

# 鄱陽湖學刊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

2017 第 1 期(总第 46 期)

## 编辑委员会

主任: 姜 玮            梁 勇  
委员: 毛智勇            龚建文            孔凡斌  
         夏汉宁            胡颖峰

特约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兴明            李 周            张坤民  
黄瑞祺            傅修延            曾繁仁  
鄢帮有            蒙培元            潘家华  
[美]斯科特·斯洛维克(Scott Slovic)

主 编: 胡颖峰

Journal of Poyang Lake

# 鄱陽湖學刊

2017 第 1 期(总第 46 期) 双月刊

## 目 录

### 生态学术名家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III 专辑 陈望衡主持

[名家前沿]

- 5 环境美学在中国:东西方的对话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III 文 谢梦云 译

[研究述评]

- 15 罗尔斯顿“荒野”三题 赵红梅

- 20 从环境美德的视角来看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观 高山

[学术访谈]

- 25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III 教授访谈录 朱 洁

### 生态文明研究

- 29 生态文明创建的绿色发展路径:以江西为例 邴庆治

### 生态经济研究

- 42 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边缘优势效应 钟晓青

- 55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研究  
——基于 31 个省(市、区)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 许正松 孔凡斌

### 环境法与政策

- 61 全球变暖视野下中国与墨西哥的能源现状分析

——从传统型能源模式向多元型能源模式转变

胡安·冈萨雷斯·加西亚 文 贺光银 冯 春 崔金星 译

- 75 当代国际环境法发展面临的内外问题与对策分析 于兴安

# Journal of Poyang Lake

---

## 环境治理

---

- 83 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基础及其困境 鞠昌华  
90 中世纪德国城市饮用水供应和垃圾处理问题研究 江山 胡爱国

## 生态批评

---

- 97 动物资本与垃圾动物:纪录片的救赎与希望  
张嘉如文 肖湘平译 方红校  
109 梭罗身份论 钟燕

## 学术综述

---

- 116 跨学科视野下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思想  
——第六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综述 梁坤  
125 本期论文英文摘要

本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

本期责任编辑:胡颖峰 王俊暉 责任终校:姚继舜(特邀)  
英文翻译、审校:柯英(特邀) 执行编辑:王俊暉  
电脑制作:张园功 封面设计:饶乐  
期刊基本参数:CN36-1307/X\*2009\*b\*A4\*128\*Zh\*P\*¥15.00\*14\*2017-1\*d

---

# Journal of Poyang Lake

---

No.1, 2017 (General No.46)  
Bimonthly (Published on Jan. 30<sup>th</sup>, 2017)

---

## Contents

5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in China: East-West Dialogue .....	Holmes Rolston III
15	Three Perspectives of Rolston's "The Wild" .....	Zhao Hongmei
20	On Rolston's View of Inner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Virtue .....	Gao Shan
25	An Interview with Holmes Rolston III .....	Zhu Jie
<hr/>		
29	The Green Development Approach to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xi Province .....	Huan Qingzhi
<hr/>		
42	Eco-marginal Predominance Effec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	Zhong Xiaoqing
55	The Ecological Effects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 Study Based on the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Including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	Xu Zhengsong & Kong Fanbin
<hr/>		
61	Energy Analysis of China and Mexic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Warm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Energy Model to the Diversified Energy Model .....	Juan González García
75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	Yu Xing'an
<hr/>		
83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Dilemma of Avoiding "Control after Pollution" .....	Ju Changhua
90	On the Drinkable Water Supply and Rubbish Disposal in German Cities of the Middles Ages .....	Jiang Shan & Hu Aiguo
<hr/>		
97	Animal Capital and Garbage Animal: Documentary Redemption and Hope .....	Chia-ju Chang
109	Henry David Thoreau as a Diarist and Surveyor .....	Zhong Yan
<hr/>		
116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 Ecological Thought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 Overview of The 6th Cross-strait Ecological Literature Symposium .....	Liang Kun
<hr/>		
125	ABSTRACTS	

---

**主持人语:**国际著名学者、美国科罗拉多州大学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III (Holmes Rolston III) 教授对于中国哲学界早已不陌生。国际上公认为他是环境伦理学之父,而其学说的影响绝不只在环境伦理学这一领域。尤其在正在建设的生态文明时代,罗尔斯顿教授的学说特别是环境伦理观与“荒野”哲学观正在发挥着全方位的影响。不仅如此,罗尔斯顿教授还是诸多关心、热爱中国的外国学者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得比较多也比较深入的一位。他在为拙著《中国环境美学》(英文版)写的评论中说:“中国人对于自然,有一种强烈的家的意识。‘家园感因此代表了对自然的最高认同’……书中最好的观点是,中国人长期传统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这种和谐所构成的整体美。这也许是全球环境美学的未来……”钦佩罗尔斯顿教授对中国的环境美学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并充分肯定了它在构建全球美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2015年5月,武汉大学主办“首届环境美学与美丽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年逾八旬的罗尔斯顿教授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在这次研讨会上,他作了精彩的报告,同时也接受了专访。这个专栏中有两位中国学者也值得介绍一下。一位为高山副教授,留美博士,她是罗尔斯顿教授的学生。另一位为赵红梅博士,她的博士论文《美学走向荒野》为研究罗尔斯顿环境美学思想专著。感谢两位博士对于罗尔斯顿教授思想的精彩阐述。(陈望衡)

## 环境美学在中国:东西方的对话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III 文 谢梦云 译

**[摘要]**本文就环境美学领域中的“艺术与自然”“城市、乡村与荒野”“人居之处”“景观之丑”等问题提出看法,并结合西方环境美学思想与中国儒家、道家等哲学中的环境思想,通过探讨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环境政策的关系,为发展美丽中国提出建议。这些将对中西方环境美学的对话产生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环境美学;景观;环境问题;生态美学;人与自然;哲学

虽然我曾经六次造访中国,但由于我个人太“西方”,因而并不能给中国的环境美学带来很好的观点建议。我走遍了世界各地,也已经在美国的不同地区居住了几十年,我一直在研究思考环境美学,因此我将提出一些深入性的问题,以此引发大家的思考。此外,我非常希望能够从读者的反馈中找到为我答疑解惑的东西。

### 一、艺术与自然:中国景观是艺术的创作?

在西方,我们通常认为环境美学源于自然,而非源于建造的环境。科罗拉多大峡谷、大提顿国家公园或者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都有一种不同于凤凰城、圣路易斯、洛杉矶的美。我们通常将环境审美和艺术审美区别开来,但是也许中国的景观是一种艺术创作。人类与自然在一种彼此之间互相支撑、互为加强的创造性动力下运转,造就了一个美丽非凡

---

**[作者简介]**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III (Holmes Rolston III),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特聘教授、哲学荣休教授和环境伦理学首席教授。

**[译者简介]**谢梦云,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 430072)。

的中国。在儒家的世界观中,人类有责任改造自然、丰富自然。在中国,艺术与自然并非互不相干的两种类别,而是互相联系的,即人们在不断地改造、重现新的自然景观。事实上,中国环境美学所倡导的是人化自然之美。

西方最近的一种观点是: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的到来,人类已经进入一个新纪元,一个“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时代,即人类主宰景观。可能会有人反驳说,中国已经经历了千百年的“人类世”时代。在我所居住的科罗拉多州,一些耄耋之年的人会回忆说,他们的父母辈或祖父母辈是第一批定居到这个荒野中的欧洲人。中国有记录的历史就已经达6000年以上,并且在不断地进行自己的景观创建。因此,在中国,景观一直以来就是人类与周围的自然系统交互的结果。中国人一直在以一种艺术的手法来阐释景观,同时又把它看作是一种自然作用的过程。也许对于西方来说,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但是对中国来说,这是源远流长传下来的,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

## 二、城市、乡村、荒野:中国人是否是三维人?

我将人类分为经历过城市、乡村、荒野三种体验的三维人。这种三维人概念可被视为一个椭圆,椭圆的一端代表自然,另一端代表城市。椭圆中的主要部分具有自然属性,一部分具有文化属性,当然大部分兼具自然属性与城市属性。人类活动如同一个从自身走向社会、从乡村扩大到整个国家的同心圆,而自然则处于包含所有的最外层的那一个大圆。儒家也有相似的说法:由小家,到大家,再到国家,再到世界。一些研究发现,中西方的专家学者对景观概念的阐述是很接近的<sup>①</sup>。

地球上的部分区域以城市景观为主,如伦敦、纽约,居民没有太多有关荒野、乡村的居住体验。部

分区域则大多以乡村景观为主,居民能够拥有荒野、乡村、城市三个维度的全方位景观体验,比如堪萨斯州或内布拉斯加州。我居住在科罗拉多州时也是如此。当我从住所开车前往更大的城市——丹佛时,我会穿过乡村地区。或者我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在一天当中的数个小时欣赏着野外的落基山国家公园美景。即使在大城市丹佛,其200万居民也可以通过天际线往西体验到埃文斯山脉的荒野景观;在晴朗的日子,往南可以远眺派克峰,往北则是目朗斯峰。在丹佛,很难像纽约或费城那样盖起摩天大厦来。来到户外往西望去,天边映入眼帘的是起伏的山峦,此情此景之下,任何摩天大厦都是微不足道的。

当下的中国是什么境况呢?

毋庸置疑,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度,中国拥有城市、乡村、荒野这三种景观类型。中国有大量人口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对于中国人来说,兼具三种类型景观的体验是否也越来越困难?

但是,你可能会发出反对之声,既然中国人已经有了乡村自然景观,那人们还需要追求荒野的自然景观吗?虽然我们不在荒野中居住,但荒野的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基础。在荒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生命在时间级与数量级上共同产生的奇迹。生物圈中最为重要的元素——森林和天空,阳光和雨露,河流和土壤,绵延的山脉,交替的季节,动物和植物,水文循环,光合作用,土壤肥力,食物链,遗传基因,物种的形成和繁殖,继承和复归,从生到死再到新生——早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亘古常存。人类的思维无法创造出生机勃勃又结构紧密的森林,一片野外森林是独立于文明之外的存在,它是永恒的自然规律支撑着万物生息的一种存在或象征。这样的经验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在科罗拉多州时我能经常沉浸在这种体验当中。相对于美国人而言,

<sup>①</sup>Kong-jian Yu, "Cultural Variations in Landscape Preference: Comparisons among Chinese Sub-groups and Western Design Expert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vol.32,1995,pp.107—126.

中国人在成为这样的三维人过程中尤为欠缺这样的荒野体验。

自然无所不在,它同样也存在于农业、城市的景观之中。所以在西方,我们想要表达得更为准确,可以称之为“荒野自然”,即非农业非城市的自然。道家讲的是“道法自然”,其中“自然”之意与“荒野”相似,或至少指的是自发生成的自然。有时候我们说人们需要“顺其自然”,就好比在河流里面游泳的时候需顺流而下,而非逆流而上。道家与其相类似的概念是“无为”,指的是顺应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来达到人的目的。有时我们会说“行动顺其自然”,但是我们通常都会困惑要如何顺其自然,顺其自然是否合适,因此,是否采取这种态度需要依具体情况而定。那么,中国人也会寻求“顺其自然”吗?

不同的国家对城市、乡村、荒野的重视程度不同。任何一种景观,甚至包括荒野在内,都能被植入文化意义。在美国人的思维当中,即使是荒野景观所具有的野性,也是具有文化意义的。在中国,也许你会回答,农业景观是重点;在乡村,艺术与自然互相交织<sup>①</sup>。工程景观在中国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在很长一段历史上都鼓励人们在乡村居住,鼓励农业技术的发展。如水稻种植中的水利供应与控制,管理者是否真的能让河水顺其自然流入稻田?数个世纪以来,国家政府对河运、水渠和防洪设施等景观进行积极投入的建设。当自然不能够供养人类的时候,就需要被征服、被克服,这即是海德格尔将自然视为储备的思考。自然需要被驯服。

在儒家思想中,人与自然应该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共生状态。人类已经意识到这种和谐是通过克服不和谐来达到的,正如西方语境下以正确克服错误。儒家思想主张和而不同,接受差异性、多样性的存在,进而将这些差异和不协调统一到和谐中来,例如烹饪或者演奏,使不同角色的参与调和至

一种和谐的状态。这种和谐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不同的表现。农民们通过对季节的观察,掌握了自然的节奏,产生了二十四节气,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生态系统服务。

你或许会说,中国人通过田园生活的乡野视角,以审美及现实的眼光去欣赏他们的农业景观,那么西方人如何用美学观点来作出回应?水稻在美国南部和加利福尼亚湾沿岸也有种植,但我们不会在落基山以西地区种植。如此说来,对于稻田的欣赏而言,中国的审美方式中是否存在一些美国所不具备的经验?我们拥有广阔的玉米地和麦田,亦能发现硕果累累的田地之美。有趣的一点是,我们采取等高耕作以避免土壤流失的方法却增强了景观的审美趣味。流动的曲线是人工的产物,也增强了连绵起伏的平原的自然弧度。

我们同样建造了很多改变景观的大坝,这些大坝的水库如今基本都不能蓄满水,我们因此断定这些大坝对景观造成了破坏。但是,人们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人们要尊重生命,那么水就是生命之源,为了人类的繁荣,就要通过修建水坝来保护和管理水,这与任由河流自由流淌一样,都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农业景观的美学品质被放大了,因为它们表明人类贴近自然的一面,自然的环境使得人类得以蓬勃发展。当前,中国和美国都在增强农业的工业化,这对传统的家庭式农业与农业景观审美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耕作方式不再是传统的延续,农业景观是否还具有令人愉悦的美学价值?中国对有机农业是否采取了一些举措?有机农业的方式是否更为赏心悦目?

人需要城市的感受与体会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但是我们所渴望的城市同样伴随着自然元素。我经常被指责忽视了城市环境伦理。中国能否将自然元素纳入到城市当中去?在美国,人们通

<sup>①</sup> Wang-heng Chen, *Chine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Su Feng, trans., Gerald Cipriani, eds.,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141—159, pp. 186—227.

常利用绿化设计、在建筑大厅内栽种大型植物、在街道上种植树木、对空间进行开放等方式,为城市居民的工作及日常生活提供更为舒适便利的环境。

你能否在你的城市找到开放空间以及公园?你能否切身感受到脚下的土地与头顶的蓝天,而不仅仅是混凝土的高楼大厦?你是否能欣赏到鲜花在初春绚烂的色彩,如日本人能欣赏到盛放的樱花,而在美国的华盛顿能够感受到盎然的春意一样?你的城市是否有绿色的空间,并且是安全的?政府的规划往往喜欢建造大型的广场,适于游行与节日庆祝,这些广场是充满绿化的吗?当建造城市的时候,规划人员是否询问你这个城市的设计是否更好地给人们环保的舒适的生活环境,比如绿树成荫的小径、空间,让城市绿水环绕的河流?

武汉地处长江和汉江的交汇之处。陈望衡教授赞扬了武汉长江大桥与建筑及城市背景相互契合:“这座桥是武汉城市景观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元素,它将城市不同特征的元素统一为一个气势恢宏的整体,一端是蛇山及黄鹤楼,另一端则是汉阳龟山电视塔。”<sup>①</sup>中国的河流经常发生洪涝,河流的滩涂地带不适合建造建筑,这些区域都非常适合用于留住城市中的自然景观。

城市之间有时可以相互融合以突显环境的自然特征。部分城市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特征非常突出,例如盐湖城、西雅图、旧金山、爱丁堡、威尼斯、开普敦,但是对于亚特兰大和圣路易斯、伦敦却并非如此。巴黎城内有莱茵河流经,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个自然特征突出的城市,所以巴黎人建造了很多的公园和花园。2015年3月,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访问和参观群山环绕的

京都时,被京都的寺庙和园林深深吸引。新加坡被誉为“花园城市”,而中国有着悠久的园林历史,彰显了人类文化与自然的交融。我们是否可以将园林看作是环境美学的主要表现?当代的中国是否拥有真正意义上的园林城市?<sup>②</sup>

### 三、人居之处:中国是否不同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中国环境美学的特色在哪里?

景观之美给予栖居者一种归属感,一种家园感。人类长期以来都是向往山水秀丽的地方,这叫做“地域偏好”,或称之为“恋地情结”(topophilia)<sup>③</sup>。所有人都需要一个称作“家园”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有让他们持续爱护和关心的景观。英国人热爱他们的乡村,在美国我们歌唱美丽的美利坚,唱得起了鸡皮疙瘩。美国人喜欢谢南多厄河谷、切萨皮克湾、科德角、大湖区、俄亥俄河流、塞拉斯、阿迪朗达克山、西南荒漠、西北太平洋、落基山脉。俄克拉荷马州人唱道:“我们知道自己属于这块土地,我们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蒙大拿州以其山脉的名称来命名,并声称为“大天空之州”。西弗吉尼亚州则拥有“群山之母”的美誉。怀俄明州以其开阔的平原、矗立的高山以及独特的牛仔文化而自称为“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方”。中国人对于自然更是有着强烈的家园感。“家园感是环境特征的最高等级”<sup>④</sup>。中国也拥有独一无二的景观风貌吗?

难道我们对一个地方的管理不应该将这个地方的管理在人类干预之前的情况考虑在内吗?出于伦理考虑,地方感的建立是有必要的,但同时人也需要一种环境能够居住的感觉。在西方,我们常常听到有人呼吁:拯救自然!但在中国,你不会听到那么多保

① Wang-heng Chen, *Chine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Su Feng, trans., Gerald Cipriani,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242.

② Wang-heng Chen, *Chine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Su Feng, trans., Gerald Cipriani,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 243—258.

③ Yi-fu Tuan,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74.

④ Wang-heng Chen, *Chine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Su Feng, trans., Gerald Cipriani,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75, pp.61—108.



护自然的呼吁,而是呼吁人们如何建造那种与人和谐为一的景观,即儒家的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sup>①</sup>,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sup>②</sup>。用道家思想来概括,则是以风水择居,调和阴阳。这将有助于实现陈望衡教授“将工程做成景观”的愿景<sup>③</sup>。

中国人至少在理念上坚持将自然纳入景观的范畴,但同时又偏向“人化的自然”。“人化的自然塑造了环境及其外在的审美表现,因此是文明的一个特征。如今,自然世界的方方面面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类世界发生联系。地球被‘人化’,成为人类的一个对象……环境之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活动的进行”<sup>④</sup>。

在西方,我一直在问:“人类属于自然以外的存在,还是自然的一部分?”然而中国人似乎不会去问这个问题,杜维明先生说:“中国人……坚持认为个体是自明的真理……因此,个体经历的审美趣味不再是个人的感觉,而是‘内在情感与外在景象的合一’……我们不会将自己从自然中分离开来,不会以这种不感兴趣的思维模式去研究它。我们的方法是悬置自身的感官体验及概念工具,以此使自然在感觉中具象化,赋予自然一种可以拥抱自身的亲和力。”<sup>⑤</sup>

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们的世界观当中可能有西方人所没有的文化资源。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独立于自然而存在,人与自然并非从属于两种不同的本体论范畴。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当中国人回忆古老的历史时,人是主角,古代中国对环境的记载中并没有对无人涉足的环境景观进行歌颂。人在中国的景观之中始终扮演着参与者的角色,也许在有着悠久的人类发展史的地方,如非洲、欧洲等皆是如此。这种人与景观的相互统一对于美国,尤其是我所居住的西部而言,是很难实现的。也许只有当我居住到肯塔基州一个我父亲和祖父曾居住过的种植场时,这种审美体验才能实现。

儒家的世界观还被誉“天人学”(anthropocosmic),人构成了连接天地万物的锁链,世界在一个人特定的意识及道德观中具现<sup>⑥</sup>。人们能感觉到“气”的存在,而“气”则是构成及推动世界的核心力量。

但对于西方人来说,这种“天人学”比较难以理解。自然的确与我们息息相关,是的,我们把它视为国土、家园,但我们同时也面对着亿万的非人类的自然。我喜爱大峡谷,我曾穿越谷底深处的科罗拉多河,但在峡谷深处,一个人不会觉得他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而会感觉到与自然分离的。与人密切亲近的自然往往是那些长期被人类占据的自然。我经常去怀俄明州黄石国家公园,运气好时我能看到狼群正在猎杀麋鹿。我赞叹这种自然的生命循环,但并不想参与其中,无论作为捕食者还是猎物。

如同欧洲人一样,中国人到美国去是希望亲眼看到他们所谓的“新世界”,从而思考自己所居住的“旧世界”。而住在落基山脉的美国人则对于美国被

① Xin-zhong Yao, "An Eco-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Tianren Heyi,"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vol.9, 2014, pp.570—585; Wang - heng Chen, *Chine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Su Feng, trans., Gerald Cipriani,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p.24—25.

② Confucius, *Confucius: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 The Doctrine of the Golden Mean*, James Legge, trans., NY: Dover Publications, 1971, p.VI, p.XXI, p.192.

③ Wang - heng Chen, *Chine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Su Feng, trans., Gerald Cipriani,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268.

④ Wang - heng Chen, *Chine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Su Feng, trans., Gerald Cipriani,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67.

⑤ Wei - ming Tu, "The Continuity of Being: Chinese Visions of Nature," in 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Berthrong, eds.,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 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06, p.118.

⑥ Wei - ming Tu, "An 'Anthropocosmic' Perspective on Creativity,"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vol.2, 2010, pp.305—311.

视为“新世界”的看法不肯苟同,他们庆祝自己生活在最原始的“旧世界”,即使他们的住区是在现代开发的。原始自然及史前文化都在这儿的景观中留下足迹。确实,中国拥有“旧世界”的历史与景观,但如果你想目睹真正意义上的“旧世界”,那么,来美国吧,我将带你参观大峡谷的谷底深处。

当我们在学校试图教给孩子们地球上生命进化的相关知识时,常常采用这样的比喻:假如地球上生命的发展史只有24小时,那么人类的历史则仅仅占据了几秒钟。地球上的生命蓬勃发展了35亿年,而人类的出现大约只在300多万年前。美国使我们体验了人类仍未广泛涉足的这个几近永恒的自然。如此看来,从一个科学的视角出发,我们对天学所形容的人的世界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因为宇宙的绝大部分都是人类所不曾涉及的。

与此同时,我们有称之为“人择原理”的存在。科学家们发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以来,天文学与原子论之间戏剧性的相互关系正引导着宇宙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天文现象,如星系、恒星、行星的形成,都与微观物理学现象有着密切关联。而那些复杂的中观尺度的问题,都取决于天文尺度及微观物理学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因宇宙的发现而迷失了方向的人类现在又再度回到了中心地位。这种大胆的设想中,人类是宇宙中已知的最复杂的群体,他们是唯一知道地球上生命历程的物种。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感受到了天地之“气”,也许在这一点上,东西方之间可以互相学习。

#### 四、中国景观之丑

你认为中国景观中的哪一面是有所欠缺的?这个问题可以一分为二:作为自发性的自然景观的丑之何在,作为艺术作品的景观的丑之何在?儒家的

理想是和谐,而在中国景观中,什么是不和谐的?

##### (一)自然景观之丑

中国的大地上绵延着肥沃的土壤、丰富如长江、黄河般壮阔的水资源,但往往这些河流的不可控制一直困扰着人们。据历史记载,这些河流曾上千次地化身洪水猛兽摧毁了数百个村庄,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造成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灾难。黄河泛滥造成死亡的人数比地球上任何其他河流都要多,数千年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地治理这些河流。对中国而言,这些河流是否具有美学品质?据报道,中国的村民们并不喜欢如此湍急、迷雾笼罩的河流景观。相比之下,具有丰富的教育背景的中国知识分子则发现,这样的景观增加了他们的审美体验,因为它增强了景观的神秘感。

美国经常会评选出一些所谓的“自然风景河流”。而对于中国的河流而言,是否其野性程度越低,则其审美价值就越高,比如筑堤立坝以控制河流量?三峡大坝的建设是否造成了景观美学品质的下降,或者它造成了审美感知的变化,由河流之美转变为湖泊之美?美国平原上的湖泊都是人工水库,而山地湖泊则都是自然的冰川湖。大型水库的确为很多鸭子、各类水鸟、数百万的鹅以及秃鹰等水禽提供了栖息地,但也因此失去了河流上游的峡谷。在这场替换中你是否找到了审美上的实质收获?

孟子曰:“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sup>①</sup>这些猛兽的存在确实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困扰。在美国,人们曾经竭力驱逐当地

<sup>①</sup>Mencius, “Mengzi (Mencius),” in Philip J. Ivanhoe and Bryan Van Norden, eds., *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2nd), Bryan W. Van Norden, tran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2005, pp. 115—159.

的山狮、熊、狼等对人类有威胁的动物,但我们现在却在不断地努力恢复。非洲人的生活中常伴随有大象和犀牛,印度人也试着与当地的老虎和谐相处,面临的则是挑战与老虎共存。中国热衷于自己的居住景观,那么那些洪水和猛兽就意味着丑吗?

人们珍惜这些魅力十足的巨型动物。落基山公园中,数百游客蜂拥而至,以期望在麋鹿发情时看到一场争斗。运气好的话,可能还会看见大角羊出现在岩石上,运气再好一点的话,大角羊会有一副漂亮的卷曲的大角。在黄石国家公园,我们为狼群生活繁衍的恢复而欢欣鼓舞,为一个世纪之前对它们的捕杀感到羞耻。曾经,在黄石公园看到灰熊就是一种奢望;而现在,成千上万的游客已经能够在黄石公园一睹荒野终极象征的风采——群狼啸月。也许,野生动物的绝迹之处,其景观才是真正的丑。

## (二)人造景观之丑

建筑为城市带来繁荣,同时也带来弊端。中国国内的空气质量被严重污染,持续下降,尤其是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柴静的《穹顶之下》报道了中国环境严重受到污染的状况,她发现孩子们几乎都不知道天空是蓝色的,而且从未见过白云,夜晚也看不到一颗星星。

城市的建设带来商业的繁荣,但从美学上来说,它是否令人赏心悦目?陈望衡教授担心的是:在城市,发现具有吸引力的建筑并不难,但这些建筑却因为与环境的不和谐而糟蹋了景观<sup>①</sup>。

你所在的城市中有多少是没有价值的“垃圾景观”?不幸的是,从我之前的中国之旅来看,所谓的“垃圾景观”很常见。在有着“群山之母”美誉的西弗吉尼亚州,有一个这样的谚语:当一个人学会捡起自己的垃圾时,他才算真正成人。那么,中国人是否捡起了自己生产的垃圾,你们的道路两旁是优美的风景或是无用的垃圾景观,你们的景观有多少已经被外来入侵的杂草而丑化?

中国的森林已经被过度砍伐,全国约有14%的面积为森林所覆盖,但只有2%的面积受到了完整的保护,许多森林被桉树人工林所取代。中国目前是世界上第二大木材消费国,导致了国内森林被大量砍伐,同时又向国外进口木材,进而导致其他国家的森林资源被开采。中国曾经有过大规模的植树造林项目,但是即使再植树,砍伐过后的景观也是光秃秃的。森林的砍伐造成了地表径流增加,水土流失严重,水流夹杂着泥沙汇入河流,对下游产生不利影响。这种对木材的过度需求是否导致了丑的景观?而过度的放牧则导致中国的土地沙漠化速度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

中国广袤的土地承载了约7500种野生动物繁衍生息,中国是除了热带地区国家之外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但野生动物却面临着中国巨大的人口带来的压力。至少有840种动物的生存受到威胁,濒临灭绝,主要是由于这些野生动物因食材、药材、装饰等用途而被非法采集、捕猎,栖息地也遭到破坏及污染。中国拥有上千个自然保护区以及各种濒临灭绝的野生生物的保护法规,但是这些要如何有效地起作用呢?许多大型食肉动物变得十分罕见。也许类似当时孟子所赞扬的驱逐那些危险动物的行为,在如今看来只会使景观变得更丑,而非如同古代那般具有美感。如果没有熊、山狮和狼,那么我所居住的落基山脉将不再美丽如昨,即使人们在与野生动物相处的过程中充满了危险,但还是要与它们共享自然景观。

鹤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常被当作不朽与永恒的象征。鹤体型大,长得高,能乘风翱翔。丹顶鹤曾被中国国家林业局列为中国代表性动物的候选者之一,就像鹰被选为美国的象征一样。鹤的图案被绣到古代官员的官服上,并且通过一些细微的差别来区分官位的级别。人们羡慕鹤翱翔天空扶摇直上的强劲,所以常把鹤的羽毛拿来防止疲惫

<sup>①</sup>Wang-heng Chen, *Chine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Su Feng, trans., Gerald Cipriani, eds.,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62.

的护身符。在美国自然景观中有两个种类的鹤,沙丘鹤与美洲鹤。美国西部成千上万只沙丘鹤的迁徙飞行构成了一个壮观的场景,而美洲鹤则在濒危物种的名单之上。中国三峡大坝对鹤的种群数量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拥有9个种类的鹤,且鹤的数量超过了世界总数的一半。这些鹤是否在中国的自然与文化的和谐统一中自由地栖息与生长着?

#### 五、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美丽中国、生态中国?

许多去美国国家公园的观赏者,其目的以游览风景为主,对于正在注视的生态系统,他们很少了解或对其感兴趣。中国式景观体验也许是风景美、如画性的一种,但这些喜爱中国式景观的人真的知道这些景观的生态整体性吗?他们喜欢沿河漫步,但他们知道水中是否有鱼吗?在河中游泳、洗衣服甚至饮用河水,是安全的吗?当你们致力于城市发展,建筑师与开发商在作策划时,是否会去了解什么是生态敏感区域,如一条河水或溪流,一片湿地,一片保留下来的原始丛林,城市中的一座山丘?城市规划师们会在意你们正在毁坏的自然的进程吗?

幸运的是,有些时候答案是肯定的。程相占先生认为,在生态审美鉴赏中有四个要点,它们分别是:科学知识的中心地位,拒绝人与自然二元主义分裂的自然参与,承认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与以健康作为首要价值,继续环境伦理学的指导地位<sup>①</sup>。但程相占先生已经广泛涉猎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和环境美学,他接受的一个观念就是:环境美学必须

被生态学所启示。当一个人观赏一处景观,他必须看到景色背后那些并非显而易见的东西,了解到是否有一个整体的以及良性发展的生态系统。

在人口方面,尽管印度也许很快将超过中国,但目前来说,中国仍然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13亿多人口中,你们认为是否会有1/10的人具有生态意识,能感受到生态之美?美国具有生态意识的人口比例可能也不会超过1/10,但是在参加选举及拥有较高教育背景的人群当中,这个比例将会提高许多<sup>②</sup>。问题在于,在中国的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中是否包含了环境教育?在美国,我们已经在努力推进实施环境教育这一项了<sup>③</sup>。

中国在近几年获得了一个令人感到疑虑的世界第一,那就是向环境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而且排放量预计还会增加<sup>④</sup>。也许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更能说明问题,美国在这一数值上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美国已经拥有了城市建设方面不得不遵从的《大气保护法案》。在中国是否有类似的法律法规?三峡大坝已经对当地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影响,当初规划者是否意识到了这些影响?一份最新研究表明,中国飞速发展的沿海经济正在越来越严重地损害沿海生态系统<sup>⑤</sup>。或许我们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人何时才开始考虑到他们身边的环境,他们是否曾考虑过“生态系统服务”?正如陈望衡教授所言:环境美学必须是生态文化性的<sup>⑥</sup>。

① Xiang-zhan Cheng, "On the Four Keystone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 Appreciation," in Simon C. Estok and Won-Chung Kim, *East Asian Ecocriticism: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3.

② Willett M. Kempton, James S. Boster and Jennifer A. Hartley, *Environmental Values in American Culture*,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1996.

③ Stephen R. Kellert, *Building for Life: Desig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Human-Nature Connection*,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5.

④ Chris P. Nielsen and S. Ho Mun, eds., *Clearer Skies over China: Reconciling Air Quality, Climate, and Economic Goal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3.

⑤ Qiang He, et 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astal Ecosystem Change in China," *Scientific Reports*, vol.4, Article Number: 5995, 2014, pp.1-9.

⑥ Wang-heng Chen, *Chine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Su Feng, trans., Gerald Cipriani, 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p.13.

## 六、环境美学与环境政策:美丽中国、拯救中国?

中国的环境美学是否被寄予希望去推动一项新的环境政策?在美国,环境保护的主导力量源于对自然之美的难忘的体验。当问及美国人为何要拯救科罗拉多大峡谷或是大提顿国家公园,我们的回答是:“因为它们的美;因为它们雄奇。”环保意识被认为是必须具备的,个人的环保行为应是出自个人意愿,不需被要求。我们会开车在国内游览欣赏风光,在途中欣赏拂动的麦浪,联想到空气、土壤、水等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元素。当我们歌唱“美丽的美国”时,我们歌颂“高山雄踞于富饶的平原之上”,这首赞美诗描写的就是科罗拉多一座高山之下的场景。人们应当去赞美并保护环境之美,生活如果缺乏自然美、乡村以及荒野的体验将是贫乏的。

这种审美体验通常被认为层次很高,但并非要必备:工作生活第一,景观审美其次。当与基本的发展需求相冲突时,任何的审美伦理学都需要与更有说服力的力量相结合,希望能将发展与审美的矛盾转为资源与生命依托间的取舍问题。森林生态系统将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管控水资源、防止土壤侵蚀。如果人们能将生态系统健康、社会福利、资源利益以及审美质量进行综合考量,同时结合审美价值以及资源价值,将会构成环境保护行为最为充分的理由。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他的大地伦理中将义务与伦理学结合起来:一切保护生物群落完整性、稳定性以及审美价值的行为都是正确的,而一些与之相反的行为则都是错误的<sup>①</sup>。利奥波德将美学上升至义务,正如我们所讨论的生态系统之美,美被纳入环境生物学的基本因素,而不再仅停留于景观所带来的愉悦感之中。

但如果美与利益二者不能同时兼得呢?诸多人类的兴趣所向根本不具有美学意义,并且导致了审

美价值的折衷甚至消失。而且这些兴趣也许会促使人们妥协,甚至牺牲掉审美价值。那么,我们将如何说明环境之美对环境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个人也许不会去品味居住在大峡谷或大提顿的日常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对这类景观有着审美体验的需求。当一个人去攀登大提顿的山峰,或是深入大峡谷谷底,或者观赏沼泽地上生活着的鹤群时,这些景观经验给予我们一种更为深入参与的感觉,与自然的密切关系使得人们感受到了存在的意义。人虽不需要在荒野中生活,但却需要对荒野的体验。这种体验的需求从自我中剥离开来,成为自主的自然或者“道法自然”的一部分,与自我保持相对的独立。这种对土地的尊重与责任感深化了自我,使自我蜕变革新并产生出更深层次的个性。

当自然触手可及,出现于我们居住的环境中而不得不进行人为干预时,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欣赏自然美就是一种愉悦,因此对自然的管理就显得不再如此紧要。当我们认识到大地在我们脚下,天空在我们头顶,我们会强烈感受到这种美的景观。我能辨识出我所居住的区域景观,这会使我关注于保护自己家乡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那样我就不会仅仅对工作感兴趣,同时也关注我生命中那片属于我的土地,由此也促使我主动去关注环境保护的政策。是的,我需要一份工作,我希望美国能够繁荣发展。但如果在工作与自然二者间作选择,我为什么要选择自然?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并且热爱美国之美。如果富庶的平原背后没有雄伟的高山,美国人的生活是繁荣不起来的。

所以,中国人应当这样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是的,我需要一份工作。但正是为了中国的蓬勃发展,我们才必须保住中国之美。”如果经济的繁荣是以越来越高的气温以及灰色的天空作为代价,你们愿意吗?我们也许可以想到蒙大拿州辽阔的苍穹之美,那里一半的美景都在天空,阳光的倾照,一望无

<sup>①</sup>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23—224.

际的蔚蓝,变化万千的云彩。你们想让这样美丽的景观变成一个垃圾丛生的景观吗?你愿意那里充斥着有毒的空气,并且伴随着有毒的泥土与河水,同时缺乏生物多样性,还杂草丛生吗?你愿意用这样的景观换来一个无价值的景观吗?在不间断的发展之后,美丽中国的未来是否因为肆意发展而变得越来越丑呢?

总之,我们罕见地因为美国国会最近在环境立法上的作为而欢欣鼓舞。但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我们的联邦政府一直活跃于进行一系列的环境立法行为。这些环境法案往往是关于环境质量、环境价值、景观的美学价值、濒危物种、生物多样性、荒野的担忧,以及土地的生产能力及多样性,或者是可持续性、未来子孙后代的问题,等等。国家财产包含了自然资源,无论对人类生存发展是必要的或是非必要的,都应该被单纯地看作是一个商品。仅仅举一个例子,国家环境政策法案要求任何一个大型联邦项目必须附有一份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的详细报告。这个法案大大增加了环境的管理及诉讼,也引发了很多机构对于公共用地的争论。美学价值已经构成了这些争论及评议中的常规部分。

政治系统中的巨大变化大部分往往不是由政

治领袖发起的,而是从更加基层的大众价值观念变化开始,由环保人士以及民间组织做先锋率先开启。政策的转变反映了民间对于自然环境伦理与价值的重新反思。中国是否有类似的群体及情形,是否有与环境保护署同等功能的机构,这些机构是否将中国的景观美学观点运用到规划之中,如果没有,中国的美学家以及民间组织会表达抗议吗?

在落基山脉居住生活时,我认为自己尤为荣幸。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懂得欣赏景观的物种,如果我们不去充分享有并珍惜这份灿烂的美丽,还会有谁去歌颂、保护这份美?而且,如果因为我们失去了它,而使得子孙后代再也欣赏不到,那将是多大的遗憾!如果中国人失去美丽的中国,那将是多大的遗憾!中国人在悠久的历史传统中擅长于寻求和谐,追求天下大观,将部分融入进一个更加完美的整体。我们共同希望这将会是中国环境美学的未来。只有如此,中国才能繁荣昌盛,西方也才能在与东方的对话中有所领悟有所升华!

(2015年5月20—23日期间,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教授赴武汉大学参加由陈望衡教授担任主席举办的“首届环境美学与美丽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文为罗尔斯顿教授参加此次大会的发言论文)

# 罗尔斯顿“荒野”三题

◎赵红梅

**[摘要]**立足于大量的资料检索、理论思考与具体的环境体验,我们发现罗尔斯顿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与环境美学的关键词是“荒野”。在哲学走向荒野、价值走向荒野与美学走向荒野的主张背后,荒野是切入与进入罗尔斯顿环境思想的关键点。本文从荒野与自然、荒野与自由、荒野与文化三个层面来解读罗尔斯顿的荒野概念,认为荒野是自然的原初状态,荒野表达着自由的精神,荒野与文化相互交织又相互联系。

**[关键词]**罗尔斯顿;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

罗尔斯顿的研究领域与学术兴趣十分广泛,从物理学到神学、从哲学到环境政策、从环境伦理学到美学,他都有所涉猎。在对环境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与反复思考的基础上,罗尔斯顿提出哲学走向荒野、价值走向荒野和美学走向荒野等主张。荒野之于罗尔斯顿意义非同寻常。罗尔斯顿特有的中间立场使他认为,荒野与自然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通之处,两者紧密相关;荒野与自由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通之处,荒野是人类精神自由放飞的领地;荒野与文化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通之处,荒野与人类文化相互支撑。

## 一、荒野与自然

纵观人类发展史,我们既能发现荒野与自然之间二而一的关系,又能发现荒野与自然之间一而二的关系。原始社会时期,自然就是荒野,人是自然的,也是荒野的,人的世界、自然的世界与荒野的世界是一体的。原始人或荒野人生于荒野、居于荒野、食于荒野、老于荒野,人完全被自然荒野所接纳和消融。正如卢克莱修在《天道赋》中所言:“当此之时,民犹未知夫用火,虽获兽皮而不衣皮,故形无蔽而仍裸。

惟林莽之是栖,或岩穴之息。迅风烈雨,忽焉来袭。乃庇秽体,于彼榛棘。”<sup>①</sup>荒野与原始人(荒野人)同属于一个充满“野性”的世界。然而,伴随着文明化的进程,自然与荒野的整一性断开了。自然世界分化为人工的世界、半自然的世界及荒野世界。被人类完全征服的自然世界成为人工的世界,如城市;处于被半征服状态的自然世界成为与人相邻的周边世界,如乡村;尚未被人“侵犯”的自然世界则沦为荒野。荒野成为被忽视、被冷落、被遗弃的世界,即使有人想到荒野,也是在被鄙视的意义上使用的。

从荒野体验与历史考证出发,罗尔斯顿通过描述与深思,回到荒野本身,发现了荒野的价值,肯定了荒野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荒野是自然,只不过是本原的自然。从历史的演化来说,荒野是原初状态的自然,是自然的自然、自然的典范、自然的本真状态。荒野可被当作原始自然的一个活生生的象征、标本或博物馆。荒野与自然的交融关系使得罗尔斯顿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往往不把二者相割裂。在《哲学走向荒野》《环境伦理学》等著作中,罗尔斯顿一方面把“荒野”与“自然”联用,如“荒野自然可不懂我的参照

**[作者简介]**赵红梅,哲学博士,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教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 430062)。

<sup>①</sup>转引自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页。

系,对我最深层的文化规范也不会有任何关心”<sup>①</sup>;另一方面又将“荒野”与“自然”互换使用,如他曾说过:“每一个荒野地区都是一处独特的大自然”<sup>②</sup>;“尽管人们常需要自然所给予的一切,但他们对环境的利用并非易如反掌。他们常常不是使自己去适应荒野自然;相反,他们要在大自然之上劳作,并根据其文化需要来重建自然”<sup>③</sup>;“当哲学实现这一荒野转向时,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自然呢”<sup>④</sup>。

种种说法表明,在罗尔斯顿这里,荒野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十分密切,而且常常是纠缠在一起的。有人可能会问:既然荒野与自然的关系在罗尔斯顿那里如此密切,那么为什么罗尔斯顿又提出哲学走向荒野、价值走向荒野和美学走向荒野,而没有提出哲学走向自然、价值走向自然和美学走向自然?这其中的缘由,虽然罗尔斯顿没有明说,但是我们透过其环境思想也能感觉到他如此提法的寓意所在。其一,自然内容庞杂而用法颇广。自然既指向人工自然,又指向非人工自然。罗尔斯顿用“荒野”而不用“自然”一词,表明他的重点旨在纯粹的自然荒野而不是人工的自然。哲学走向荒野就是哲学走向纯粹的、未被人类侵犯的自然。其二,一般人都能理解哲学走向自然,但走向荒野则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更深的反思能力。其三,荒野是更为本原的自然,是尚未异化的自然,是自然的本真内核。罗尔斯顿自己就认为,荒野是世界的基础的一个原型。罗尔斯顿提出哲学走向荒野、价值走向荒野和美学走向荒野而不是走向自然,也许他的目的就是要使哲学、伦理学与美学回溯到自然的深处、进入到自然的本真状态,以实现哲学、伦理

学与美学研究上的荒野转向,并最终达成人工世界与荒野自然的和解。或者说,罗尔斯顿倡导哲学走向荒野、价值走向荒野和美学走向荒野,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倡导人们重新拾起与“自然的自然”世界的情感联系,通过真、善、美的荒野回溯,重建人与世界的完整性。

## 二、荒野与自由

从自然与荒野的联系来看,荒野是自然的原生态;从自由与荒野的关系来看,荒野是“自由自然”<sup>⑤</sup>。罗尔斯顿认为,虽然人类在很大程度上能统治自然,但即使不说能自然也能统治我们,至少荒野是按自己的方式运行着,并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自然自身有着一一种自主性。因此,罗尔斯顿指出:“‘荒野’一词中有着某种东西,是与‘自由’一词相契合的”<sup>⑥</sup>;“荒野对宗教自由很重要,也能促进宗教自由”<sup>⑦</sup>。他还指出:“野性虽说是人类关心范围之外的一种活动,但它代表的并非一种无价值的事物,而是代表一种与我们相异的自由,代表着一种天然的自主性与自然维持的能力”<sup>⑧</sup>;“虽说自由的火炬是在人类这里才被全部点燃,但这在其他一些物种那里已经开始闪亮。说一头母狮‘生而自由’是诗的浪漫,而非科学的严谨,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自由就是不真实的了。因为这样的诗实际上也能帮助我们弄清楚真实的情况。事实上,随着科学家对像狮子这样的动物作更好的观察并找出它们与我们的亲缘关系,我们会越来越觉得,把人类自由的价值看得那么高而把其他动物的自由看得那么低,是很难站得住脚的”<sup>⑨</sup>。罗尔斯顿

①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1页。

②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③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页。

④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⑤ 包庆德等:《生态哲学视界中的荒野范畴及其研究进展》,《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⑥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⑦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9页。

⑧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2页。

⑨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6页。



将荒野与自由相连，在对荒野的描述中诠释着荒野的自由性。

其一，罗尔斯顿肯定了荒野自由性的存在。在近现代哲学家看来，自由是属于人的世界，只有理性精神才能与自由相连。但是在罗尔斯顿看来，我们不能因为荒野不同于人类就否定荒野自由的存在。罗尔斯顿认为，荒野有一种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与自由契合。也就是说，荒野具有一定的自由性，这种自由性首先说的是荒野是其领域的主人，它按自己的方式运行，远离人的掌控。正如美国林业工作者协会在1991年发布的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荒野是不受人为控制、不受各种条件限制且保持其主要特征和影响的地方。

其二，荒野的自由异于人类的自由。人类的自由更多地是指向一种理性的自由，即意志的自由、精神上的自由。荒野的自由是显现自身的自由，即一种“云自无心水自闲”的自在层面上的自由。老庄的“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清人沈朝初在《忆江南·春游名胜词》中所说的“山水自清灵”，指的就是这个层面的自由。有学者认为，物的自由是一种任意，而人的自由是自由的任意，它包含着对自由意识。虽然在自由的阶梯上，自在的自由低于有意识的自为的自由，但不能因为这种等级就抹杀了荒野自由性的存在。

其三，荒野自由的表达是独特性。“通过把每一环境变得各不相同，荒野创造了一种令人愉悦的差异。它使得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具有历史价值，也更加优美，因为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是独一无二的”<sup>①</sup>。在罗尔斯顿看来，荒野的自由即意味着异质性、多样性，以及不受规范、未被驯化。荒野的野性、未驯服性蕴含着一种自由的基质，在那里，万物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各得其所、自由自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一般认为，“原始森林、湿地、草原和野生动物是荒野的主要存在方式”<sup>②</sup>，但所有这些荒野形态都有其内在的个性化生存的一面。荒野的“野”不断制造出差异与个性，反抗着一种概念式的整一性。荒野正是以这种个性化和非整一性显示出生命的丰富性与自由性。自由的生命就在于差异，生命的自由就在于个性。荒野以其多样性和个性化向我们表明，它是自由的。

荒野与自由相关，不仅因为它具有异质性与多样性。在罗尔斯顿看来，荒野与自由相关，还因为荒野不是被规划和被决定的，而是自我规定的世界。荒野是充满野性的、未被驯服之地，它是桀骜不驯、拒绝规定的自由世界。“荒野就是世界的本来面貌，就是自然的纯粹状态和‘本底’状态，因为没有受到人类这一特殊的、有意识的、有目的的物种的干扰和改造，荒野是一种充满多样性、原生性、开放性、和谐性、偶然性、异质性、自愈性、趣味性的野趣横生的系统，荒野上的各种野生动物种不受人类的管制与约束”<sup>③</sup>。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保护是茫茫荒野的规律。在荒野中，一切都是自在的，也是自足的。动物是自由的，它没有被关在笼子里或者限制在公园里；河流是自由的，它没有被大坝、水库规定，也没有被水车、磨坊所限定。在荒野中，万物自由地伸展。

荒野不仅与自由相关，而且荒野的自由与人的自由相应。荒野凭借本能创造伸展自由，人类凭借理性演绎自由，二者的自由追求又统一于生命意志中。走向荒野，人类可以感受到它的自由性生存的一面。在罗尔斯顿看来，荒野的自由与人类的自由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仅仅从经济利用的角度消费荒野自然，就会摧毁我们的自由。“如果一个土地所有者一方面坚持他自己的自由，一方面又要成为其400英亩土地的独裁者，而且，从来不去想一想他的土地上生存

①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8页。

② 叶平：《生态哲学视野下的荒野》，《哲学研究》2004年第10期。

③ 王惠：《论荒野的审美价值》，《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的野生动植物是否也有它们自己的自由,那么,他的这种态度肯定是前后矛盾的。如果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认为,他们脚下的土地是贡献给公民的自由,是供他们全面征服大自然的,他们的唯一要务是把植物和动物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经济)资源,那么,这样的人在道德上肯定是不成熟的。至少,在那些有象征意义的地方——在荒野和野生动物保护区、在供鸟飞行的天空、在供动物奔跑的大地、在供动物在夜间潜行并觅食的地方——大自然应当是自由的。自由对双方都适用;那些只知争取自由却从不把自由给予他人(他物)的人,不可能理解自由;事实上,这些人自己甚至也没有获得完整意义上的自由<sup>①</sup>。做一个自由的人,就应该让荒野保持自由状态。荒野是人的一面镜子。荒野显现出工具性的价值,是因为人以功利的眼光面对它;荒野显现出审美的价值,是因为人以审美的眼光面对荒野;荒野显现出自由的精神,是因为人以自由的姿态面对荒野。

人类出现以前,荒野中的自由是寂静无声的。当人以荒野人的身份现身于荒野时,荒野中的自由是含混内敛的。只有当人以自由作为其本质时,荒野的自由性才通过人类以有声的方式传达出来。正是通过人,荒野的自由性由无声走向有声。人的自由追求是荒野自由性的有声表达,荒野的自由性通过自由的人才能得以更好地保护与彰显。向往自由的人比乐于框架式生存的人更向往荒野,或者说,向往荒野的人必然对自由有着独特的体悟。

### 三、荒野与文化

从词源学上看,荒野与文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前者远离人工,而后者是人工的世界。最早在《周易》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字的本义多指色彩交错的纹理,后又引申

为文字符号、道德修养和装饰等意。如《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论语》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此处的“文”取人的修养之意。“化”的本义是改变、生成、造化等。《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周易·系辞下》载:“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西汉后,“文”与“化”合成了“文化”一词。《说苑·指武》载:“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选·补亡诗》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的说法。这里所说的“文化”,均是以文教化之意。后来“文化”的词义又有与“自然”“野蛮”相对的含义,是“人化”“文明”的意思。在西方,文化一词来自拉丁文 *Cultura*,本义是指耕种、加工、照料、栽培,后逐渐引申为培养、教育、训练等意思。“文化”的德文为 *Kultur*,英文和法文均为 *Culture*。从词源学上看,“文化”有人类借助工具对自然改造、加工、区别于自然并控制自然之意。

罗尔斯顿也注意到荒野与文化的不同。他认为:“荒野自然可不懂我的参照系,对我最深层的文化规范也不会有任何关心。”<sup>②</sup>他说:“在某种意义上,城市是我们的生境;我们属于城市,没有城市我们就不会得到完美的人性。文化的人类生活在未经改造的荒野中是不可能的。”<sup>③</sup>但是,荒野与文化并不是两个完全隔绝的世界,而是两个互相支撑的世界。在一般人的眼里,荒野与文化是相互对立的存在。卢风指出:“长期以来人们把荒野看作文明的对立面,以为消灭荒野就是扩展文明。生态学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文明不能脱离自然,文明也离不开荒野……生态学不要求我们消弭文明与荒野之间的界限,它要求我们,尊重荒野,让荒野存在。”<sup>④</sup>在罗尔斯顿那里,特有

①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III:《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94页。

②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III:《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1页。

③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III:《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页。

④ 卢风:《走进荒野,亲近自然》,《环境教育》2009年第9期。

的中间路线使他对文化世界的强调并不必然导致对荒野的贬低，对荒野世界的肯定也并不必然导致对文化的嘲讽。在他眼中，文化人生存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文化人也生存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中。

罗尔斯顿认为，自然荒野是人类心智活动最基本的背景和基础，自然对心智的激发是永不停息的。“对于那些纯正的荒野追求者而言，荒野是一座教堂；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荒野偶尔也具有教堂的功能”<sup>①</sup>。“几千年来，人类心智的演化过程实际上是与自然相连的；而且我们总是通过与自然的互动，来发现和创造我们用以理解世界的符号”<sup>②</sup>。象形文字是对自然现象的抽象，岩石壁画是对自然万物的摹仿。荒野自然是我们的生存之根，是孕育和生养我们的生命之网，文化的世界一刻也离不开它。荒野自然给文化提供生命支撑系统。“生态保护运动已使我们认识到，文化受制于生态系统，人们在重建的环境中的自由选择（不管其范围有多大）并未跳出大自然的‘如来佛手掌’。人依赖于空气、水流、阳光、光合作用、固氮、腐败菌、真菌、臭氧层、食物链、传粉昆虫、土壤、蚯蚓、气候、海洋及其他遗传物质。生态系统是文化的‘底基’，自然的给予物支撑着其他的一切。即使是那些最选进的文化，也需要某些最适宜于它生长的环境”<sup>③</sup>。文化生存于一定的环境中，文化世界的存在离不开生态大系统的支撑，文化世界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系统的完善。

正是由于荒野生态系统与文化世界的关系，罗尔斯顿认为：“文化的命运与自然的命运密不可分，恰如心灵与身体密不可分。”<sup>④</sup>自然如同人的肉身，文

化如同人的精神，自然与文化一同构成了人的整体。因此，无论是何种文明的人，都需要以自然作为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支撑。“英国人与酸沼地、德国人与黑森林、俄国人与干旷的草原、希腊人与海洋都密不可分。所有的文化都生存于某种环境中”<sup>⑤</sup>。正是因为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人们总是易于用自然之物来象征某种文化。“秃鹰象征着美国人的自我形象和向往（自由、力量、美丽），恰如加拿大盘羊是科罗拉多州‘州立动物’。多花狗木和红花半边莲表征着弗吉尼亚的特征。白头翁是南达科他州的州花，短吻鳄是佛罗里达州的象征……狮子是英国的象征，熊是俄国的象征……叮咚泉、狐狸洞、白杨城、鸡冠山，文化总是与风景地和野生生物融合在一起”<sup>⑥</sup>。

文化人的生存离不开荒野自然及其启示，同时，荒野自然的存在也离不开文化人的参与。荒野的保护离不开文化人，离不开来自文化世界的关怀与爱。荒野的保护与物种的保护相联系，而物种的保护又与文化人的生存相联系。荒野与文化相互纠缠，荒野自然不仅为文化的存在提供生命支撑，而且荒野自然还承载着文化价值。罗尔斯顿认为：“荒野以文化的和自然的两种方式提供历史价值。”<sup>⑦</sup>一方面，荒野是一个活的博物馆，展示着我们的生命之根。“荒野是自然历史遗产，反映着过去时光的99%，也是铸就了我们人类的大熔炉”。另一方面，荒野也保留着曾有的文化信息，保护荒野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之根。因此，我们应该用连续性的眼光来看待荒野与文化，应该感知到自然荒野的历史与文化的历史的相互交织与依赖。

①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3页。

②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9页。

③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页。

④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⑤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⑥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20页。

⑦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 从环境美德的视角来看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观

◎高山

**[摘要]**在中西环境伦理研究领域,对罗尔斯顿生态伦理思想的研究一直方兴未艾。但学者对罗尔斯顿思想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自然的内在价值这一概念上,而且在研究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很少有学者从环境美德的角度切入作深入研究。从表面上看,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理论似乎是对环境美德理论的挑战,因此,学界对于环境美德伦理的探讨,大多集中在对大卫·梭罗、奥尔多·利奥波德和蕾切尔·卡森的研究上。本文认为,尽管罗尔斯顿提出了以内在价值为核心建立环境伦理体系,但事实上从他对于内在价值的论证中可以看出,其本质上是属于一种环境美德伦理。本文主要从生态理性、生态想象力和生态情感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在哲学深处是一种环境美德伦理。

**[关键词]**罗尔斯顿;内在价值;环境美德;生态理性;生态情感;生态想象

被誉为环境伦理之父的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Holmes Rolston Ⅲ),他所建立的环境伦理学体系一直被中西学者所广泛探讨,尤其是这一体系建立时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即自然的内在价值。直到今天,对罗尔斯顿环境伦理思想的研究依然是热点。在中国环境伦理的研究领域,除了期刊上发表的大量相关的研究论文之外,至少有两本研究专著已经出版。一本是赵红梅撰写的《美学走向荒野:论罗尔斯顿环境美学思想》<sup>①</sup>,该著主要是从美和善的关系角度来研究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思想。作者指出,是罗尔斯顿对自然的审美欣赏搭建了他的环境伦理体系。另一本是杨英姿撰写的《伦理的生态向度: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思想研究》<sup>②</sup>,该著主要探讨了罗尔斯顿的价值论,此外还把价值论和美德理论联系起来作研究,也就是指出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理论是与人的德性的形成与完善密不可分的。这些研究大多从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出发,很少聚

焦于环境美德的角度。尽管杨英姿在其专著中提到了自然价值和环境美德的关联,但她却忽略了环境美德中的一个重要维度,也就是人的情感与身体的功能。本文试图从环境美德理论的视角出发,来分析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观:首先对环境美德伦理的兴起及其理论源头作一介绍;接着介绍罗尔斯顿环境伦理体系中内在价值的概念;最后从三个方面详细分析罗尔斯顿以生态为核心的环境伦理为什么可以纳入环境美德伦理的范围。

## 一、环境美德伦理的兴起及其理论源头

环境美德伦理是近三十年来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它是针对非人类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理论体系的一种批判。以内在价值为核心所建立的环境伦理体系,其主要代表人是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保罗·泰勒(Paul Warren Taylor)和汤姆·雷根(Tom Regan)。加拿大学者卢克·温文(Louke vanWensvee)于

[作者简介]高山,博士,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苏苏州 215100)。

①赵红梅:《美学走向荒野:论罗尔斯顿环境美学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②杨英姿:《伦理的生态向度: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000年出版了第一本研究环境美德伦理的专著<sup>①</sup>。另外,菲利普·凯佛瑞(Philip Cafaro)和罗纳德·桑德拉(Ronald Sandler)也是研究环境美德伦理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曾共同编辑了两本论文集《环境美德伦理》<sup>②</sup>。此外,在哈国罗夫(Eugene Hargrove)主编的《环境伦理》(*Environmental Ethics*)期刊上也发表了很多关于环境美德伦理研究的论文。中国学者对环境美德伦理研究的专著,目前有华东师范大学姚晓娜写的《美德与自然:环境美德研究》<sup>③</sup>。环境美德伦理主要关注的并不是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的哲学论证,而是关于人类的卓越和幸福,尤其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培养的人类的卓越品质。环境美德伦理研究的代表人之一菲利普·凯佛瑞,曾在论文中把梭罗(David Thoreau)、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卡森(Rachel Carson)这三位伟大的自然主义作家看成是环境美德的体现<sup>④</sup>。另外,他还专门写了一本《梭罗的生活伦理:瓦尔登湖和对美的追寻》<sup>⑤</sup>,通过分析梭罗的环境美德,详细阐述了其环境美德伦理思想。凯佛瑞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会促进人的卓越,这种卓越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个人的美德(自信、独立、充满希望、活在当下、阳刚气质、自立等)、社会的美德(情感、友好、慈善、爱、同情和信任等)、智力的美德(自我知识、历史感、好奇心、敏感、野性和原创性等)和身体的美德(健康、活力、忍耐、寂静和坚忍等)。

环境美德伦理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德性。德性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的活动是指“灵魂的一

种合乎逻各斯的实现活动与实践,且一个好人的活动在以合乎它特有的德性的方式完成时就是完成得良好的”<sup>⑥</sup>。当人灵魂的高贵部分即理性的活动完成得比较好的时候,人就具有了德性,并因此实现了人类的卓越,这也是亚里士多德强调的幸福,即幸福的本质就是做得好(活动得好)。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美德理论中重点强调的是灵魂中理性的部分,他把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又分成了两个方面:一部分理性是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主要思考不变的问题,这一部分理性的充分实现即具有了理智美德,其中包括科学、智慧和努斯。另一部分理性是非严格意义上的理性,思考可变的问题,它包括实践智慧和技艺。就实践智慧来说,它思考的是与人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善的问题,其主要功能是决定人的总体生活中什么是善的,并努力去实践这种好的生活。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的卓越,侧重人的心灵的卓越部分即理性的实现,最卓越部分的理性是理智理性,另一部分则是和人的生活相关的实践理性和技艺。当两种理性处于理想的理想状态之时,人就具备了两种德性,即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

环境美德理论在三个方面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其一,环境美德思想把孕育美德的关系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里的自然尤其是指较为原生态的自然,也就是西方所特有的概念——荒野。菲利普·凯佛瑞在他的论文《梭罗、利奥波德、卡逊:走向环境美德伦理》<sup>⑦</sup>中所列举的梭罗、利奥波德和卡逊的环境美德基本上是在较为原生态的荒野中,而不是在已经人化的自然中孕

① Louke Van Wensveen, *Dirty Virtue: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Virtue Ethics*, Amherst, NY: Humanity Books, 2000.

② Philip Cafaro and Ronald Sandler, *Environmental Virtue Ethic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005.

③ 姚晓娜:《美德与自然:环境美德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④ 菲利普·凯佛瑞:《梭罗、利奥波德、卡逊:走向环境美德伦理》,郭辉译,《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⑤ Philip Cafaro, *Thoreau's Living Ethics: Walden and the Pursuit of Virtue*,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4.

⑥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0页。

⑦ 菲利普·凯佛瑞:《梭罗、利奥波德、卡逊:走向环境美德伦理》,郭辉译,《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育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梭罗的《瓦尔登湖》和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中看出。其二,环境美德思想注重人的身体在美德实现中所起的作用。菲利普在《生活伦理:瓦尔登湖和追求美德》一书中对梭罗的美德作了归类,其中有一项即与身体相关,例如身体的干净、活力等<sup>①</sup>。其三,环境美德注重人的各种情感的扩张,而不是情感的克制。我们在梭罗、利奥波德和卡森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对自然的情感的无限扩张;而不是如亚里士多德的注重人际相处时用实践智慧去克制自己的情感,使之在一定的度之内,也就是中庸。环境美德理论非常重视人的情感因素,这种情感主要包括人在自然中的审美感受力,包括观察力、创造力、感激之情和敬重等。

## 二、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内在价值的概念

我们知道,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体系是建立在内在价值这一核心概念的基础上。他认为,如果环境伦理学要成立的话,就必须证明自然具有内在价值。那么什么是自然的内在价值?对于内在价值的定义,罗尔斯顿在其经典著作《环境伦理:对自然世界的义务和自然世界的价值》<sup>②</sup>第六章中详细作了阐述。他主要是在与工具价值的对比中提出内在价值概念的。他说:“工具价值使用某物作为实现某一目标的手段;内在价值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不需要必然地去诉诸其他。利奥波德感叹自然以前只是被看成是人类的工具价值,人类被看成是内在价值的唯一拥有者。但对生态学敏感的人会修改他的价值观。”<sup>③</sup>在第六章及该书其余的章节(第二至第五章),罗尔斯顿从生态科学的角度描述了大自然中有感觉的生物、有机体、濒危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价值,对

自然的自然价值的描述都是根据他们的生态特征。下文将从形而上和伦理的角度来分析罗尔斯顿内在价值的概念。

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内在价值是不依赖于任何其他有意识的存在物而独立存在,它依赖于我们通过生态科学和生物科学知识所发现的自然的客观特性。也就是说,内在价值不依赖于关系而存在,不依赖于人这样的评价者。对于罗尔斯顿来说,人不是价值的唯一评价者,在动物界也存在这样的价值评价。他在《自然的价值和价值的本性》一文中举例说明这一点:“一个没有尾巴的蝙蝠妈妈,可以使用自己的方式在完全的黑暗中逃脱布兰肯洞穴,每小时捕捉 500 到 1000 个昆虫放到自己的翅膀上,然后再返回去找到并哺育自己的幼崽。她评价昆虫和幼崽。”<sup>④</sup>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罗尔斯顿看来,人不是大自然唯一的评价者。自然的内在价值不是人类赋予自然的,而是人类发现了自然的属性,但这种发现伴随着情感的体验,也就是说,情感的体验与自然的客观属性的结合形成了价值。

从伦理的角度来说,自然的内在价值是康德义务论伦理思维的生态延伸。按照康德创立的义务论的伦理理论来说,人类对动物和对自然的其他生灵没有直接的义务,原因是动物不具有康德提出的理性的标准。在康德看来,我们只对人拥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因为人具有理性,这种理性能使个人超越当代的风俗和权威等去建构自己的道德原则,并且会遵守。这里面有一个道德思维逻辑框架:当我们理性上认可了一事物具有内在价值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在行动上去尊重和保护这种内在价值。罗尔斯顿提出的以内在价值为核心的环境伦理尽管把道

① Philip Cafaro, *Thoreau's Living Ethics: Walden and the Pursuit of Virtue*,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4.

② Holmes Rolston III, *Environmental Ethics: Duties to and Values in the Natural Wor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③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III:《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7页。

④ Holmes Rolston III, "Value in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Value," in Robin Attfield and Andrew Belsey, eds., *Philosoph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3—30.

德考虑的对象从人扩展到了有机体、动物、植物和整个生态系统,打破了曾统治西方多年的人类中心主义。他发展了康德的人是目的的观念,而提出自然尤其是荒野本身也是目的。自然的目的体现在其生命创造活力。“在荒野中,生命体会被降解,但在这永恒的毁灭中,自然又能极有秩序地自我聚集成新的生命体。大地杀死自己的孩子,这似乎是一个极大的负面值,但她每年又生长出一轮新的生命,用以替代被杀者。大地这维护生命的生发能力,既是最具野性、最惊人的奇迹,也是最有价值的奇迹。”<sup>①</sup>在罗尔斯顿看来,自然(主要指荒野)是有目的的,不断地创造出生命,这一目的是善的和美的。这是自然作为生态系统所具有的内在价值论证。罗尔斯顿就是通过这种生态科学的理性思维方式,论证了生命有机体、植物和动物的内在价值。但这样的论证模式是康德义务论伦理思维的延伸。罗尔斯顿将康德的实践理性发展为生态理性,但在伦理思维方式上他沿用了康德的义务论伦理框架。关于内在价值的义务论伦理框架,拉斯·萨缪尔森很好地表达了这一观点:“证明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这一论点的意义在于这一价值会使我们承担义务:它们给我们对自然的价值的承载者进行行动的理由。”<sup>②</sup>

### 三、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与环境美德

我们知道,环境美德伦理是在批判内在价值为核心的理论上建立以来的,那么,为什么罗尔斯顿以内在价值为核心建立的环境伦理体系能纳入到环境美德伦理中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从《哲学走向荒野》中的一段文字看出:“但纯粹的城市人是单向度的人,只有那些把乡村和荒野自然也加入自己的存在中的人才是三维的人。至于我自己,我认为要是缺了对自然荒野的尊重与欣赏,生命的道德意义就会大大萎缩,一个人如果没学会尊

重我们称之为‘野’的事物的完整性与价值的话,他就还没有完全了解道德的全部意义。”<sup>③</sup>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罗尔斯顿对道德的理解并非只是遵循生态道德原则(即尊重并保护自然的内在价值),而是通过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尊重和欣赏,实现一种三维人的好的生活。这里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为为什么尊重和欣赏内在价值就可以帮助我们过一种好的生活?这涉及对好的生活的理解和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观,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

好的生活也是一种人性在其中能够充分实现卓越的生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更多地是强调在城邦中人际关系的实践智慧。当科技对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空前改变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又实现了复兴。在环境美德研究领域,人们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培养人性卓越时的影响。人的卓越也从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理性的功能扩展到了人的身体功能和情感能力,而情感能力不是如卢梭所指出的天然的情感能力,而是奠基于生态理性基础上的生态情感。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观所体现出的生态情感,与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所展现的生态情感有本质的不同。受爱默生超验主义的影响,梭罗在与自然相处时,强调的是对自然(尤其是对荒野)的感受力,这种感受力并不是以科学的数据为媒介,而是人的直觉为基础,其在对自然的感受中结合了很多人类文化的元素。而罗尔斯顿对自然(尤其是对荒野)的感受力是建立在丰富的生态知识基础上的,它与自然中的文化关系不大。下面,本文从两个方面详细阐述罗尔斯顿在对自然内在价值概念的论证中所体现的环境美德思想。

#### (一)生态情感的充分展开

这里的生态情感主要指的是对自然的亲身体验产生的精神上的“兴奋”,正是这些“兴奋”与在生态科学基础上发现的自然的客观属性结合,形成了

①② Lars Samuelsson, "Reasons and Values in Environmental Ethics," *Environmental Values*, vol.19, no. 4, November 2010, pp. 517—535.

③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8—69页。

内在价值的观念。罗尔斯顿强调,价值评价需要兴奋体验。他说:“如果我们想谈论自然价值,那我们必须主动‘介入’到这些价值中;也就是说,必须要以个人体验的方式分享这些价值,这样才能对它们做出恰当的判断。”<sup>①</sup>在罗尔斯顿看来,“价值,需要内在的兴奋……所有的自然评价都是建立在体验的基础上,但这并不是说它的描述,它的价值只是那些体验。评价可以是更进一步地以非偏袒的方式对这个世界的认知”<sup>②</sup>。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顿所指的兴奋并不是在人的感官体验基础上的兴奋,而是在人的生态理性结合了身体体验基础上产生的兴奋。情感的介入与身体紧密相连,这一点与中国的身心合一有些类似。在环境美德伦理中,对身体的重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了延伸了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人性的卓越。身体与情感能力是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以理性为主导性的古希腊古典哲学中,这两种能力处于被忽略的地位。而在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这两种能力对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起着突出重要的作用。关于身体能力,罗尔斯顿非常注重在荒野中的行走,正是这些行走和所遇到的与身体相关的体验,如饥渴、信心与恐惧、寻找住所等等,激活了我们与动物相近的本能,也因为这些体验,我们对与我们有亲缘的生命能作出价值判断。

#### (二)生态理性的充分实现与生态想象力的展开

罗尔斯顿在阐述内在价值理论时所表征的生态理性,指的是经过生态科学和生物科学知识所浸

润的理性,这些理性催发出丰富的生态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会让我们和自然形成一个彼此生命相依的整体,能将小我与无限相联,且这种连接是人性中非常高贵的部分,也是人生意义的源泉。如果没有生态理性与想象力的发展,那么人极易被各种现实的利益所驱动,且如果把自然当成是资源,人类也很难超越小我与“资源”的自然相联。“在此我们认识到,自然首先是价值之源,是在后来,在第二性的意义上,它才是一种资源。在荒野中,我们是在体验根,这种体验是有价值的。但我们体验的对象,即这些野性的、生发生命的根是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在运行自然过程,这些过程给我们很多价值,而且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它们给我们的益处都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之根中起作用。”<sup>③</sup>从这里我们看出,罗尔斯顿通过在生态理性熏陶基础上的生态想象力在荒野中找到了根。如果没有丰富的生态知识为背景,人们在荒野中很容易感受到的是恐惧、孤独和逃避,转而回到文明的怀抱中。我们知道,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荒野通常是消极的概念,例如《说文解字》对“荒野”是这样解释的:荒,为芜也,“一曰草淹地也”;对“野”的解释是:“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从这种解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荒野理解的核心要点是:荒野被视作是与人类文化相反的概念,因此荒野很难成为中国人的生命之根。中国人的生命之根常在具体的文化中找到,即具体生活的地方和血缘关系。只有在丰富的生态知识背景下,依靠想象力,人们才能在荒野中找到意义和归属感。

①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III:《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② Holmes Rolston III, "Are Values in Nature Subjective or Objective?" *Environmental Ethics*, 1982, p. 139.

③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III:《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3—214页。



## 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教授访谈录

◎朱 洁

**按语:**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Holmes Rolston Ⅲ)先生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杰出的哲学教授,也是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官方观察员、国际环境伦理协会的创会主席和国际《环境伦理》杂志的创刊编辑,2003年获得邓普特宗教奖。罗尔斯顿教授现已出版7部著作,最新的一本是《新环境伦理:地球下个世纪的生命》(*A New Environmental Ethics: The Next Millennium for Life on Earth*)。2015年5月,罗尔斯顿受邀参加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主办的“首届环境美学与美丽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借此机会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宾馆采访了罗尔斯顿先生,采访内容包括他的学术观点,他对环境美学、环境修复及对目前中国的城市建设等问题的看法。兹将采访内容翻译如下。

**朱洁:**请您谈一下您的环境美学理论。

**罗尔斯顿:**我所做的其实就是扩大美学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源自利奥波德(Aldo Leopold)。他说,美丽,就是有人想要探寻自然与美丽,因此,他们会想看日落,看高山上的皑皑白雪,或其他风景之美。而这仅仅是初步的,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美学与自然能够懂得那些自然发生过程之美。比如,一个普通的孩子来到公园玩,那里可能会发生死亡,他可能会看见苍白、流血和腐败,他可能被一头野狮所伤,但这一切都是生命的各种形式。他们可能会反感这些,但我要说的就是,你必须正视生命的所有形式。生命死亡交替轮回,食腐动物吃掉

其他动物的尸体,鸟类吃掉食腐动物的尸体,这就是广义的美丽,是生命的动态形式,是出生与死亡的交替,是更新与成长的交替。我想说的是,这些死亡也许在当时看来是丑陋的,但放在生命轮回的大背景之下则不一样了。当你懂得了生命的更新、成长,认识到这是永恒之中的某个片刻,你才能理解整个过程并珍视这个过程。

**朱洁:**所以您说自然才是美学的肇始,是这样的吗?

**罗尔斯顿:**也不绝对,但可以这么说,是美学的一种形式。也许你来到一些地方,你会发现一些疾病儿童,你想帮帮他们,你不会说顺其自然吧。你会帮助他们获得一些医疗救援,因为你对那些遭受痛苦的孩子是有同情心的。你也许会说:没错,那些孩子很可怜,那是因为孩子的父母在一些无法为其提供医疗服务的地区工作。所以,这就是关于正义的问题,而不是基本的美学问题。我们探讨的问题也有很多非美学领域的问题,但是美学还是能让双方产生思考,来彼此支撑,融进更深入的自然过程。我写的一篇文章《从责任到美丽》(“From Beauty to Duty”)就是关于这些内容的。

**朱洁:**艾伦·卡尔森(Allen Carlson)提出自然都是美丽的观点,您赞同他的观点吗?

**罗尔斯顿:**我始终支持这个观点,这就是所谓的正面美学。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美学,它的尺度是从零以上开始的,美学的尺度从来不会低于零,你不能反其道而行,去寻找丑陋的自然景观,这是很具挑战性的。我曾经见过很多景观,有被火山、台

风摧毁的,也有被大火烧毁的,我会说这些景观是丑陋的吗?我是这么解释的:在西方,很多森林可能会为了建筑、甚至娱乐而被砍伐、焚毁,而被焚毁树木的躯体会迅速地再生。再以火山为例,火山喷发的状态也许是丑陋的,因为它会摧毁周遭的人和环境,但两年之后,你再回到那里,就可以看见那里新生的女孩和小花,再过两三年,所有生命都会重新开始。如果你在一个宽广的视野来看,这就是生命的更新与循环,自然往往不太容易被破坏。而地区则不一样,以卡特里娜飓风为例,这是一场重大的灾难,两年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海岸线就大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些自然灾害很大一部分从生命更新的角度来看是永恒之中的一个环节。

**朱洁:**如今科技离我们越来越近,自然却离我们越来越远,通过科学技术,我们能够欣赏到地球的照片,从自然审美的角度上看,我们应当支持科学技术的使用吗?

**罗尔斯顿:**事实上我们可以兼容并蓄。科学技术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自然之美,如果你会使用显微镜,你就可以发现 DNA、了解生态系统服务,科技在其中起了作用。如果我们仰观宇宙,面对巨大的空间却没有科技的帮助,我们会变得十分愚蠢。如果我们不掌握科技,无论是从宏观或微观上,我们会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我出生于 1932 年,在 1926 年,人类第一次知道了银河的四大星系,也认识到了银河之美,而在此之前,从来没人知道地球多古老、宇宙多广博,人们将整个浩瀚宏伟的天际理解为神性的。同样的,只有当我们解码 DNA 序列之后,才懂得人体基因序列和信息储存的复杂性,这一切的发生都在近代,这让我们能够欣赏到更丰富的自然之美。是的,科技赋予我们能量,帮助我们战胜恐惧。

**朱洁:**您提出了“三维人”的概念,请您就此谈一谈。

**罗尔斯顿:**我确实认为,有三维生活的人生会比一维和二维的人生更完整、更丰富、更懂得欣赏。

以我母亲为例,她成长于农场中,生活在城市里,但她可以欣赏自然之美,能看到落叶和秋天的色彩,她也会欣赏,她能上山野餐,但是她对于野生自然确实知之甚少。所以我认为,她是个好女人,她的生活很美满,这么想来她的两个维度已经给了她充实的人生。但你可能会说,有些住在城市里的人,他们从未去过乡村,也没有见过自然。我有堂表兄弟,他们住在纽约,尽管他们数次搬家,但他们始终拒绝离开纽约。我说,你们必须深入去感受纽约,你们并没有经历到纽约,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当我说他们是一维人的时候,他们真的生气了,因为我说他们根本不能理解《美丽美国》一歌中的感情。

**朱洁:**如今全世界很多人都在致力于修复自然,让自然回归到一个原始的状态,如乔治·蒙内尔特(George Monbiot),他写了一本书,名为《还原野性的土地、海洋和人类生活》(*Rewilding the Land, the sea, and Human Life*),您怎么看他的观点呢?

**罗尔斯顿:**是的,我不认为他处理得很好。在我的演讲中,我提到了一个“自然丑陋”的观点,我还未听到有人说如何看待“自然丑陋”。你怎么看待狂风暴雨?如何看待动物相互残杀?如何看待自然的阴暗面?大自然是双面的,所以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复杂。你在欣赏自然之美时,需要一个崭新而全面的视角。在一个动物吃另一种动物时,这是生态的一部分,但是在痛苦和新生交替的混乱之中,需要保持一种生命平衡的持续,这本书没有说清楚。

**朱洁:**据我了解,美国的黄石公园对自然进行了修复,之后 19 个州都引进了此种做法。有些人强调,也许我们应该建造更灵活性的城市,我听说纽约的中央公园也进行了部分的修复。

**罗尔斯顿:**不完全是,他们是作了一些努力,比如公园引来了迁徙的候鸟,候鸟们会穿越整个城市。我们处理公园,而公园是城市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不能仅凭一部分就评价其好坏,凭借公园的作用发挥与否就评价其优劣,而应将一部分公园与广

泛的城市以及更大范围的景域建立联系来评价。

我们经常说,为了孩子们的学习,恢复和保留原始自然是有益处的,但不只是这些,孩子们在学习的同时也学会了欣赏自然的生活。我认为,我们确实希望尽可能地恢复自然,但这项工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比如美国的大部分草原已经消失了,但也有相当成功的项目恢复了当地的草原,我非常赞成这些工程。他们做了两件事,既把大草原带回来了,同时带回来了在草原上工作的人们。草原和景观得到了尊重,所以他们不仅恢复了自然,而且也恢复了人们与景观的良好关系。

**朱洁:**您刚刚提到自然的恢复对孩子有益,那么欣赏自然是不是具有冒险性呢?

**罗尔斯顿:**我们说,城市的一部分应当是自然原始的,这尤其对儿童的成长有益,因为儿童需要一个可以发掘探险的地方。我会带着我的孙子们去一些有游乐场、游泳池的公园玩耍,那里也会有一些原始自然的痕迹。我的小孙女非常活泼、喜欢探险,经常跑出去收获惊喜,有时她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或是掉进小溪,她就会叫着害怕,但这也成为她的一种体验。

**朱洁:**那安全问题呢?如果孩子们在自然体验中受伤的话,你觉得谁应当对此负责?

**罗尔斯顿:**是的,这件事是冒险的行为。我平时也会带我的两个孙子到距离城镇 5 英里的山脚下探险,我经常步行去寻找早春开放的野花,我会慢慢地走、四下看看,我的小孙女则经常跑在前头。我会说:“艾丽,别离开我的视线。”她就会问为什么,我对她解释:“我不想你走丢了,另外山上可能有狮子,狮子会吃人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担心孩子,因为每年都会有一些孩子死于郊野。但如果儿童在原始自然中出事,我认为负责人应该是孩子的监护人。

**朱洁:**如果狮子进入城市是否应该射杀它们?因为它会伤人。

**罗尔斯顿:**狮子曾经伤过小孩,如果它见到孩

子,就可能杀害孩子。从某种程度而言,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教育,教会他们如果见到了野生狮子应该怎么做。如果背着双肩背包的话,要用包抵着头,使自己看起来大一些。而且这些情况越来越普遍了,如今自然已经走进了城市,说不定狮子也会走进来,也许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射杀狮子,而是使用镇静剂瞄准狮子,把狮子运到 50 英里或 100 英里以外的地方去。

**朱洁:**请您谈谈陈望衡教授的《环境美学》一书。

**罗尔斯顿:**这本书从历史谈起,古代中国的环境美学,中国传统观念中的环境建筑,包括私家花园、宫殿和农业景观,当然,现在我们主要说的是公园和花园。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景观是由农民和匠人制造的,书中谈到美和农业环境,谈到美和城市环境等内容。关于这些我写得并不多,在谈到中国的古典园林时,我很欣赏他所强调的人性化环境的观点,那些基于人类审美需求而建造的环境,它们来自自然或人工,层次要更高一些。

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如今,我听闻中国政府要采取一些举措,建设以人为本的自然,这样让我联想到了我自己。当我们来看美国的景观时,美国有许多以人为本的景观,但同时美国景观的鲜明特色在于它还保留了大量的荒野。也许这种荒野特色在我居住的美国西部更鲜明,在美国的东部要少一些,但是我在美国的东部长大,那里也有许多荒野,美国的西部和东部大不同。而在中国,我们在欣赏景观时,往往把原始自然和人工景观分离开来欣赏。我必须承认,中国人更加善于造园,但也许美国人对人与原始自然(wild)的联系要比中国人做得更加紧密,这就是我们两个国度的区别。无论是在私家花园还是城市公园中,人们可能都会想要部分保持原始自然,这样对孩子会有好处,因为这样他们就能了解到景观建成之前的模样。在西方,大部分人会鼓励孩子们去爬山、穿越危险的森林,这不禁让我们开始思考东西方的文化差别,东方人常说“不做未准备的事”。

我有许多的背景学科。我之前一直接受理学、生物学的教育,在大学期间还研修了物理学。我发现,人们对“深层自然历史”的审美少之又少。“自然历史”有着成百上千年的历史,它可以溯源我们生活着的土地,回到那些恐龙化石、蒙古羚羊化石形成的年代,然而我却没有见到太多有关于进化自然历史的审美。当我们研究岩石层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那些生灵仿佛凝视着我们;当我们深入大峡谷的谷底,看到的岩石年龄在5亿年以上。而在中国,我看不到人们在这个层面上对景观的欣赏,我曾认为这是对生态不敏感的原因。生态就是降雨和泥土,生态是农民眼中所见周遭的一切景观,他并不能够意识到其中有个媒介,这个媒介就是自然历史,所以错过了美的维度。

**朱洁:**您认为科学是欣赏美的关键吗,或者只是一个部分?像刚才您提到的中国的环境审美好像与此不同。

**罗尔斯顿:**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并且是关键的一部分。人类还在发展之中,中国也在发展之中,就像我曾对孩子们说的那样:把地球的历史划分为24个小时的话,在3点时,生命起源了;6点,恐龙出现了;9点,哺乳动物和鸟类出现了;而人类的出现是最后3秒钟的事。我们对孩子的教育中,并没有学习到中国人的自然观。

**朱洁:**环境美学对美国政策有影响吗?有哪些影响?

**罗尔斯顿:**从我的人生过程来看是有影响的。近些年环境美学的影响可能小了一些,但从我的人

生经历看来,它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例如,我们知道的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使得美国及世界全面禁用 DDT,因为她曾在书中写到:在春天,鸟儿不再鸣叫,花园满是悲戚。吉姆·莱昂纳多(Jim Leonardo)写过一本书谈到 DDT 杀死鸟类,导致虫害肆虐。只有当我们把 DDT 视为一种污染源时,它才受到我们的重视。但是,这在国家公园和州立公园里已经广泛使用了。美国人喜欢在公园中休憩,因此,保护美国的美丽公园,就是保护环境、清理河流。在我的人生中,政府采取过大量的举措,这些举措都是在意识到清洁环境、保护环境的重要性之后采取的。因此,环保主义在美国政治中确实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不过近十年来通过的法案都是关于贸易之类的,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有所减少。奥巴马总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倡导建立野生动物救助并开展了相关工作。

**朱洁:**如今中国提出了建造生态城市的概念,对此您怎么看?

**罗尔斯顿:**在美国我们有“绿色城市”的概念。有些人想在城市中规划建筑,但遭到了来自市民的一些反对,因为他们不欢迎这些建筑。不过,如果他们采用芝加哥的建设理念,情况可能就不同了。如果建筑采用节能技术,有绿色的空间、采用可再生材料,也许就会很受欢迎。

[访谈人简介:朱洁,博士,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 430072)]

# 生态文明创建的绿色发展路径:以江西为例

◎ 郇庆治

**[摘要]**生态文明创建的绿色发展路径,是指更多侧重于自然生态资源禀赋较为丰厚的合生态化经济利用的绿色发展理念和战略,它是一个不同于着力对既存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消费经济体系进行生态化改造(即“生态现代化”)的另一种考量或模式。依此而言,在江西这样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优厚而传统工业化模式嵌入程度相对较浅的省域中,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最初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引发,同时关涉到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各个层面变革的系统性工程,或者说一场异常复杂与深刻的整体性社会生态转型,可以较容易地转换为一种对其自然生态资源禀赋及其经济性利用的绿色感知和实践。而这种重新认识省域内自然生态资源保护价值及其合理利用途径的过程,也就是其主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或实施绿色发展转型的实践历程,尽管我们还远不能说已经存在着这样一个“江西样板”。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国家试验区;绿色发展;江西省

正如笔者曾指出的<sup>①</sup>,有机整体或“五位一体”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即把生态准则或考量融入到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内在地蕴含或规定着其现实实现的两个战略性维度或路径:生态建设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化和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建设的生态化。而如果对此作进一步的简约性界定与阐释,即它们分别是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的更理性经济利用(发展生态经济)和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经济生产生活体系(方式)的生态化转型(工业/城市经济生态化);那么就不难设想,在当下中国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实践中,江西省理应成为践行前一种路径或模式的一个适当区域。基于此,本文将对江西近年来的生态文明创建工作作一种初步的反思性审视,着力分析自然生态资源禀赋优越但传统工商业经济相对不太发达的地区,在

发展理念和战略上的“绿色超越”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中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一个可行性路径。

## 一、作为一种生态文明创建战略路径的“绿色发展”

广义上的“绿色发展”或“环境友好型发展”,其所体现或表征的是世界范围内各自源起于更为久远的生态环境保护话语与政治,跟发展话语与政治的一种历史性结合或融合,而这大致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此时,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经过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逐渐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社会政治影响的公共管治议题,其结果是:环境友好或“绿色”渐趋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性不容置疑或挑战的公共决策与行为准则(不限于政府层面)。另一方面,伴随着

**[作者简介]**郇庆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1)。

<sup>①</sup>郇庆治:《生态文明创建的生态现代化路径:以江苏为例》,《阅江学刊》2016年第6期。

源自少数欧美发达国家的新一轮资本输出浪潮,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扩展成为现实可能,集中表现为利用来自传统工业化国家的资本与技术大规模开发其较为丰裕的自然资源,并向这些国家出口资源与劳动密集的中低端工农业制品。因而其过程大致是,欧美国家中的环境社会运动(绿色运动)和政党(绿党)最先提出了追求一种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发展)既存模式的绿色政治要求——即希望转向一种替代性的发展或“绿色发展”;而这种政治主张不久就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接纳为一种新型普适性规范——即对现代化经济发展(增长)的“绿色”(生态环境保护)约束。前者的例子是,对于绿党政治(家)来说,走向未来生态化或绿色社会的基础,是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生态化经济从而实现“生态发展”(eco-development),而这种可持续经济只能是一种产生和满足人们合理的基本需求的经济<sup>①</sup>;后者的例子是,1981年2月24日,《国务院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就明确指出:“环境和自然资源,是人民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物质源泉……长期以来,由于对环境问题缺乏认识以及经济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生产建设和环境保护之间的比例失调……必须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是全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sup>②</sup>这实际上已认识到一种保护生态环境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或“环境友好型发展”的战略重要性。

毋庸置疑,正是1992年在里约举行的联合国

环境与发展大会,使“可持续发展”这一在西方环境话语与政策语境下构建起来的术语,成为一种关于绿色发展的全球主流性表达——不同工业现代化水平的世界各国和地区共同承担起应对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诸多生态环境挑战的历史性责任,从而实现一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sup>③</sup>。随后20多年的国际可持续发展实践表明,人类社会及其现代文明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或模式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当初政策倡议者的预期和想象<sup>④</sup>: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难以实现稳定满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少数新兴经济体(“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则几乎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不同层面(经济、社会与生态)可持续性追求之间的张力甚或冲突;而那些所谓发达国家和地区俱乐部的边缘性成员也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脆弱性一面(比如近年来作为欧盟和欧元区成员的希腊)。尽管如此,在当代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话语和政治仍是一种全球共识度最高的绿色发展主流性阐释,2015年9月通过的包括17项二级指标和169项三级指标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就是明证<sup>⑤</sup>。

因而可以大致理解为,绿色发展概念是后来影响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前奏或通俗性代称<sup>⑥</sup>——绿色的发展自然(理应)是可持续的,而可持续发展概念是对绿色发展概念的理论政策意涵的进一步明晰化和全球性扩展,尽管许多

① Petra Kelly, *Thinking Green*, Berkeley, California: Parallax Press, 1994, chapter 2; The European Federation of Green Parties, *The Guiding Principles of the European Federation of Green Parties*, Masala: 1993, pp.3—11; The German Green Party, *Die Grünen: Das Bundesprogramm*, Saarbrücken, 1980.

② 《国务院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2006年8月8日,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law/flfg/txt/2006-08/08/content\\_7058576.htm](http://www.china.com.cn/law/flfg/txt/2006-08/08/content_7058576.htm).

③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王之佳、柯金良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2页。

④ 范春萍:《面对失控的世界 人类必须做出抉择》,《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2期。

⑤ 郝庆治等:《“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政治”笔谈》,《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6年第4期。

⑥ 郝庆治:《国际比较视野下的绿色发展》,《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激进的生态主义学者或活动家会强调,只有生态主义价值取向下的或基于生态可持续性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绿色发展,就像可持续发展也存在着自己的“强”“弱”等不同版本一样<sup>①</sup>。撇开上述可以感知的些微差异不论,概言之,一方面,绿色发展或可持续发展的要义与宗旨,在于逐步实现工业(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理性、社会理性和生态理性的内在性融合,从而形成一种以可持续性为基本表征追求的新发展意识、路径与模式。很显然,这是一场同时关涉到现代工业文明的经济技术基础和价值观念基础的历史性变革或革命,并将导向一种基于全新的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构型的人类文明形态或类型<sup>②</sup>。另一方面,走向绿色发展或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变革进程或实践努力,将会依然在一个特定构型的国内经济政治结构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下展开与推进。这意味着,它将是一个充满着观念、战略与结构性博弈甚或冲突的长期性过程,其现实进展仍将受制于具体的经济社会与历史文化条件,并呈现为不同的国别或地域性形态。

应该说,当代中国学术与政策语境下的“绿色发展”,总体上是处在上述绿色话语与政治国际流变的进程之中而非之外的。换言之,中国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提出并倡导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论”“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等,其实都是绿色发展或可持续发展这种全球性政治生态学话语与政治的内在组成部分。因而,广义上的绿色发展或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而言,其在理论层面上已算不上是一个全新的人文社会科学术语,在实践层面上也已有着颇为丰富的政策创议和制度化意义上的

探索,比如中国学界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以及《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政策制定与贯彻落实<sup>③</sup>。

对于本文来说,笔者所关注的是,绿色发展概念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与政治逐渐达成一种中国特定学术与政策语境下的联结;更明确地说,“绿色发展”已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一个战略性维度或侧面<sup>④</sup>。一方面,经由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相对应而拓展开来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即“三个发展”),在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成为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篇章的重要战略性内容:“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sup>⑤</sup>换言之,主要指涉经济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化的绿色发展或绿色经济,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领域中的重要体现或努力目标——尤其相对于循环发展或循环经济所要求的原材料低(零)耗费(废弃物低或零外排)和低碳发展或低碳经济所要求的能源低消耗(污染物低排放)而言。

另一方面,2015 年 10 月举行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把“绿色发展”列为与其他四个发展(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相并列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这既是落实和深化“科学发展观”作为党和国家政治指导思想在新一个五年

① 郇庆治:《环境政治国际比较》,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17 页。

② 郇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济南:泰山出版社,1998 年,第 260 页。

③ 国家发改委:《2012 中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编:《2015 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重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年。

④ 郇庆治、高兴武、仲亚东:《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5—13 页。

⑤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9 页。

规划时期中统领作用的政治宣示,也是把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中国新时期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以及全过程的原则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sup>①</sup>对照十八大报告的相关论述就可以看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绿色发展”有着哪些全新的意涵或表述形式,而在于“绿色发展”或“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成为中国新一个五年规划时期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性或规约性准则。

上述的背景性和语境性分析旨在表明,本文所指称的绿色发展概念,主要是在生态文明建设或示范区创建的现实路径或战略维度的狭义上使用的。更具体地说,生态文明创建的绿色发展路径,是指更多侧重于自然生态资源(禀赋)较为丰厚的合生态化经济利用的绿色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涵盖了人们平时所指的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举措),可以成为一个不同于着力对既存的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消费经济体系进行生态化改造(即“生态现代化”<sup>②</sup>)的另一种考量或模式。

## 二、江西生态文明建设:从“先行示范区”到“国家试验区”

地处中国东南部的江西,其地形地貌以江南丘陵、山地为主,盆地、谷地广布,省境东南三面环山地,其中武夷山主峰黄岗山(2157米)为省内最高

点,北部为近2万平方公里的鄱阳湖平原;全境水网稠密,河湾港汊交织,湖泊星罗密布,有大小河流2400余条,总长度达1.84万公里,较大的有赣江、抚河、信河、修河和饶河,而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气候类型上属于中亚热带温暖湿润季风气候,无霜期长,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在1341毫米—1940毫米。由于这些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禀赋,一方面,江西自古就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盛产水稻、小麦,以及油菜、棉花、油茶和茶叶等农副产品,同时拥有十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比如属于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物种有110种)和各种形式的水资源(比如河川径流总量居全国第七位、人均居全国第五位)。另一方面,江西不仅有着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一面(比如较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占比极高的红壤和黄壤),而且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全国性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尤其是鄱阳湖流域和包括武夷山区在内的国家东南林区)。

江西全省面积为16.69万平方公里,人口4542.2万(2014年末),现辖11个地级市、100个县级(县、市、区)行政区。长期的农林业大省定位(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间累计净调出商品粮600亿公斤),造成江西相对较低的传统意义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2015年,江西省的地方生产总值为16723.8亿元,人均36819元(而相邻的福建省和安徽省分别为25979.82亿元和70417元,22005亿元和35997元),其中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0.6%:50.8%:38.6%,城镇化率为51.6%(全国平均水平为56.1%)<sup>③</sup>。

可以说,上述现实构成了江西省思考与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性背景或语境。一方面,继续传统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动力或潜能。经过新中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15年11月3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1/03/c\\_1117027676\\_2.htm](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1/03/c_1117027676_2.htm)。

② 郝庆治、马丁·耶内克:《生态现代化理论:回顾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1期;郝庆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

③ 百度百科词条“江西”,<http://baike.baidu.com/item>,2016年10月7日。



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努力,江西省已经具备相当高程度的现代工业化与城市化基础,如今,超过半数的地方生产总值来自工业产业,超过半数的辖区人口已经成为城镇居民。不仅如此,单纯就第二产业如重金属等稀有原材料的开采加工以及建立在它基础上的城镇化来说,江西的工业现代化发展——比如赣南地区的稀土开采及其加工业——依然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而且其生态环境容量如果按照江浙地区的现行标准的确是还比较大[比如 2015 年江西 11 个省辖市中只有萍乡和九江两市的大气质量优良达标率(按日计算)低于 85%,分别为 76.3%—83.8%;而江苏 13 个省辖市达标率仅为 61.8%—72.1%<sup>①</sup>]。事实也表明,与 2000 年的数据(分别为 2003.07 亿元、4851 元和 3764.54 亿元、11194 元<sup>②</sup>)相比,2015 年江西省与福建省的地方生产总值和人均产值差距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分别从 53.2% 和 43.3% 提高到 64.4% 和 52.3%,而这其中,第二产业的较快扩张功不可没。因而可以想象,即便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或绿色发展的话语(政策)语境下,不但资源耗费或环境污染性的原材料开采加工和化工机械等产业会找到一定的生存拓展空间,而且既存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产出、高消耗、低品质)工业体系的生态化改造也会遇到各种形式的阻碍(比如以“投入成本”“市场选择”“民生需求”“社会稳定”等诸多理由或名义)。

另一方面,不断成长的绿色发展转型或生态文明建设氛围与意识自觉。无论从国家现代化发展总体布局,还是普通民众对于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追求来说,维持或实现不断改善的区域(城乡)

生态环境质量已然成为一种不容回避或漠视的民生和政治需求,江西也不例外。这意味着,“先工业化、后生态化”的传统思维或路径,将会面临着日益增加的体制性约束和大众性抗拒。就此而言,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并趋于固化的全民性经济(发展)主义或 GDP 至上思维,开始出现一种社会性的裂变或断裂,对于各级党政干部群体而言,无约束地发展经济或增长 GDP 已经不再必然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事情(包括关系到每一位官员政治前景的仕途升迁);而对于最广大人民群众来说,6%还是 8%的地方 GDP 增长显然没有洁净的空气和清澈的河水更实在、更必需。在这方面必须承认,近年来传统工业化发达的东部沿海省区日渐凸显的生态环境恶化情势(比如严重的大气雾霾和地表水污染现象)发挥了一种正向性的“反面教员”作用。同样重要的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无论是生态文明建设还是绿色发展,并不意味着或可以解释为停止任何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或发展,尤其是普通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条件和水平的持续性改善,而这对于那些仍处于严重贫困和生活不便地域的社群来说,还首先是一种平等生存权利或社会公正的问题。

正是在上述语境和思路下,对于像江西(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福建)这样的生态环境资源(禀赋)优厚而传统工业化模式嵌入程度相对较浅的省域来说,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最初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引发,同时关涉到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各个层面变革的系统性工程,或者说一场异常复杂与深刻的整体性社会生态转型,就会较自然地转换成为一种对其自然生态资源(禀赋)及其经济性利用的新型感知和实践。相应地,这种重新认识省域内自然

①江西省环保厅:《2015 年江西省环境状况公报》, <http://www.jxepb.gov.cn/sjzx/hjzkgb/2016/625f4083123e43a0a829293ebb91ab1b.htm>; 江苏省环保厅:《2015 年江苏省环境状况公报》, <http://js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6/06/03/028854748.shtml>, 2016 年 10 月 12 日。

②《中国省级行政区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列表(1978—2004)》, 维基百科: [http://www.niba.com/f/7fa7fbc5\\_6197763.html#2000.E5.B9.B4](http://www.niba.com/f/7fa7fbc5_6197763.html#2000.E5.B9.B4), 2016 年 10 月 8 日。

生态资源保护价值及其合理利用途径的过程,也就是江西省主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或实施绿色发展转型的实践历程<sup>①</sup>。

其一,“生态省建设”(1999—2007)。自20世纪80年代起,江西省就开始组织实施“山江湖”治理工程,加强省域内的水环境整治与生态基础设施建设。1999年,结合落实国家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江西省政府制定了《江西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按照地貌条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把全省生态环境建设划分为赣北鄱阳湖平原区、赣西北丘陵山地区、赣东北丘陵山地区、赣中西丘陵盆地区、赣中东丘陵山地区、赣南山地丘陵区六个片区,分别提出了三个阶段(1999—2010、2010—2030、2030—2050)的具体规划目标与要求。海南省1999年获批准全国第一个“生态省”创建试点后,也有学者提出江西应积极准备争取列入国家试点<sup>②</sup>,但江西省至今并未加入这一由环保部主导的以省为单位的制度创新试点(具体包括海南、吉林、黑龙江、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安徽、河北、广西、四川、辽宁、天津、山西14个省区市)。尽管如此,到2015年初,江西省已创建获批了国家级生态县(区)5个(靖安县、婺源县、湾里区、铜鼓县、浮梁县)、国家级生态乡镇228个、省级生态县(市、区)15个、省级生态乡(镇)599个、省级生态村610个<sup>③</sup>。

其二,“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2008—2012)。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目标后,江西省政府根据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制定了“生态立省、绿色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并于2008年初提出创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构想。2009年12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准,标

志着鄱阳湖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与此同时,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监管体制改革,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积极推动“省、市、县、乡、村”五级的生态示范创建和鄱阳湖、柘林湖等生态功能保护区试点建设,为保持与提升全省生态环境质量作了大量的政策与制度创新探索。但值得注意的是,江西仍未参加2008年起由环保部主导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市县两级试点。

其三,“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2012—2016)。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江西省的生态文明创建或绿色发展转型明显提速。这其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是2013年7月举行的中共江西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提出了“发展升级、小康提速、绿色崛起、实干兴赣”的“十六字方针”。2014年3月,江西省代表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了把江西纳入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议案;同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公布了包括江西省在内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第一批名单;11月正式批复《江西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该方案为江西设定的总体目标包括:建成中部地区绿色崛起先行区,率先走出一条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新路子;大湖流域生态保护与科学开发示范区,积极探索大湖流域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模式;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创新区,形成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和长效机制,并希望在2017年取得积极成效、2020年取得重大进展。2015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两会”江西代表团审议时又明确要求:“着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子,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江西样板。”<sup>④</sup>同年11月,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举行全

①杨锦琦:《江西生态文明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经贸实践》2015年第6期。

②肖锡红:《江西“生态省”建设的若干思考》,《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4年增刊。

③《江西拥有国家级生态县区5个 国家级生态乡镇228个》,2015年3月11日,大江网:[http://www.jxcn.cn/system/2015/03/11/013672589\\_01.shtml](http://www.jxcn.cn/system/2015/03/11/013672589_01.shtml)。

④王晖、刘勇:《奋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江西样板》,《江西日报》2016年2月2日。

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现场推进会,将武宁、婺源、崇义、芦溪、南昌市湾里区、浮梁、资溪、南昌市新建区、安福、共青城市、安远、余江、靖安、铜鼓、宜丰、奉新 16 个县(市、区)列为江西省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12 月,又出台了《关于建设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实施意见》,决定实施围绕着“六大体系”“十大工程”共计 60 个项目的建设<sup>①</sup>。在 2016 年全省“两会”上,“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情况和生态环境状况”成为继传统的“一府两院”报告后新增加的重要报告内容,属全国首创。2016 年 8 月,江西省成为国家公布的首批 3 个生态文明建设“国家试验区(省)”之一(另外两个是福建和贵州)。这意味着,在为期 3 年的“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省)”创建第一阶段(2014—2017)结束后,江西省将自动转入更具权威性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试点。

可以看出,江西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或示范区创建具有明显的“后来者居上”性质,并且紧紧围绕着致力于绿色发展或“绿色崛起”而展开。至于“绿色崛起”的意涵,中共江西省委主要领导将其界定为如下五个层面<sup>②</sup>:一是制定绿色规划,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江西省“十三五”规划当中,落实到全省各地各部门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各专项规划中,科学布局绿色发展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二是发展绿色产业,把江西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快构建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绿色产业体系,大幅度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努力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绿色产业基地。三是实施绿色工程,以重大生态工程

为抓手,积极保护和修复自然生态系统,全面推进污染防治项目的实施,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使江西的绿色优势得到提升,主要生态指标保持全国前列。四是打造绿色品牌,借助江西省丰富的绿色资源,大力推出优质、安全的农产品,大力发展风景独好的生态旅游,大力培育健康养生、养老等朝阳产业,让江西绿色品牌占领国内外市场。五是创建绿色文化,把生态文明理念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积极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活动,进一步普及绿色政绩观、绿色生产观、绿色消费观,引导人民群众崇尚节约、低碳生活,形成尊重自然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浓厚氛围。

概括地说,江西省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sup>③</sup>:

一是积极推动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推进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或内核,是产业升级、发展升级,而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是实现产业与发展升级的基本路径。基于此,江西近年来针对不同区域的资源特色、经济基础、产业影响力等禀赋条件,部署加快 60 个工业重点产业集群的发展,着力扶持新型光电、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发展,积极发展汽车、大飞机等先进装备制造业,努力推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比如,基于南昌大学在 LED 技术研究上的创造性成果,江西正致力于打造“南昌光谷”,做大做强全省的 LED 产业集群,用“江西创造”来打造“江西制造”的制高点。

二是强力推进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与治理。江西省近年来加紧划定生态红线、水资源红线和耕地红

①“六大体系”指的是定位清晰的国土空间开发体系、环境友好的绿色产业体系、节约集约的资源能源利用体系、安全可靠的生态环保体系、崇尚自然的生态文化体系、科学长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而“十大工程”指的是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工程、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工程、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工程、旅游强省基础工程、清洁能源重大工程、推行绿色循环低碳生产方式重大工程、生态建设重点工程、环境保护重点工程、生态文化推广工程、绿色生活引导工程。

②《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就生态文明建设答记者问》,中国文明网:[http://www.wenming.cn/syjj/dfcz/jx/201511/t20151125\\_2977397.shtml](http://www.wenming.cn/syjj/dfcz/jx/201511/t20151125_2977397.shtml),2016 年 10 月 8 日。

③王晖、刘勇:《奋力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江西样板》,《江西日报》2016 年 2 月 2 日。

线,为绿色江西扎牢底线篱笆;深入开展“净水”“净空”“净土”行动,实施重点行业脱硫脱硝、除尘设施改造升级、机动车尾气污染防治三大工程;加快“五河一湖”环境整治、鄱阳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等工程建设和城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完善,加强土壤污染源头综合整治特别是重点推进7个重点防控区试点示范工程建设。为此,江西创建了县(市、区)级以上三级“河长制”,由省委书记、省长分别担任省级正副“总河长”,7位副省级领导分别担任五河及鄱阳湖、长江江西段的省级“河长”,在全国率先探索河流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此外,江西省还在流域生态补偿、森林生态补偿、湿地生态补偿和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方面进行制度创新,并强化对地方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考核奖惩。其结果是,2015年,江西省森林覆盖率保持在63.1%,设区市空气质量优良率(按日计算)在90%左右,河流、湖泊的Ⅲ类以上水质断面达标率达81%<sup>①</sup>,生动展示着“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的朴素真理。

三是大力发展生态农林业。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重新认识与定位当代农业,以“百县百园”(即每个县、市、区创办一个现代农业综合性示范园区)为平台,推动现代农业围绕品质与品牌的发展升级。到2015年,全省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11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66个,绿色有机农产品总数1248个,居全国前列;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139元,连续6年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在生态林果生产与销售方面,赣南已经成为脐橙种植面积世界最大、年产量全国第一的柑橘生产基地。2015年,“赣南脐橙”以657.84亿的品牌价值居中国初级农产品类地理标志产品第一名,果农

人均脐橙收入达7500元;脐橙收入占赣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2%,有25万种植户从中收益,直接带动30余万人脱贫。而相邻的吉安市也在采用类似策略打造自己的“井冈蜜柚”品牌,为新一轮扶贫开发和美丽乡村建设提供现代农业产业支撑。

四是优先发展生态观光旅游业。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将旅游产业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把旅游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朝阳产业、发挥生态优势的低碳产业、促进区域开放的先导产业和建设全面小康的幸福产业来全力推进,大力实施旅游强省战略,努力打造“风景这边独好”的江西旅游品牌形象。如今,旅游已经成为江西绿色发展的第一窗口、第一名片和第一品牌。2015年,江西共接待游客总数3.85亿人次,同比增加23%,实现旅游总收入3630亿元,其中乡村旅游接待总数1.9亿人次,实现总收入1800亿元。

### 三、实例分析:靖安和资溪

江西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重要推进途径是进行先行示范县(市、区)的创建试点,其中宜春市的靖安县和抚州市的资溪县就是2015年11月设立的第一批试点县,而靖安县还是江西省第一个建成的国家级生态县(2013年通过验收)。为此,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成员和东华理工大学的同行于2016年9月17—19日对两县的生态文明建设作了短暂考察,从而大大深化了我们对于江西省积极探索生态文明创建绿色发展路径及其面临着的诸多挑战的理解。

#### (一)靖安

靖安县地处赣西北,总面积1377平方公里,辖5镇6乡,人口15万(2015年),经昌铜高速到南昌只有37公里,距昌北国际机场56公里,位于长

<sup>①</sup>江西省环保厅:《2015年江西省环境状况公报》, <http://www.jxepb.gov.cn/sjzx/hjzkqb/2016/625f4083123e43a0a829293ebb91ab1b.htm>, 2016年10月8日。

江中游城市群、南昌都市区和昌铜高速生态经济带三大规划区之内。靖安不仅拥有山青水绿的生态环境和风景秀丽的自然景观(比如九岭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和三爪仑国家森林公园),出县交界断面水质达国家Ⅱ类标准,自然保护区内水质达国家Ⅰ类标准,森林覆盖率高达84.1%,境内有野生动植物种类2535种,超过全省总量的50%;而且靖安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与人文历史遗存,自公元937年建县以来文化名人辈出(比如明代尚书李书正和著名清官况钟),诗风久远,是“中华诗词之乡”“江西书画之乡”。

近几年来,靖安县逐渐明确自己的生态环境优势、近郊区位优势和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优势,致力于成为连接“南昌都市区”与“长株潭城市群”的“战略节点”,以及赣湘合作的“桥头堡”、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绿心”和南昌慢生活的“故乡”——“白云深处,靖安人家”,努力打造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靖安模式”。靖安的生态文明创建工作可以大致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sup>①</sup>:一是大力强化生态文明创建的顶层设计,二是积极探索绿色崛起的切实路径。前者主要表现为成立了以县委书记、县长为正副组长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并制定了详尽的实施方案、行动要点和工作规程。后者主要表现为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实施人居改善工程,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引入城乡垃圾一体化处理体制和全面实行“河段长”制度,对境内水域进行分段管理、分片保护;围绕强化生态基础支撑,实施生态品牌创建、森林景观提升和古树名木保护等生态保育工程,尤其是力争成为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全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围绕打造绿色产业体系,实施旅游强县、绿色低碳工业建设、循环经济推广、农业转型升级等产业转型升级工程,其中特色鲜明

的是发展生态休闲观光旅游业、有机农业和山区生态循环经济;围绕构建绿色文化,实施生态理念普及、生态行为推广和生态创建引领等生态意识培育工程,比如通过编制发放市民学生手册和乡规民约以及举办各种形式的地方性文化节。

在靖安县发改委相关人员的陪同下,笔者一行重点考察了如下三个生态文明建设工程项目:一是自行车绿道。它致力于打造“户外运动天堂”的靖安旅游品牌,结合承办第七届鄱阳湖国际自行车首站比赛,在已有100公里环山公路自行车道的基础上,2016年又投资兴建了全长25.04公里的自行车绿道,该绿道分为环城北路骑士道、滨河骑友道、山地骑侠道三条路线,并在沿途配备了驿站、观景摄影平台、医疗救助站等服务设施,适合不同体质和专业水平的骑手骑行。二是九岭滨河公园。它是位于城东九岭大桥潦河南岸的一个免费WIFI覆盖、景观优美、设施完备的开放式休闲运动公园,目前已完成整个工程的第一期,旨在向市民与游客提供一个环境优美、功能齐全的时尚休闲空间。值得提及的是,它也是靖安创新性引入实施“河长制”(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河长”建制全覆盖、建立“互联网+河长”监管模式、实施政府月调度制)及其成效的一个具体体现。三是宝峰禅韵生态小镇。自2013年以来,依托宝峰深厚的禅宗文化及优越的生态环境,结合全国深化城镇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创新试点,靖安按照5A级景区标准对集镇及其周边村庄基础设施进行了整体性改造提升,精心建设一个唐风禅韵古镇、一个马祖文化公园、一条旅游文化产品步行街、一个传统文化传播平台(宝峰讲堂)、一个河心湿地公园等五大工程。目前,宝峰禅韵小镇已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性知名度的生态文化小镇,正在致力于冲击全国5A级景区。

<sup>①</sup>陈志尧:《靖安县生态文明建设情况汇报》,靖安内部资料,2016年9月17日;靖安县生态办:《靖安县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情况汇报》,靖安内部资料,2016年9月17日。

## (二) 资溪

资溪县地处江西省东部、闽赣交界的武夷山脉西麓,国土总面积 1251 平方公里,现辖 2 乡 5 镇和 5 个生态公益型林场,人口 12.6 万(2012 年),连接济广高速、福银高速的资光高速和 316 国道、鹰厦铁路贯穿全境,是江西的东大门和重要的入闽通道。资溪既是一个生态资源(禀赋)大县,森林覆盖率高达 87.3%,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列中部地区第一位、全国第七位(2009 年数据),保存有全世界同纬度最完整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因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动植物基因库”,也是一个著名的移民大县。资溪县人口构成为 1/3 本地人、1/3 浙江“两江”移民、1/3 全国其他地区移民。同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不断走出去的 4 万多资溪人使之成为名扬国内外的“面包之乡”,在全国各地开设有 8000 余家面包店,并已进入俄罗斯、越南、缅甸等国外市场。

近年来,尤其是 2015 年成为江西省第一批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以来,资溪更加明确地实施生态立县战略,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积极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sup>①</sup>:一是敢为人先确立生态立县战略。早在 2001 年,县中共第十一次党代会就正式确立了“生态立县”的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以生态旅游为突破口的生态经济,并在 2007 年、2016 年进一步将其概括为“生态立县、绿色发展”和“生态立县、旅游强县、绿色发展”。2012 年,资溪县还请旅游策划专业机构将其整体形象设计为“纯净资溪、休闲圣地”,如今已成为无处不在的宣传广告语。二是不惜代价守护生态环境。在科学划定、严格遵守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生态红线的同时,资溪大力推动生态旅游业“带一产、接二产、连三产”,强力推动产业结构的绿色化调整。三是积极培

育绿色产业体系。确立并大力推进以生态旅游业为主导,以有机休闲农业、绿色低碳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绿色产业体系。生态旅游业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将全县 1251 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打造成全县域旅游景区、最美生态旅游目的地——包括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十大重点景区和 100 个精品景点。2015 年,全县接待游客达 340 万人次。四是创新机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资溪从 2003 年起就已将生态文明建设相关内容纳入县直部门和各乡镇(场)年度目标考核与绩效管理考核,从 2005 年起就开始将森林质量、水质等指标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和离任审计的重要内容,并在 2013 年后逐步完善成一种独具资溪特色的“生态审计制度”。此外,资溪还建立了包括“县、乡、村、组”四级的“山河长”负责制。五是不断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保障。资溪自筹资金 12 亿元(总投资 30 亿元)的资光高速计划于 2016 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将会实质性缓解资溪目前的高速交通瓶颈,“一城三区”(即中心城区+大觉山、九龙湖、师公十八瀑景区)的新发展格局规划,将会大幅提速资溪的“园林城市”与“森林城市”建设,“绿满资溪、花开百村”和景区沿线景观提升等一系列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正在整体性提升资溪的生态乡镇和美丽乡村建设水平,而各种形式的生态文化宣传践行活动,正在创造更为浓郁的生态文明建设社会氛围。

在资溪县政府和发改委机关人员的陪同下,笔者一行重点考察了如下两个生态文明建设工程项目:一是大觉山生态旅游景区,二是九龙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大觉山生态旅游景区是一个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的生态旅游景区,占地面积 204 平方公里,分为东西两大片区:东区以 30 万亩原始森林为中心,汇集了各类植物 1498 种,并拥有 40 余种国家一、二级名贵保护动植物,是“天然氧吧、

<sup>①</sup>黄智迅:《探索生态文明、打造纯净资溪》,资溪内部资料,2016 年 9 月 18 日。

动植物基因库”;西区以迄今已 1600 年的宗教文化特色为主体构成,有瀑布观景台、古艺术亭阁、高山湖泊观光、大峡谷漂流、大觉寺、太空步廊等众多景点。目前,资溪正努力将其进一步提升为国家 5A 级景区,并成为全县生态旅游业发展的标杆。九龙湖生态旅游度假区位于县城郊区 8 公里处,库区面积延绵 13 公里,从空中俯视,九座山岭宛如九条蛟龙盘卧山峦丛林之间,因而得名。尽管最初设想的旅游度假区建设目标尚未充分实现,但其自然生态景观确实美轮美奂。

从总体上说,靖安和资溪都明确坚持了中共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以“绿色崛起”为核心理念的“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指导性原则,试图通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有机休闲观光农业和低碳循环新型工业(尤其是服务业)来最大限度地保持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实现经济总量的扩张。就此而言,靖安和资溪是江西生态文明创建尤其是先行示范区建设的一个地域性“缩影”或“样板”,并突出体现了江西作为国家中部地区、生态环境资源(禀赋)相对优越地区、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相对较低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上的“绿色成长”特色。而从比较的角度看,地理区位更为有利的靖安似乎有着更大的现代化经济社会发展潜能——目前正在规划实施的昌铜高速生态经济带建设就提供着这样的重大机遇,尽管这也会使其未来的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着更大的传统工商业扩张压力。相比之下,资溪至少在目前体现了更为坚定的构建生态旅游主导的绿色经济体系,但却缺乏这一战略成功实施似乎不可或缺的、像靖安那样的地理区位先天性条件(浙江的安吉县是这方面的较成功实例)。

#### 四、比较性评论

正如本文开篇就已指出的,讨论生态文明创建

或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绿色发展路径”的方法论前提是:绿色发展只是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一种途径或战略手段,尤其是在与我们平时经常谈论的“生态现代化战略”(已经大规模或较深度工业化的生态化转型或重构)相比较的意义上。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意指经济领域中的无所作为或拒绝任何意义上的成长,特别是普通人民群众基于基本物质文化需要满足的生活条件与生活质量改善。也就是说,这里并不适用基于生态中心主义价值与伦理所推演出来的许多生态政治与政策要求——比如对所有物种与动植物个体及其生态系统的不加区别的保护,因为那样的话,将会完全扼杀像靖安和资溪这样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可能性,并会导致更为复杂的生态与社会公正难题。但是,它也明确无疑地表明,生态文明创建或先行示范区建设的长远目标,是一种基于新型政治、社会与文化制度体系和观念支撑的把生态可持续考量置于首位的新型经济,其基本特征是本地民众合生态需求的生态化满足,而不应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体系基础上的物质生产与生活方式<sup>①</sup>。

相应地,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并不等同于绿色发展,相反,前者对于后者同时具有方向和路径选择的规约性意义。也就是说,绿色发展既可以成为渐进走向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一个现实性路径,也有可能成为传统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的一种时代呈现或变种——“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概念正是对这样一种形成中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性描述<sup>②</sup>。笔者认为,二者的根本性区别在于:前者主动地致力于避免或超越自然生态资源(禀赋)的经济性利用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大众性)生活方式,更多考虑如何实现本地民众的

<sup>①</sup> 郝庆治、李宏伟、林震:《生态文明建设十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3页。

<sup>②</sup> 郝庆治:《21世纪以来的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期。

合生态需求的生态化满足,而这往往意味着对自然生态资源的社会性分享与管理;相比之下,后者仅仅把自然生态资源(禀赋)作为尚待开发的“绿色资产”或“绿色资本”,因而,所谓发展不过是使那些较容易资本化的自然生态系统及其要素转化为真实资本,加入到一个更为庞杂的资本生产与流通过程,而这其中的人的需求尤其是本地民众的需求及其满足并不重要。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可以对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或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绿色发展路径探索作一个初步的评价。在笔者看来,现阶段就作出一个“已经找到”或“此路不通”意义上的断定,显然还为时尚早。也许,我们可以将其转换为如下三个具体性问题:一是“绿色崛起”或“绿色发展”正在或将会导致经济活动中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程度(性质)的降低吗?二是“绿色崛起”或“绿色发展”正在或将会导向一个更加生态化的经济结构与制度体系吗?三是“绿色崛起”或“绿色发展”正在或将会通向一种更高社会形态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吗?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的观察大致是肯定的。以靖安和资溪为例,两县通过关闭整改低效高耗污染企业、选择支持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大力发展生态农林旅游业等政策措施(资溪甚至到抚州去创办“飞地工业园”),使得传统产业(比如石材、木竹加工)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大大减轻,而生态旅游业和有机休闲观光农林业的扩展虽然肯定会导致对自然生态资源开发力度的增加,但总的来说不可再生(逆)性和污染程度要低得多。至少就目前来看,无论是生态旅游度假景点,还是城乡公共休闲观光设施的开发建设与消费使用,都呈现为一种适度可控的情形。

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很可能是一种双重性的结果。单就靖安和资溪而言,答案似乎是清晰

的。即便是工业较为发达的靖安,2015年全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也只有16.52亿元,尽管这已经比2010年的6.9亿元增长了139.42%,并且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0.87%上升为45.5%;而资溪则直接提出了建立以生态旅游业为主导的绿色经济体系的目标(2015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32亿元,而同年全年游客接待量超过34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1亿元,同比增长34.5%)<sup>①</sup>。可以想见,随着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建设举措的不断落实,尤其是国家2016年9月公布的对于两县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定位,它们必将进一步“绿化”其现存的产品与产业结构,并探索创建与之相应的整体性经济制度构架。但从全省范围来看,过去10年中,江西明显是一个工业化比重不断提升的过程。与2000年相比,地区生产总值和三产结构分别从2003.07亿元和23.2%:35%:40.8%,改变为16723.8亿元和10.6%:50.8%:38.6%,前者增长了8.35倍,而后者中的第二产业比重提升了超过15个百分点;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长期持续性下滑,最极端的是2010年的12.8%:55%:32.2%<sup>②</sup>。不仅如此,2015年南昌和九江两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合计达5902.69亿元(而两市的人均地区产值分别为70752.67元和39582.27元),占全省总量的35.3%,已然呈现为一种高度集中与分化的格局。而一般来说,较高的第三产业和适当的第一产业比例更容易保证较好的生态环境质量,过度集中的大规模经济则会直接导致更多的生态环境难题。

对于第三个问题,笔者认为既是最容易、也是最难作出回答的。一方面,与过去过分倚重基于煤炭能源的以建材、重金属开采、纺织、机械制造、化工等行业的工业化城市化相比,如今更多侧重于开

① 百度百科词条“靖安县”“资溪县”,<http://baike.baidu.com/item>,2016年10月12日。

② 黄毓生、曾巧生:《江西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发使用新能源的以绿色低碳循环工业、生态旅游和有机农林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显然是现代文明形态演进中的一种质的进步。就此而言,江西近年来所践行甚或引领的先行示范区或试验区框架下的许多制度创新与政策探索,当然是迈向生态文明的坚实步骤,理应给予高度肯定。比如,国内最具权威性的北京林业大学创制的“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就对江西省作出了较高的连续性评价,2005—2008年分别在第12、第9、第13、第17位,2009—2013年分别为第21、第16、第18、第6、第9位(其中2013年表现较差的指标是“社会发展”)<sup>①</sup>。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崭新文明形态的生态文明的萌生与确立,显然需要更多的国内政治、社会与文化条件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对这些更一般性条件的探索尝试也是江西作为国家级试验区的重

要历史使命。比如,一个地区及其各个社群对于这场文明性变革的主动而充分的参与,从而在逐步改变现存的生态不合理、社会不公正的制度体系的同时,实现自身文明素质的革命性提升或重构,这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而我们在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或先行示范区建设过程中所看到的还主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社会动员。在对靖安、资溪和抚州等地的实地考察中,特别令人欣喜的是,地方官员群体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关键性少数”认识到并致力于所掌管区域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保持,逐渐跳出基于狭隘的经济主义思维的“你追我赶”逻辑。但笔者想强调的是,他们的各种形式的地方化努力,只有既自觉趋近于正在迅速革新着的生态文明理念与思维,又主动诉诸最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才会最终将其转化为一种生机勃勃的可持续事业。

---

<sup>①</sup>严耕主编:《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ECI 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严耕主编:《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ECI 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严耕主编:《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ECI 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严耕主编:《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ECI 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严耕主编:《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ECI 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严耕主编:《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ECI 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 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边缘优势效应

◎钟晓青

**[摘要]**边缘优势效应是生态系统中普遍存在的界面效应之一,本文将这一生态学基本理论首次运用到对香港经济社会“界面”效应的研究中。在发现香港处于制度界面、东西文化界面、金融时差界面、台海界面、港口界面等界面的基础上,对五大界面上的生态边缘优势效应进行了实际经济指标的比较分析,并通过胶体化学或生理学(微观生态学)的道南(一作杜南)平衡理论和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界定界面两边的市场均衡价格之差为界面渗透(进出口)的“渗透压”,是界面上的边缘“渗透(压)”交换效应一定程度地促进了经济繁荣。根据研究分析得出结论:随着内地的开放改革,香港与内地的界面“渗透压”有逐步降低趋势,香港的经济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香港经济;生态经济;边缘效应;道南平衡;界面渗透压;界面均衡

## 一、问题的提出

边缘化和边缘优势效应是分属于经济学和生态学的两个意义截然相反的概念<sup>①</sup>。前者是指经济主体从中心到边缘的失落、弱化、衰败的过程,后者是生态系统的边缘出现的“优势或劣势”效应。本文运用生态边缘优势效应原理研究“香港经济”,试图从另一个方面揭示香港经济发展的动力或原因。

战后香港的繁荣是有目共睹的,但究其原因可能很复杂。英国人认为:“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sup>②</sup>香港回归已经13年,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设想不仅捍卫了主权,实现了政治经济上的平稳过渡,而且对于保持促进香港经济发展动力或原因之一的“生态边缘效

应”,也是有其生态学及生态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

## 二、研究的思维和方法

用生态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落点在经济学,属于经济学范畴,叫作生态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生态学,落点在生态学,属于生态学范畴,叫作经济生态学<sup>③</sup>。我们结合生态学的生态边缘效应理论、胶体化学或生理学(微观生态学)的道南平衡(Donnan equilibrium)理论和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首次改进为区域生态经济边缘的三种新的研究思维和方法,并尝试运用到“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的经济发展动因的研究规范与实证研究之中。

### (一)生态边缘效应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钟晓青,博士,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园林及生态经济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香港中大景观设计院副院长、广州新世纪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广州 510275)。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96AJB042)、华南理工大学亚热带建筑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绿色空间研究”(20070401)、“低碳社区研究”(2010KB10)与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生态经济边缘效应研究”(974083)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W. J. Beacher, *Nesting birds and the vegetation substrate*, Chicago: Chicago Ornithological Society, 1942, pp.48—52.

<sup>②</sup>宗道一:《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

<sup>③</sup>马世骏:《边际效应与边际生态学》,马世骏:《现代生态学透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43—45页。

Guause 认为,两个相同物种不可能同时长期地占有相同的生态位(高斯假说)。在生态系统中,位于边缘的物种由于只有一半(50%)需要与相同的物种(同伴)在“相同时间上和相同的地上地下营养空间里”作“殊死搏斗”,而另一半不需要和相同的物种(同伴)作“殊死搏斗”,因此具有“边缘优势”。例如在人工植物群落像人工杉木林、马尾松林、稻田、麦田、密集菜田中,边上的植株可能个体最大<sup>①</sup>。

同样,在人工植物群落像人工杉木林、马尾松林、稻田、麦田、密集菜田中,边上的植株可能个体最小,这是因为遗传问题和边缘劣势的原因。由于系统的边缘往往是外来干扰如风暴、机械损伤、动物捕食等不利因素首当其冲的地方,于是系统的边缘上“边缘优势”与“边缘劣势”并存<sup>②</sup>。

既然边缘效应是大自然“界面”系统普遍存在的一种规律,而人类“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的“界面”存在边缘效应也是有可能的。生态系统的启示对我们解释香港经济的起落同样具有“仿真或仿生”的意义。战后的香港经济与边缘效应原理应该是有一定关联的,起码 1949 年中国大陆的变革造

成了香港在客观上位于以下的“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的“界面”是十分明显的:(1)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界面;(2)海洋与陆地的港口界面;(3)台湾与大陆交往的台海界面;(4)世界金融时差界面;(5)世界东西文化界面,如图 1 所示。

(二)胶体化学和微观生态学(生理)的道南平衡研究理念和方法

1911 年由 Donan 提出的胶体化学中关于半透膜两侧电解质平衡浓度关系的理论,其要点是:同一电解质在半透膜两边的化学势相等,若膜的一侧有某种符号(正或负)的非扩散性离子,则同号的扩散性离子在该侧的浓度较另一侧小。离子交换树脂表面可视为半透膜,树脂内部可视为由固定离子和反号离子组成的浓电解质。由此可以导出“与固定离子同号的离子被排斥在树脂外(不被吸附),不同可交换离子对于树脂吸附具有选择性”的结论。

道南平衡也是一种特殊的植物根系吸收机理中的积累离子现象。平衡的结果是膜两侧某离子的浓度不相等,但也达到了平衡。

此时,细胞内可扩散负离子和正离子浓度的乘积等于细胞外正负离子浓度乘积<sup>③</sup>。即:

$$[K^+]_{内} \times [Cl^-]_{内} = [K^+]_{外} \times [Cl^-]_{外} \quad (1)$$

由于细胞内有部分可扩散正离子被不扩散的负离子吸引,所以扩散平衡时,细胞内  $K^+$  浓度大于细胞外  $K^+$  的浓度,呈现离子积累现象,此时细胞外  $Cl^-$  的浓度大于细胞内  $Cl^-$  浓度。这种离子积累不需要消耗能量。

我们在研究生态经济系统的“界面”效应时,把海关和“界限”看成是“半透膜”,对于两边“经济要素”(“离子”)的互相渗透,我们构造和建立“经济渗透压”的概念和计算公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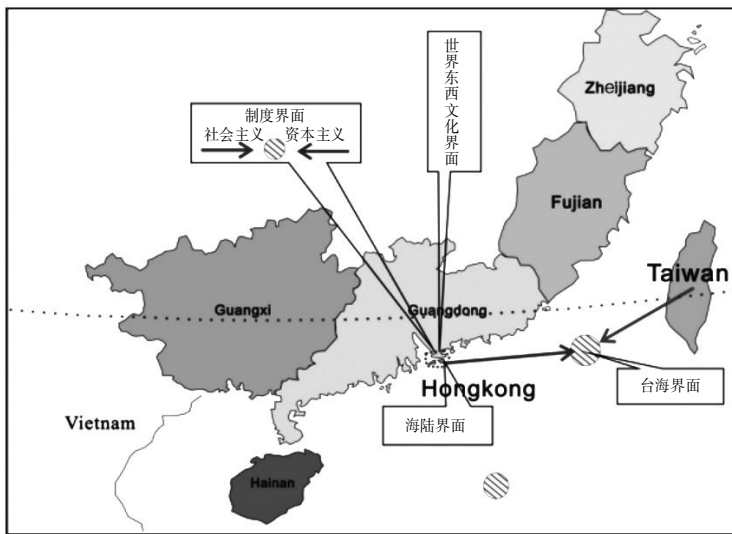


图 1 生态—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系统界面上的香港界面类型

① 马世骏、王如松:《边缘效应及其在经济生态学中的应用》,《生态学杂志》1985 年第 2 期。

② 陈利顶、徐建英、傅伯杰、吕一河:《斑块边缘效应的定量评价及其生态学意义》,《生态学报》2004 年第 9 期。

③ 何妍、周青:《边缘效应原理及其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的应用》,《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7 年第 5 期。

$$P=H/(H+C)-C/(H+C) \quad (2)$$

其中:P为渗透压%,H代表香港指标,C代表大陆的指标。利用该式,我们分别计算出之间的渗透压大小来实证有没有界面效应的存在。如果  $P=0$ ,证明两边同质,界面效应不存在。P的绝对值越大,边缘效应越明显。

(三)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上的经济学规范与实证研究方法

一般均衡理论是1874年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他的《纯粹经济学要义》中创立的。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后来由帕累托、希克斯、诺伊曼、萨缪尔森、阿罗、德步鲁及麦肯齐等人加以改进和发展。经济学家利用集合论、拓扑学等数学方法,在相当严格的假定条件之下证明:一般均衡体系存在着均衡解,而且这种均衡可以处于稳定状态,并同时满足经济效率的要求。

运用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和方法,对香港所处的多维界面分别进行“供需均衡”基础上的“价格”差异所导致的“渗透压”存在的“规范和实证”分析。首先通过对同一种产品从供需均衡的价格机制角度规范分析制度界面上的香港经济边缘效应,然后较大篇幅地进行实证研究。包括国际贸易中心的转口贸易的趋势变化,国际金融中心、交通运输、旅游和资讯中心的定量分析。特别是对边缘效应最明显的转口贸易量的长期变化作统计分析,实证“渗透压”及相关的“边缘效应”存在。

三、香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界面的“边缘优势效应”分析

采用经济学规范和实证的基本方法,结合边缘效应理论、离子渗透压理论(道南平衡)和一般均衡决定市场价格理论,首先进行规范方法的“假设、演绎、归纳、结论”的步骤,对生态系统界面边缘效应进行“比

较静态分析”的演绎型和归纳型研究,然后再进行相关社会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

(一)制度界面的生态经济边缘优势效应

1.制度界面的供需均衡的价格“渗透压”分析

香港和内地生态系统界面边缘效应的经济机制问题可以用“同一种产品供需均衡价格‘差额’或‘梯度’”来分析。市场价格是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均衡点)决定的。在香港和内地之间由于“界限”的分隔,出现了以下的情形:(1)1949—1979年,内地生产严重短缺,许多产品有市场无供给;(2)1949—1979年,内地生产技术落后,其质量价格无法同香港市场竞争;(3)1979年以后,内地在质量、价格、信誉、服务等方面无法同香港市场竞争,且价格远远高于香港;(4)1979年以后,内地也有一些产品(主要是农产品)价格远远低于香港,如图2所示。

根据公式(1)(2)以及经济学一般均衡决定价格原理,我们也可以定义香港和内地由于“海关”的分隔而产生的同一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差异”值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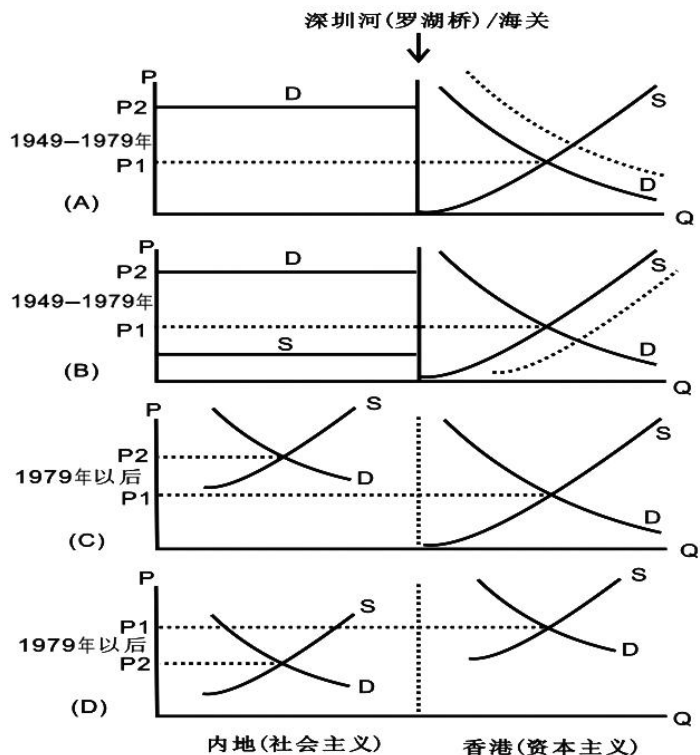


图2 同一种产品供需均衡价格“差额”或“梯度”的生态经济边缘效应

该类产品的“渗透压”:

$$P = P_{\text{香}} - P_{\text{内}} \quad (3)$$

其中: $P$ 为渗透压(价格差), $P_{\text{香}}$ 代表香港价格, $P_{\text{内}}$ 代表大陆的价格。同理,对于区域界面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也可根据上式推广到其他各种经济要素数量指标计算出来的“渗透压”。只要 $P$ 的绝对值大于零,就证明“边缘渗透”效应存在。 $P$ 的绝对值越大,系统异质性越大,边缘效应就越明显。

图 2A 表示 1949 年社会主义中国建立至 1979 年改革开放的 30 年中,由于前期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封锁和后期的闭关锁国,内地与香港以深圳的深圳河为界,经济上基本上互不往来,这时我们从同一种产品供需均衡的价格机制角度分析“制度界面上”的“价格差(渗透压)”及香港经济边缘效应。

对于国际上的先进产品如当时走私盛行的电视、冰箱、录音机等,国内市场有很高的需求( $D$ )对应价格  $P_2$ ,但没有正常的进口供给(供给曲线  $S$  因为闭关锁国而非正常缺失)。罗湖桥那边的香港却是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相关产品有均衡价格  $P_1$ 。由于国内有需无供必然是  $P_2$  远远大于  $P_1$ (渗透压存在且较大),于是开始是走私,后来是盗卖进口配额,结果是香港的需求曲线从实线上升到虚线的  $D$ ,香港从中获利,而内地却并未享受到“需求”方面市场均衡价格的真正实惠。

图 2B 表示 1949 年社会主义中国建立至 1979 年改革开放的 30 年中,由于国内的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国内的产品基本上无法面对国际上的先进产品竞争,为了换取“外汇”,只有利用土产、特产以低价格进行“倾销”。这时我们同样从同一种产品从供需均衡的价格机制角度,分析“制度界面”上的香港经济边缘效应。如当时的特产食品、中药材、原材料等,国内市场有很高的需求( $D$ )对应价格  $P_2$ ,香港相关产品有均衡价格  $P_1$ (渗透压存在且为负值,但绝对值较大)。为了“外汇”,不顾国内价格  $P_2$  用远远小于  $P_1$  的价格,用强制(计划经济)手段(与需求曲线  $D$  脱离关系的供给曲

线  $S$  的方式)对国外市场进行“倾销”。结果是香港的供给曲线从实线上升到虚线的  $S$ ,香港从中获利,而内地却同样并未享受到“供给”方面市场均衡价格的实惠。

图 2C、D 表示 1979 年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体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对同一种产品从供需均衡的价格机制角度分析“制度界面”上的香港经济边缘效应。当国门打开以后,罗湖桥边的“墙”开始“通透”(用虚线表示)。两边开始按“市场”方式配置资源,运用供需均衡确定价格。但同一种商品内地和香港的均衡价格是不一致的; $P_2$  不等于  $P_1$ 。界面两边的市场均衡价格之差的出现与自然生态系统界面出项渗透的“渗透压”原理是一致的,界面两边的市场均衡价格之差就是进出口贸易产生的动力或“渗透压”(渗透压存在且较大)。图 2C 中  $P_2$ (内地市场均价)大于  $P_1$ (香港市场均价),香港的产品向内地输入;图 2D 中  $P_2$ (内地市场均价)小于  $P_1$ (香港市场均价),内地的产品向香港输出。通过关税调节,进口或出口贸易在界面上发生,双方均享受到了“边缘优势效应”的好处。

## 2. 制度界面引生的经济边缘效应实证

香港经济与内地息息相关。在新中国建立之前,香港的经济与内地基本上是一体化的,那时候本文研究的“五大界面”的问题尚不明显,其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制度界面”尚未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经济按照标准的产业结构分期,可以分为五个时期:(1)1945—1951 年的战后恢复期;(2)1952—1970 年的工业化时期;(3)1971—1980 年的内外交困而进行的经济多元化时期;(4)内地改革开放以后引发 1981—1997 年“大香港经济”全面发展的时期;(5)1997 年回归祖国之后的现代都市经济时期,如下页图 3 所示。

(1)战后恢复期也是制度界面的诞生期(1945—1951 年)

转口贸易是发生在生态经济系统界面上的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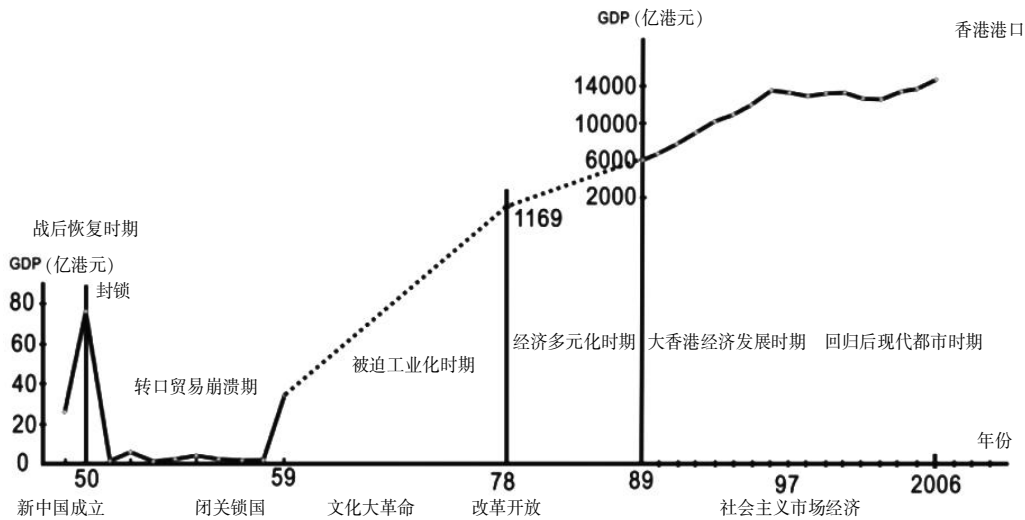


图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五个时期

缘效应的标志之一。香港自开埠以来一直是一个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商埠,特别依赖对中国内地的转口贸易来带动经济发展。二战结束时,香港人口只剩60万人,1949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26.32亿港元,当时香港的工业远不如上海、广州等地,工业收入在整个香港经济中的地位及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内地和资本主义香港的“制度界面”正式出现。当时,英国采取了承认新中国并积极开展对华贸易的明智决策,香港商人抓紧时机充当中国同外界贸易的“中介”。“制度界面”的边缘效应凸现:香港与内地的贸易额在1949年和1950年分别上升了66%和74%。1950年贸易总额达75亿港元,比上年增加近50%,超过了战前水平。

(2) 制度界面的人为关闭及被迫工业化的时期(1952—1970年)

1950年12月,美国宣布对华实行禁运,同时亦对香港实施严厉的贸易限制。随后,在所谓“联合国”决议下,许多国家也相继宣布对华禁运。英国追随美国,加紧对华出口管制。社会主义的内地和资本主义香港的“制度界面”在正式出现后不久,由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被人为“关闭”。

1952年,香港对内地输出下降到5.2亿港元,

不及上年的1/3,此后逐年下跌,到1955年下降为1.82亿港元。在1951—1955年间,内地在香港出口市场中的地位从第1位降为第5位,比重从36.2%急降到7.2%。转口贸易的衰退直接影响到工商、金融、保险、航运等行业的生存,工商业倒闭风潮迭起,单在1952年,每季倒闭工厂平均即达50家,失业率高达30%以上。

在转口贸易这一香港经济的生命线遭到美国和联合国对华禁运政策严厉打击的情况下,香港经济处于“不出口即衰亡”的危险境地。为了摆脱困境,香港选择了发展出口加工工业的道路,通过发展直接出口以求得生存。

1960年,香港的工厂总数已由1950年的1500家增加到5000家,雇员总数由8万人增加到21万人。以轻纺工业为主体的香港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已粗具雏形,从1959年开始,香港产品出口总值首次超过转口贸易总值,达32.78亿港元,占香港出口贸易总值中的比例高达69.6%,这标志着香港的经济形态完成了从依靠“边缘效应”的“转口贸易”为主向加工工业为主的转变。

(3) 制度界面的人为关闭及被迫经济多元化时期(1971—1980年)

与内地的经济关系的“边缘优势效应”被人为

干扰之后,弹丸之地的香港既无资源又无市场,拥有的仍然是多种“界面”的“界面效应”。利用“自由港”的优势,香港的出口加工工业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了飞跃发展。

纺织业和制衣业一直是香港最大的工业部门,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其出口值占香港制造业出口总值的四成以上,雇用的工人在70年代后期已达36.2万人,几乎占当时香港制造业工人80万人口的一半。

在1970—1978年间,香港出口贸易额每年平均增长16.7%,其中港货出口为16.2%。1978年香港工业品出口达407亿港元,进出口总额为1169.6亿港元,为1950年的15.6倍,位居世界第18大贸易区,在亚洲仅次于日本。

(4)制度界面的重新“开启”及“大香港经济”全面发展的时期(1981—1997年)

1979年,内地开始“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的内地和资本主义香港的“制度界面”重新“开启”。工业化后的香港产品重新有了一个广阔的、邻近的且十分巨大的市场和稳固的原料来源。

1980年以后,香港电子工业依托与内地的“界面优势效应”发展得更为迅速,到1990年,电子业出口值达586亿港元,1992年增至614.37亿港元,占香港制造业产品出口总值的26.2%。从1979年以后,香港经济依托与内地的“边缘优势效应”保持了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年平均实际增长率为11.7%,70年代为9.2%,到80年代保持在7.1%的高速增长状态,名列世界前茅。

1990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达5460亿港元(约合712.64亿美元),为1961年的91倍;人均产值94138港元(约合12067美元),比1961年增加了48倍。1991年,香港在世界贸易排名表中名列第10,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太地区第二大国际贸易中心。

3.回归后制度界面“强化效应”及现代都市经济

时期的机遇和挑战

香港回归祖国以后,“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继续强化了制度界面的“边缘效应”。因为:(1)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享有“特别优惠政策”;(2)邻近的广东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的自然转移;(3)香港经济的起飞后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断上升;(4)原来的与英国人管制的“外界”成了中国人的“内界”;(5)内地周边省份的经济发展及与香港的差距缩小(2006年广东GDP超过香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传统制造业及相关产业逐渐丧失低成本优势并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香港明显感到了问题所在并在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在这个“现代都市经济”的新时期,香港在“边缘效应”的继续作用下,由于“界面”两边资金积累的差异而产生巨大的资金流动或“渗透”压力,香港的资金自然向邻近的内地流动。

在产业的自然转移的过程中,“边缘效应”的继续作用使超过85%的香港制造业转移到了邻近的内地。由于“边缘”的存在,香港制造业的对外转移实际上是生产车间的转移,公司总部并未转移。由此形成香港制造业新的经营模式,即香港接单、内地生产、海外销售。在生产线转移到内地之后,香港制造业企业总部主要负责产品设计、品质管理、市场营销和财务管理等工作。通过企业价值链的分离与整合,内地的低成本优势支持和延续了香港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使香港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为结构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以“港口”业的发展为标志的海陆界面引起的边缘效应<sup>①</sup>

香港地处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边缘,邻近珠江出海口,是典型的海陆生态经济系统的“界面”。根据历史资料和当前的经济发展研究显示,中国的沿海港口的发展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以“上海”为龙头的港口发展阶段(1869—1949年);(2)以“香

<sup>①</sup>程连生、孙承平、周武光:《我国海岸带经济环境与经济走势分析》,《经济地理》2003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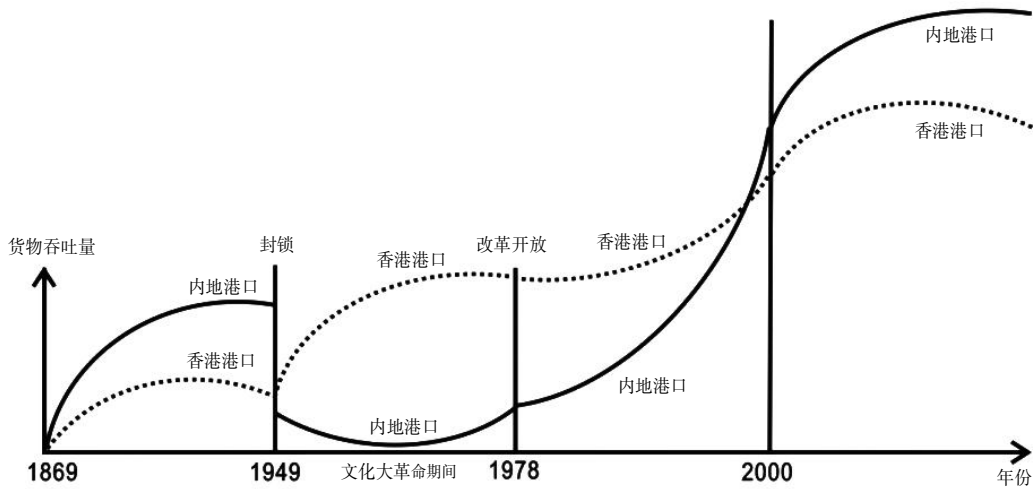


图4 海陆界面上的港口效应中香港和内地的比较动态分析

港”为龙头的港口发展阶段(1949—2000年);(3)群雄并起,兴旺发达的新阶段(2000年以后),如图4所示。

图4中,1869—1949年间内地的港口货物吞吐量远大于香港,1949—1978年间内地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和自身的“闭关锁国”,港口货物吞吐量一落千丈。1978年后改革开放,但港口不是一下可以建成的,直到2000年前后才逐步超过香港。图3也表明内地和香港的港口的互补性和相互替代性。

1.以“上海”为龙头的港口发展阶段实证(1869—1949年)

1949年以前,香港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远不如上海<sup>①</sup>。1887年,九龙、拱北相继设立海关,图中的数据据《中国旧海关史料》各有关年度贸易统计折算。表1的数据映证了图4的分析。

2.以“香港”为龙头的港口发展阶段实证(1849—2000年)

二战后初期的世界很快形成了两极敌对格局,新中国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方,对资本主义国家“闭关锁国”,对外也几乎关闭了所有的港口。但是政治隔绝并不能断绝经贸交流,中国内地通过香港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经贸往来,香港成了唯一的国

表1 1949年前中国主要“港口”年吞吐量排名表

排名(order)	1869年	1874年	1885年	1894年	1904年	1938年	1949年
1	广州	汕头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2	福州	上海	厦门	广州	广州	广州	广州
3	厦门	厦门	汕头	汕头	汕头	厦门	汕头
4	汕头	广州	广州	厦门	厦门	厦门	厦门
5	上海	福州	福州	福州	福州	梧州	福州
6	芝罘	宁波	北海	北海	福州	福州	梧州
7	天津	台湾	琼州	天津	蒙自	蒙自	蒙自
8	牛庄	天津	天津	淡水	牛庄	牛庄	牛庄
9	宁波	淡水	淡水	台湾	汉口	天津	天津
10	台湾	芝罘	台湾	琼州	天津	汉口	汉口

①程连生、孙承平、周武光:《我国海岸带经济环境与经济走势分析》,《经济地理》2003年第2期。



际通道。内地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港口发展滞后,转口经过香港,使香港的港口经济迅速发展。香港的港口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也成为了世界第一。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香港拥有 19 条国际航线,联系着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的 460 多个港口。这些航线除了本港运营外,许多海外国际航线也选择香港作为船舶中途停靠港。香港拥有一支庞大的商船队及 2000 多家大小航运公司和码头公司进行高效率的竞争性运营,使香港航运具有成本低服务质量好的特点。2005 年,有 64300 万吨位的远洋轮船进出香港,客运吞吐量达 2152 万人次,共装卸 16120 万公吨的货物,加上河运货物,共计约 2241 万个标准货柜单位。而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香港取代荷兰鹿特丹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货运港,其间除了 1997 年被新加坡超过,一直占第 1 位。

3. 群雄并起,兴旺发达的新阶段实证(2000 年以后)

在目前行政区划状况下,中国的临海经济空间包括 68 个县、62 个县级市、41 个地级市和 2 个直辖市,共 173 个行政单位,总面积 25.78 万 km<sup>2</sup>,总人口约 1.5 亿,是中国经济活动的密集地带;2000 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 33,190.08 亿元,占同期全国总数的 37.1% 以上,是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中的发

达地区,在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sup>①</sup>。在中国的临海产业中,港口是不可少的,于是内地港口与香港港口的互补性和替代性同样明显。

(三)世界时差产生的金融“界面”及其边缘效应规范与实证

1. 世界金融界面的 24 小时连续驳接的比较静态分析

香港是国际十大金融中心之一,是排在伦敦和纽约之后第二梯队的国际金融中心。如图 5 所示,香港金融业由于根据世界时差(太阳规律)的 8/24 的三分天下的条件,具有迈向第一梯队金融中心、迈向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与伦敦纽约并驾齐驱的基础。

香港不仅具备发展世界级金融中心的最佳区位条件和制度条件,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具有发展金融业的基本要素,具备优异的金融生态环境。

香港金融业的区位优势主要有三个方面<sup>②</sup>:(1)全球区位优势。香港与伦敦、纽约三分全球,在时区上相互衔接,纽约下班,香港开始上班,香港下班,伦敦开始上班。三座金融中心可以使全球金融保持 24 小时运作。(2)东亚区位优势。东京位于东亚北端,新加坡位于东亚南端,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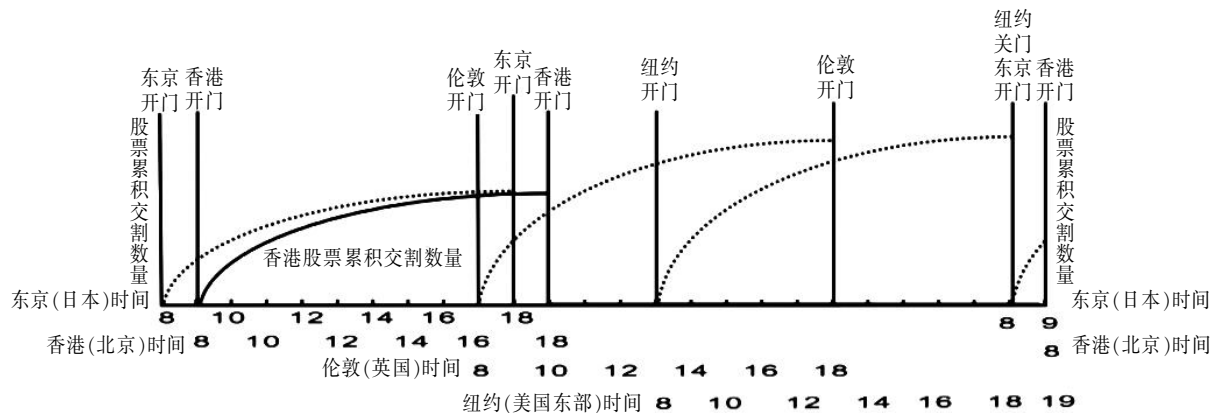


图 5 世界时差形成的三大金融界面(营业时间为 8:00-18:00)

①杨银海:《我国临空经济发展解读》,《中国城市经济》2010 年第 1 期。

②史小坤、宋之杰:《高度发达的香港金融制度的适宜性研究与借鉴》,《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

香港位于东亚中心,从香港到东亚大多数城市的飞行时间都不超过4个小时。(3)全国区位优势。背靠经济迅猛发展的祖国大陆,经济腹地辽阔。

香港金融业的制度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和完善的司法体制。二是有“一国两制”的保障。香港和内地是两个不同的金融体系,可以建立互补、互助和互动的关系。三是在区位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基础上,经历一百多年的洗礼,香港具备了金融业成长的五大基础要素:(1)宏观经济稳定。政局稳定,币值稳定,财政稳定,长期以来,香港维持审慎的财政收支政策。(2)产权明晰。土地、股份、股票、债券和衍生资产的产权界定、登记、注册、交易以及保护,都有完全的法律保障。金融监管有力,在历史长河中,香港“什么贼都见过”,投资者对香港有充分的信心。(3)“公平游戏”。境内境外市场参与者一律平等,公平竞争,外汇自由流动,金融不断创新。(4)信息透明。高质量的信息是金融市场交易的必要保障,香港金融市场信息流通速度快,投资者可以便捷、可靠和廉价地获得信息。(5)交易成本低。金融交易的磨擦成本越低,金融交易量越大,金融市场越发达。香港金融业的关联行业蓬勃发展,使得金融交易的税收低、时间快,形式灵活多样。

2006年,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调研认为,香港能够与纽约和伦敦抗衡的五项优势是:其一,金融条例较美国宽松;其二,资金货币自由流通、自由兑换;其三,拥有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其四,联系内地与“珠三角”重镇;其五,税率比美国和英国低。

2.作为世界三大金融“界面”的香港与伦敦、纽约的差距<sup>①</sup>

目前,与国际金融业第一梯队的纽约和伦敦相比,香港的差距还十分明显。2003年,香港金

融业的产值只有纽约的1/4,就业人数只有纽约的1/2;伦敦和纽约的金融业分别占GDP的16.5%和26.7%,而香港金融业只占GDP的12.3%。在金融业的结构上,香港也存在劣势,例如期货市场 and 保险市场发展滞后,债券市场的规模还不到纽约的1%。

伦敦金融城的情况与纽约相似。最近20年,英国大刀阔斧地调整经济结构,把原来以制造业为本调整为以金融、教育和贸易为主。2005年,金融城全年收入10万英镑的人数从8年前的20万增加到50万,金融城高薪阶层纳税额占全英国所得税收入的1/4,金融城提供的公司税源也占到全国的1/4。

香港金融业与伦敦和纽约金融业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是腹地比较狭小。纽约金融业的基础是占全球GDP32%的美国,欧洲不少大型企业的股票在伦敦上市,而香港是一个细小的城市,要发挥其金融业的潜在优势跻身国际金融中心的前列,就必须开拓庞大的腹地。

### 3.香港回归以后金融“界面”效应趋势

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香港金融业迈出了坚实的攀登步伐。从1997年到2005年,境外驻港地区的总部公司增长了三成,驻港地区办事处增长了六成。尽管有亚洲金融危机和SARS的干扰,香港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仍在上升。

同期,香港的银行资产和股票市值增长1.2倍以上,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其主要推动力来自祖国大陆,内地企业占香港2005年股票成交额的46%,当年十大最活跃的股票中,内地企业占到了6家。

2006年,到香港上市是内地银行最热门的话题,大小银行都紧锣密鼓地筹备到香港上市。截至2006年11月,全球首次公开招股2270亿美元,香港占17%,超过伦敦和纽约占世界首位,伦

<sup>①</sup>胡兆量:《香港与世界级金融中心的差距及发展优势》,《城市问题》2007年第5期。

敦和纽约分别占 15%和 11%。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公开招股 220 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开招股项目;中国银行招股 110 亿美元,占当年全球第 2 位。随着内地优质企业的增多,到香港上市的企业数将成倍增加。

作为冉冉上升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辐射力还可以达到整个中华经济圈,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目前,台湾地区有 50 家企业在香港上市。

#### 4. 和同样处于金融时差“界面”上的上海的分工协作问题

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是区域金融中心。香港是兼具伦敦与瑞士功能及特色的国际金融中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主要扮演离岸金融市场的角色,这与上海是有明显区别的,可以从规模和素质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香港和上海,一个是国际级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一个是祖国大陆地区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两座城市互相补充、互相协作,加上全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并肩繁荣是不言而喻的。美国除了纽约金融中心以外,还有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副中心;欧盟除了伦敦金融中心以外,还有法兰克福、巴黎、米兰、阿姆斯特丹等中心。有理由相信,偌大的中国完全需要各具特色的香港和上海共同带动全国经济前进。

综上所述,香港建成“东方纽约”,建成世界级金融中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这应该成为政府和全民的共识,应该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以及舆论上的支持。香港建成世界级金融中心,是 700 万香港人民的光荣使命,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责任。

#### (四) 历史造成台海“界面”的香港边缘生态效应<sup>①</sup>

香港长期是两岸经贸关系发展的中介和桥梁。随着台湾当局落实“入世议定书”中关于直接贸易和直接投资承诺日期的临近和两岸航空业界谈判的进展,两岸“三通”已势在必行。“三通”虽对两岸经港转口贸易产生一定影响,但对作为两岸经港贸易主体的两岸经港离岸贸易影响不大,“三通”后香港作为大陆台商投资服务基地的作用还将进一步加强,香港作为大陆台商的资金运作基地和资金调度中心的作用仍将无可代替。

#### 1. 台海界面的贸易的“渗透压”比较静态分析

图 6(A)(B)用经济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描述了同一产品或服务的三方价格(内地价格 P1 和香港价格 P2 及台湾价格 P3)的相互“渗透压”态势。在图 6(A)中  $P1 > P2 > P3$ , 产品或服务从台湾经香港流向内地;图 6(B)中  $P1 < P2 < P3$ , 产品或服务从内地经香港流向台湾(即使内地的价格是非市场经济决定,如果和香港、台湾一样是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均衡价格一样也是如此)。无论何种情况,香港的利益是“边缘”上的“渔利”。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台湾当局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相继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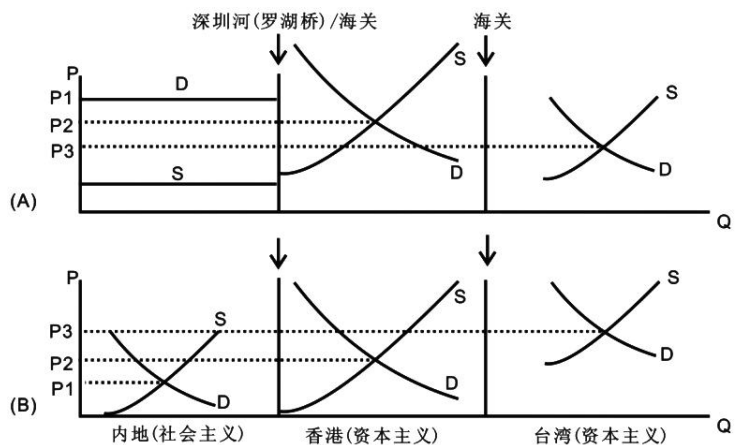


图 6 台湾与大陆(内地)商品价格差(渗透压)引起的香港边缘效应

<sup>①</sup>陈恩:《两岸“三通”对香港经贸中介地位的影响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期。

对大陆探亲、通商和投资活动以来,两岸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但由于台湾当局对两岸经贸交往坚持“间接、渐进和单向”的限制性政策,使海峡两岸的经贸往来只能以港、澳等第三地为中介间接进行,这样香港便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良好的航空、航海设施而在两岸经贸交往中扮演了人员交往的枢纽、贸易中转港、台资进入大陆的桥梁、大陆台商的资金调度中心、专业服务基地,以及两岸海、空航运通道等重要角色。

2.“三通”将减弱台海“界面”边缘效应但不会完全消灭

由于香港优越的区位条件,良好的航运设施和自由开放的制度环境,特别是“三通”对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强力拉抬作用,“三通”对作为两岸贸易主体的两岸离岸贸易影响不大。“三通”后香港作为大陆台商投资服务基地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香港仍将是两岸间重要的航运、旅游中转枢纽。“三通”后香港作为大陆台商的资金运作基地和资金调度中心的作用仍将不可代替。

“三通”对两岸经港贸易有一定影响,其中两岸经港转口贸易略有减少,但对两岸经港离岸贸易的影响不大。过去 20 多年来,两岸贸易发展迅猛。据统计,至 2005 年底,两岸累计贸易总额 4779.1 亿美元,其中 2005 年两岸贸易额达 912 亿美元,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顺差来源地。据估计,“三通”后两岸经港转口贸易额将下降 30%,使香港从中赚取的转口毛利下降 40 亿港元左右,并让香港的整体贸易下降 3%—6%,香港本地生产总值也因此下降 0.3%—0.6%。广东对台贸易超过 95%都是以香港为转口或转运港实现的。

作为广东和华南地区外贸枢纽港的香港因具有一流的港口航运设施和航运效率,两岸“三通”后考虑到运输成本和港口运作效率等因素,占两岸贸易总额中约 40%的广东对台贸易仍会

以香港为贸易中转或转运港。

3.“三通”后香港“中介”投资服务基地边缘效应仍可保持

“三通”后香港作为台商对大陆投资中介的作用日渐式微,但投资服务基地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据大陆方面统计,至 2005 年底,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累计达 68095 个,合同投资金额累计达 896.6 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 417.6 亿美元。

台商对大陆投资约 85%左右都是以香港为中介间接进行的。目前台湾在香港设立具有实质业务的商贸公司约 5000 家,而在香港注册设立不具实质业务的纸上公司(空壳公司)则估计有 2 万—3 万家。

两岸“三通”后虽然香港的投资中介作用会减弱,但其投资服务基地的作用却会进一步加强,因为香港是国际贸易、金融和会计、法律等专业服务中心,拥有东亚地区最高效率的海陆运输网络和完善配套的专业服务体系。香港的专业服务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香港的律师、会计、保险、证券和管理咨询等专业服务人员不但熟悉内地的法律和会计制度,而且熟悉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运作,从而能为台商在内地的投资和贸易业务提供符合国际规范的服务和保障。正是这一原因,香港始终成为台商进入大陆市场的主要门户,成为台商的贸易、投资服务基地,也吸引大量台商到香港建立中介性服务机构。

据有关资料显示,台湾对香港贸易每出超 1 美元,就有 0.4 美元滞留香港作为短期资金周转之用。据台湾“陆委会”测算,从 1985 年至 2003 年底台湾对香港贸易顺差累计约 2192.96 亿美元,其中滞留香港作短期资金周转之用的资金合计约达 877 亿美元。香港在台商筹、融资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大陆台商除通过香港获得国际银团联合贷款,通过香港获得岛内银行 OBU(台湾银行国际金融业务分行)贷款外,香港还是台资企业上市融资的重要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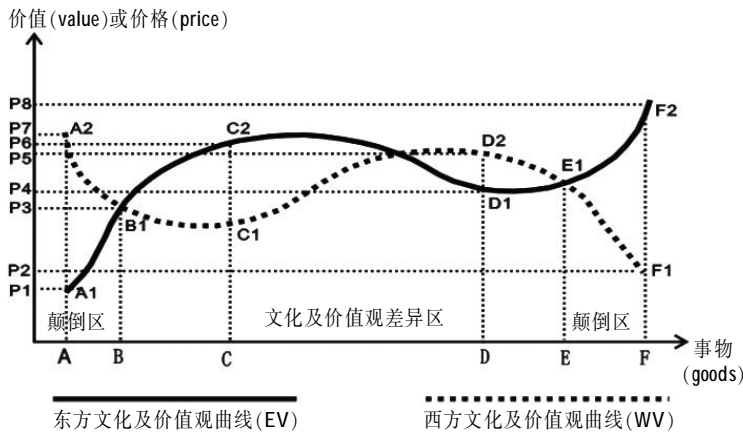


图7 同一种产品或服务的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比较静态分析(价值“麻花”图)

(五)文化界面的生态经济边缘效应

1.文化界面的价值观差异的比较静态分析

香港地理位置位于制度、海陆、台海、文化等生态“界面”上,生态边缘优势效应被充分发挥,条件十分优越。城市风光秀丽,荟萃中西文化,同时又是“购物天堂”和“美食天堂”。东西方文化由于历史、生态、偏好、习惯等等原因存在巨大差异。如图7中代表对同一事物的东西方文化的两条价值曲线有开叉的两端:表示对同一事物的美与丑、高与低、好与坏有可能是完全对立的、极端的两种价值观。两条价值曲线在中间的“差异区”中,同一物品或事物的“价值”是不同的,当然,也有在B、E点上的交点,在这些点上,东西方的价值观偶合、相等。

图7中,对于A物品来说,东方价值为A1(P1)而西方价值为A2(P7),显然同样的A物品,价值或价格 $P7 > P1$ 。这是同一物品东西方价值颠倒的状况,同理还有F物品。C、D物品的价值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因此,价格差异的“渗透压”存在,边缘效应明显。实际情况中,由于文化的差异和包容,香港成了“旅游”和“购物”的乐园。

2.东西方文化交汇的“界面”效应实证:以“旅游经济”为标志的表达

(1)香港旅游业成为经济的主要支柱

旅游业是香港服务型经济的重要一环,成为

香港赚取外汇的第二大行业,对香港经济有着重要的贡献。在2001年,旅游收益达642.8亿港元,较2000年增长4.5%,平均每位访港旅客花费4532港元。香港的旅游业与社会经济、民生息息相关。旅游业在2001年直接及间接为香港提供了36万个就业机会,较2000年上升3.4%,超过就业人口的1/10,并呈上升趋势,是香港聘用最多从业人员的行业之一。同时,旅

旅游业是相关性很强的产业,旅游业好景带动了香港餐饮、酒店、交通、通讯、零售商务、公共服务等相关行业的发展,缓解了通缩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据估计,现时如果旅游消费提高2个百分点,那么零售额和酒店收入将提升1个百分点,香港的生产总值将增长0.2个百分点。

(2)旅客访港目的以度假、商务会议为主

图8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旅客访港目的比重中,度假和商务会议占绝大比例。1998—2001年间,以度假为目的的旅客占总人数的五成左右,而以商务会议为目的的旅客比重则占三成左右。

香港享有国际公认的“购物天堂”的美誉,其最富吸引力的是价廉物美的商品。香港实行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除烟草、酒类及其他少数几类物品外,一般进口货物都免税,且不存在销售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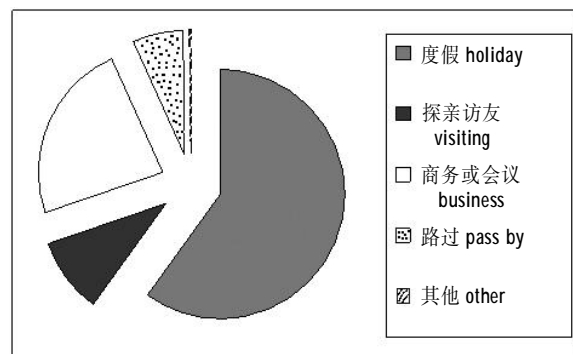


图8 香港的游客访港的目的统计分析

资料来源:《香港统计年鉴》

表 2 香港的内地游客人数统计分析

万人次/年

年份(year)	1998	1999	2000	2001	2006	2007
内地游客数量(amount)	259.7	308.4	378.5	444.9	1433	2100
占总数百分比 (percentage)	27.1%	29.9%	28.8%	32.4%	35.6%	50.3%
增长率(increase rate)	13.1%	18.7%	18.1%	17.5%	15.9%	46.5%

资料来源:《香港统计年鉴》

及工商业增值税,因而香港商品价格较世界主要城市低廉。再者,香港有万余家各种档次的百货公司、购物中心、超级市场和专卖店,具有优良的购物环境。

此外,香港具有其他著名旅游点不可媲美的优势。几十年来,访港游客购物消费一直占总消费的半数以上。如上页图 8 数据所示,访港旅客的主要消费依次为购物、酒店账单、酒店外膳食。其中购物为最主要的消费,所占比重保持稳定,1998 年占 49%,1999 年占 57%,2000 年和 2001 年均占 50.2%。这表明虽然全球经济不景气且港元汇率仍然坚挺,但香港在旅客心目中依然是理想的购物圣地。

(3)生态边缘优势效应的充分表达:访港旅客以邻近的内地客源为主

目前,中国内地成为香港最大客源地。如表 2 所示,1998—2001 年,内地旅客人数均占访港旅客总数的 1/3 左右,并以每年百分之十几的增幅高速稳步增长。其中,2001 年中国内地旅客的总数为 444.86 万人,增幅达 17.5%。这首先归因于中国内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春节、“五一”“十一”三个旅游“黄金周”的形成,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已成了内地居民消费的热点。中国内地成为亚洲地区一个新兴的客源输出国,使香港成为最大、最直接的受益地。

再者,在 2002 年初,国家旅游局取消访港旅游团的配额限制,并批准了 63 家可组织“港澳游”的旅行社。香港旅游发展局亦开展广泛的宣传和推广攻势,内地旅客人次不断上升。2002 年

1—10 月份内地游客高达 537 万人次,上升 50%,占来港游客总数的 40%。

根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资料,2006 年内地接待的香港同胞达 7390 万人次,澳门同胞达 2440 万人次,台湾同胞达 441 万人次;而中国内地居民首站赴香港的旅游人数为 1433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6.0%,赴澳门者为 989.50 万人次,增长 16.7%。

#### 四、小结与讨论

利用建立在公式(1)和(2)基础上的公式(3),可以十分直观地衡量、观察和预测生态经济边缘效应的发生、减弱或增强趋势。只要系统两边的价格差或其他经济要素的差值(经济渗透压)的绝对值大于零,边缘效应就存在。绝对值越大,边缘效应就越强;绝对值越小,边缘效应就越弱。价格差趋向于零,系统两边趋向于同质,界面生态经济效应消失。

目前,香港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界面效应,海洋与陆地的港口效应,随着珠江三角洲的改革开放已经逐步减弱;台湾与大陆交往的台海界面效应仍比较强劲地保持,但随着“直行”“两岸三通”也会逐步减退;世界金融时差界面上的优势仍然明显,但随着上海竞争“国际金融中心”,重返国际金融舞台的势头将受到严峻的挑战;在世界东西文化交流界面上,优势仍然明显,表现在旅游和其他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较好。因此,香港经济发展在保持传统界面的“渗透压”优势及创新新的界面方面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在。

# 中国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研究

——基于 31 个省(市、区)面板数据的聚类分析

◎许正松 孔凡斌

**[摘要]**不同产业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尽相同,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被称为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本文在回顾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确定了国民经济细分行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以全国 31 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使用 2000 年至 2013 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构造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面板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研究表明,2000 年至 2013 年,全国范围内生态环境压力有所增大,且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别。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促进中西部省份有选择地承接产业转移,以技术进步降低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对策建议。

**[关键字]**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生态效应;技术进步

## 一、引言与文献分析

通常认为,第一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弊有利。例如,农业与林业生产中绿色植物的生长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而农业面源污染则会破坏环境<sup>①</sup>。但从第一产业的发展历程以及工业生产对环境的影响比较来看,第一产业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均较为有限<sup>②</sup>。第二产业的生产方式与产出种类决定了其单位产出的污染程度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相对于轻工业需要更多的能耗,对环境

的污染也更为严重<sup>③</sup>。于是,处于高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通常会发生较为严重且难以避免的环境污染;服务业发达的地区则通常生态环境较为优良,这是因为现代服务业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较少<sup>④</sup>。然而,传统服务业尤其是交通运输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却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压力<sup>⑤</sup>。由于不同类型的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同,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对本地区生态环境带来不尽相同的影响,这被称为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sup>⑥</sup>。产业结构的变化既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又改

**[作者简介]**许正松,博士,皖西学院副教授(安徽六安 237012);

孔凡斌,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江西财经大学“井冈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江西南昌 33007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引领下沿江地区经济发展路径研究”(2015YZD16)、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产业转移与结构变化对中部 6 省环境质量的影响机理及对策研究”(SK2016A0979)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得到安徽省皖西学院本科高校发展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物流管理 A 类专业建设”的资助。

①许正松等:《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分析》,《企业经济》2015 年第 9 期。

②彭建等:《区域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以云南省丽江市为例》,《地理学报》2005 年第 9 期。

③赵雪雁:《甘肃省产业转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 年第 2 期。

④许正松、孔凡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环境污染——基于江西省的实证分析》,《当代财经》2014 年第 8 期。

⑤彭荣胜:《旅游产业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发展路径研究》,《理论与改革》2012 年第 1 期。

⑥许正松等:《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分析》,《企业经济》2015 年第 9 期。

变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其重大的经济意义和学术价值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产生了丰富的学术文献。彭建首次确定了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和生态环境影响指数<sup>①</sup>,其研究具有开创性,之后的研究多以此为基础。赵雪雁和张海峰等利用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对甘肃省和青海省的实证研究发现,两省的产业发展均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sup>②</sup>。以巢湖流域为研究对象的实证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变化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的压力<sup>③</sup>。也有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随时间的演变并非只是给生态环境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对鄂尔多斯市和武汉市的研究就表明,生态环境未来有改善的趋势<sup>④</sup>。对其他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环境效应的影响也得出了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sup>⑤</sup>。

已有的研究在丰富人们认识的同时,在研究方法上却也亟待改进和提高,以单一省份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相互矛盾的结论也造成认识上的莫衷一是。基于此考虑,本文以全国31个省(市、区)为研究对象,使用2000年至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构造面板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具有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研究结论的可信性也有望增强。

## 二、生态环境影响系数与生态环境影响指数

### (一)生态环境影响系数的确定

由于国民经济不同行业的生产投入、产出种类与生产方法存在巨大差异,其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尽相同。因此,就需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行业上的细分,度量每一细分行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进而综合分析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表1为已有文献中给不同细分行业赋予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的代表性观点。

由于学者们对于同一细分行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程度持有不同看法,因此所赋予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存在差异。学者们通常按照行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程度的高低进行排列,既有按百分制的系数赋值,也有五分制的系数赋值。通过比较分析表1中所列的4种典型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赋值,本文认为,许正松等所给出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对此前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作了较为明显的改进和调整<sup>⑥</sup>,影响系数赋值更加科学合理。本文接下来的分析均

表1 已有文献中不同行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

行业名称	农业	林业	牧业	渔业	轻工业	重工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业	其他	作者
影响系数	3	2	2	2	4	5	3	4	1	彭建等;汤进华;张海峰等
	3	2	3	1	4	5	4	2	2	郭敦、李百岁
	55	30	45	35	90	90	75	20	20	袁抗松、陈来
	3	0.5	2	1	4	5	3	4	1	许正松等

①彭建等:《区域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以云南省丽江市为例》,《地理学报》2005年第9期。

②赵雪雁:《甘肃省产业空间结构及其生态效应分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6期;张海峰等:《青海省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经济地理》2008年第9期。

③袁抗松、陈来:《巢湖流域产业结构演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3期。

④郭敦、李百岁:《鄂尔多斯市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9年第6期;汤进华、钟儒刚:《武汉市产业结构变动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水土保持研究》2010年第4期。

⑤李芳等:《新疆产业结构调整的资源环境效应与响应的实证分析》,《软科学》2013年第11期。

⑥许正飞等:《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分析》,《企业经济》2015年第9期。



采用此影响系数。

(二)生态环境影响指数

在确定各细分行业生态环境影响系数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加权求和,权数为各细分行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加权求和所得值被定义为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 (influence index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n natural environment, IISNE)。该指数可以反映产业结构演变对生态环境的干扰程度和总体影响<sup>①</sup>,其计算方法如下:

$$IISNE_{kt} = \sum_{i=1}^n IIS_{ki} * IE_{ki} \dots\dots\dots (1)$$

其中,  $IISNE_{kt}$  为第  $k$  省第  $t$  年的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  $IIS_{ki}$  为第  $k$  省第  $t$  年第  $i$  行业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该比重同时起着权数的作用;  $IE_{ki}$  为第  $k$  省第  $i$  行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

各行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之和为 1,意味着权数之和为 1,因此,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5,即该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5]。该指数数值越小,表明产业结构演变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越小;反之,则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越大。将区间范围[1,5]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分为 5 组,则可以大致划分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指数分组情况如表 2 所示。

三、中国各省份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的比较(2000—2013 年)

按照本文第二部分所构造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IISNE)的计算方法,通过查找中国 31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2000 年至 2013 年各细分行业的增

加值数据,计算得出中国 31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 2000 年至 2013 年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出于数据连续性和可得性的考虑,本文所用数据截止时期为 2013 年。

(一)中国各省份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2000—2013 年)

下页表 3 为 2000 年至 2013 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统计性描述。从统计性描述的结果来看,极小值随时间增加呈递减趋势,表明个别省份的产业结构从以工业为主逐渐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而极大值几乎未随时间发生变化,这表明依然有部分省份维持着以工业为主的生产格局。2000 年至 2013 年,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均值呈现出缓慢波动增加的趋势,维持在接近 3 的水平,生态环境影响等级整体呈中等;同时,2010 年至 2013 年,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众数也较前几年有所增加,这些变化意味着,从整体而言,中国以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不仅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反而有所加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远没有完成,产业结构变化与调整所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将会持续较长时间。2005 年之后的标准差系数较之前的年份有所变大,在均值有所增加的情况下,这表明各省份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部分省份的产业结构调整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有所减小,而有些省份则出现了相反的情况。所有年份的偏度系数均小于 0,中位数大于均值,这表明生态环境影响指数为左偏分布,即重尾在左侧。

(二)不同区域代表性省份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的比较(2000—2013 年)

表 2 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分组与影响等级

生态环境影响指数	1-1.5	1.5-2.5	2.5-3.5	3.5-4.5	4.5-5
生态环境影响等级	弱	较弱	中等	较严重	严重

数据来源:2001 年至 2014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自治区与直辖市的统计年鉴。

<sup>①</sup>许正松等:《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分析》,《企业经济》2015 年第 9 期。

表3 全国31省(市、区)各年份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统计描述(2000—2013年)

年份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中位数	众数	偏度	标准差系数
2000	2.12	3.39	2.854	2.90	2.69 <sup>a</sup>	-0.655	0.105
2001	2.10	3.33	2.886	2.92	2.82 <sup>a</sup>	-1.421	0.087
2002	2.13	3.29	2.911	2.94	2.79 <sup>a</sup>	-1.450	0.090
2003	2.20	3.34	2.953	2.96	2.78 <sup>a</sup>	-1.084	0.086
2004	2.20	3.45	2.950	2.97	2.97 <sup>a</sup>	-0.909	0.092
2005	1.93	3.35	2.933	2.99	2.85 <sup>a</sup>	-1.535	0.114
2006	1.71	3.32	2.917	2.99	2.86 <sup>a</sup>	-1.773	0.122
2007	1.77	3.35	2.919	2.98	3.20	-1.689	0.120
2008	1.71	3.42	2.939	3.00	2.85 <sup>a</sup>	-1.815	0.130
2009	1.72	3.30	2.881	2.95	2.81 <sup>a</sup>	-1.925	0.126
2010	1.71	3.37	2.938	3.04	2.93 <sup>a</sup>	-2.092	0.127
2011	1.66	3.46	2.936	3.05	3.09	-1.999	0.133
2012	1.88	3.41	2.982	3.06	3.06	-1.828	0.113
2013	1.89	3.38	2.947	3.00	3.25	-1.698	0.112

除了整体上分析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之外,本文还选择了北京、河北、广东、贵州和四川5个省市分别作为不同区域的代表,比较分析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如图1所示。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在5个省市中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最低,且呈缓慢下降的趋势;而河北省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却为5个省市中最高。为什么北京与相邻的河北却出现了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天壤之别?一种可能的解释

是,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市在最近十几年来不停地向河北转移其非首都功能产业,大量的污染型工业被转移到河北。北京市的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18.3%持续下降到2013年的不足12.2%;而河北省的重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则从2000年的27.1%增加到2013年的35.1%。与之同时,北京市的第三产业如旅游业和会展业等,以及总部经济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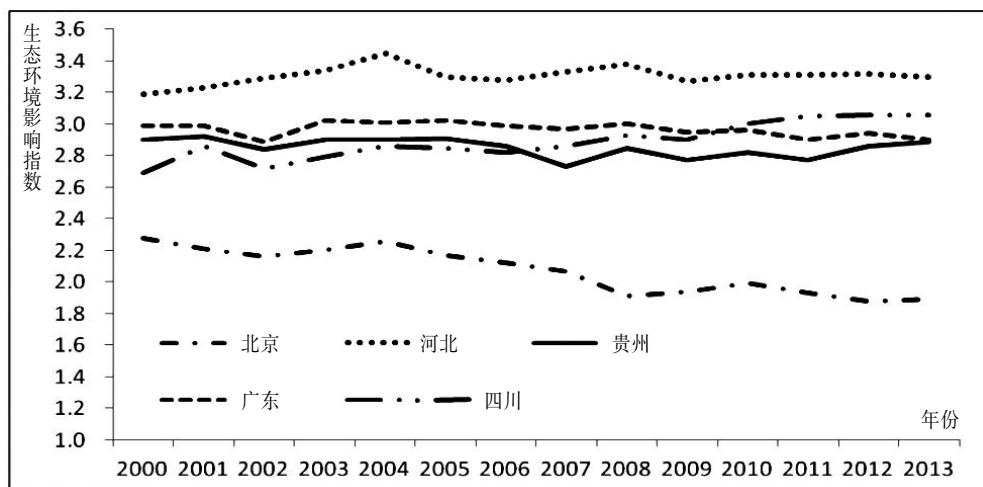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区域代表性省(市)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2000—2013年)

支柱产业。由于第三产业对生态环境的压力相对较小,使得北京市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也较低。

广东、贵州和四川三省虽然分处于中国东部沿海、西南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但其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却比较接近。经济欠发达的贵州省其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整体上低于广东,2000 年之后出现了逐渐趋同的势头,2013 年两省份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几乎相同。2006 年之前,四川省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略低于广东省和贵州省,但之后的上升趋势却较为明显,2010 年超过广东,差距越来越大。这可能与广东省近几年来一直持续推进产业发展上的“腾笼换鸟”政策有关,也可能与交通障碍逐渐解除之后,大量资本进入四川发展工业有关。

#### 四、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的聚类分析

##### (一)聚类分析的结果

使用 SPSS20.0 对全国 31 个省(市、区)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划分结果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以看出,划分为 3 个集群和划分为 4 个集群聚类结果的区别在于:将 3 个集群分类中原为一类成员的北京、海南和西藏分为 2 个集群,划分为 5 个集群的聚类分析则出现了结果上的较大变化。考虑到北京、西藏和海南与其他省(市、区)相

比具有独特性,将除北京、西藏和海南之外的其他省(市、区)分为 3 个集群较为合适。

##### (二)分类结果的统计性描述与分析

划分为 5 个集群后的统计性描述如下页表 5 所示。集群 1 和集群 2 分别由北京、西藏和海南组成,产业结构变化与调整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等级为较弱。北京作为全国首都,其主要承担的是首都功能,经济上的发展方向以总部经济、高端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为主,其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地位,使得北京在全国不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西藏地域宽广、人口稀少,较少的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和破坏也较小。同时,西藏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不以工业为主,2013 年其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 8%。虽然西藏的产业结构演变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较小,但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不具有可模仿性。海南省全境为一岛屿,其国民经济以农业、渔业和旅游服务业为主,工业不是经济的主流,且渔业生产地主要在海洋,对本省和周边区域的生态环境影响微弱。同样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海南也不可能成为其他省份产业结构调整的学习对象。

集群 3、集群 4 和集群 5 的成员为中国省份的主体。整体而言,2000 年至 2013 年,集群 3 的产业结构变化对生态环境造成中等的压力,而组成集

表 4 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的聚类结果

分为 3 个集群	集群 1 成员(3 个):北京、海南、西藏	分为 4 个集群	集群 1 成员(2 个):北京、西藏	分为 5 个集群	集群 1 成员(2 个):北京、西藏
			集群 2 成员(1 个):海南		集群 2 成员(1 个):海南
	集群 2 成员(9 个):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陕西		集群 3 成员(9 个):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陕西		集群 3 成员(12 个):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集群 3 成员(19 个):内蒙古、吉林、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集群 4 成员(19 个):内蒙古、吉林、上海、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集群 4 成员(7 个):内蒙古、吉林、福建、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集群 5 成员(9 个):天津、河北、山西、辽宁、黑龙江、江苏、山东、河南、陕西

注:聚类方法采用 ward 法,度量标准采用区间平方 Euclidean 距离。

表5 各省(市、区)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聚类后的统计描述(2000—2013年)

集群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中位数	众数	偏度	标准差系数
集群1	1.66	2.34	2.011	2.080	1.71	-0.325	0.198
集群2	2.10	2.68	2.411	2.405	2.68	-0.107	0.221
集群3	2.33	3.17	2.869	2.875	2.90	-0.761	0.150
集群4	2.66	3.41	3.017	3.000	2.97	0.689	0.114
集群5	2.82	3.46	3.188	3.195	3.06 <sup>a</sup>	-0.213	0.124

注:表中数据利用 SPSS20.0 统计分析得到。上标 a 表示存在多个众数。

群5的9个省份其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最大。集群4和集群5主要由中西部的省份组成,这些中西部省份虽然总的产值较低,但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比重较高;同时,近十几年来,东部沿海省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了大量的资源型产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较为严重的破坏。天津和河北虽位于环渤海湾地区,但天津的制造业和重化工业非常发达,河北的钢铁产业占到了全国比重的一半,这使得天津和河北在聚类分析时被分在了同一个集群。江苏、山东和福建的重工业比重明显高于广东和上海,这是该3个省份未能与浙江和上海分在同一集群的主要因素。集群3中的贵州、云南、江西和广西因山区面积比例明显高于全国其他省份,虽然这4个省份经济欠发达,也与浙江、上海和广东等经济发达省、市分在同一类中。中部的安徽、湖北和湖南,以及西部的重庆和四川,分别在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中表现出色;同时,其产业结构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也相对较小,应该成为中西部其他省份的学习榜样。沿海发达地区的上海、浙江和广东,在实现经济领先发展的同时,还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优化的同时实现。例如近十几年来,上海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2.83一直减少到2013年的2.48。这几个省、市应该成为经济欠发达且生态环境压力较大省份的追赶对象。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回顾产业结构演变的生态效应相关研

究文献的基础上,确定了国民经济细分行业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并利用所构造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使用中国全部31个省(市、区)2000年至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计算出了相对应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进而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面板数据进行了聚类分析。基于对聚类结果的讨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应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对环境的压力显著大于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因此,除了要对现有工业企业进行环境升级改造之外,更重要的是还应逐步降低石化、金属冶炼与加工、水泥及水泥制品等传统重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降低污染排放强度。

第二,应有选择地承接产业转移。多数中西部省份和部分东部省份之所以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较高,部分原因在于承接海外和国内其他地区的产业转移时,未能列出详细的负面清单,或者列出负面清单后未能严格执行,以至于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接纳了大量污染型工业。为此,生态环境影响指数较高的省份均应该有目的地承接产业转移,更多地承接环境友好型工业资本和以生态旅游等为代表的清洁型服务业。

第三,应重视技术进步在改善环境中的作用。绿色工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因此,必须加快制定激励措施,支持和鼓励研发更多的减污型生产技术,并应用于传统制造业的改造,推动技术进步型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发展,实现产业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减少的同步协调。

# 全球变暖视野下中国与墨西哥的能源现状分析

——从传统型能源模式向多元型能源模式转变

◎胡安·冈萨雷斯·加西亚 文 贺光银 冯 春 崔金星 译

**[摘要]**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各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猛增是温室气体大量排放的主要原因。本文将对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用以能源领域,以此作为分析中国与墨西哥两国的切入点。在宏观层面上,对比中墨两国的宏观经济背景,深入分析经济形势以及石油和天然气能源的密切关联。在微观层面上,分析墨西哥的传统能源结构(煤、石油、天然气等),以展现双边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并比较分析可再生能源。在严峻的国际社会减排压力下,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中墨两国的共同选择。此外,可再生能源在未来将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拓展——传统的能源模式将向多元化的能源模式转变。当然,这需要两国政府的积极作为——制定并实施具体可行的环境法律和政策。

**[关键词]**全球变暖;宏观经济;能源模式;可再生能源;政府作为

## 一、引言

气候变暖是当前全球普遍性的危机,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各主权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近几个世纪以来,温室气体(GHG)排放量逐年攀高,除了污染破坏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以外,还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气候的变暖改变了全球经济的议程,能源作为产生社会商品、服务的基础,其生产消费模式引导着经济模式的发展变化。当前全球大多数企业均是使用传统能源或是石化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等。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对石化能源的依赖,至少产生了以下三方面问题:一是石化能源成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是大气污染源的主体;二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了全球的社会、经济活动;三是石化能源的稀缺属性导致全球电力短缺,限制了经济的增长。

近十年来,面临石化燃料的枯竭和对能源依赖的双重压力,全世界兴起了研发替代性能源的热潮,并成为近年来重要的技术研究领域。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得益于科技的发展、自然资源的多样性和劳动力资源的丰富,但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污染源之一。部分经济学者研究认为,中国要保障经济的增速,需要协调经济增长与清洁技术的发展,以减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墨西哥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国民经济每年仅以3%的速度增长,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在逐年增加。墨西哥在应对气候变化上面临诸多挑战,如科技创新不足、科研投资较少、清洁能源的低利用率以及公民低生活质量等。从比较分析的角度观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倒逼其发展清洁技术;而墨西哥经济增长停滞,高度依赖

**[基金项目]**贵州大学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研究生创新基地建设项目(XJD[2015]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安·冈萨雷斯·加西亚(Juan González García),墨西哥科利马大学(Universidad de Colima)经济学教授。

**[译者简介]**贺光银,贵州大学法学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贵州贵阳 550025);

冯春,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四川绵阳 621000);

崔金星,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研究员(四川绵阳 621000)。

石化能源,温室气体排放量高。本文主要通过比较中国和墨西哥现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创新,分析其异同以及两国对温室效应的应对策略。论述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国际社会和能源市场在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第二部分对比分析中国和墨西哥的经济现状;第三部分主要分析中国和墨西哥能源消费行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对气候变化的

影响;第四部分讨论煤、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分析中国、墨西哥在应对能源问题的差异,以及相关政策的实施情况和对生产消费的影响。最后,在对以上四个部分作分析、探讨的基础上进行全文总结。

## 二、能源市场的经济对全球变暖的“贡献”

表 1 2000年、2009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前 24 名的国家

国家	2000年 CO <sub>2</sub> 排放量 (kt)	占全球总量比重 (%)	国家	2009年 CO <sub>2</sub> 排放量 (kt)	占全球总量比重 (%)
美国	5,713,450.02	23.03	中国	7,687,113.77	23.99
欧盟	3,912,344.30	15.77	美国	5,299,563.07	16.54
中国	3,405,179.87	13.72	欧盟	3,639,116.13	11.36
俄国	1,558,111.97	6.28	俄国	1,574,386.11	4.91
日本	1,219,592.86	4.92	印度	1,979,424.60	6.18
印度	1,186,663.20	4.78	日本	1,101,134.09	3.44
德国	832,100.97	3.35	德国	734,599.11	2.29
英国	543,662.09	2.19	伊朗	602,055.39	1.88
加拿大	534,483.59	2.15	加拿大	513,937.38	1.60
意大利	448,140.40	1.81	韩国	509,375.64	1.59
韩国	447,561.02	1.80	南非	499,016.36	1.56
墨西哥	381,518.35	1.54	英国	474,579.47	1.48
伊朗	372,702.88	1.50	印度尼西亚	451,781.73	1.41
南非	368,610.51	1.49	墨西哥	446,237.23	1.39
法国	365,559.56	1.47	沙特阿拉伯	432,772.01	1.35
澳大利亚	329,604.63	1.33	意大利	400,836.10	1.25
巴西	327,983.81	1.32	澳大利亚	400,194.38	1.25
乌克兰	320,774.49	1.29	巴西	367,147.37	1.15
波兰	301,691.42	1.22	法国	363,355.70	1.13
沙特阿拉伯	296,935.33	1.20	波兰	298,904.50	0.93
西班牙	294,434.43	1.19	西班牙	288,229.87	0.90
印度尼西亚	263,418.95	1.06	土耳其	277,844.92	0.87
土耳其	216,147.65	0.87	乌克兰	272,175.74	0.85
泰国	201,549.32	0.81	泰国	271,721.03	0.85
前 24 国	23,842,221.61	96.10	前 24 国	28,885,501.72	90.15
世界其他地区	968,700.39	3.90	世界其他地区	3,156,744.28	9.85

数据来源:2013年世界银行统计。

面对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经济和环境问题,食品 and 能源危机,国际社会开始行动起来。联合国于 1972 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并设立专门机构。后又于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制定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21 世纪议程》。在 1997 年的联合国成员国缔约方大会上通过了《京都议定书》,每年的会议强化了科学研究对经济、环境等问题的解决。围绕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表明,世界各国排放量各不相同,如上页表 1 所示,对比 2000 年和 2009 年可以发现:2000 年美国是 CO<sub>2</sub> 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2009 年中国成为 CO<sub>2</sub> 最大排放国。在排放量比重的世界格局中,2000 年的七国集团(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排放量的总比重将近 40%,而金砖国家(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则是 30%;10 年之后的 2009 年,此种格局反转过来,金砖国家排放量总比重将近 40%,而七国集团则是将近 30%)。在(24 国中)多数国家排放量比重下降的宏观趋势下,此种格局的转变得益于中国排放量比重的“强势崛起”。同时,此 10 年间墨西哥的

排放总量比重亦是随(24 国)大势略有下滑。

能源生产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根据全球环境研究所 2002 年的报告显示,能源的生产占温室气体总量排放的 24%,并在 2010 年继“运输”因素之后成为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因素。能源的产生与各种矿产输入有关,石油是目前最重要的能源,石化能源促进着国家工业经济的腾飞,尤其是在机械工业方面。由于石油具有稀缺性,且随着其价格的抬升反而愈发稀缺,如果石油转化为能源的过程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来源,那么建立可再生能源则是解决气候变暖的最佳途径。可再生能源起源于可持续补给的自然过程的能量,它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太阳或地球内部深处所产生的热量,具体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水能和海洋资源等。2010 年,在世界能源机构分析的能源总量中,有 13%是可再生能源,其他类型的能源包括石油(32.3%)、煤炭(27.3%)、天然气(21.5%)和核能等。从 1990 至 201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增长了 2.9%,年平均增长率为 5.7%。可再生能源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国家的经济规模、科研发展程度和国家能源政策等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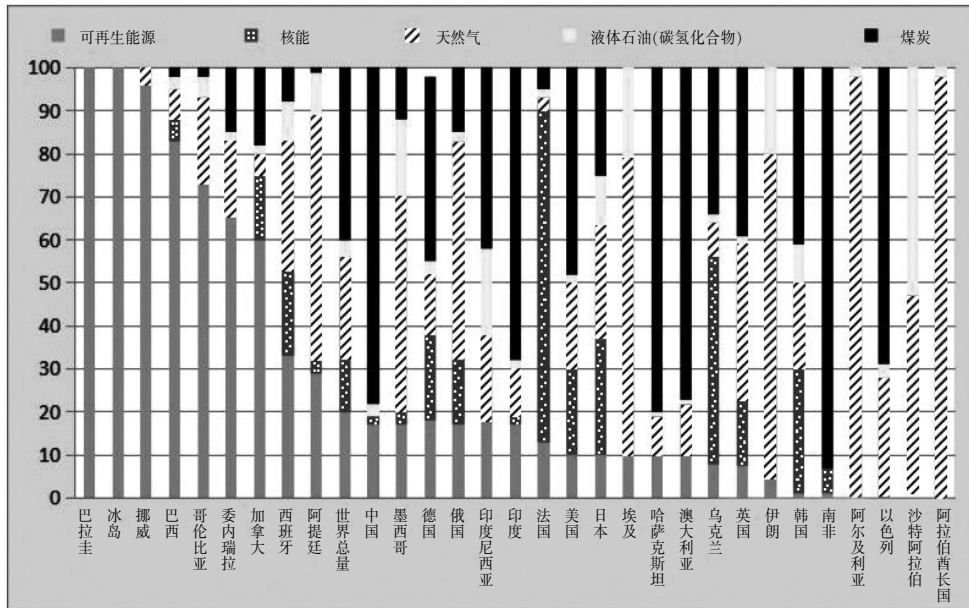


图 1 2010 年世界主要国家在电力方面使用可再生能源及其他能源的情况

数据来源:《可再生能源的前瞻性考虑(2012—2026)》。

如上页图 1 所示,各国使用电力能源各有差异,巴拉圭与冰岛是 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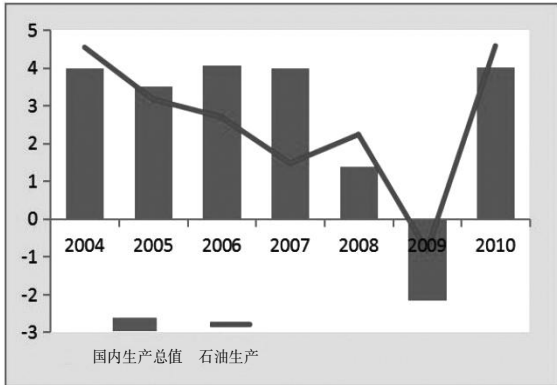


图 2 2004—2010 年国内生产总值与石油能源生产(增长率)  
数据来源:2013 年世界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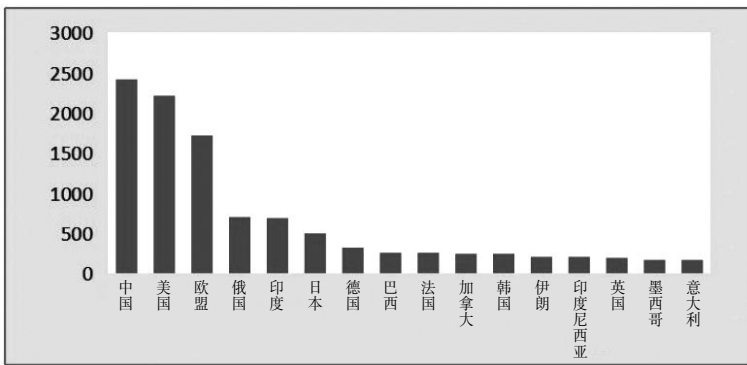


图 3 2012 能源使用情况(相当于 kt 石油)  
数据来源:2013 年世界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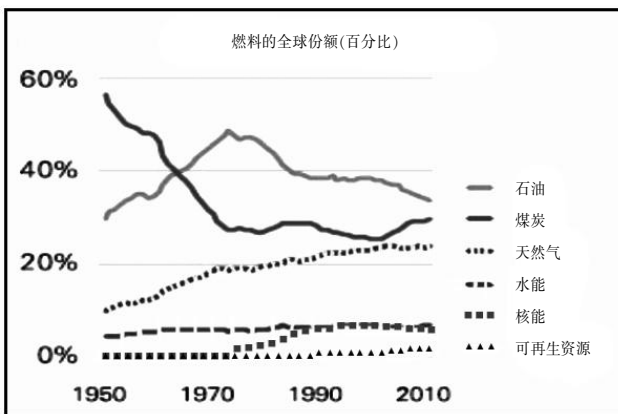


图 4 半个世纪全球燃料市场份额变化图  
数据来源:《BP 世界能源统计评论 2013》

中国和南非更青睐于使用煤炭,墨西哥则是更多地倾向于天然气,沙特最为依赖碳氢化合物(液体石油),韩国、德国和西班牙对核能依赖很强。

石化能源多年来一直是带动其他市场繁荣的引擎。随着可再生能源的逐步使用,可再生能源市场的确立(开始逐步取代石化能源),各国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下整合不同类型的能源。经济增长下的能源市场是国家发展战略确定的基本因素之一,因此,需要进一步对比分析石化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图 2 所示,对比经济与能源生产速度,两者具有很强的关联,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前,能源生产的增长低于 GDP 增速,但在 2009 年、2010 年,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能源生产的增长速度高于 GDP 的增速。

如图 3 所示,2012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并在能源市场的作用变得至关重要,而墨西哥则位居第 15 位。

创造可再生能源已从一种发展战略过渡到绿色经济改革<sup>①</sup>,在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已增加 36%。即使国际组织一直在努力控制能源使用,排放量的增长却一直在加速,如图 3 所示的包括非 OECD 的国家(中国、巴西、印度)。投资是带动 GDP 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巴西、印度和中国是投资可再生能源最多的国家,相反,另一些非 OECD 成员国和发展中国家对可再生能源投资很少。从 2005 年到 2008 年,OECD 的国家有 200% 的增长速度,而非 OECD 的国家则有 500% 的增长速度。如图 4 所示,因为能源市场上出现了新燃料,石油的主导地位有轻微的下趋势,煤炭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急剧下降,在随后的 2000 年恢复增长。最近几年,可再生能源虽然有较高的增长率,但在全球能源中的所占份额却最少。

①联合国提出的经济模式,拟运用 GDP 的 2%对环境问题进行绿化投资,通过绿色经济助推经济发展。



### 三、中墨两国的宏观经济背景比较

#### (一) 中国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土面积居全球第4,人口数量最多;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sup>①</sup>。中国经济增长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国际市场中举足轻重,因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业和经济表现出充分的活力,对外贸易模式、政府(政策)干预的特点,使其成为目前全球经济模式中备受争议的国家。

如图5所示,中国和全球的GDP增长速度变化,可以看出中国与世界的GDP增速相比大约有6%的差异,在2004—2007年出现了经济增长的热潮;2007—2008年的增长也并不逊色;从2008年起经济开始平稳上升,有9%的平均增长率;从2010年起经济出现下降趋势。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继而成为世界工厂,其产品进入全球市场,因而更加注重提高产品质量以提升竞争力。中国目前主要在于开辟国际市场,其低工资、高生产率和巨大潜力的优势能有效吸引外国投资,并成为现今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同时,在逐步地改善经济模式背景下,其当下的制度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体现为:在1949—1960期间以重工业为主,在1960年产业结构开始调整为以重工业和轻工业为主,并在1978年工业部门发展得比较均衡;反观农业发展没有考虑环境、能源要素,尤其是大跃进时期,能耗的不平衡、低效表现得并不明显,这是由当时中国能源利用自给自足的模式

决定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能源的消耗翻了两番,煤炭是生产能源的主要来源并达到80%,直到1962年,能源生产的增速才明显高于GDP的增速。能源产量的增长是否成为一个问题,取决于中国是否对外开放以及经济增长的速度。1992年中国开始打开进口市场,因为可再生能源的利用,2010年其对外国能源的依赖程度开始下降。在GDP增长的同时,中国面临无法满足自身能源需求的困难,因此采取拓展其全球市场的策略,以获得足够的能源来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增长。如图6所示,从中国出口和进口的发展情况,明显可以看出中国出口高于进口,2010年出口和进口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后有所恢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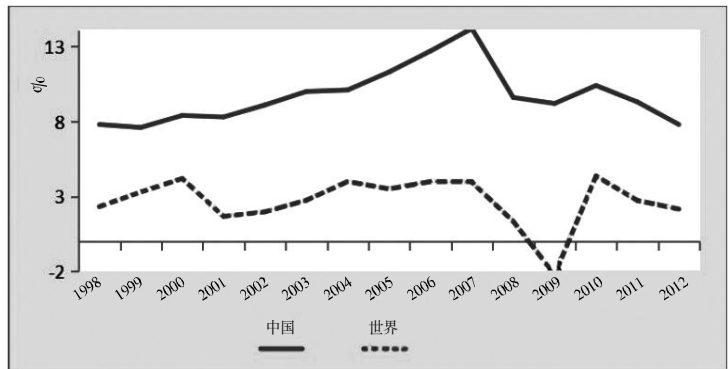


图5 1998—2011年中国和世界的GDP增长速度  
数据来源:2013年世界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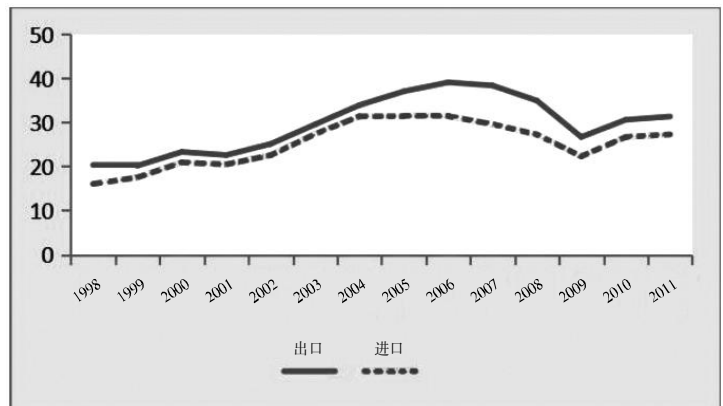


图6 1998—2011年中国进出口情况  
数据来源:2013年墨西哥银行。

<sup>①</sup>数据来源于2013年世界银行。

中国需要大量的能源用以生产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自于能源(主要是石油和煤炭)的消耗,经济的增长加速了能源消费的增长。如图7所示,经济增长与能量消耗呈正比。过去两年的能源增长速度比GDP增速还要高。在1991—2007年间,能源消费平均增长10.4%,在2008—2020年间估计每年将有9.4%的速度增长。

自1978年改革开放转型为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石化燃料的第二大消费国。在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和商业潜力国之前,必须成为全球经济决策的领导者之一,高度依存于外贸的经济结构迫使其成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国家。同时,中国对能源存在高度依赖,要改变这种依赖的僵局,必须要关注清洁能源或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二)墨西哥

墨西哥位于北美南部,是一个典型的联邦民主共和国,它是继西班牙后全球第十四大经济体。墨西哥201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77,271,329,643,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3.9%,通货膨胀为4.1%;居民人口达120,847,477,人均GDP为9740美元。如图8所示,墨西哥的增长速率与世界平均发展水平非常相似,其经济1998—2000年间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增长态势;在2000年有所下降,其后呈增长趋势;在2008年经融危机之后,从2010年起,经济增长开始反弹。

尽管墨西哥经济发展近年来已呈现高水平的进口,但仍具有出口依赖型的特点。墨西哥出口石油、食用油的原油、汽车、机械和电气设备、植物油,进口已经加工的食用油和石油、燃油、汽车配件、电器和散装电机等。如图9所示,墨西哥承受着贸易平衡的赤字(进口额大于出口额),

贸易赤字的危机正在日益扩大。

墨西哥是石化能源的供应国,多年来其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是依赖于能源出口。此种依赖的劣势表现在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波动的不确定性,影响着墨西哥国内市场的波动,加上存储量的大量消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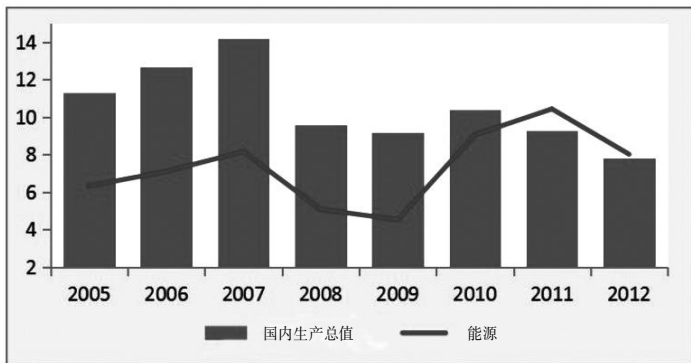


图7 2005—2012年GDP和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  
(能源消耗的计算方式是取石油、煤和核能消耗增长率的平均值)  
数据来源:《世界能源统计回顾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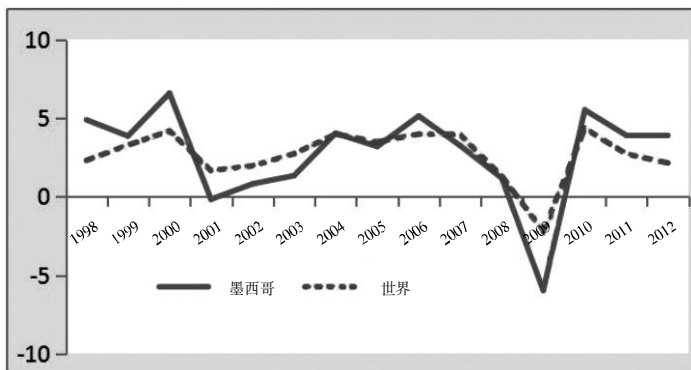


图8 1998—2012年墨西哥和世界经济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2013年世界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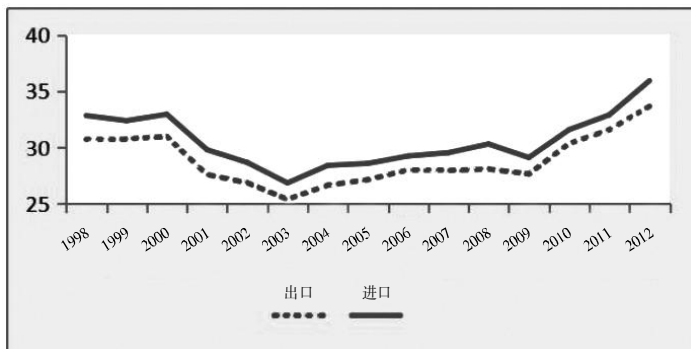


图9 1998—2012年墨西哥出口和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数据来源:2013年世界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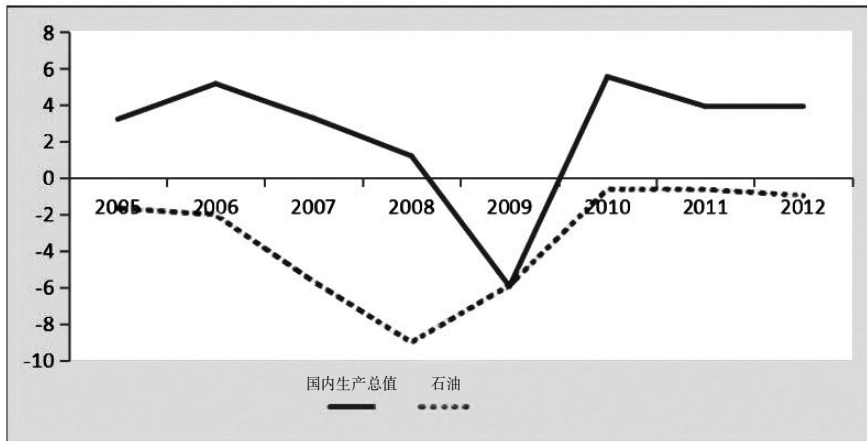


图 10 2005—2012 年 GDP 增长和原油产量(石油生产增长率)

数据来源:《世界能源统计回顾 2013》

意味着如果其对国内石油市场的投资减少,就不得不更大规模地出口石油原料,以进口获取加工后的石油制成品。如图 10 所示,2006 年墨西哥石油产量逐步下降,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石油产量随国民生产总值下降而下降;如果没有积极的国民经济增长率,石油产量相应随之下跌。

#### 四、温室气体排放与能源生产

如前文所述,中国是排放温室气体最多的国家。根据全球气候变化报告指出,中国仅在 1994 年的排放量就占全球总量的 73%,但其人均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 2000 年排放量占全球的 1/3,排放的主要源头是电力部门。墨西哥在 25 个全球

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中排第 10 位,虽然已有下降趋势,但这是基于石化能源生产的下降而非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长和 GDP 的增速相关,中国在 1990 年至 2010 年间温室气体增长了 58%,占排放量的 65.9%,而平均 GDP 增长率为 2.3%;墨西哥 1990 年至 2010 年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增长了 33%,2001 年至 2010 年的排放量平均增长 2.6%,而 GDP 增长率平均只有 1.9%。如图 11 所示,墨西哥的 CO<sub>2</sub> 排放量和能源生产在 2005 年和 2008 年之间呈现出下降趋势,在随后的 2009 年出现反弹,与全球相比有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中国在 2009 年的 CO<sub>2</sub> 排放量呈现出较强的下降趋势。这种情况在未来可能会发生改变,正如在 2009 年排放量增长跟能源增长率呈正相关。

如图 11 中所示,如果墨西哥仍然持续排放温室气体,其排放量可能会与中国一致;如果降低能源生产率则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源进口。在石化能源通过消费和生产代表了一种增长因子的宏观背景下,如果温室气体排放持续增长高于 GDP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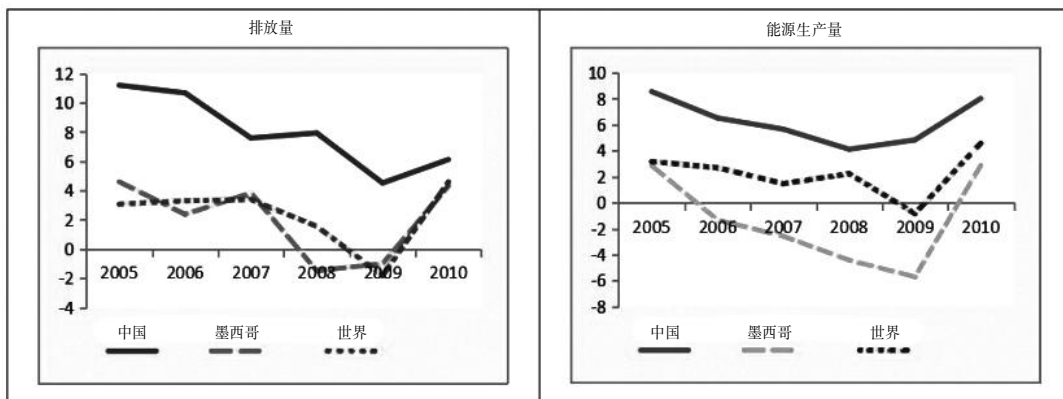


图 11 2005—2010 年 CO<sub>2</sub> 排放量和能源生产(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2013 年世界银行和世界经贸组织。

增长,那么这种经济模式将不具有可持续性。由于目前能源不足限制了经济的增长,因此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将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

### 五、中墨两国能源的类型分析

能源能有效提供各种商品资源,石化能源是全世界最常用的生产原料,但其具有稀缺属性,且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是各国致力于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制定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生产过程中利用所有类型能源。墨西哥积极参与防治气候变暖的各种国际活动,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国际环境政策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法律预防和控制大气污染,于1972参加了首届人类环境会议,于1982年制定了第一部环保法,于1983年加入了国家发展计划(NDP)的“生态环境”主题,并在1998年签署《京都议定书》,多次参加了由联合国举办的各国首脑会议。在过去5年里,墨西哥政府于2008年宣布到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50%,于2009年通过了一项特殊气候变化法案(旨在减少排放量),于2010年在坎昆举办了16方会议,同年制定了气候变化法,旨在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促进政府各种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此外,墨西哥政府拟建立绿色基金,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减缓各种污染气体排放。墨西哥“在关于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中提出:在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过程中,应强调政府和民间投资的重要性。可再生能源所开发出来的风能、太阳能、水能等,其重点在于如何提高效率和降低能耗,同时国家电力系统计划在2024年生产35%的清洁能源电力。

中国亦在逐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并出台相应的政策加以支持,例如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生产和有效利用资源等。《中国白皮书》将2010年以来凸显的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其制定经济政策的关键参考因素,其基本的能源政策侧重于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同时鼓励科技创新,深化改革,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正在寻

求建立现代能源产业体系,以拥有稳定、经济实用、清洁的能源发展。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于2006年颁布实施,其以法制的方式保障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并针对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提供有效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此外,还确立了共享机制,可再生能源的额外成本可由享受公共服务的用户加以分担;出台相应的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农村地区使用可再生能源,并提出可再生能源的长期发展规划。该法的三个主要目标为:一是进一步详细规划在全国范围内增强电力行业的发展,其中包括可再生能源;二是为电力企业收购可再生能源企业提供保障;三是增加可再生能源基金,以扩大销售电能的比例。中国正在大力支持国内各地区的发展,大力推广分散式能源系统天然气的建设,拟建设1000个项目的分散式能源系统,其目的在于实现能源密集的中心化和农村地区分布可再生能源,对改善定价机制和电网政策有着积极的作用。

#### (一)石油

在墨西哥,石油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它是该国20世纪80年代GDP增长的主要因素,并在2011年仍占能源总量的64.5%。墨西哥最重要的油田是坎塔雷尔(Cantarell)油田,在2008年之后其产量持续明显下降,而在2002年发现的Ku-Maloob-Zaap油田,因其提供了全国1/3的石油产量而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油田,并在西半球成为出口世界的重要油田,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墨西哥石油开采公司Pemex(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是该国内最大的国有企业,同时也是一家全球性的跨国公司,为政府提供40%的财政收入。由于石油产量下降,墨西哥政府实施能源改革,允许民间资本、私人投资石油产业,同时为发展可再生能源修建相应的基础设施,使能源的开发利用更有效率。但在改革过程中,因石油被认为是国家的战略资源,民众不愿石油私有化。在发现墨西哥工人和私人公司占有石油资源后,总统通过并颁布了相关法律,予以禁止。墨西哥是原油的净出口国,也是成品油的净进

口国,进口的货物中 60%是汽油、柴油和液化石油气,这是墨西哥石油经济方面的一大劣势。又由于墨西哥国内贩毒猖獗和治安较差,近几年各种石油货运卡车被盗,为此国家石油公司损失数百万比索。

中国的石油主要依赖进口,当下中国的能源政策旨在促进石化能源清洁发展,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开发石油资源,并淘汰落后产能的生产结构;同时也试图通过加大开发勘探的力度,强化老油田的采收率(例如提高塔里木盆地和鄂尔多斯的石油产量),确保产量的稳步提升。如图 12 所示,中国是石油高消费国家,迫使其不得不依赖于石油进口。中国的石油产量在 2012 年较墨西哥有所增加,这得益于其有效政策的扶持。墨西哥在 2009 年产量有大幅度下降,却一直没有回升,同年的石油消费也略有所下降,但在目前已有所回升,并呈现增长趋势。长期来看,这样的趋势可能导致墨西哥会发展出另一种替换能源,或重新成为重要的原油供应国。

### (二)天然气

在墨西哥,2011 年天然气占能源总量的 23.04%,占总能耗的 29%,其产量因投资的减少而下滑。由于大量地依赖于进口,能源消费的增加将取决于其他国家的能源增量,2011—2012 年间 50%的进口增长来自于美国。墨西哥的南部和北方具有大规模的天然气储存量,将来完全可以成为国

家财富和生产的重要区域。由于 2011 年、2012 年全球范围内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墨西哥天然气勘探量和生产量的下降。天然气在中国的消费量占比最小,其储量占全球的 1.1%。天然气燃烧与其他燃料相比更为清洁,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国力求在全国各地区实现对资源的均衡利用,天然气在“油气并重”的政策指引下,其产量将逐步增加。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天然气有丰富的储量,提高第一产能结构中天然气的份额可以进一步优化炼油行业,部分炼油和化工的重要生产加工基地主要建在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地域,应促进上游油气资源开采和下游油气资源提炼的整合,即化工一体化和提炼的一体化式管理模式。

如下页图 13 所示,中墨两国是天然气进口国,2002—2005 年间墨西哥天然气产量超过了中国,自 2006 年中国才开始反超墨西哥,2009 年中国的增长略高于墨西哥,墨西哥自 2009 年有所下降,到 2012 年期间的增长基本停滞。这两个国家在天然气消费上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 (三)煤

煤炭在墨西哥主要用于发电,煤炭生产始于 1884 年在萨维纳斯科阿韦拉州(Sabinas Coahuila)附近,墨西哥革命后,煤炭生产却停滞不前,目前在该国内有 3 个主要的产煤区,其中 2 个在科阿韦拉州和新莱昂州,1 个在瓦哈卡州和索诺拉州。墨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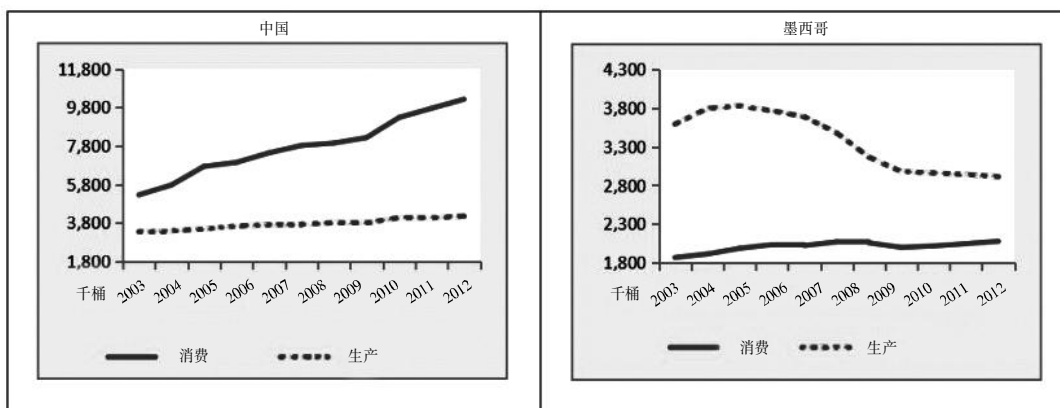


图 12 2003—2012 年中国和墨西哥的石油生产和消费(千桶)

数据来源:《BP 世界能源统计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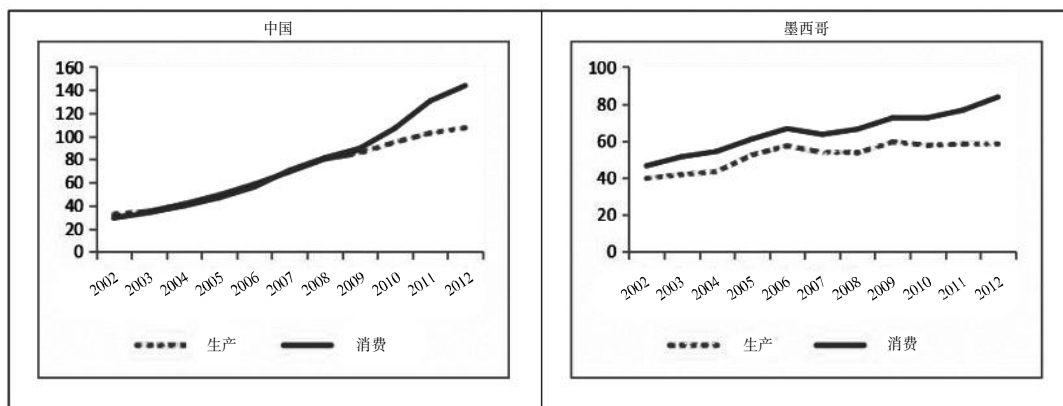


图 13 2002—2012 年中国和墨西哥的天然气消费和生产 (立方米 10 亿)

数据来源:《BP 世界能源统计 2013》。

哥现有 2 个项目是从地下矿井提取煤矿,其中一个项目正在执行中,利用沼气作为原料来加热锅炉,另一个项目是利用沼气进行发电。通过高效使用沼气等气体,可以更好地防止煤矿发生爆炸的危险,同时可减少甲烷排放到大气中。能源市场对煤的需求一直在增加,例如联邦电力委员会(以下简称CFE)期望从 2000 年的 1080 万增加到 2024 年的 2560 万,即增加 137%的产能。到 2024 年,这种对煤的高需求量将会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进而影响数以万计的墨西哥人的身体健康。

中国的煤矿拥有量居全球第 3,是煤矿生产最大的国家,同时也是高污染国家。虽然从 1970 年至 2000 年中国对煤矿的消费量已有了 75%的下降,但高能耗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却持续增加,2005 年和 2008 年中国分别是 CO<sub>2</sub> 和 CO<sub>2</sub> 的最大排放国。中国力图实现煤炭行业安全、有效的发展,制定了“支持东部地区发展,保持中部地区稳定,促进西部地区开发”的战略。目前已经建设开采了 14 个大煤矿,主要分布在陕北、山西和山东等,当下正在逐步兼并整合煤矿企业。中国正在有针对性地开发露天矿坑,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改造落后产能结构,建立经济循环发展的矿区,拓宽整个地区的产业链,通过对煤炭进一步的加工转化,从而高效有序地开发示范项目产品。同时,中国也力图创建绿色矿区,重点投资清洁煤技术,例如内蒙古的碳液

化项目还处于早期阶段,这项技术包括碳捕获、石化燃料制成、避免在大气中燃烧等。在未来几年,随着中国对石油进口需求的减少,这些新技术可能成为重要的增长领域。在电能方面,中国致力于探索电能存储的技术研发,通过建设煤炭、风能、核能、天然气等能源发电基础设施,旨在延伸从西部到东部电能的输送范围,从北向南健全和优化现有铁路运输路线,以强化煤炭的输送;建设新的运输通道完善原油、石油产品和天然气的运输网络,以优化资源和储备量的分配,使国家各地区资源平衡发展和利用。

如下页图 14 所示,2010—2012 年间,中国在煤炭领域的生产和消费上呈现下降趋势;在 2008 年之后,墨西哥的煤炭生产和消费呈增长趋势,但在 2012 年又呈下降状态。中国在 2012 年的煤炭生产约是墨西哥 276 倍,煤炭消费约是墨西哥的 212 倍。

#### (四)核能

在墨西哥核能占能源总量的 1.6%,其核能起步于 20 世纪 70 年代,核电站(Laguna Verde)始建于韦拉克鲁斯州,它是全国唯一的核电厂,受核武器条约的影响,Laguna Verde 工厂不得不每年从荷兰和美国进口 25 万吨矿石作为燃料。国内环保团体反对使用核能,认为核电有巨大的潜在风险没有建设的必要。同时,虽然 2011 年 Laguna Verde 通过 CFE 管理和阿尔斯通公司进行核能生产国际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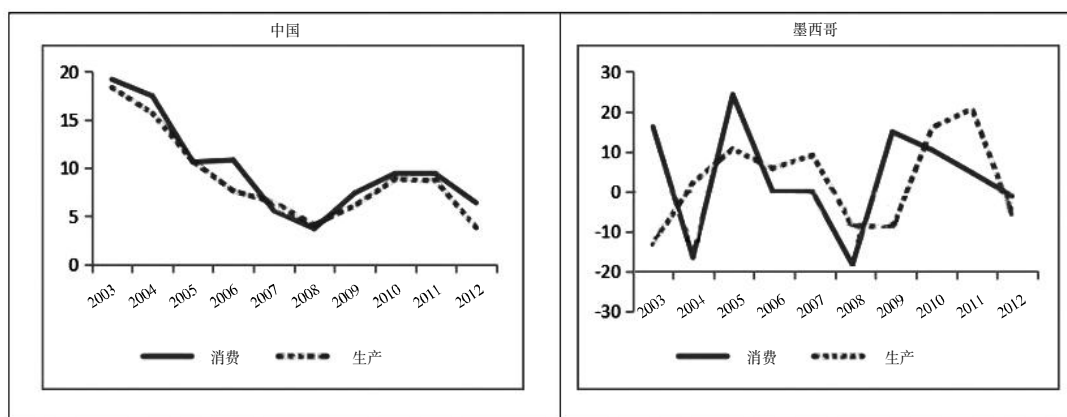


图 14 2002—2012 年中国和墨西哥煤炭的生产和消费(年增长率)

数据来源:《世界能源统计回顾 2013》。

但对于核电工程设施仍进行多次修缮以确保核电安全。

中国核能的使用有利于优化国家能源结构,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积极作用。目前,核能占中国国内能源生产总量的 1.8%,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国内铀的生产被认为是国家安全机密,目前探明的储量可以持续 10 年或 20 年使用,国内需求的铀原料一半来自进口,主要供应商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纳米比亚和澳大利亚。目前中国在全球各地寻找这种稀缺资源,中国海外铀公司已经在尼日利亚建设了矿山。中国近几十年来已建成超过 11 座核电站,更多的核电站正在筹备和兴建当中。虽然核能与风能、太阳能一样是作为一种绿色能源被使用,但核原料同煤、石油一样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因为核原料的主要元素是不可再生的铀元素。中国则希望通过更多的投资来促进以核能为主的技术创新。

如图 15 所示,从墨西哥和中国核电消费的增长速度可以看出,中国自 2003 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这可能与铀的低储量和其他的清洁能源受到更多重视有关;而墨西哥核电消费波动巨大,2005—2008 年间增速下滑,2009 年略高,2010 年呈现负增长,2011 年受 Laguna Verde 工厂生产的影响,核电有 80% 的增长,但同样在 2012 有显著下降。

### (五) 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占全球能源份额的 10%,但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具有天然的发展优势。

#### 1. 水电

墨西哥水电占总发电量的 14%,最大的水电站位于恰帕斯州,2011 年受降水量减少的影响,水电发电量有所下降。该国西南部有大河流的水利优势,成为加勒比海湾发电量最大的地区,墨西哥政府水电项目的重点在于寻求加利福尼亚州和瓦哈卡州合作的高潜力能源。中国拥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其可再生资源有一半来自水利产生的水电资源。中国目前对其潜在的水资源利用率还不到 30%,因此水电资源开发具有非常大的潜力,同时可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提高当地就业率、提升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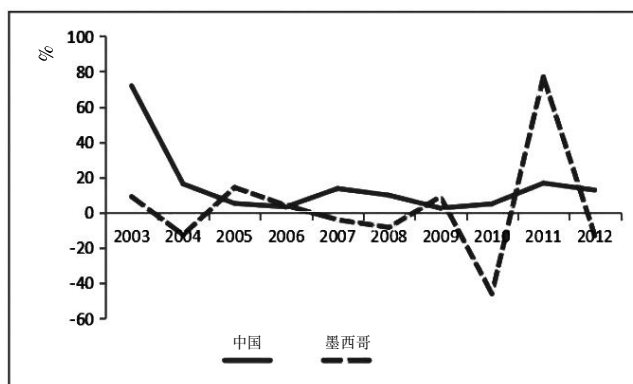


图 15 2003—2012 年中国和墨西哥的核能增长率

地居民的生活水平。1904年中国建了第一个水电站,到2020年中国预计有足够多的(7—9个)水电站,这将大大提升河流的防洪能力和水电生产。根据当地主要河流的水文条件,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加快大型水电站的建设,预计到2015年水电发电装机容量在全国将达到2.9万千瓦。

如图16所示墨西哥、中国和世界水电消耗的增长速度,墨西哥水电消耗的周期性波动巨大,2010年大幅增长后,2011年、2012年水电消耗正在下降并呈现负增长;而中国周期性波动更为平稳,仅在2011年就有一个小的负增长,之后又出现了很强的上涨,这或许是因“十二五”规划的影响。

### 2. 生物质能源

墨西哥生物质能源研发刚起步,生物质来源主要是甘蔗渣和木材的混合,索诺拉州、锡那罗亚州、哈利斯科州是具有最大生物质能源潜力的城市。中国生物质能源利用则是在主要的产粮区和产棉区,利用农作物秸秆、粮食加工剩余物和甘蔗渣为燃料,以因地制宜为原则,利用当地农作物废料促进生物质能源的发展,促进在生物质能的生产过程中的气体(包括甲烷)的形成,开发生物柴油和乙醇工业的纤维素。

### 3. 地热能源

墨西哥拥有丰富的火山资源,发展地热能源有巨大的潜力。CFE是墨西哥唯一的地热能源企业,

并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米却肯州和普埃布拉开发地热资源,在Campo Prieto、Los Azufres和Los Humeros拥有843兆瓦的安装设备,其环境影响可以完全忽略。在中国,热电联产机组主要运用于大中城市和工业园区中,集中鼓励热负荷建设(燃气-蒸汽),建立单位最大负荷联合循环,因地制宜将冷却的电热联产天然气作为燃料。目前,中国已经加强节水技术在火电厂的运用,并发展发电联合循环集成气化和示范碳捕获工程的利用和储存。

### 4. 风能

墨西哥在瓦哈卡工厂加大了生产和投资力度,风电在2011年开始增长,当年产量比2010年高出33.1%,部分地区(如塔毛利帕斯州、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和普埃布拉等地)正在逐步开发风力发电。但2009年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在报告中声称:正在开发的墨西哥瓦哈卡峡谷所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大于其所产生的潜在收益,该项目忽视了该地农民和土著居民的人权。中国从1958年到1980年代开始使用大中型风力发电机发电,直到1998年,风力发电机的使用率相对较低。在过去的10年里,风力发电的使用率开始提升,从2005年20兆瓦的电力到现在的320兆瓦。风电领域的最大障碍之一是缺乏从西部到东部高效率、高利用率、低损耗率的网络输送通道。中国的风电行业是全球同行业中发展最为快速的,在“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注重风能的集约化利用,即推动风能的集中发展,在西北和华北领域加强研究和开发,鼓励支持风电设备制造商整合提升风力发电电网。

### 5. 太阳能

墨西哥拥有丰富的太阳能,全国3/4的领土都有足够的太阳能辐射,CFE目前负责用太阳能来发电,如2006年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太阳能发电工厂,以及目前正在墨西哥西北部规划的太阳能发电工厂。此外,CFE正在开展太阳能光热集中系统项目,2010—2011年以来,CFE的第一个太阳能光伏电站将太阳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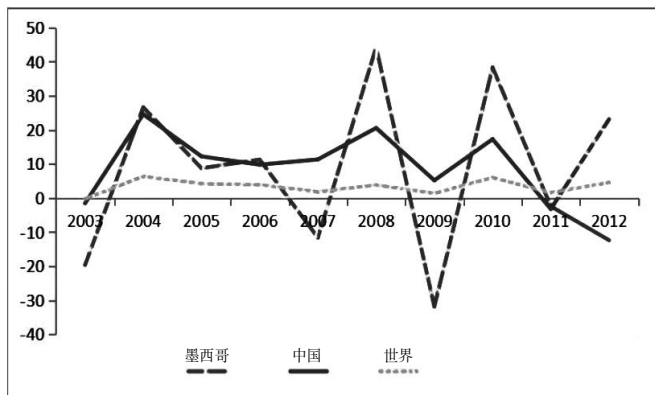


图 16 2003—2012 年墨西哥、中国和世界的水电消耗(增长率)  
数据来源:《世界能源统计回顾 2013》。



生产、利用率提高了 19.4%，拥有地理位置优势的北部成为墨西哥最好的太阳能发电地区。中国被认为是拥有巨大太阳能潜力的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该国确立了集约利用太阳能的发展模式，将光伏电站连接到网络，在青海、甘肃、新疆等地推广太阳能发电项目，利用众多闲置的土地，以增加电力供应满足本地的电力需求。西藏的小村庄能源主要来源于太阳能，太阳能便宜，且在偏远地区也可以运用，这也是政府发展农村能源供应的关键环节。太阳能热水器将建在当地的建筑上，并推广普及太阳灶。预计到 2015 年，太阳能发电量要突破 2100 万千瓦，太阳能热的普及面积超过 4 亿平方米。中国是太阳能最重要的生产和消费市场之一，太阳能热水器无论是在产量还是在销量上都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如图 17 所示，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中国腾飞的经济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很高；而墨西哥自 2003 年以来，消耗速率较低于世界水平，尤其是 2010—2012 年几乎停滞。

## 六、结语

全球气候变暖和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直接影

响着保护人类的臭氧层，因此，各国迫切需要转变当下经济的发展模式，尤其是要注意使用和生产石化燃料的替代能源。发达国家以及对新兴能源依赖的国家在气候变暖的国际社会博弈上一直专注于生产可再生能源和减少使用(或不使用)不可再生的能源，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为顺应全球的趋势，各国正在制定相关的规划、战略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同时努力提供非石化能源的必要生产条件。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对能源的高需求、高排放迫使中国政府积极作为，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

尽管墨西哥石油资源较丰富，但受工业发展水平的限制也不得不大量进口石化工业品，因此墨西哥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利用会提升其本国经济的发展。而墨西哥面临的巨大挑战是：作为全球 25 个最大温室气体的排放国之一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在应对如何减少石化能源生产或提出提高石化能源利用效率上难以提出有效解决方案。墨西哥石油产量正在明显下降，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却反而增加。而中国最近被指责为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之一，因此，中国必须实质性地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量。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墨西哥和中国大约都是在做相应的规划和方案，以减少和消除气候变暖问题。虽然墨西哥已应联合国的要求并为此作出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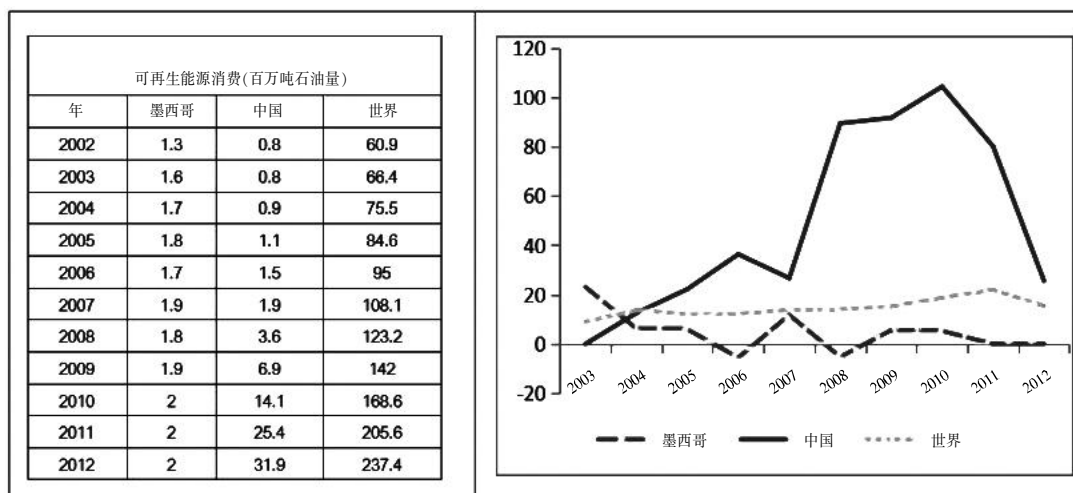


图 17 2003—2012 年中国、墨西哥和世界消费可再生能源(增长率%)

数据来源：《世界能源统计回顾 2013》。

努力,但其措施是非常抽象、原则性的,并未涉及具体如何根治气候变暖问题。当下中国有效的解决方法在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可再生能源在不遏制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目标。墨西哥的大多数能源生产来源于石油、天然气,但其油气产量在持续下降,油气的扶持政策和油气生产技术工艺似乎不足以提供一个更清洁、高效的生产过程,甚至也谈不上增加投资以提高油气产量。中国的石油生产一直在下降,石油储备较低,但其消费量相当高。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主要由煤炭提供,但煤炭在使用、生产的过程中污染最为严重,当下中国政府已承诺减排,同时,受可再生能源增长的影响,中国的煤炭产量出现下降趋势。相比较而言,墨西哥煤炭提供的能源几乎为零,中国的核电发展也成为解决

环境问题不错的方案。中墨两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中有着共同的利益,中国已经看到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增长,同时墨西哥可替代能源生产也已经开始增长。总的来说,两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更侧重于太阳能、水能和风能。在中国,预计未来5—10年内这些可再生能源会持续增长;而在墨西哥,尽管2014年开始能源改革,但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目标,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中国,上自中央政府下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清楚自己的工作重心,在20世纪对制造能源的商品、服务上致力于寻找替代物和研发绿色技术;而在墨西哥,却没有看到明确的能源政策,当下只是一些流于表面、普遍的、肤浅的讨论。

# 当代国际环境法发展 面临的内外问题与对策分析

◎于兴安

**[摘要]**全球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循环性、综合性的特点,因而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需要“集中化”的治理模式。而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逻辑起点建立起来的现行国际环境法,却面临“分散性”的问题。在现阶段应正确认识国际法体系“碎片化”的事实,通过推进国际环境法硬法化,进行监督执行机制建设以及加强对重点区域的保护,来应对国际环境法发展中面临的内外两方面问题。

**[关键词]**国际环境法;生态环境;国际政治

从史前文明的刀耕火种开始,人类便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塑造着自然环境。在从自然环境向人为环境转化的过程中,人为环境的扩张损害了原有的自然环境。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以及其他生物物种的灭绝等诸多生态环境问题始终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国际法将环境保护纳入其体系以来,在协调各国政府行动,明确各国权利与义务,提高各国对环境问题的认识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不能否认的是,当前国际环境法的发展面临外部变量与内部障碍双重因素的考验,因而,只有加强立法层面和执法层面的改进,促进国际合作,才能推动国际法不断发展进化,从而更好地造福人类。

## 一、外部变量: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出现新问题

生态环境问题不分地域、不分种族、不分发展程度,是整个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一国经济发展

在达到一定程度前(主要以人均收入为指标),社会生产中的规模效应是导致环境恶化的主因。在这一阶段,发展生产和破坏环境是同时进行的<sup>①</sup>。根据历史经验,很少有国家能够跳出这种发展与破坏并举的早期发展困境。由于环境污染的累积效应,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生态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

(一)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恶果更快速地反作用于当代人类

从时间角度看,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循序渐进的,是有一个积累过程的。自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改造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随着人类技术爆炸与人口数量爆炸同步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造成当代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呈几何数增加的,给全球生态环境带来的伤害是毁灭性和不可逆的,远远超出前工业文明时代对环境影响的总和。人类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速度远远超出了生态环境的自我修复速度,因而由生态环境破坏引发的后果

[作者简介]于兴安,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部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91)。

①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pl/pl\\_xskp/201503/t20150324\\_1558085.shtml](http://www.cssn.cn/pl/pl_xskp/201503/t20150324_1558085.shtml),2016年9月8日。

直接作用在当代人类身上。最典型的例子是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根据2013年9月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五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披露,过去30年,每10年地表温度的增暖幅度高于自19世纪中叶有现代测量记录以来的任何时期,2003—2012年平均温度比1850—1900年平均温度上升了 $0.78^{\circ}\text{C}$ <sup>①</sup>。如果任由这种情况继续恶化,其后果是导致极地冰川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低地势沿海国家和岛国面临土地盐碱化加快,适宜人类居住的领土面积不断缩小的威胁。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图瓦卢、基里巴斯共和国等岛国可能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内完全被海水淹没。

(二)地区性生态环境问题酿成全球生态问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从空间角度看,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大体上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压力过大,二是资源消耗过度,三是生存环境破坏严重。这三个方面呈连锁反应模式,即由人口数量大爆炸引起资源消耗过度,在资源开采、加工、利用过程中又引起生存环境的恶化。根据传统认知,这些生态问题大多只对当事国或所在地区产生局部性影响,是国内以及区域内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由于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广泛应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以及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循环性特点,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环境问题由原来的国内问题突破人为设置的地理限制,跨界传递成为地区生态问题,并逐渐发展到现在的“全球风险”。如北极地区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头10年,在夏季最低海冰每10年缩小73万—107万平方公里。北极冰川大面积消失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北美大陆和亚欧大陆中

纬度地带在夏季遭遇极端天气的概率大幅度提高,从而对相关国家的农业生产、社会生活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sup>②</sup>。

(三)生态环境问题与国际政治深度结合,成为各国政治互动的重要议题

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空间产生的影响会引发其他一系列连锁反应。传统看法认为,国家间因生态问题发生互动主要是由于在发展过程中为争夺两国或多国共有的资源而激化的矛盾造成的。但随着人类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形:其一,一国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生存空间的改变,先前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很快被环境恶化带来的恶果所对冲,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环保意识的觉醒,对一国发展的评价和考察增加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标准,从而使国内发展模式面临国际与国内多重标准检验。其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气候和环境因素成为大量移民的重要驱动力。据《2010国际移民报告》预测,到2050年,因环境因素全球需要迁移的人数可能为2亿—10亿<sup>③</sup>。而目前国际法体系中尚无针对环境移民的立法保护。大规模的环境移民会对其他国家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生态环境造成冲击,导致不同文明间的认同感发生碰撞甚至引发国家间政治、军事冲突。其三,生态环境与气候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重要议题,气候外交、环境外交成为国家间博弈的重要手段。西方发达国家将环保议题纳入国家和国际战略层面,要继续在全球环境和气候领域掌握绝对话语权,进而抢占外交战略中的“道德制高点”<sup>④</sup>。而发展中国家在兼顾“发展”与“环保”平衡的同时,要求借环保议题获得构建国际制度新框架的参与权利,以平衡发达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议题设置与规则制定层面上的主导现状<sup>⑤</sup>。

① IPCC working group, *Climate Change 2013: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IPCC, 2013, p.5.

② 蒋小翼、周小光:《气候变化背景下北极权益争端与我国海洋权益的国际法思考》,《理论月刊》2016年第2期。

③ 郑艳:《环境移民:概念辨析、理论基础及政策含义》,《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4期。

④ 高蕾、陈俊华、沈长成:《基于博弈论的气候外交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⑤ 周绍雪:《气候外交将成为中美战略合作新增长点》,《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全球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并不以民族国家疆界为限,它同整个人类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因而,只有世界各国达成生态环境治理的普遍共识,在国际环境法体系的有效制约和引导下,明确各国权利与义务,统筹各国行动,“集中化”处理环保难题,才能对全球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治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国际环境法自身进化程度以及各国对国际环境法的普遍认识及治理信心并未提升到面对现实问题时所应有的高度。

## 二、内部障碍:国际环境法自身发展面临的问题

目前世界各国仍处于民族国家主导的“后冷战时代”的转型期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权力斗争和利益争夺仍然占据主流,但是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为逻辑起点建立起来的现代国际环境法却面临“分散性”问题。本文认为,国际环境法的“分散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国际法体系层面的问题。随着国际法的扩张,现代国际法体系的“碎片化”愈演愈烈。碎片化是指随着国际法体系的发展,在缺乏权威统筹的前提下,国际法体系内部出现偏离法律发展的整体性视角,自主性造法,相互独立甚至彼此冲突的区域分割和专业板块组合现象。国际法的碎片化造成两种冲突:一是实体法冲突,即不同规则体系或国际法分支间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规定,导致国际法实体间的冲突;二是程序法冲突,即当多个国际法分支执法机构面对相关问题均有管辖权时的司法性、执法性冲突<sup>①</sup>。其二是国际环境法层面的问题。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内,环境的整体性、流动性与全球 200 多个民族国家主权的独立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国际环境法不仅在实际操作

层面出现功能性失灵,而且在诞生之初就“先天不足”。

由此可见,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进化不仅面临自身先天不足的问题,还要面临国际法体系内部“碎片化”带来的结构性压力。总之,现行国际体系下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集中化”需求与现代国际环境法面临的“分散性”问题相悖,导致全球生态环境的治理困境。

### (一)国际环境法存在基础的分散性问题

这主要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关注程度与责任分配的矛盾。国际法的存在及其运作取决于两个分散性的因素:一是各国利益的一致或互补,二是国家间的权力分配<sup>②</sup>。国家间能力分配的不同导致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位置不同,环境保护在各国国家战略中所处的地位也不同。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的异质化明显加强。南北发展严重不均衡造成对于环境保护的认知差距,而这种差距的主要根源是各国对本国实力和发展利益的考量。历史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是“高污染,高能耗,高增长”的规模效应模式广泛应用的结果。当代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发展也是在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而应用这一模式。发达国家现在高度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并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而其在资金、技术支援方面的承诺又因为种种原因难以实现。这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目标和环保能力相悖,从而导致国际环境法是在各国利益反复博弈中妥协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原则不可避免地带有笼统性和模糊性。

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紧迫性要求现代国际环境法要以灵活实用的方式发展进化,特别是制定新的原则或制度管理某些优先问题。而这种妥

<sup>①</sup>莫世健:《国际法碎片化和国际法体系的效力》,《法学评论》2015年第4期。

<sup>②</sup>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协实际是以一个低标准来迁就某些国家,从而将评价国际环境法有效性的标准也拉至较低的层次。不可否认的是,此举符合国际社会发展面临的实际情况,但在无形中又限制了一个更加从环境视角出发的国际法律体系进一步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和空间,甚至导致已达成的原则、机制也难以保证严格实施<sup>①</sup>。正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虽然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但也使得各国对于责任分配意见不能统一,全球范围内关于生态环境的谈判进展缓慢。

## (二)国际环境法立法功能的分散性问题

这主要包括国际法体系层面和国际环境法层面两方面的问题。国际法体系层面的问题是:不同于国内法律是由专门立法机关颁布和实施的,国际法的立法活动是由多种层面的国际法主体共同参与完成的,主要有主权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以及个人等。由于缺乏统一的立法管理机构或者立法主体间的协调机构,以及类似于国内法“立法法”性质的国际法律的依据和保障,不同行为体根据自身利益需求与各自专业知识认知能力推动各自领域的国际法立法。目前,国际法体系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地域间出现了大量的“亚国际法体系”,如国际贸易法、海洋法、外交和领事法、欧盟法等。在整个国际法体系的“碎片化”进程中,由于国际环境法与其他国际法存在很明显的重叠和互动,并且当前国际环境法中存在大量零散的、难成体系的宣言、决议等“软法”性文件,因此现代国际环境法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自足的法律体制。相比之下,某些国际法已发展进化成相当完善、独立且具有约束力的体

系,即国际自足体制<sup>②</sup>。当国际环境法与其他亚国际法体系发生实体性冲突时,面对其他法律业已扩张形成的“体制优势”,国际环境法显得势单力薄,从而威胁到国际环境法本身的权威性和可靠度。

国际环境法层面的问题是:一方面,尽管国际环境法远未发展成一个独立的体系,但其碎片化已初见端倪。面对全球生态环境出现的综合性的问题,基于不同利益的考量、因不同风险偏好而人为设置的部门目前缺乏统一协调的立法机制。这可能导致三种情况的出现:其一,立法重叠;其二,立法冲突;其三,立法空白。其后果是国际环境法在立法环节即出现“内耗”现象,从而浪费了立法资源,不仅不利于国际环境法自身发展进化,而且降低了生态环境治理的效率。另一方面,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法的立法主要建立在相关国际法主体达成统一的基础上,即每个立法主体只会参与制定它所同意的国际法。如果某立法主体不曾加入某项国际法,那该法对它就没有约束力<sup>③</sup>。当前国际环境法主要包括国际环境条约和国际习惯以及软法。其中:(1)软法是指由不具有立法权的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通过的灵活性较大、没有直接约束力、可以为各国共同接受的多为原则性阐述的法律文件<sup>④</sup>。软法在国际环境法体系中占据比较大的比重,一些比较重要的国际环境法文件如《人类环境宣言》《里约宣言》《斯德哥尔摩人类行动计划》等都属于软法范畴。(2)国际习惯是指能得到各国公认,并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国际社会在生态环境方面最基本的行为总结。但国际习惯需要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得到各立法主体的法律确认<sup>⑤</sup>。(3)国际环境条约是创立有

① 帕特莎·波尼、埃伦·波义尔:《国际法与环境》,那力、王彦志、王小钢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10页。

② 葛辉:《国际法“碎片化”视角下的气候变化单边措施——以欧盟航空指令为例》,《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③ 那力:《从国际环境法看国际法及国际法学的新发展》,《法学评论》2009年第6期。

④ 程溢:《论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8—20页。

⑤ 林灿铃等:《国际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第326—328页。

约束力的国际规则最常用的方法。然而,条约的创立只是条约相关国家参与制定的,对未参与到该条约制定的国家并没有约束力。

为了克服环境法渊源分散性带来的难题,目前条约制定者通常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通过推动国际环境条约逐步演变成国际习惯的渐进方法,从而达到约束非缔约方的目的;另一方面,相关立法朝着“框架公约”方向转变,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到一个条约的设立中,以达成最广泛的共识。但“框架条约”并未对具体权力义务进行表述,只是呈现一个抽象的行动原则,以这种形式规避国际法立法功能方面的分散性是以暂时失去执行力为代价的。虽然事后有通过议定书或附件的形式确定具体权利义务,但又使得国际环境法立法周期过长、成本过高,并且实际达到的效果远远不能满足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紧迫性要求。

### (三) 国际环境法执行功能的分散性问题

执行功能主要包括司法与执法两方面。在司法方面,国际社会缺乏具有等级制和强制管辖权的司法机构。司法机构的管辖权需经过主权国家间协定才能建立,在国际法司法领域中,各个国家的意志在该领域起决定性作用。事实上,这关系到国家间整体权力分配的争端,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关于发展与环保之争,涉及南北国家关于未来世界格局中权力分配的激烈竞争,是发展中国家改变国际社会不公平现状与发达国家维持现状之间的争端<sup>①</sup>。这种关于是否改变现状的争端,在现阶段相关国家是不会企图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的。因此,即使国际环境法的立法程序不足,也不可能像国内法通过司法机关审案的机会弥补短板。司法活动本身的被动性与国家意志的独立性,导致国际环境法难以在司法领域广泛应用。

从国际法体系层面看,现代国际法体系碎片化使体系内部各法不均衡发展态势进一步加剧。国际法体系解决某领域问题的功能性扩张超越了地域、专业限制,从而造成不同层面的国际法发生重叠乃至彼此冲突。如前文所述,面对各个“亚国际法体系”各自独立构建的规则体制,一方面,某些强势的国际法会借“体制优势”继而形成“体制霸权”,即通过挤压其他国际法的空间,来扩张自身话语权,造成国际法体系内部不平等现象的发生,从而损害国际法体系的整体形象和效力;另一方面,每一个“亚国际法体系”各自为政,拥有一套争端解决机制,导致国际法体系碎片化表征更为明显,而由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循环性,很容易发生关联数个国际法领域的国际争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国际民事诉讼活动中的不方便法院原则尚未在国际法体系中普遍应用,各争端方会根据利益考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解决机制,即造成“选购法院”的后果。这种重结果、轻规则的挑选行为,进一步造成司法程序的分散,不仅无助于争端的解决,而且可能会使整个国际法体系发生倒退。因此,就算相关国家愿意通过国际环境法司法途径解决争端,也会面临国际法体系碎片化带来的这两方面问题的考验,司法解决的过程、结果恐怕都会深负众望。

在执法方面,其一,当前处在新旧国际体系交替的转型期,各种世界性难题层出不穷,不可避免地导致环保议题的重要性被“稀释”,使得国际环境法的实际执行被打折扣;其二,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难以形成超国家执法机构,跨区域治理缺乏权威性和直接效力。同时,国际法体系的碎片化使得国际法执法主体多元化,进一步导致国际环境法的权威性丧失、执法成本上升与约束效力的弱化。当前国际环境法退而求其次,主要是通过取得各缔约国国内法承认

<sup>①</sup>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46—477页。

进而影响国内法的制定而发挥作用的。尽管在没有强制力的情况下,在国际环境法多年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世界大部分国家有了环保意识,并履行了条约义务。这部分是出于各缔约国自觉的国际法意识与环保热情,但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环境治理短期内可能看不到效果,各国遵守相关条约的积极性会受到很大影响,这就导致已经达成的国际环境法在实际执行中进展缓慢。

### 三、国际环境法进化层面的对策探析

当代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并出现一系列新问题,而相关国际环境法却难以克服“分散性”问题,相关立法、司法与执法诸功能的进步未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因此,应采取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以突破现有国际体系桎梏,寻求有效的国际合作,真正走出治理困境,从而实现人类与地球生态环境和谐相处。

#### (一)正确认识国际法体系“碎片化”的事实

有观点认为,从深层次原因看国际法的碎片化,是近代以来理性主义的泛滥引发人类知识的职业化,以及自然科学方法论被广泛引入人文学科双重作用的结果。所以其碎片化是与生俱来的<sup>①</sup>。从另一个视角看,二战后,国际法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基本原则构建起来的,但一方面,宪章对于其规定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与保障基本人权等权利原则之间的协调与均衡并未作相关规定;另一方面,宪章第8章承认在适当区域领域内,相关国家可以根据特殊情形,为维护共同利益自主制定特殊的国际法规范<sup>②</sup>。伴随着科学技术的推动与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以上规定成为国际法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因,但也成为现代国际法碎片化的重要诱因。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认识论角度,还是从实际发展角度来看,国际法碎片化是国际法体系固有的结构特征,并不是一个新现象<sup>③</sup>。从知识发展角度来看,一门知识谱系的传承发展必定伴随着其内部的分化组合、与时俱进的“竞争”态势,而在这看似杂乱无章、难成体系的乱局中,却孕育着发展进化的新希望。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不是盲目夸大碎片化带来的副作用,更不是去否定甚至徒劳遏制碎片化,而应尽量缓解碎片化带来的对现代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冲击。

#### (二)在立法方面持续推动国际环境法硬法化

软法的大量存在,一方面体现了国际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目前可持续发展已得到世界各国广泛认同;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由于无法律约束力,尽管国际环境法在不断向深层次发展,但在国际法体系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不能有效治理当前全球环境面临的新问题。面对出现的新问题,国际环境法经过4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经到了向系统化、硬法化发展的时间拐点。所谓硬法,即指国际环境条约、国际习惯以及有约束力的宪章等<sup>④</sup>。目前国际环境法的立法工作倾向于在全球气候方面的硬法化尝试。尽管全球气候变化与全人类命运息息相关,但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统筹安排、涉及国家数量较多、发展程度不均衡、利益诉求多元化等问题,相关工作未能取得显著进展。

因此可以具体做到:一方面,要充分发挥联合国系统在立法硬法化上的重要作用。其一,应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契机,推动国际环境法硬法立法的议事议程,充分发挥联合国大会在推动国际环境法立法方面的核心作用,如联大决议、发起提出国际法编纂计划等权力,同时更进

①李秀芳:《论国际法碎片化的成因》,《行政与法》2016年第7期。

②③古祖雪:《现代国际法的多样化、碎片化与有序化》,《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

④洪永红、郭炯:《论国际法发展的新趋势》,《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一步突破现有的立法区域与领域局限,从全球角度尝试国际环境总法的立法工作。其二,利用国际法院司法判例对国际习惯的再确认和体现的功能,有意识地缩短有关国际条约转化为国际习惯的时间周期,从另一个角度影响国际环境法硬法立法工作,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的约束力。其三,国际法委员会应在国际法硬法立法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可以从立法源头上适当增加拟定硬法性质的草案比例,有计划地构建国际环境法的硬法体系,与联合国大会形成推进硬法立法的“双保险”。除此之外,还应发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其他专门机构的立法作用,以推动国际环境法硬法立法工作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在硬法立法上的作用。作为现代国际环境法诞生标志的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正是在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持续压力下才得以召开的。尽管非政府组织的国际环境法主体资格有很大局限性,但它可以通过灵活、非官方的活动影响有关国家的环保意愿,甚至直接提供“绿色援助”来改变有关国家的立场,在某种程度上配合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硬法立法工作。如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该组织拥有专门的国际法中心,由于其成员的综合性和专业性,可以弥补现行国际法漏洞并为各国制定环境法提供意见和技术支持,甚至可以独立完成国际环境法草案。从某种意义上说,该组织的环境立法意识和实际立法工作进程已经走在了其他国际组织的前列,在立法方面已经成为联合国系统的坚定“盟友”。

(三)在国际法执行方面应加强监督执行机制建设

国际环境法的实际执行情况是整个法律环节中不容忽视的问题。长期以来,国际环境法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执行机制,不能形成普遍约束力。国际环境法的基础是国际合作,即国际环境法的发展根本上是取决于各国环境保护的意愿。按照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集中化要求,现阶段应保证国际法维持民族国家间有限的政治支持现状与超国家治理愿望之间的均衡。本文认为:其一,应以政府间国际组织成立联合监督执行机构为主,确定执行权的集中化,辅之以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监督作用,将各缔约国实际实施情况进行定期审查评估,及时收集、核查、披露缔约国不履行条约的行为。在缺乏超国家治理条件情况下,利用世界舆论与各种国际组织形成的约束合力进行相关国家的行为矫正。例如,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现在越来越多地以“法庭之友”第三方的身份介入司法程序行使咨询管辖权,促进司法程序公正透明,从而间接影响国际环境法的执行效果<sup>①</sup>。其二,以缔约国间相互监督与自己报告制度为辅,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EIA),同时促进国际环保问题解决机制的多样化和灵活化,除了国际司法途径,还可开发外交、贸易等政治、经济多种手段。如2014年11月,中美双方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6年9月中美两国在G20杭州峰会正式开幕前夕同时向联合国递交两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sup>②</sup>,作为两国气候外交的重大成果,发挥世界大国之间在环保领域合作的影响力,确立了大国间在国际气候环境治理中政治合作的新典范。

(四)确定国际环境法语境下的“全球公域”划分标准,以国际商业合作方式加强对重点区域的保护

在推动国际环境法立法和执行两方面内部进化的同时,面对全球生态环境诸多持续发酵的

<sup>①</sup>林灿铃等:《国际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第290—291页。

<sup>②</sup>环球网:<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6-09/9399251.html>,2016年9月9日。

外部变量,应及时加强对重点领域的保护。如1980年《世界自然保护战略》将海洋、大气层、南极和气候列为“全球公域”。这些地区由于在生态环境系统中位置特殊,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左右全球生态环境,是环境保护的重点区域。但目前全球公域范畴内的“人类共同财产”“人类共同遗产”等概念都引入了“财产”属性,其不足之处在于:一方面,从财产角度定义全球公域,植根于“人类中心论”,这种从人类自利天性出发、功利主义色彩浓厚的定义并不符合国际环境法的未来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财产”这一概念正是源于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英美法系,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这容易造成全球公域的财产的私有化与环保的公益性相悖<sup>①</sup>。其后果是这个概念成为大国在全球“无主”领域进行势力扩张的借口,进行自然资源的掠夺并宣示主权,反而加速了相关区域生态环境的破坏。

因此,应厘定国家环境法范畴下的“全球公域”划分标准及相关行动原则,淡化财产属性,克服主权争议,完善相关立法,达到真正保护全球公域的目的。应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平衡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对全球公域治理能力上的差异。应借鉴1990年11月创立的全球环境基金模式

与正在蓬勃发展的碳排放权交易模式,具体通过成立各地区专门全球公域托管基金,将各国捐赠的形式改革为以世界各缔约国直接注资入股的形式,以政府间专门性国际组织在相关地区管理运营,并相机引入非政府国际组织参与监督运营管理,在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前提下,股权可以在成员国间自由交易,股权收益为持股人共有,做到环境保护与国家主权相协调,寻求环境效益与发展利益间的平衡。

#### 四、结语

世界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举步维艰的系统性工程。面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集中化”需求与现行国际法体系的“分散性”问题构成的治理困境,应正视国际法发展的现实,杜绝出现条约制定超出当代人类意愿与能力,过于理想化以及缺乏实际操作性等情况,有条理地推进国际环境法的进化发展。只有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国际环境法与国家主权相协调,生态环境治理与现实收益共存,才能真正动员起世界各国、各地区、各领域的力量参与到这一工程当中,才能真正发挥国家环境法的巨大作用,切实维护人类可持续发展。

<sup>①</sup>刘卫先:《环境保护视野下“人类共同遗产”概念反思》,《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 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基础及其困境

◎ 鞠昌华

**[内容提要]**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环保原则的提出有其历史背景,计划经济理论、跨越发展理论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这些理论基础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导致实际发展过程中实践与理论原则脱节,未能真正起到约束作用。在实践中,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环境已经被严重污染,近30年也同样边污染边发展,并未能够发展出一条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建议正确面对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境,直面先污染后治理。

**[关键词]**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环境管理

在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教训之后,依据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要求,中国环保工作的早期创建者提出了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环保原则。根据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曲格平先生的回忆,尽管当时也有人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现代化建设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能超越西方国家。然而在曲格平看来,西方国家因“先污染,后治理”付出了惨痛代价;在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先污染,后治理”将更加冒险<sup>①</sup>。因此,在反复论证之后,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起草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明确提出:“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事实上,在此后的发展中,中国并未能真正摆脱这一宿命。40年后,曲格平先生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没能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sup>②</sup>。回首走过的道路,我们需要思考:除了应然的环境需求之外,我们何以在当初提出这一理论,又何以导致实践与指导

方针脱节?以下笔者将通过探讨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及其问题的分析,尝试对此作出解答。

## 一、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基础

中国在环境保护工作初期提出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有以下几个理论基础,即经济的计划经济理论、社会的跨越发展理论和环保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是1978年还处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环保工作者,面对“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压力时,提出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原则的基本依据。

恩格斯指出,当无产阶级取得社会权力并实现生产资料公共制之后,“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sup>③</sup>。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不仅能够而且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

[作者简介]鞠昌华,博士,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江苏南京 210042)。

[基金项目]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201602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李静:《“环境保护”进入中国的几件大事》,《瞭望东方周刊》2011年第46期。

②汪韬、曲格平:《四十年环保“锥心之痛”》,《南方周末》2013年12月26日。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6页。

经济只有有计划地、按比例地发展,使人力、物力、财力得到最合理的利用,才能保证经济高速度的发展,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因此计划经济是社会化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sup>①</sup>。列宁认为,要“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现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并声称:“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犯不可饶恕的经错误”<sup>②</sup>。

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于,可以通过制定科学的国民经济计划,合理安排国民经济中各种基本的比例关系,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和比例失调所造成的社会劳动的浪费,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正是按照在全社会范围内科学地、有计划地分配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制定统一计划调节社会生产,才能实现国民经济有计划地发展,可以保障经济系统运行的最优化,从而避免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先污染问题。

### (二)社会主义跨越发展的论断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率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and 后发优势理论,为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提供了社会发展理论的支持。马克思于1881年2月底在给俄国民粹派革命家查苏里奇的复信中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从而提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命题。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马克思主义者亦认为存在着后发国家在工业化进程方面赶上乃至超过先发国家的可能性。前苏联领导人通过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等获得国力的快速提升,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领导人亦务实地提

出通过技术的模仿、引进或创新,借鉴后发优势理论,为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赶超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支持。

###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为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原则的提出提供了哲学支持。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经营的工业和农业给人和自然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有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田。”<sup>③</sup>这表明,资本主义工业技术的进步是以破坏自然条件,特别是土地的自然条件为代价的。恩格斯认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sup>④</sup>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生态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界同性共体,始终把大自然当成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把自己当成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因此,人类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要尊重自然和自然规律,树立起平等、和谐、共存的新型自然观。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异化,要求在爱护自然的过程中改造自然;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自觉地肩负起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的重任,不断优化和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sup>⑤</sup>。

## 二、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困境

然而,上述理论基础有其局限性,这些问题导致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失去基础。

### (一)计划经济的最优化问题

①刘成瑞:《也谈计划经济》,《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5期。

②《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⑤张存刚、陈增贤:《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当代经济研究》2010年第10期。

列宁说：“要把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一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sup>①</sup>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规律“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规律，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悉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规律的要求的计划”<sup>②</sup>。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列昂惕夫引进投入产出法优化经济计划。苏联学者康特洛维奇也运用数学工具，建立了线性规划来研究资源的最佳分配问题。但是由于计算工具的限制，线性规划也只能限制于不多的几个变数，除线性规划以外，当时并没有其他有效的数学理论及工具，因此考虑大范围的规划问题只能是极粗略的。中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教授曾在《科学通报》连载发表《计划经济大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试图解决计划经济最优化的数学问题<sup>③</sup>。恩格斯也曾设想说：“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sup>④</sup>

但是，实际的计划制定者却永远无法掌握全面的信息，无法掌握完整的经济学规律，以最后形成完美的计划。因此，不管怎样努力地改进计划的编制方法，努力地提高计划的科学性和群众性，都无法避免计划经济的弊病。正如马克思引用比·特雷

莫的名言指出的：“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sup>⑤</sup>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跨越发展的要求下，在制订计划时，往往更多片面地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速度，而忽视产品质量的提高、成本的降低和适销对路等，造成更多的粗放式发展问题。在东西方冷战的激烈对抗下，前苏联即采取以军事工业为先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而轻工业发展不足，这样的畸形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资源依赖型特征，而且环境保护难以进入国家战略的核心序列，苏联“超常规开采和使用自然资源，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sup>⑥</sup>。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导致苏联生态问题不断积累和恶化的最根本原因。此外，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还悖逆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规律，导致“公地悲剧”，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共性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结构失衡，导致企业以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计划，实现奖金最大化为最高任务，而不关心资源节约，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大量资源被挥霍<sup>⑦</sup>。据前苏联学者库马洛夫的分析，到1980年，由于空气和水的污染，造成前苏联1980年的总损失大约为500亿—600亿卢布，而1990年达到1200亿卢布<sup>⑧</sup>。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表明，1987年苏联仅污染造成的医疗卫生花费就高达1900亿卢布，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11%<sup>⑨</sup>。1980年，苏联每生产1卢布的国民收入消耗的电比美国多20%，钢多90%，石油多100%，水泥多80%<sup>⑩</sup>。资料还显示，前苏联单位产品的原材料消耗比西方国家高出1.5倍，燃料及能

①《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4页。

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页。

③华罗庚：《计划经济大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XI)历史回顾与小结》，《科学通报》1985年第24期。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1页。

⑥杜秀娟：《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⑦金京秀：《文明过程和生态危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⑧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6页。

⑨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⑩江流、徐葵：《苏联剧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66页。

源消耗高出 50%<sup>①</sup>。

## (二)跨越发展理论问题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断,为当初的俄国和后来的中国等落后国家直接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持,但是,这一跨越仅指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跨越,而无法涵盖生产力的内容。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客观性,“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sup>②</sup>。“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sup>③</sup>。事实上,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领导人就曾经错误地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大跃进”的发展甚至造成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严重倒退。

在环境发展领域,美国环境经济学家格罗斯曼(Saford J. Grossman)和克鲁格(A. Krueger)在 1991 年基于 42 个国家横截面数据的分析,提出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sup>④</sup>。该假说指出,在某一地区,在经济起飞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第二产业比例走高,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增加;当经济发展,环境恶化到一定程度时,达到拐点,主要经济活动从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转向低污染高产出的服务业、信息业,管制的趋严和技术的进步进一步降低了工业对资源的依赖和污染物的排放,污染物排放总量会逐步下降。此后,大量基于各类不同国家、不同污染物及不同环境要素质量与经济发展数据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假说。因此,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之间表现出的倒 U 形曲线关系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总结发展的教训之后,西方发达国家逐步

发展起以环境污染治理技术、产业清洁生产技术和环境影响评价为代表的环境管理制度,使得人类进入污染预防与控制的时期,也一定程度上为此后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提供了可能。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发达国家的公害事件给他们提供了一面镜子,使他们认识到环境保护的意义和必要性。发达国家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和环境管理的进步,也给后发国家提供了缓解先污染后治理压力的条件。在工业发展中,后发国家的确可以吸取发达国家的历史教训,依据自然环境条件,进行合理的主体功能布局,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条件下,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将污染控制在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范围之内,尽力降低环境危机的危害。但是,工业化必然带来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治理技术更需要资金、人才等的投入,不能绝对回避所谓先污染后治理。这种无法跨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环境治理需要以一定的技术、资金支撑,缺乏技术、资金支撑的所谓绿色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以中国为例,由于技术、资金、管理制度的落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赖资源优势,发挥环境容量优势,建立起“世界工厂”。尤其是在发展的初期,更是由大量缺乏环保设施的乡镇企业支撑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半边天。实际上,大量的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环境污染物排放和环境质量大多体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实际,证实了全国及各地的发展也基本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相符<sup>⑤</sup>。二是环境治理需要一定的社会需求支持。所谓“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作为一个公共政策,尤其是必须付出代价的公共政

①刘希刚:《前苏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探索及其历史启示》,《理论导刊》2012年第8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页。

④G. M. Grossman & A. Krueger,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10, 1995, pp. 357-378.

⑤刘荣茂、张莉侠、孟令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经济地理》2006年第3期;王志华、温宗国、闫芳等:《北京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的验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2期;李瑞娥、张海军:《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化特征(1981-2004)》,《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策,必须在社会整体权衡下实现,在社会整体并未感受到损害威胁时,政策制定者并不能轻易说服整个去接受。就环境治理而言,一般只有在公众身受其害后方知必要,认识到其从环境损害中获得的社会经济福利增长已不可接受,甚至危及其健康安全,才能够被社会所接受。

###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问题

由于自然环境既是满足人类生存和生理需要的“生存资源”,又是为人类经济活动提供空间、生产原辅材料的“生产资源”,因此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天生的价值冲突。同时,只有经济发展了才会提升公众对环境质量的需求,才能提供生态环境建设和污染治理资金,才有条件发展绿色产业和技术,进而改善环境。而随着环境的改善,又可进一步发挥生态环境优势,助推绿色产业,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又是相互支持的。尽管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苏东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社会主义是最好的生态学”;但是随着斯大林时代的来临,一批俄国优秀生态学家被清洗,环保受到了与日俱增的攻击,被说成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东西<sup>①</sup>。据前苏联官方调查结果,20世纪60年代在前苏联1763个城市中,具有废水生物净化设施的仅有30个左右,即不足前苏联城市的2%,70%以上的工业废水未经过任何净化直接排入水库<sup>②</sup>,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的同时,也损害了居民健康,破坏了环境。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更关注从阶级出发的环境公平,而对具体的环境问题缺乏理论研究,导致在实际社会发展中,当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成为主要问题时,理论无法在现实中发挥指导作用。

### 三、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现实困境

上述理论基础明显具有历史局限性,这些问题导致实际发展过程中实践与理论原则脱节,无法真正起到约束作用。

#### (一)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困境

提出避免先污染后治理时的中国正在阶级斗争中挣扎,然而同样没有能够避免因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当时的中国,甚至尚无环保的概念。虽然当时没人敢给社会主义抹黑,说中国有污染,然而事实上,其时北京西郊、官厅水库已发生大面积污染事件,上海的苏州河、黄浦江也已黑臭。黄河在1972年已开始断流,长江也在大跃进及其之后的大面积无序砍伐下渐成黄河,草原大面积沙化更使其时的北京时常笼罩在沙尘暴之中。到1981年,全国排放工业废水237.9亿吨,达标排放量仅70亿吨;所排废气中含有害物4000万吨,大部分城市都超标。截至1979年,累计已用“六六六”400万吨。1980年废渣排放4.3亿吨,利用的只有0.8亿吨,回收率仅19.3%。中国环保事业奠基者曲格平在向周恩来汇报时如此判断:城市环境的污染问题,中国不比国外轻;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中国远在外国之上<sup>③</sup>。只是在思想被禁锢的时代,国人不愿也不敢承认社会主义的中国有环境公害,认为那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治之症,而社会主义的中国应该也必然可以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以河北省为例,其时相当部分的工矿区地表水已污染相当严重。1973年对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邯郸、唐山等5个地区的主要水系及近200个企业的调查发现,“每天排出含酚、氰、硫化物、砷、汞、铅、铬、石油等工业废水约200万吨”<sup>④</sup>,大多未经处

①杜秀娟:《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3页。

②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7页。

③汪韬、曲格平:《四十年环保“锥心之痛”》,《南方周末》2013年12月26日。

④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三废管理办公室:《河北省工业三废污染及其危害的调查报告(1973—1975)》,河北省化学石油工业厅档案(964-6-10),河北省档案馆藏;转引自姜书平:《20世纪70—80年代初河北环境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理排入河道。如唐山焦化厂废水中酚含量高达72毫克/升,氰化物23.4毫克/升,分别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35倍和23倍。陡河、汤河、府河、绵河因受该地工业“三废”污染,水质已变黑、变臭,鱼类已经绝迹。陡河受唐山焦化、造纸、印染、化工、皮革等工业废水污染,酚含量为3.8毫克/升,已成死河;滏阳河是邯郸市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的重要水源,因受邯郸钢厂、增塑剂厂、农药厂、树脂厂、石油化工厂等工业废水的污染,水质逐年变坏,据有关部门1973—1975年监测化验,滏阳河水中“有害物质最高含量为:酚0.073毫克/升,砷0.1毫克/升,细菌总数52.8万个/升,其中大肠菌群2.38万个/升,均大大超过了饮用水的标准”<sup>①</sup>,直接影响了工业正常生产和威胁人民的用水安全。20世纪70年代初,河北的大气污染同样已经比较严重,全省9个中等城市中“有3000多台锅炉没有烟道除尘设备”<sup>②</sup>,造成城市上空浓烟滚滚,粉尘飘扬。石家庄市的空气污染也比较严重,全市有锅炉1283台,烟囱869个,80%以上的烟囱在市区和郊区,大部分没有消烟除尘装置,每年排放的烟尘“即达6万多吨,二氧化硫气体4600多万立方米,加上各种工业有害废气,全市每年排入大气的含有各种毒物的气体达470多亿立方米”<sup>③</sup>。该市烧碱厂每年熏坏庄稼100多亩,排放的氯气“曾一次使500余名社员中毒”<sup>④</sup>。

## (二)近30年的实践困境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技术、资金、管理制度的落后,我们不得不依赖资源优势,发挥环境容量优势,建立起“世界工厂”。尽管发达国家的公害事件给中国提供了一面镜子,使我们认识到环境保护的意义和必要性;发达国家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和环境管理的进步也给我们提供了缓解先污染再治理的条件。但是,工业化必然带来污染物的排放,污染治理技术更需要资金、人才等的投入,不能绝对回避所谓先污染后治理。事实上,在提出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后的30年间,伴随着中国GDP的一路狂飙,污染物也大幅激增,一段时期内中国二氧化硫超标严重,酸雨频频。一边不断重申避免先污染后治理,一边又优先提拔重发展轻治理的官员。有分析显示,中国地级市的党政一把手升职的概率会随任内GDP增速而显著提高,而环境治理投资则会影响他们的升迁<sup>⑤</sup>。面对先污染,地方环保官员要么因坚持而倒下,要么选择隐忍甚至弃守。在二氧化硫及酸雨污染压力下,中国将二氧化硫纳入总量减排之后,通过关闭小锅炉、提升燃煤标准、推动脱硫工程等一系列措施的实施,全国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显著下降<sup>⑥</sup>,质量指标也渐趋好转。然而,近年来雾霾污染仍然愈演愈烈,并未能在污染之前得到有效控制。事实证明,最

①《关于邯郸市城市建设欠账问题的初步调查(1978-2-10)》,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档案(919-6-43),河北省档案馆藏;转引自姜书平:《20世纪70—80年代初河北环境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②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三废管理办公室:《河北省工业三废污染及其危害的调查报告(1973—1975)》,河北省化学石油工业厅档案(964-6-10),河北省档案馆藏;转引自姜书平:《20世纪70—80年代初河北环境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③河北省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河北省石家庄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我市环境污染情况的初步调查报告(1975-12-10)》,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档案(919-3-372),河北省档案馆藏;转引自姜书平:《20世纪70—80年代初河北环境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④《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批转省计委、省卫生局关于“三废”污染情况和解决意见的报告(送审稿)(1972-11-1)》,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档案(919-3-44),河北省档案馆藏;转引自姜书平:《20世纪70—80年代初河北环境问题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⑤Jing Wu, Yongheng Deng & Jun Huang, et al., “Incentives and Outcomes: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ic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8754*, <http://www.nber.org/papers/w18754>.

⑥李瑞娥、张海军:《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变化特征(1981—2004)》,《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近 30 年的发展,我们仍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 (三)现实的治理困境

中国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一面在公民环境意识调查中表现出“多快好省”的想象,过高估计为环保放弃经济发展的意志。2007 年全国公众环保意识调查结果显示,39.2%的公众不赞同“要发展经济总是要在环境方面付出一点代价”,46%的公众不赞同“我们不能为了环保而降低大众生活水平”<sup>①</sup>。这在客观上助推了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近年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在四川什邡、江苏启东、浙江宁波、云南昆明、浙江杭州等地陆续爆发破坏性环境群体性事件。这些破坏性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既与中国当前环境决策不透明、群众环境意识觉醒以及错误的维稳机制有关,也与一直以来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宣传有关。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宣传,对公众形成“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多快好省式”的误导,使公众无法充分了解发展与环保的辩证关系,无法客观面对环境和建设问题。部分公众缺乏对经济增长中污染的容忍度,不能够理解环境问题的妥协,一定程度上导致因认识差异造成目前环境冲突难以和解的局面。

## 四、结论及建议

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提出有其历史背景,经济的计划经济理论,社会的跨越发展理论和环保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这些理论基础或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步深入,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

为辅,到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已经不再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或有理论上的某种限制,社会发展形态可以跨越,而生产力却无法跨越。这些问题导致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实践与原则脱节,未能真正起到约束作用。因此,本文建议应正面对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原则的困境,直面先污染后治理。

政府应客观面对污染治理,及时、全面掌握污染状况,安排环境治理措施。同时,应基于预防优先原则,加强主体功能布局,留好空间,使污染产生和排放对环境 and 人群的影响最小化;加强循环经济建设,减少产业压力和经济系统内污染物的总产生量;加强清洁生产技术研发推广,源头减轻各产业的污染物产生。要减少虚无口号对环保工作的干扰,切实加强环保具体工作的力度,优化环保政策工具,真正提高环保工作成效。应借着后发优势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前期污染的破坏程度,缩短污染治理的时间。对人均 GDP 已达到或接近 1 万美元,基本到达拐点的东部地区要加强总量削减强度;对尚未达到拐点,仍有一定环境容量的西部地区,则要承认其发展的必要,基于环境容量的计算,合理调控其污染物排放限制,同时给予技术、资金等的支持,借着后发制度优势,努力减轻污染的破坏,更早进入环境拐点。必须通过科学的普及、平等的沟通,使公众了解发展与环保的辩证关系。不应因发展绑架环境,亦不应因环境拒绝发展,以利益补偿和日常监管参与机制避免刚性发展和刚性环保要求之间的激烈冲突。

<sup>①</sup>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7 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2008 年 4 月 3 日。

# 中世纪德国城市 饮用水供应和垃圾处理问题研究

◎江山 胡爱国

**[摘要]**随着中世纪德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不断发展,逐渐摆脱封建庄园经济束缚的奴隶纷纷涌入城市,他们和市民一起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力量,促进和推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13世纪中叶城市的繁荣发展,城市环境问题也开始日益显现,特别是城市饮用水供应和垃圾处理问题已成为市民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这一问题由此也成为中世纪以后乃至工业革命时期德意志民族最关心的生存问题。本文从环境史学角度出发,结合考古学史料,以中世纪德国城市饮用水供应和垃圾问题为主题,深入剖析和探讨中世纪德国市民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和周边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以此尝试为德国生态文明史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新视野。

**[关键词]**中世纪;德国城市;饮用水供应;垃圾处理;环境治理;环境史

## 一、前言

德国城市发展史可以上溯到古罗马行省时代,科隆(Köln)、特里尔(Trier)即是古罗马人建造的第一批德国城市<sup>①</sup>。早期城市的建立主要出于为日耳曼人自身提供安全保障的考虑,因而它具有城堡防御侵略、抵抗外侮的功能。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剩余商品可用来交换,特别是许多道路交通的兴修,11世纪的德国城市开始渐渐兴起。同时,由于许多农奴从封建庄园中不断获得人身自由,他们进入城市,这也为促进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兴起繁荣提供了重要保证。到13世纪中叶,德国城市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全面繁荣的阶段,到14世纪中叶,德国城市已多达3000座。其中,居民数达到2000人的城市约占90%,居民数达到10000人的城市约有20多

座,这在当时已属规模相当大的城市,特别是慕尼黑(München)、法兰克福(Frankfurt)和科隆等这些城市甚至已达到5万人的规模,这在当时的欧洲已属超大城市,可见中世纪德国城市发展的迅猛势头<sup>②</sup>。从市容外表方面来看,中世纪德国城市总体给人的感觉是房屋紧挨、山墙拥挤、教堂林立、街道众多,这些都要归功于10世纪以来建筑技术的持续发展,它给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了较好的栖身之地。

人们之所以不断涌入城市,在城市中觅得容身之所,是因为和封建庄园相比,城市居民在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方面拥有相对的自由,尤其在法律方面,他们不受封建等级的压迫,享有较为平等的法律权利,如集市权、城郊禁地、城市宪法和自由迁

**[作者简介]**江山,德国哥廷根大学硕士,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生态文学团队兼职教授(江西南昌 330063);胡爱国,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副教授(江西南昌 33006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德国环境史研究”(15BSS026)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Hans Planitz, *Die deutsche Stadt im Mittelalter*, VMA-Verlag, Wiesbaden, 1997, S.5-23.

<sup>②</sup>Gottfried Zirnstein, *Ökologie und Umwelt in der Geschichte*, Petropolis-Verlag, Marburg, 1991, S.51f.

徙权等,所以自中世纪以来,就一直流行着“城市空气使人自由”(Stadtluft macht frei)的说法。连恩格斯也将中世纪城市喻为“中世纪的花朵”,旨在强调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发展对于欧洲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意义<sup>①</sup>。不过,随着城市人口的密度越来越大,城市卫生条件一直困扰着市民的生产生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疾病的滋生地和瘟疫的传播中心。纵然中世纪城市的环境问题由许多环境媒介引发,如交通设施、花园经济、树木栽种和建筑分布等,但和城市饮用水以及城市垃圾问题相比,它们都远远未达到这两种环境媒介的重要影响程度。所以,在研究欧洲中世纪城市环境问题时,欧洲环境史学家往往十分关注这两方面的问题,以此考察城市环境的历史变迁。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就曾经根据古罗马城市经典规划设计提出过一整套“理想城市”的方案构思,即既布有完整的地下排污系统,又建成完整有序的道路交通网,并配有惬意舒适的“商业步行区”,以进一步突出城市这个重要的商业枢纽中心的作用<sup>②</sup>。所以,在饮用水供应方面,中世纪德国市民在饮用水的开源引流、水井喷泉的挖凿装饰以及对它们的各种安全保护,尤其是法律保护从下文可见端倪。正是有了这些较为完善的法律保障,德国的啤酒酿造业才得以顺利兴起,这些都可谓水资源有效保护的结果。在垃圾清理方面,鉴于中世纪人口密集、人畜混居以及垃圾清理设施不完备的状况,所以,虽有相关法律规定和相关管理部门介入,但卫生问题还是很难得到彻底根治,特别是14世纪黑死病的流行更加剧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未来命运的担忧。本文着重研究中世纪德国城市中这两个问题存在的原因以及各种解决途径,以此展示中世纪日耳曼人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环境实践和环境保护思想。

## 二、中世纪德国城市饮用水供应情况

中世纪德国城市的饮用水供应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种为凿井取水,而另一种则是使用泉水。在阿尔卑斯山北麓城市,市民很少从城市周边的河流中取水,大多数情况下汲取的是城内的地下水如井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口增加或者自然条件的限制,地下水资源往往不敷使用,作为补充,城市周边的河水也偶尔被当作饮用水使用。在考古过程中,有关私家水井的不断被发现就是一个明证。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考古发掘仅局限于某个地域,所以一个城市中的总水井或泉水口数则难以确定。但无论如何,在当时许多城市防火规定或家庭日常生活记录中,仍可经常发现水井名称以及它们的所在地,如纽伦堡(Nürnberg)一户城市居民的家庭记事簿中,就有这样妥善保护自家水井的记录:每年需更换新井绳,定期清洁水井,即抽干井水,清除里面的淤泥杂物,再彻底清洗冲刷,以重新投入使用。只有个别城市的某个街巷记录了它的总水井数,如慕尼黑有一条名叫蒂纳尔的街巷(Dienerstraße)在15世纪时,平均每54户人家即拥有一口水井。而有关城市总水井数记录则相对很晚,直到19世纪初才出现,如慕尼黑城当时已有的总水井数约为2000口,数量虽不少,但这样的规模在当时德国其他大城市中已较为普遍<sup>③</sup>。据记载,对于使用公用水井的城市居民来说,按顺序排队、有义务保护水井和其他汲水设备、防止投毒或其他水污染等,已成为14世纪至19世纪德国市民需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实际上,有关这样的管理规定早自11世纪就已有之,有的规定甚至已相当完备,只是到14世纪有关史料记载才更为详实具体,直观生动。除管理之外,城市还担负起筹募资金、修建公共喷泉和水井的任务。在城市广场上修建的这些喷泉和水

①李伯杰:《德国文化史》,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②Stephan Schmal, *Umweltgeschichte.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C.C. Buchners Verlag, Bamberg, 2001, S.33.

③Ulf Dirlmeier, “Zu den Lebensbedingungen in der mittelalterlichen Stadt: Trinkwasserversorgung und Abfall-Beseitigung,” in Bernd Herrmann, *Mensch und Umwelt im Mittelalter*,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1986, S.152.

并不但可以使市民来此汲取饮用水,而且还可起到美化环境如艺术喷泉、浇花种树、冲洗街道的作用。所以,在环境史学家拉得考(Joachim Radkau, 1943—)看来,14世纪的德国城市就已经进入“一个将喷泉、水井、水塔、水道与艺术创作融为一体的‘水的艺术’的时代”<sup>①</sup>。此外,由于市民住房多为木结构,为了防火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此时公用喷泉和水井所发挥的作用就变得尤为重要。到了15世纪中期,各种形式的城市部门出资兴修的公用水井和喷泉已遍布德国各个城市,此时的纽伦堡市内已多达100口,到该世纪末已增加到120口。初步估计,平均每300个市民就拥有一口公用喷泉或水井<sup>②</sup>。

除此之外,中世纪城市中还有一种类似动物食槽的长方形饮水池。这种公用饮水池流入的多是从山高处长年流下的山泉,所以它的建造往往取决于城市的地形和周边的自然条件。在上述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有些城市则不得不通过修建人工管道方式引入水源,注入到这种长方形饮水池内,用以解决市民的生活之需。有文献证明,在13世纪早期,位于多瑙河畔的雷根斯堡(Regensburg)和莱茵河畔的巴塞尔(Basel)两座城市在无法获得从高处流下的天然山泉的情况下,由修道院和教堂出面铺设管道,从莱茵河引入水源,再将其注入池内<sup>③</sup>。而在北部平原地区的吕贝克市(Lübeck),1294年在有关商会的倡议下,由啤酒酿造商出资承担了铺设管道的引水工程,将瓦克尼茨河(Wakenitz)河水引入市区的公用饮水池内<sup>④</sup>。由于这种公用饮水池日益增多,

如何加强对生活用水的统一管理,确保有清洁的饮用水,就成为城市管理的一项重要日程事务。最早的管理起始于14世纪早期,包括引水设施的建造布局也被纳入管理之中。到14世纪末,从南部的伯尔尼市(Bern)到北边的不来梅市(Bremen),相关的城市公共饮用水管理已在德国的大小城市中被执行。由于管理得力、制度规范,15世纪德国城市中的饮水设施的数量规模有了进一步的增加。如纽伦堡这座城市,当时已拥有了一套完整的管道引水系统。有资料显示,为严格管理城市饮用水,从14世纪上半叶开始,有些城市还特别作出规定,看管监护饮用水设施的监管人员被正式任命为国家公职人员,饮用水管理设施被正式确立为城市建筑业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封建诸侯城邦对饮用水管理的高度重视。这样重视的结果自然带来了公用饮水池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如13世纪时巴塞尔市在教堂广场只有一个公用饮水池,而到了1440年前后,整个城市已拥有40个公用引水池和22个私家饮水池。再如纽伦堡市1396年修建了第一个公用饮水池,而到中世纪末时,已有了23处公用饮水池,可见数量之多,受益之众<sup>⑤</sup>。此外,在饮用水管理方面,针对井水不时被污染的情况,有关城市还作出过相当严厉的法律规定,如基尔(Kiel)和弗莱堡(Freiburg)等城市就曾作过死刑判决这样的法律规定<sup>⑥</sup>。甚至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还针对犹太人作出过一项十分荒诞的决定:由于14世纪黑死病的不断蔓延,他们将病因归结到犹太人身上,并污蔑犹太人是洁水源的投毒者,所以犹太人被

① 约阿希姆·拉得考:《自然与权力》,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

② Bernd Herrmann, *Mensch und Umwelt im Mittelalter*,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1986, S.76ff.

③ Jürg Schneider, *Der Münsterhof in Zürich. Bericht über die Stadtkernforschungen 1977/78*, Walter Verlag, Olten-Freiburg, 1982, S.142.

④ Philipp Schmidt-Thomé, “Archäologie in Lübeck,” in *Hefte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der Hansestadt Lübeck*, Lübecker Verlag, Lübeck, 1980, S.240.

⑤ Ulf Dirlmeier, “Zu den Lebensbedingungen in der mittelalterlichen Stadt. Trinkwasserversorgung und Abfall-Beseitigung,” in Bernd Herrmann, *Mensch und Umwelt im Mittelalter*,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1986, S.153—154.

⑥ Stephan Schmal, *Umweltgeschichte.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C.C. Buchners Verlag, Bamberg, 2001, S.33.

禁止从井中汲水。这桩历史栽赃案最终被德国医学史学家温克勒(Stefan Winkle, 1911—2006)所揭露。最终这些犹太居民只能去市郊的河里取水<sup>①</sup>。

从地下水源地到地表水源,中世纪德国城市水源供应较为丰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上述论述中,而且从地名学中还可以进一步得到印证。在今天的德国,许多带有“-bronn”“-brunn”或“-born”的地名,皆含有“泉水”之意,如 Paderborn 和 Heilbronn 等地名,仅 Schönborn 和 Schönbrunn 两个地名目前在德国分别就有 5 个和 10 个之多<sup>②</sup>。从水质情况来看,由于中世纪人对自然的侵袭较少,所以地下水的水质很少受到污染。而引入的河水却时常成为人们慢性疾病和瘟疫的传染病源,因为这些地表水的引入除大多数采用木制管道系统外,还有部分则采用了金属铅制管道,甚至有的直接从露天沟渠引入城内,所以时常会有水源遭受污染的情况发生。如 13 至 15 世纪博登湖(Bodensee)边的康斯坦茨市(Konstanz),由于市民长期向湖内倾倒生活垃圾,致使湖水一直受到污染,不洁水源被引入城市,引发疾病传播,造成许多人死亡<sup>③</sup>。然而,在供水技术方面来看,中世纪德国城市的供水技术还相对单一,当时的水井深度一般都不超过 10 米,作为补充,引入城内的地表水大多采用了木管道供水系统,这种情况一直沿用到 19 世纪上半叶德国工业革命前夕,所以这些供水技术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没发生根本性改变<sup>④</sup>。

### 三、中世纪德国城市垃圾处理情况

除城市饮用水供应之外,在中世纪城市中,能够对人们生活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城市卫生问题。这其中以垃圾问题为最,它包括污水、人畜粪便和生活垃圾等的处理。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德国各封建诸侯国中,都普遍奉行着一个必须严格遵守的所谓的“肇事者原则”,即这些垃圾清除必须在不给邻居增添任何麻烦的情况下进行,换句话说,任何垃圾的清除都要在自家地皮范围内处理干净,不得影响左邻右舍<sup>⑤</sup>。正是由于这样的规定,我们今天很少能在有关史料中找到当时建立垃圾处理场所或机构的记载,经常看到的却是市民如何违反“肇事者原则”及由此产生的邻里纠纷的记载。由此也可以推测出,16 世纪前中世纪德国城市市民家庭很少有卫生处理设施,因此形成一个恶习并成为惯例:大部分垃圾污水、人畜粪便都被倾倒泼撒到公共街道上,以至于到处污水横流、臭气熏天、蝇蚊满地,这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身心健康带来了严重影响。在今天的德国城市考古发现中,还可经常发掘出当时有些市民家庭的卫生处理设施,如垃圾坑和粪便池等,这些已成为后人研究中世纪城市环境卫生的重要史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某些城市甚至已建造了清除这类垃圾的沟渠设施。从史料上来看,从 12 世纪开始,就已有许多考古实物发现,如在德国中部偏东北的高斯拉尔市(Goslar)和南部的康斯坦茨市(Konstanz)等,而从 14 世纪开始就有了许多史料记载。这些记载生动详实,很好地再现了

① Gottfried Hösel, *Unser Abfall aller Zeiten. Eine Kulturgeschichte der Städtereinigung*, Jehle Verlag, Heidelberg, München, 1994, S.61 (当时 14、15 世纪斯特拉斯堡因井水污染所造成的病毒传染人数:1349 年为 1.6 万人,1360 年为 1.5—1.8 万人,1414—1417 年间每年约 1.5 万人。Stephan Schmal, *Umweltgeschichte.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C.C. Buchners Verlag, Bamberg, 2001, S.35)。

② SEW-EURODRIVE. *Driving the world, Autoatlas Deutschland und Europa*, GeoGraphic Publishers GmbH & Co.KG, München, 2002/2003, S.114—136。

③ Ulf Dirlmeier, “Zu den Lebensbedingungen in der mittelalterlichen Stadt: Trinkwasserversorgung und Abfall-Beseitigung,” in Bernd Herrmann, *Mensch und Umwelt im Mittelalter*,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1986, S.158。

④ Gottfried Zirnstein, *Ökologie und Umwelt in der Geschichte*, Petropolis-Verlag, Marburg, 1991, S.15。

⑤ Bernd Herrmann, *Mensch und Umwelt im Mittelalter*,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1986, S.154。

当时城市卫生设施兴修的历史细节,如在成本造价方面,法兰克福市政部门为市民修建的垃圾处理设施有详细记录。另外,在卫生设施管理方面,在该市的有关史料中,还发现修建卫生设施的工匠师傅和清扫沟渠卫生清洁工的有关口述,他们普遍认为该市的垃圾清除工作做得很出色,相当到位<sup>①</sup>。在卫生设施修建过程方面,还有更形象具体的官方记载,如纽伦堡城市建筑师图赫尔(Endres Tucher, 1423—1507)在1464年至1470年间就对该市卫生设施的修建布局情况作了记载。这些卫生设施中既有清理污水的沟渠,还另有清理粪便的沟渠。在污水沟渠方面,他绘制了整个城市用石子构筑的沟渠分布图,这些污水沟渠布局都很讲究,有条不紊、秩序井然,每一条沟渠都挨家挨户,从邻舍间的地基结合部穿过。所有污水最后都汇集到一处,由市政部门妥善安排处理。有趣的是,布局图中还标注了犹太人居民区,这在18世纪前的绘图记载中还是第一次。另外,在图赫尔的文字叙述中,也不乏对邻里之间为檐水滴漏后的排水走向问题和粪坑位置方向问题产生争执的生动记载<sup>②</sup>。在粪便排污方面,图赫尔受市政部门委托,设计出一种独特的粪便清理系统,即这套系统在地上开挖,挖出沟渠后,上面再用一块块石板盖严,所有的粪便通过沟渠系统汇入到城市的公共粪池内,然后由专人负责掏出,再倾倒入流穿市区的佩格尼茨河(Pegnitz)中<sup>③</sup>。类似情况还有斯特拉斯堡、巴塞尔、乌尔姆和科隆等城市,只是这些城市的人畜粪便不像纽伦堡市那样全部被集中,再倒入河内,而仅是部分有经济实力的家庭采用了此法。由此可以推断出,这类粪便清理设施在不同城市贫富居民区内的铺设情况是不尽

相同的。

作为补充,史料中还对这些粪便排污系统的操作过程和操作方式进行了记载。根据中世纪城市法律的有关规定,这些排污系统必须定期打扫清理,如科隆、法兰克福、巴塞尔、奥古斯堡(Augsburg)等城市的清扫工作都是由社会最底层的市民承担,而纽伦堡市粪便排污系统的清扫工作则由市政部门下属的工商业协会团体承担<sup>④</sup>。

这些在地表修建的粪便排污系统的铺设引发了一个重大问题,即它对地下水形成了严重污染。对此,图赫尔的记载也非常详细,如纽伦堡贸易集市中有一口水井,由于城市粪便排污系统的泄露而造成其被污染不能使用,从中清理出的人畜粪便居然达三百桶之多,这口水井也因此成了一口废井。因此,人们对粪便排污系统进行彻底改造,将其深挖到地下,低于水井深度,使其不污染水源。这样的改造成本异常巨大,即使如此,为方便居民生活,苏黎世(Zürich)和吕贝克等城市还是对其进行了清理改造<sup>⑤</sup>。

在生产生活垃圾清理方面,由于从中世纪晚期的14世纪末开始,城市中的街道多由石子路铺成,市内的交通设施较从前已得到了明显改善,这为城市生产生活垃圾从城内运往城外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垃圾包括街道垃圾、建筑垃圾和日常生活垃圾。在奥古斯堡、斯特拉斯堡和纽伦堡等城市,市政部门将如何把原本堆放在市内的垃圾进行处理提到了议事日程,尤其是那些手工业作坊中的生产垃圾异常难以处理。比如纽伦堡市内金属手工业作坊中的液体酸和纺织作坊中的染色剂就通过快捷的交通条件被倒入佩格尼茨河。奥古斯堡市染坊中

①Gottfried Zirnstein, *Ökologie und Umwelt in der Geschichte*, Petropolis-Verlag, Marburg, 1991, S.58f.

②Bernd Herrmann, *Mensch und Umwelt im Mittelalter*,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1986, S.156.

③Hans Planitz, *Die deutsche Stadt im Mittelalter*, VWA-Verlag, Wiesbaden, 1997, S.205—206.

④Ulf Dirlmeier, "Zu den Lebensbedingungen in der mittelalterlichen Stadt: Trinkwasserversorgung und Abfall-Beseitigung," in Bernd Herrmann, *Mensch und Umwelt im Mittelalter*,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1986, S.156.

⑤Hans Planitz, *Die deutsche Stadt im Mittelalter*, VWA-Verlag, Wiesbaden, 1997, S.208.

的染料残留物则被倒入莱希河(Lech)中。即使是在中世纪早期城市道路交通不便捷的情况下,许多家庭的生活垃圾也被抛入河内,如鱼刺和动物皮毛骨头等等,正如从德国北部一个名叫哈代比尔的内湖(Haddebyer Noor)中所发掘出的考古实物所显示的那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的19世纪<sup>①</sup>。为避免生产作坊所产生的废气、烟雾、噪音、火灾等危害,许多城市还先后作出过有关法律规定,即制革厂、屠宰场、染坊、冶炼厂等都必须搬迁到附近的河流边生产,这既改善了城市环境卫生,又方便了作坊生产,如耶拿(Jena)、鲍岑(Bautzen)等城市<sup>②</sup>。

此外,为清除垃圾、确保市容整洁、防止环境污染的法律法规也每每见诸有关历史文献中。以法兰克福为例,仅15世纪该城市就曾对14世纪所颁布的法律规定进行过一系列的补充完善。如1401年9月9日市议会就作出规定:“不管是世俗人员还是神职人员,都需要积极参与到清理污水的行动中来,要做到既不影响过路人,也不影响邻居家庭。总之,要消除一切危险隐患。若有违反规定者,须接受议会所作出的一切惩罚。”同年10月15日,有关街道清理规定又随之颁布:“入夏后的8天内和入冬后的14天内,老城区街面上的粪便、污泥和乱石必须予以清除。凡是粪便被清理的地方,随后的两周时间内不得再倾倒或堆放粪便。”针对老城区养猪所带来的环境污染,1481年8月19日市议会严格规定:“至圣马丁节(Sankt Martin,每年的11月11日)前,老城区的养猪户一律屠宰、出售完他们的饲养物。而且自此以后,不管富人还是穷人,老城区的住户都不得再养猪,且圈厩、院落等不论大小,也一律被撤除或迁出。”作为当时欧洲一流的贸易城市,为维护城市的对外形象,中世纪德国城市的有

关环境保护规定由此可见一斑<sup>③</sup>。同样,1410年乌尔姆市有关养猪的规定也有时间限制。根据规定,市民只有中午11点至12点这1个小时内可以将猪散放到街道上,而其他时间则被禁止<sup>④</sup>。此外,其他一些中小城市如雷根斯堡(Regensburg)和斯特拉斯堡,也都作出过类似相关的规定。

#### 四、结语

伴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不断发展,德国许多封建庄园中的奴隶摆脱了封建主的残酷剥削,纷纷涌入城市,他们为城市的兴起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面对人口不断增加,资源日渐趋紧的压力,他们又不断采用新技术以满足自身的生产生活之需。生活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中,如何解决好生产用水以及清除各种垃圾,一直成为中世纪德国市民努力解决的问题。值得肯定的是,他们不但在取水技术和垃圾清理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在有关操作流程方面也有较具体明确的规定。这为后人研究中世纪城市环境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然而,技术虽好、规定虽有,但在当时的具体执行如何,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只有很少城市中的部分垃圾清理设施根据规定采取了密封防漏措施,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垃圾污染源可能性的存在。究其原因,是建造这些设施的资金不足,还是对水源遭受污染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抑或其他原因,今天已无从知晓。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的市民已经感受到,水质的好坏会对其自身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否则那些密封防漏措施也无需采取。比如,在苏黎世,就发现一个靠近水井的家庭粪坑作了密封防漏处理,而且附近的垃圾沟渠也采取了此类措施,为的是确保公用水源的清洁可靠,而在其他没有水井或不接近水源的地方所修建

① Hans Planitz, *Die deutsche Stadt im Mittelalter*, VWA-Verlag, Wiesbaden, 1997, S.209.

② Gottfried Zirnstein, *Ökologie und Umwelt in der Geschichte*, Petropolis-Verlag, Marburg, 1991, S.52—53.

③ Stephan Schmal, *Umweltgeschichte.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C.C. Buchners Verlag, Bamberg, 2001, S.33—34.

④ Gottfried Zirnstein, *Ökologie und Umwelt in der Geschichte*, Metropolis Verlag, Marburg, 1994, S.52.

的垃圾清理设施,就没有采取密封防漏措施<sup>①</sup>。在吕贝克(Lübeck),许多屠宰场附近也有水井,为不污染这些水井,污水处理更是采取了直接引入瓦克尼茨河的办法<sup>②</sup>。所以,无论是为了方便省事,还是为了经济节约,甚至敷衍马虎,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减轻水资源污染或垃圾污染对人们身体健康的损害。但无论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科技发展水平下,环境污染问题不会也不可能得到根治,人们只能应付眼前的生存,无暇顾及未来的发展。所以,虽有效地治理了水污染和垃圾污染,但却付出了居住区环境受损和城市周边地区河流湖泊遭受

污染的代价,造成一个大环境或者说外部环境的严重破坏,其后果就是瘟疫疾病的流行和自然灾害的频仍发生。无论如何,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中世纪,人们无法厘清人、自然、社会、技术以及环境之间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对于已发生的疾病灾难,人们也只能沿用自古以来口口相传的“瘴气说”(Miasma-Theorie),把一切疾病的流行都归咎为人们所呼吸的空气遭受污染所致,这也许正是水污染和垃圾污染没引起高度重视和得到彻底根治的原因<sup>③</sup>。

---

① Helmut Häger, *Einführung in die Umweltgeschichte*,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 1994, S.35.

② Bernd Herrmann, *Umwelt in der Geschichte*, Vandenhoeck & Ruprecht, Göttingen, 1989, S.25.

③ Bernd Herrmann, *Mensch und Umwelt im Mittelalter*,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 1986, S.158.



# 动物资本与垃圾动物：纪录片的救赎与希望

◎张嘉如文 肖湘平译 方红校

**[摘要]**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动物被视为有价值的资本或者无用的废物,那么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电影媒介在发挥政治介入功能时,如何将动物从“生产—消费—再循环”的资本主义怪圈里解放出来?本文先以尼可·舒肯的“动物资本”这一概念来解释动物与资本主义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以及二者与电影之间的进一步关系。由于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中和在资本主义的电影业中都对动物进行了广泛的利用,用“救赎”这个概念来讨论纪录片(尤其是数字纪录片)在拯救电影媒介(作为物质化的资本主义和剥削动物身体的帮凶)中的作用也就是合适的。本文从舒肯的“动物资本”到作者提出的“垃圾动物”来探讨动物保护行动以及在纪录片里如何展示这些行为的电影修辞方式。通过梳理研究当代纪录片里的动物资本和垃圾动物,本文对动物保护行动主义者较为积极正面的希望话语和使用的修辞方式予以了特别的关注。

**[关键词]**资本主义;动物资本;垃圾动物;动物保护;纪录片;生态批评

## 一、前言

王久良的电影《垃圾围城》(2013年)一开场就让观众陷入一种道德震惊:在北京周边不为观众所知的一个个垃圾堆旁,羊群吃着垃圾,它们的“牧羊人”也在一旁帮着它们戳开塑料袋以及泡沫塑料箱。这些羊群饥不择食地咀嚼着它们能找到的一切东西,包括生菜残梗,鸡蛋壳等残余物。更让人震惊的是它们咀嚼塑料袋的场景。羊群狂吃垃圾的骇人场面,重新唤起克里斯·乔登(Chris Jordan)在太平洋中途岛拍摄的信天翁体内的塑料残骸。这些促使我们必须认真检视简·本内特(Jane Bennett)关于“模糊的代理者”的论述,因为消费者很多无心的行为,如丢弃像塑料袋一样无足轻重的东西,可能对动物以及我们自己脆弱的生态系统都有巨大的影

响,因此更凸显出当前人类纪中人类对动物的道德责任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动物都被卷入以市场为导向的意识形态以及当今失控的现代化浪潮中。这一事实反驳了约翰·伯格(John Berger)的动物在现代社会中销声匿迹的宣言,而证实了兰波(Arthur Rimbaud)的“动物在未来的人类社会中无所不在”<sup>①</sup>的预言。

在资本主义体系(不管是体制化的、半体制化的、非体制化还是非法的,如生物医药行业,大型跨国肉类养殖与屠宰场,非法动物买卖和贸易等)下,动物被视为有价值的资本或者无用的废物。动物与垃圾渊源甚早。15世纪初西方的“垃圾”(garbage)一词已经揭示出动物与垃圾这一概念的渊源:英文

[作者简介]张嘉如(Chia-ju Chang),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现代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译者简介]肖湘平,南京大学英美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93)。

[校者简介]方红,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93)。

①C. Philo and C. Wilbert, *Animal Spaces, Beastly Places: New Geographics of Human-animal Relations*,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0, p. 3.

里的garbage指的是食物动物不被人类食用而被丢弃的部分,如内脏。由此,我们可以延伸出一个与动物直接相关联的“垃圾”论述,即我称之为“动物垃圾”或“垃圾动物”来将垃圾论述与动物论述联结起来。此“垃圾动物”论述与尼可·舒肯(Nicole Shukin)的“动物资本”论述有一个对话的空间,或者作为一个互补<sup>①</sup>。所以,本文先以尼可·舒肯的“动物资本”这一概念来帮助理解资本主义与动物是如何层层交集在一起的,并申论资本主义、动物与电影工业三者之间的纠缠关系。由于资本主义和电影工业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多半牵涉到广泛的动物回收利用(无法再利用的即为“动物垃圾”),“救赎”这一概念自然而然地适用于思考纪录片(尤其是数字电影)在救赎电影此媒体中扮演的角色。这里的“救赎”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指的是如何将动物从资本主义循环中解放出来,还原其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而不是将其视为物化的动物资本或动物垃圾;第二层是指纪录片和数字媒体如何为电影工业提供一个更宽广、不局限在影片内容和主题中来思考“动物救赎”的可能性。

我由舒肯的“动物资本”转向“垃圾动物”来探讨动物保护纪录片里的动物保护行动与影视修辞策略。在通过纪录片追溯“动物资本”和“垃圾动物”在当代社会的情形时,我尤其关注动物保护主义者所运用的“希望”(hope)话语和策略。动物保护纪录片中常常充斥着忧郁基调,无意中扼杀了拯救和改变现状的可能性话语。因此,我们有必要呼吁使用一种正面的、积极的叙事策略<sup>②</sup>,并且电影媒体或可视化技术在建构“希望”话语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若罗布·尼克松(Rob Nixon)呼吁用创造

性的策略来展示慢暴力,那么我们下一步要考虑的是:在揭露残暴的资本主义技术与体制对动物无形或隐藏的结构暴力与慢暴力后,电影制作者如何让观众不陷入沮丧、抑郁、“同情疲劳”甚至无感的情绪氛围中,而是让观众心生温暖、希望、对种族间的关爱以及对未来万物平等乌托邦实现的乐观。

电影的救赎力量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这里所使用的救赎概念并非资本主义式的救赎,如以环保、可持续的再生能力为名义的提炼与加工工业,将多余无用的动物部分继续转化为可利用的材料。恰恰相反,我认为,电影尤其是行动式的纪录片,是一个有力的调查和观察工具,具有解放动物的能力。纪录片的涉入可以让电影打破生物资本主义(bio-capitalism)吞噬动物血肉的恶性循环。“动物保护行动主义模式”的纪录片不仅能够揭示动物苦难和不公的原因,也可以展示所有生物——不论其有无生命——都享有的尊严、活力和情感。

## 二、理论探讨:错综纠缠的动物资本、垃圾和电影媒体工业以及希望/救赎论述

电影能让我们看到在其到来之前,我们没有预见到,甚至也许无法预见到的东西……通过电影来努力体验这个世界,我们确实将世界从休眠状态和虚拟的不存在状态中救赎出来……电影可以被视为一种尤其是用来促进对物质现实的复原的媒介。<sup>③</sup>

作为一种涉入的媒体工具,电影有着不容忽视的行动力,因为它具有改变观众观影感受和行动的作用。库纳·沃赫拉(Kunal Vohra)的《塑料奶牛》(印度,2012)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塑料奶牛》是一部

①关于“垃圾动物”论述的阐述,参见 Chia-ju Chang, “Wasted Humans and Garbage Animals: Deadly Transcorporeality and Documentary Activism,” in Rayson Alex and Susan Deborah, eds., *Ecodocumentaries: Critical Essays*,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119—138.

②K. Ball and M. Haynes, “Introducing the ‘Global Animal’: An Insomniac’s Recourse in the Anthropocene,” *ESC*, vol.39, no. 1, 2013, pp.1—26.

③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电影的本性:物质现实的复原》,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

时长 37 分钟,关于塑料污染及其对在印度被尊为圣物的奶牛具有毁灭性影响的纪录片。电影缓慢地叙述开来,直至高潮动手术部分:一头中等大小、独角奶牛的瘤胃被剖开,展示出它体内隐藏的慢暴力证据——53 公斤混杂在一起的未被消化的东西,其中有塑料袋、气球、皮革制品。所有这些物质都会导致动物们缓慢而痛苦地死去。看完这部电影后,观众再也不愿以这种方式来观看印度的奶牛(延伸开来,应该是所有吞噬垃圾的动物)。通过这部影片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这一问题的规模之大:每一头奶牛都在吃塑料垃圾,并且每头奶牛瘤胃内携带的垃圾量可能相当于一位成年女性的体重。不管是中途岛被塑料填满的信天翁尸体、北京的垃圾羊、山东荣成天鹅湖的垃圾天鹅,还是印度的塑料奶牛以及其他吞噬垃圾的动物,它们都只是动物肉体深陷于失控的垃圾海洋中的部分例子。

如上述指出,英文里的“垃圾”(garbage)一词与动物息息相关(原来指的是被丢弃的动物内脏),在资本主义系统中可以指涉动物的负剩余价值,这种价值不再有任何用处,回收系统内进行再利用也可能是有害的,所以需要被清除<sup>①</sup>。这些动物垃圾就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所说的“法律之外的存在”,或是保罗·谢泼德(Paul Shepard)所说的“边缘动物”。它们也是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d Bauman)所说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人

类垃圾”或“无用的人类”的动物版本。鲍曼写道:“这些人是‘多余的’,不能或没人希望他们被认出来,被允许生存下去。”<sup>②</sup>“垃圾动物”这一概念也揭示了一个正浮出水面的全球现象,向我们讲述了当代动物是如何在全球市场中既陷入全球资本主义圈子,又陷入一个废弃的体系以及废弃的基础设施中。更深入来看,垃圾动物现象揭示了一个与现在的经济体系息息相关的更大、更本质的问题。在现在的经济体系中,正如卡里·沃尔夫(Cary Wolfe)、尼可·舒肯、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等人的作品所揭示的一样,动物的肉体通过不同的控制形式,已经与其他物质混杂在一起了。这反过来又呼应了罗西·布拉伊多蒂的观点,即“当代的资本主义是‘生物政治化’的,因为它意图控制所有的生物”<sup>③</sup>。

布拉伊多蒂的观点与舒肯的“动物资本”相对应。舒肯的“动物资本”讲的是,在动物(被用来充当原材料)进入一个封闭式的物质交换圈(“生产—消费—循环”)后,动物在此圈内永无止尽地被“回收”为资本,重新进行生产<sup>④</sup>。为了警告人们关于回收动物逻辑的危险性,舒肯写道:“起初围绕动物提炼与加工工业而发展起来的回收逻辑,可能是以一种提倡物质使用效率和废物回收的生态伦理观来完善过度生产与过度的商品消费,但是这种伦理观却暗中巩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可持续性。”<sup>⑤</sup>(也就是她

①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也使用了“垃圾动物”这一术语,目的是使动物和垃圾之间的内部联系概念化,并且也讨论了库纳·沃赫拉的电影《塑料奶牛》。参见 Chia-ju Chang, “Wasted Humans and Garbage Animals: Deadly Transcorporeality and Documentary Activism,” in Rayson Alex and Susan Deborah, eds., *Ecodocumentaries: Critical Essays*,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119—138. 垃圾动物(garbage animal)与“trash animal”的含义是不同的,后者让人想起固体废弃物,并且与中文中的“垃圾”含义更相近。垃圾动物(garbage animal)的一个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工业捕鱼业中用网捕捞上来的副渔获物,这些“生物都被作为没有生命的垃圾(garbage)再次扔回海洋中”(参见 Alaimo, “Oceanic Origins, Plastic Activism, and New Materialism at Sea,” *Material Ecocriticism*, pp. 186—203, 203, 186.)。鲨鱼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它们的鳍被砍去后,就被当作垃圾扔回海洋,随后缓慢地死去。

②Z. Bauman, *Wasted Lives: Modernity and Its Outcast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p.5.

③R.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Polity, 2013, p.95.

④N. Shukin, *Animal Capitals: Rendering Life in Biopolitical Tim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71.

⑤N. Shukin, *Animal Capitals: Rendering Life in Biopolitical Tim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70.

所称之为“资本主义式的救赎”)舒肯引用马丁·奥康纳(Martin O'Conner)的话补充道,对于资本家来说,“生产条件的复制不仅是对利益与积累的威胁,也对社会和自然环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生活本身的可行性构成了威胁”<sup>①</sup>。尽管舒肯认为,“动物提炼与加工工业的经济和文化逻辑无非超越动物为滋生资本的生产力这样的逻辑”<sup>②</sup>,然而她仍然提供了抵抗的希望。她所说的“抵抗的希望”求助于自然的施动能力(agency),与简·本内特在物质生态批评中提出的具有干扰性的“活力物质”<sup>③</sup>这一观点相似。在物质生态批评中,本内特将“敌对的生命”(如疯牛病)看作是奥康纳所说的在一个密闭圈内爆发的“自然的抵抗”的例子。将“抵抗的希望”这一观点进行这样的理论化,能进一步阐明家畜的再生能力,或者是动物的代理能力。

电影(尤其是纪录片)可被看作是一种抵抗或逃避形式,因为它具有挑战主流消费意识,探索或者处理不同的偏离消费至上的意识形态路线。它也具有终结“生产—消费—回收”循环圈的潜能,进而解放动物。除还原消费者不愿面对的真相之外,摄影机的镜头帮助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回收”的循环圈。若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是一种救赎环境或物质现实的媒介,如他写道:“电影可以被视作一种复原的媒介,尤其是在促进复原物质现实面向。”那么在本文中,我将他的现实复原与救赎概念延伸到动物的现实、复原与救赎,进而探讨此电影、纪录片媒介如何为解放动物行动带来希望,实践一个众生平等的乌托邦。

然而,作为一个救赎的媒体,我们首先必须承认,电影曾一度是资本家屠杀动物的帮凶。唯物主义电影研究学者们指出了早期电影、动物和资本主义三者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可以说,电影媒体或

工业就是一种动物肉骨化、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工具。动物生理知识、解剖技术、电影视觉科技与资本主义生产管理的建立紧紧联结在一起。例如,舒肯就曾提到讲求效率的科学管理资本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 W. Taylor, 1856—1915)如何“拍摄了劳工在劳动时的身体移动,并且将其放大产生一系列短暂的静止片段,这使得隐藏在每一个微小动作中的无效动作清晰可见”<sup>④</sup>。“这其实就是去除无用的或是没有必要的操作,重新建立起一个系统化的微型流线形的劳动生产模式”<sup>⑤</sup>。此处提到的移除动物内脏、保留有用的部分跟电影剪辑有异曲同工之妙。世界各地的血汗工厂也是来源于这种泰勒主义,其目的是通过移除“无用的或是没有必要的操作,重新建立一个系统化的微型流线形工厂”<sup>⑥</sup>,以此来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减少以及去除多余的操作,与移除动物身体上没用的部分是如出一辙的。换句话说,泰勒的这种实验在欧洲的早期烹饪中就可以找到先例(正如“垃圾”这个词的词源学历史所暗示的那样)。舒肯总结道,垃圾(作为一种负剩余价值)“是时间—移动技术(time-motion technology)以及欧美资本合理化规则的产物,而不是一种早已存在的可永久使用的价值”。因此,“时间—移动”技术是资本家剥削人类劳动、而后又剥削动物躯体的同谋者(比如屠宰场的发展以及爱迪生用电刑杀死一头大象)。

除此“时间—移动”技术外,电影的物质性还依赖动物的身体。电影胶片的材料是明胶,一种通过煮熟动物(通常是牛或猪)的皮、骨头、软骨或是兽皮而获得的蛋白质。所以,在陈述电影如何救赎动物时,我们得先理解早期资本家如何运用电影媒体来学习模仿动物生理构造,进而更有效率地奴役屠杀动物。我们同时也必须理解传统胶片物质与动物

① N. Shukin, *Animal Capitals: Rendering Life in Biopolitical Tim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80.

② N. Shukin, *Animal Capitals: Rendering Life in Biopolitical Tim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86.

③ J.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④⑤⑥ N. Shukin, *Animal Capitals: Rendering Life in Biopolitical Tim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73.

的渊源。在这样的视角下,把电影当成一种救赎动物的媒体(如动物行动纪录片企图借由行动来揭发资本主义社会对动物的不为人知的暴力与屠杀),亦带有某种神圣的自我救赎意味。除了动物行动纪录片之外,当代的数字电影(相较于赛璐珞胶片电影而言)提供了另一种“自我救赎”的思考途径。由于数字电影并不需要动物成分,所以数字电影的出现一反传统赛璐珞胶片电影在生物资本主义政治里扮演的剥削动物的共犯角色,而不仅仅只是简单地充当一种揭示工具或呈现工具。

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将列举不同的动物群体——包括宠物和野生动物,并将其作为动物资本或是被回收的垃圾动物的例子,以此来探讨这些动物群体的生命、完整性和尊严是如何通过动物保护主义以及纪录片的干预得到救赎的。

### 三、动物保护纪录片及其救赎与希望案例分析

#### (一)宠物狗/宠物猫消费以及纪录片中的抗议:动物尊严

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创造出更多拥有高水平可用收入的资产阶级精英,宠物产业成为中国欣欣向荣的最新产业之一。据欧睿国际的报道,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宠物市场,拥有 2700 万只宠物狗以及 1100 万只宠物猫<sup>①</sup>。然而在不断繁荣的宠物文化中,日益增长的动物数量可能促使人们以节日庆祝传统和当地风俗习惯的名义将吃狗肉这一行为商业化。在中国,吃狗肉这一风俗可以追溯到汉朝,随后又历经几番衰落与兴盛,最近吃狗肉又成为一种节日(据新浪新闻)。例如,在 2009 年开始的一年一度为期 10 天的玉林狗肉节期间,大约有一万到一万五千只狗被吃,并且这其中大多数的狗是偷来的家养狗/宠物狗,或是从小区以及山村走失的流浪狗,而不是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来自于专

门养狗的农场,因为事实上,养狗供人们消费并不是一件高收益的工作(据亚洲动物基金会的调查)。故事片《卡拉是条狗》(2000 年)反映了现代北京社会中人与动物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涉及盗狗、城市中的狗肉黑市以及狗很容易受到伤害这一系列问题。

被盗的流浪动物和宠物是宠物产业以及宠物文化的副产品,并且也是供应猫和狗的市场以及餐馆最便宜的货源。这让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回收圈中的一个例子:流浪动物(即资本家所说的“负剩余价值动物”,也就是走失、被抛弃、野生的动物,正是偏离了城市中的资本主义生物政治轨道的那些动物)和宠物(它们在后工业或后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可能成为家庭中的成员)作为动物资本被回收到资本主义肉食市场经济中,变成菜肴或是火腿,它们的皮毛经过加工也被用来交易。在这个封闭的资本主义经济圈中,动物的每一部分都得到充分的利用,任何的浪费行为都被小心地避免了。

众所周知的玉林狗肉节让吃狗臭名昭著,与之相比,中国人吃猫在国内外还未被熟知。在中国,盗猫以及非法贩卖猫已有 20 余年的历史,并且这条贸易网传播到了 15 个省份,涵盖了吃猫产业的方方面面,包括盗猫、输送、销售以及消费。也就是说,与吃猫有关的各个环节已经形成一条紧密联系的产业链。在一次采访中,艾未未谈到了这条猫交易链,他说道:

我们希望将猫的非非法贸易的方方面面都拍摄出来,比如猫为什么需要被保护,如何保护它们,盗猫者是一群什么样的人,猫是如何被虐待的,猫交易中的链生产(即运输路线)是什么样的,人们又是如何处理猫皮的,吃猫肉的餐馆长什么样子,贩卖猫的人对吃猫的态度如何,还有动物保护法所面临的各种困难等

<sup>①</sup> C. Larson, "China's Skyrocketing (Pet) Population," 22 August, 2014,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4-08-21/chinas-skyrocketing-pet-population>, Accessed 27 June, 2016.

方面。<sup>①</sup>

纪录片《三花》正好揭示了国内的这种贩猫产业链。郭克在收到一位动物权益保护者的电话后,开始调查这种地下生产链以及动物权益保护者的活动。在电话中,这位动物权益保护者请求郭克陪同他们一起去解救一群面临伏击危险的大猩猩,以及在一个高速公路收费站被劫持的两卡车被困在小笼子里的400只猫。这些猫正被运往广东,随后会被卖给那里出售猫肉的餐馆。在《三花》这部电影中,郭克展示了他这次经历的多个方面,好让观众对贩猫产业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其中包括猫保护者与警察之间的矛盾,他们与善良、热心、致力于保护猫的“猫阿姨们”之间的谈话,餐馆工作人员以及消费者对杀猫、煮猫和吃猫的态度与看法。

《三花》与《卡拉是条狗》有很多不同之处。这部未经删节的纪录片围绕吃猫这一行为的伦理、残忍与安全,提出了许多重大的政治与文化问题。同时,它也让人思考如何更好地展示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现象。为了平衡杀猫以及虐待猫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导演并没有过分刻画那些暴力场面,因为他要拯救的不仅仅是动物的生命,还有它们作为万物生灵的尊严。电影的后面部分讲吃猫以及猫交易链中猫受到的耻辱和人们对它们的残忍行为,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影片的开头(关于艾未未工作室的一只名为“三花”的猫)突出了救赎这一主题,即动物的个体性、美丽以及尊严。“三花”在影片中有三层含义:一是指影片中猫的名字;二是指一种毛有三种不同颜色的猫;三是指动物皮毛交易中一种毛的名称。电影开篇描述猫在户外活动的场景,并且通

过一系列慢动作以及特写镜头让观众领略到动物的尊严、优雅以及美丽。赋予动物尊严,善于发现它们的美丽和优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体现了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所拥有的尊严、美丽以及优雅。兰迪·马拉默德(Randy Malamud)指出:“为了保护人类自己的尊严,让人类成为生存在地球上的好公民,我们需要重视所有和人类平等拥有整体性、重要性以及精神的动物们的尊严。”<sup>②</sup>

和《卡拉是条狗》一样,《三花》揭露的也只是地下猫狗贸易以及猫狗偷窃现象中的冰山一角,并提出动物权/生存,吃猫/狗行为的正当性和跨国动物伦理等一系列问题。《三花》这部电影拯救动物的方式之一就是:在它们经历了非人道的折磨之后,重新赋予它们尊严,并且呼吁人们尊重所有生物。此类跨物种关怀、动物尊严和尊重主题,正是目前处于经济繁荣鼎盛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需要正视与培养的。

(二)中国熊的跨国纪录片:打破动物贸易生产链的希望所在

受到传统中医里普遍存在的图腾信仰的影响,人们获取熊体内的胆汁以及熊掌等身体部位已经有2000余年的历史了<sup>③</sup>。东亚国家,比如中国、越南、韩国、老挝等,一直以来都在捕杀或是养熊,包括棕熊以及亚洲黑熊(又称月亮熊),以此来获取它们体内的胆汁。作为一种动物资本,熊身上的胆囊、爪子以及他们的幼崽都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据说胆汁能治疗“绦虫、儿童营养不良、宿醉、感冒甚至是癌症”<sup>④</sup>。由于过度繁殖熊,熊胆汁如今甚至可以在中国生产的润喉片、洗发水、牙膏、酒以及茶叶中找到。

① W. Ai, "Caifang Ai Weiwei zhi san (Ai Weiwei Interview III)," *Yangguan weishi jilupian*, 7 August, 2012, [http://loveaiww.blogspot.tw/2011/09/blog-post\\_7340.html](http://loveaiww.blogspot.tw/2011/09/blog-post_7340.html), Accessed 15 March, 2016 (Chinese).

② K. Nagy and P. D. II. Johnson, eds., *Trash Animals: How We Live with Nature's Filthy, Feral, Invasive and Unwanted Spec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3 (Digital version).

③ 在由班康德(Dan Bensky)、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托德·凯普查克(Ted Kaptchuk)编写的《中药学》这本书中,熊的胆汁被列为是治疗外伤、扭伤、骨折、痔疮、结膜炎、严重的肝炎、高烧、抽搐以及精神错乱的药物。

④ B. Kavoussi, "Asian Bear Bile Remedies: Traditional Medicine or Barbarism?" *Science-Based Medicine Website*, 2011, <https://www.sciencebasedmedicine.org/asian-bear-bile-remedies-barbarism-or-medicine/>, Accessed 28 June, 2016.

为了从活着的熊体内提取胆汁而将熊从小养到大,这一做法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朝鲜。中国政府也采取这一措施来防止人们为了获取熊胆而捕杀野生熊。然而这个合法的、制度化的措施并没有阻止人们捕杀野生熊来获取熊胆,反而导致熊胆的商业需求以及器官贸易的激增。熊胆需求的增长同时也与中医药的全球化有关,很多这样的中药药材现在在世界各地的亚洲药店里都能买到。从这一方面来看,人们对熊的消费与吃猫、吃狗是不同的,因为人们对熊的消费以及与此相关的保护行为都是跨国的。在一次采访中,导演们透露熊养殖是一个暴利行业,并且有非常成熟的生产链。一些养殖场会养母熊,专门用来配种和生育幼崽,幼崽长到三四岁的时候,养殖人员就会从它们体内提取胆汁。熊身上的任何一部分都会被充分利用起来,以熊胆汁为原料做成的各种产品也会被输送到海外,尤其是越南。在过去的4年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更让人担忧的问题,那就是熊养殖场假借合法的名义,从事非法的器官贸易,而且他们交易的不仅仅只是熊的胆汁,还有毛皮、熊掌以及体内的脂肪。熊肉的价格是每公斤60元,而一只熊掌的价格就超过1万元人民币,熊身上其他的部分,如脂肪和骨头,则被当作了食物<sup>①</sup>。

英国的谢罗便臣(Jill Robinson)女士是投身于熊保护事业最突出的一员,她是亚洲动物基金会的创始人兼行政总监。这个组织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将熊从熊养殖场中解救出来,根除养熊取胆的做法,提高中国以及越南的动物的生存环境。在2000年,谢罗便臣女士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为从熊胆汁交易产业中解救出来的熊建立一个保护区。这是中国政府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签署的第一个相关的协议。《月亮熊:通往自由的旅程》这部电影的部分片段就讲述了罗宾逊如何参与中国的救熊事业的感人故

事,并且这一经历对她的人生意义重大。在电影中,她提到自己与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母熊的亲密接触,这一经历促使她作出了改变人生的决定。

因为不仅只有在中国才拍摄有关熊的纪录片,所以此类纪录片颠覆了电影与国家紧密相联的观念。在本文中,我认为有关熊养殖产业以及中国和越南保护熊的行为纪录片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跨国纪录片。它们促使我们从世界范围内考虑动物或环境问题,并且将虐待动物现象看作是一种全球问题,而不是一种地方性的、只需要当地的保护主义者或是电影制作者来努力解决的问题。

目前已有几部关于熊养殖以及动物保护主义者拯救动物的纪录片,大多由亚洲动物基金会拍摄或资助拍摄,其中有《月亮熊》(2012)、《月亮熊:通往自由的旅程》(2014)、《耻辱的笼子》(澳大利亚,2012)以及《地球上的月亮熊》(意大利,2016),除这些纪录片之外,社交媒体上还有不计其数的相关视频。《月亮熊》被认为是美国纪录片《血色海湾》的中国版本,由三名中国记者执导,揭露了中国的养熊取胆产业以及器官贸易。这些熊胸前有一片呈月牙形的毛,因而被称为“月亮熊”或“白凤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月亮熊列为易危物种,并且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它们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耻辱的笼子》直接讲述了从山东一个熊养殖场解救出来的10只熊的故事。该片的导演是澳大利亚的马丁·基尼斯(Martin Guinness),拍摄组的相关人员跟随解救人员一路来到山东的一个熊养殖场,将10只熊解救出来,然后运送到四川成都的保护基地。《地球上的月亮熊》是由两位独立的意大利电影制片人与亚洲动物基金会共同执导的一个志愿项目。这部短影片讲述了位于越南首都河内之外的塔姆陶熊保护区(或越南熊救援中心),以及熊被解救后恢复正常生活的过程。

<sup>①</sup> Xiaohu Huang, "Yueliang Xiong," Di'er rensheng (The Second Life), 15 July, 2015, <http://www.rensheng2.com/220000/218800.shtml>.

不像大多数动物保护主义者或宣扬动物保护的纪录片,制作拯救熊的视频的动物保护主义者所采取的策略并不是借助动物受折磨的可怕场景,将它们的死亡以及痛苦扩大为人们对工业生产链上的动物的盲目崇拜的一部分,以此来动员人们采取行动<sup>①</sup>。乔纳森·伯特(Jonathan Burt)谴责这种利用动物苦难的行为,正如在剪辑过程中,剪辑者倾向于选择很血腥、可怕的场面,借此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获得政治关注。他认为,这种行为与商业电影所采用的策略并无两样:“借助虐待场面是将二者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方面:这将各种虐待行为的复杂性简化为其对动物躯体的影响,使电影呈现出将多种让人震惊的画面混合在一起的蒙太奇效果。”<sup>②</sup>伯特赞同简·贾尔斯(Jane Giles)的观点,即动物被折磨、杀害的场景“成为了饥渴的虐待狂们的一个替代品”<sup>③</sup>。伯特还提出了屠宰场的美学以及距离观点。他写道:“寥寥无几的电影会真正探索这些启发人的虐待场面与文化中的其他方面之间的联系,相反,大多数的电影更倾向于强调它们之间的距离。”<sup>④</sup>伯特认为,用一种隐晦的、有距离感的眼光来看待虐待动物的行为,不仅不能为观众提供完整的背景,而且还趋向于美化暴力。我赞同他的这一观点。事实上,我认为这种分离感或距离感可能是由人们本能地避免探索二者之间的联系,以此来保护自己免受创伤的这一心理机制造成的。毕竟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很容易对其他动物的痛苦产生同情。

我认为,亚洲动物基金会执导的这一系列关于拯救熊的纪录片所采取的有效策略之一,就是从对暴力的极力渲染(也就是屠杀场面)转变为对更让人振奋的场景的描绘(如拯救、治疗动物、动物康复

以及动物们的健康和快乐等场景)。这类“重建叙事”有修复的功能,能让人类更接近其虐待过的动物,从残忍中,也就是科拉·戴蒙德(Cora Diamond)所说的“人类在展现自己力量时的残酷和无情”<sup>⑤</sup>中唤出人道。

伯特说出了重要的一点,即电影应当探索电影中人类对动物的虐待与文化中的其他方面之间的联系。将暴力场景放在一个合适的文化背景下,可以避免他称之为“屠宰场美学”<sup>⑥</sup>这样一种虐待狂消费心理。值得一提的还有那些不那么容易引起轰动的场景,如《塑料奶牛》中的尸体解剖以及《耻辱的笼子》中的急救手术,这两个场景都不在伯特对动物福利或是权利类电影以及自然电影的批评范围之内,因为它们不同于传统的渲染虐待动物场面的电影(使用蒙太奇手法将所有有关虐待动物的最让人毛骨悚然的场面浓缩在一起)。与善待动物组织录制的视频不同,这些虐待动物的场景并没有让人震惊到立即产生道德上的愤怒之情。它们也没有使用形式上的技巧(如慢动作、特写、定时拍摄、调整摄像机角度等)将某些片段从原来的情境中删除,以降低电影的真实性。例如,在尸体解剖或是急救手术这两个场景中,兽医将“犯罪证据”(塑料袋,《塑料奶牛》中牛体内的皮革,《耻辱的笼子》中的金属物品)展现到摄像机前,作为人类残忍的证词。《月亮熊》是一部很重要的纪录片,因为它给那些受熊胆汁产业宣传的误导而认为养熊取胆行为是人道的人,展示了这个产业内部的真正面目。

《耻辱的笼子》这部电影借助框架中有框架,或是观众中有观众这一策略建立起一种暴力与忧虑共存的情境。例如,在去成都的熊救援中心的路上,

① J. Burt, *Animals in Fil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2.

② J. Burt, *Animals in Fil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2, p.172.

③ J. Burt, *Animals in Fil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2, p.174.

④ J. Burt, *Animals in Fil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2, p.175.

⑤ C. Diamond, "Injustice and Animals," in *Medicine and Bioethics*, eds., *Slow Cures and Bad Philosophers: Essays on Wittgenstein*, Carl Elliot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18—148.

⑥ J. Burt, *Animals in Fil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2, p.174.



突然有一只熊病得很厉害,需要立即做手术。于是救援队在一个小镇停留下来,获得当地一家医院的帮助。医生就在卡车内给那只熊做手术,当地居民围在旁边好奇地观望着。导演吉尔·罗宾逊在影片中提供了详细的解释,让村民以及摄像镜头与手术的进度保持一致,并且还阐述了胆汁消费行为的残酷后果,这使得电影中村民们看到的东西和我们作为这部纪录片的观众在电影框架之外所看和学到的东西并无两样。

从这一点来看,记录人们为拯救动物所付出的努力及其过程的这类纪录片,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考希望的途径。并且,将希望概念化的一种方法就是揭露被隐藏的罪行。本文讨论的多部纪录片在揭露动物工业的残酷方面至关重要,无论是有关动物偷盗、动物贸易链,还是养熊取胆产业。《月亮熊:通往自由的旅程》这部影片甚至让观众燃起了彻底关闭中国的熊养殖场的希望,他们认为这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因为电影中有很多熊被成功解救出来的例子。事实上,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见证了人们,甚至是中医以及熊养殖者,对养熊这一行为的态度转变。

(三)历史的讽刺以及深时生物(deep time)救赎:洪淳修的《删海经》

到目前为止,本文大部分的讨论都集中在动物资本——捕获动物的躯体,用他们的内脏以及体液来获取利益——的救赎以及电影在动物保护主义

者们拯救动物行动中的作用两个方面。在接下来的这部分内容中,我将借助动物资本的最后一个例子——鲨——来讨论另一种救赎方式。

在西方国家,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鲨就成为了一种“有名的”物种,因为科学家在它们的蓝色血液中(血蓝蛋白携带铜元素,遇氧使血液变成蓝色)发现了一种强有力的保护剂,该物质能检测到微小的细菌<sup>①</sup>。作为一种“动物资本”以及生物医疗行业所使用的“原始抗生素”,鲨的血液被大规模提取,并且已经发展成一个获利数百万美元的产业。就这样,鲨陷入了一个无止境的循环圈中。它们首先被从海中捕捞上来,随后被带回实验室提取出体内1/3的血液,最后重新被扔回到海洋中去。捕捞鲨以获取其体内的血液这一活动,使鲨的数量不断减少,因此也危害到了沿海的生态系统<sup>②</sup>。

鲨在金门的生存情况有所不同。中华鲨,也称为三脊柱鲨,是亚洲特有的一种鲨,它们曾经大量生存在台湾海峡沿岸地区,但是由于过度捕捞、土地开垦以及水污染,目前它们的数量极为稀少,在台湾海峡的东部已经绝迹,只有少数还生活在金门的泥滩中<sup>③</sup>。在金门,保护中华鲨不仅仅是一项生物工程,更是一个社会经济以及政治问题<sup>④</sup>。

洪淳修的《删海经》是一部关于金门后丰水头港的建设的纪录片。由于政治决策上的失误,金门中华鲨的保护以及渔民们的日常生活深受其与中国大陆不断变化的政治关系的影响<sup>⑤</sup>。该片主要讲

① A. C. Madrigal, "The Blood Harvest," *The Atlantic*, 26 February, 2014, <http://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4/02/the-blood-harvest/284078/>, Accessed 27 June, 2016.

② S. Olson, "As Horseshoe Crab Populations Steadily Decrease, Their Indispensable Medical Use Is Threatened," *Medical Daily Website*, 2014, <http://www.medicaldaily.com/horseshoe-crab-populations-steadily-decrease-their-indispensable-medical-use-threatened-280728>, Accessed 25 June, 2016; L. J. Niles, et al., "Effects of Horseshoe Crab Harvest in Delaware Bay on Red Knots: Are Harvest Restrictions Working?" *BioScience*, vol.59, no.2, 2009, pp.153-164, <http://bioscience.oxfordjournals.org/content/59/2/153.full>, Accessed 27 June, 2016; J. Berkson and Jr. C. N. Shuster, "The horseshoe crab: the battle for a true multiple-use resource," *Fisheries*, vol.24, 1999, pp.6-10.

③④ C. Chen, et al., "Conservation of the horseshoe crab at Kinmen, Taiwan: strategies and practices,"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 vol.13, 2004, pp.1889-1904.

⑤ Y. Xie, "Kinmen hou yu xiandai ren de yuyan (Modern Parable of Kinmen Horseshoe Crab and People)," *MovieGoer: Anthropology. Arts. Activism Website*, 2014, <http://cinematic-note.blogspot.tw/2014/04/blog-post.html>, Accessed 23 June, 2016.

述后丰港渔民的生活,尤其是洪氏家族。据说洪氏家族是明朝大将郑成功的手下洪许帆的后代。这部纪录片的中文名称《删海经》,让人立即想起中国经典名著《山海经》。导演巧妙地将“山”换成了“删”,这一双关语暗示了这部纪录片主要讲述“删海经”(即沿海居住地、渔业社区以及鱼的种类)的故事,与后丰港即将被建设成一个商业港口,给当地的渔民以及沿海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影响,形成强烈对比。

结合金门近来的军事情形,不难看出历史与中华鲎开了一个玩笑。在成为野生动物天堂的朝鲜非军事区里,中华鲎在军事法律的保护下繁衍了38年(1949—1987)。在近四十年无人干涉的状态下,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多。然而,由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恢复通信,如2001年生效的“小三通”政策,该政策促进了大陆与金门之间的直接往来,此时的台湾当局开始将鲎以及当地的渔村看作是金门经济发展(即将水头港建设成一个商业港口)的阻碍。对此,台湾导演林正盛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华鲎这种古老物种比恐龙还活得久,但是它们却活不过不到20年的小三通,这无非是莫大的讽刺。

毫无疑问,《删海经》是一部关于“浅层生态学”或者说人文生态学的纪录片,主要关注金门渔业社区的生存状况以及跨海峡经济发展下沿海的生态状况。在这部影片中,中华鲎只被看作是一种经济动物或动物资本(作为食物以及吸引游客),这与它们的同类在西方的命运并无两样(作为生物医疗药物)。然而,除了浅层保护论述之外,此纪录片也同时提出了简·本内特的“活力物质”的视角,而此视角正是该纪录片的救赎之处。该纪录片的“希望”话

语并不希冀于动物保护叙述,此点在对《月亮熊》这部影片的讨论中有涉及。相反,它希冀于将动物作为一种深时生物(deep-time creature)及其视觉再现。不可否认,古老的鲎带给我们丰富的文本和“物质想象”<sup>①</sup>。导演将鲎作为一种“物种与文化结合的叙事代理者”“物质想象的文本载体”或是“故事化的物质”(storied matter)。所谓“故事化的物质”,指的是由意义、性质以及生成的过程共同构成的一个网状物,而人类和非人类在此连结同构而成的物质生成中产生无法磨灭的指涉力量<sup>②</sup>。关于中华鲎在金门人以及台湾人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描述,可以作为这种故事化的物质的深度描述的一个例子。

很久以前,鲎就已经成为金门人以及台湾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让鲎更加融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比如,一些地方是以鲎来命名的,像鲎山或是鲎村,并且鲎的壳也被做成一种舀水的器皿。这个器皿就叫作鲎,而且即使人们不再用鲎的壳来做它时,它也仍然被叫作鲎。过去,人们将鲎的壳挂在门顶或是墙上来避邪,也有人将它们涂成老虎,脸则是中国京剧演员的脸。所以鲎与金门人以及台湾人的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陈等)。从上述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很久以前中华鲎就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与其产生了“可以看作是‘故事’的意义与话语的一系列组合”<sup>③</sup>。然而,中华鲎作为一种深时的、有四亿五千万年历史的活化石,它有自己的生活记录,就像普通的石头或其他物质一样。并且,它也具有人类世界之外的不同且丰富的文本性,有着超越人类历史之外的故事以及运行轨迹。

深受鲎及其历史与人类历史差异的吸引,导演

①该术语来自加斯顿·巴舍拉尔,后来被约维诺和奥珀曼引用。参见 S. Oppermann and S. Iovino, “Material Ecocriticism: Materiality, Agency and Models of Narrativity,” *Ecozon*, 2012, pp.75-91.

② S. Oppermann and S. Iovino, “Stories Come to Matter,” in S. Oppermann and S. Iovino, eds., *Material Ecocritic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17.

③ S. Oppermann and S. Iovino, “Stories Come to Matter,” in S. Oppermann and S. Iovino, eds., *Material Ecocritic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17.

在影片的几个片段中向观众展示了该动物的深时性。例如,在一个沙滩场景中,导演洪淳修在一台正在报道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参加后丰港开幕仪式的旧电视机上放了一只鲨。在这个片段里,这只古老的活化石在电视机屏幕上缓慢地爬行着,与屏幕里面的政治家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就好像两个来自不同的地质年代的物体在进行对话。通过动物形象,导演拍摄的这个片段授予了鲨一种动能,而不仅仅是将它表现为一种被政治家操纵的动物资本。为了将鲨当作一种活生生的生物进行拍摄,洪淳修采用了一种与鲨一致的拍摄形式,模仿它们的视野(将摄像机贴近地面,采用全景镜头)和速度。这种以鲨为中心的视觉技术与以人为中心的视角是对立的,并且前者的叙事与视觉/空间之间的距离创造了一种双视角,为观众思考“纪录片的希望”腾出了一点空间。

在西方的生物医学圈中,将动物看作是经济上有价值的物种,是主要的话语以及认知模式,而《删海经》这部纪录片提供了另外一种叙事模式,揭露了负剩余价值的问题。该影片有力地论证了鲨既被卷入到深度时间中,也被卷入到经常被称为“人类纪”的当今时代中。它们的命运与历史形势、历史的转变以及它们的物质合作代理能力紧密相联。

#### 四、结论

如果说生态电影就是“有生态意识的电影”——描写“以生态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视角下人类与外界环境、地球、自然以及动物的关系”<sup>①</sup>,那么,在现代的中国,在亚洲其他国家以及非洲国家里,这种以生态而不是人类为中心的视角应当强调环境以及动物正义伦理,从美学层面上对抗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的行为和观点。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动物倡导模式的纪录

片如何来对抗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电影或纪录片的动能何在?

在一次采访中,喜剧演员乔恩·斯图尔特(John Stewart)谈到了艺术的功能(即其嘲讽功能)。他说,真正带来实质性改变的是保护主义者们的行动,而不是艺术家。艺术家所能做到的就是用艺术的形式加以推波助澜。虽然斯图尔特的这个观点确实适用于提倡保护动物的这类纪录片中,但我深信这些影片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助力。我曾对一些非动物保护主义者关于提倡保护动物的这类纪录片过于说教、无聊、厌世/傲慢的评论持保留态度,但是我在写本篇文章期间所看的这些纪录片消除了这种疑虑。这些纪录片让人感动的地方不仅仅是它们给我们的启示:揭露人类对动物的残忍以引起观众道德上的愤慨;我同时也为影片中不断强调改变写实社会的可能性所感动。我第一次在观众以及批判性动物研究学者的双重身份下,觉得纪录片给一个动物解放、动物乌托邦社会带来了希望:在动物保护主义者坚持不懈的参与下,和养熊取胆同样残忍的动物产业在不久后的中国是有可能被彻底消灭的。

如果纪录片的救赎策略是将希望作为一种修辞策略,那么此修辞将是非常有感染力的,可以引起人的共鸣,因为它不会让观众产生负面忧郁和沮丧的情绪。我提到的这些影片都将动物保护行动看作是一种有希望的社会实践。它们表明纪录片媒体救赎动物的潜能,如德克·艾程(Dirk Eitzen)所说,纪录片之所以对动物保护主义者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在于其因果的真实性(consequential authenticity),也就是纪录片里呈现的暴力容易让观众付出行动。纪录片在揭露、还原现实之际,我们也应同时将此媒体的动能(为动物保护发言的科技)合法化。正如在王久良的《垃圾围城》以及库纳·沃赫拉的

<sup>①</sup>S. H. Lu and J. Mi, eds., *Chinese Ecocinema: In the Age of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2.

《塑料奶牛》中,纪录片及其美学和修辞借助一种视觉技术确立了此媒体的发言或代言地位:此视觉媒介改变了我们对塑料垃圾的看法,将无处不在的塑料制品以及全球动物两者之间看似毫不相关的关系,以及将塑料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断绝联结起来,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在美学呈现上,郭克导演的《三花》强调了动物的尊严,揭露了人们对动物躯体的残暴与侵犯;很多中国以及跨国的关于拯救熊的纪录片向我们展示了残忍的熊养殖产业,以及被解救的熊的康复过程。最后,洪淳修的《删海经》从深时角度向我们展示了历史的讽刺,人类的荒唐行为以及贪婪。所有这些纪录片,作为一种救赎形式,不仅是对这些“资本动物”以及“负剩余价值动物”(即垃圾动物)的解放,也是对电影媒介与工业本身的

救赎。救赎意味着解放与拯救,将曾经背叛、贩卖出去或放弃的东西重新赎回来,或者将曾经做错的事情加以矫正并确认不重蹈覆辙。电影借助它的调查、传播,揭露我们消费者不愿面对的真相等能力,可以作为一种强而有力的救赎动物的工具。作为一种行动美学的工具,纪录片真正的贡献就是:瓦解表面上看似和谐的技术资本主义怪圈背后所隐藏的暴力,并将之瓦解,进而实现一个跨物种生命体共存的乌托邦社会。

(在此要特别感谢方红教授的引介与帮助,以及肖湘平同学认真精心的翻译。没有她们二位,这篇文章无法成形。本文若有错误或不清楚的部分,由原作者我全权负责。)

附:动物保护纪录片目录表

时间	纪录片名称	导演	出品公司	国家或地区
2003	卡拉是条狗	路学长	华谊兄弟影业	中国
2010	三花	郭克	艾未未工作室	中国
2012	耻辱的笼子 (Cages of Shame)	马丁·基尼斯 (Martin Guinness)	基尼斯影业 (Guinness Entertainment)	澳大利亚
2012	塑料奶牛 (The Plastic Cow)	库纳·沃赫拉 (Kunal Vohra)	阿尔泰影业 (Altair Films)	
2012	月亮熊	熊军慧、涂俏和陈远忠		中国
2013	垃圾围城	王久良	伊卡洛斯影业	中国
2014	月亮熊:通往自由的旅程		亚洲动物基金会	中国
2014	删海经	洪淳修	浮世绘工作室	中国台湾
2016	地球上的月亮熊 (Moonbears on the Planet)	纳迪亚·扎内拉特 (Nadia Zanellato) 安德里亚·达迪 (Andrea Daddi)	亚洲动物基金会资助的志愿工程(volunteer project for Animals Asia)	越南

# 梭罗身份论

◎ 钟 燕

**[摘要]**梭罗最根本的两个身份是日记家与测量家,自然与自我的逢融合一是他的理想。本文将《梭罗1851年日记》与《瓦尔登湖》作比对阅读,试图以日记家与测量家的身份建构为切入点,探讨梭罗自然写作中“四季轮回”框架对人生哲学中“灰飞烟灭”主题的冲击与解构,并论析其测量实验中自然测量与精神测探之合盟。

**[关键词]**梭罗;生态批评;日记家;测量家

梭罗逝后,爱默生悼词的结束语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知识、有道德或是有美的存在,那儿就是他的家园。”<sup>①</sup>爱德华·艾比(Edward Abbey)似乎比爱默生更了解梭罗对大自然的钟爱,他改写道:“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鹿和鹰,有自由和危险,有荒野或是有一条流淌的河,那儿就是亨利·梭罗的永远的家园。”<sup>②</sup>水是梭罗的田园之梦。梭罗生前出版的两部著作《康科德与梅里麦克河上一周》(以下简称《河上一周》)和《瓦尔登湖》,都是水环境与文学想象相映互滋的产品。梭罗的生态创作影响了继他之后的美国生态文学作家缪尔、艾比、卡森等人;而以梭罗入住瓦尔登湖为象征的荒野寻归,则影响了美国文学研究的环境转向。谢尔曼·保罗(Sherman Paul)在他1958年的著作《美国湖滨:

梭罗的精神探索》中,用新批评的细读法把瓦尔登湖解读成梭罗的“变形记”(The Metamorphoses)或“复生的寓言”(a fable of the renewal of life)<sup>③</sup>,认为瓦尔登湖播下了美国艺术文化有机传统——他后来又称作“绿色传统”——的种子<sup>④</sup>。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在其1995年的著作《环境的想象》中,用一节的篇幅论述了绿色梭罗的经典化过程,又用整章的篇幅探讨了文学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范式,从而使梭罗在美国文学与文化构成中“湖边圣人”的形象在绿色批评的研究中站稳了脚跟。

在生态批评中,自然范畴里的时间与空间是环境研究不可忽视的两个维度;而对自然、社会和精神生态的发掘,对于研究泛舟水上、又如植物般向下扎根泥土、向上朝天空伸展<sup>⑤</sup>的梭罗来说,也不

**[作者简介]**钟燕,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外语系副教授,2012—2013学年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学者(北京 100083)。

① Joel Myerson, *Emerson and Thoreau: The Contemporary Review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430.

②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66.

③ Sherman Paul, *The Shores of America: Thoreau's Inward Explor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8, pp. 293—353.

④ Robert F. Sayre, "Introduction," Robert F. Sayre, ed., *New Essays on Wald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2.

⑤ 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5, p. 15.

可或缺。梭罗扎根在康科德,尤其钟情于康科德的瓦尔登湖。他是记录四季轮回的日记家,又是勘测峰谷湖洼的测量家。

### 一、日记家梭罗:康科德四季轮回的生态学

梭罗是日记家。自1837年10月22日写下第一篇日记,到1861年11月3日记下最后一篇,梭罗的日记情缘共延绵24载。他留下日记39本,约200万字。梭罗以日记传世。他缘水而作的《河上一周》和《瓦尔登湖》,都是日记“储蓄所”里的“零存整取”<sup>①</sup>。他的200万字日记记录了康科德的四季轮回,是“生活与文学的交集”<sup>②</sup>,自然与自我的汇融。

梭罗1817年出生,1837年从哈佛毕业。大文豪爱默生是建议梭罗写日记的人。1837年10月22日,爱默生问:“你现在在做什么呢?你写日记吗?”<sup>③</sup>于是那天梭罗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日记,一写就是24年,直到他病逝。从日记时长、数量和影响看,梭罗无疑可被称为是日记家。梭罗1862年5月6日辞世,他留下的最珍贵的私人遗产,是存放在一个箱子中的39本日记。1906年,波士顿的霍顿·米芙林出版社首次发行了《梭罗日记》全集,共14卷,200万字<sup>④</sup>。梭罗生前与死后发表的著作共20多部,几乎都编选自他的日记。其中,编选自1845年至1847年日记的《瓦尔登湖》影响最大,在1985年《美国遗产》杂志“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情的书”评选中名列第一,被誉为“超凡入圣”的书、“绿色经典”。与日记结缘的24载,梭罗在行走与记录中度过。对于日记家梭罗,观察自然是爱好,思考生命是目的,记录日记是手段。

1851年是梭罗自然观察经验与日记文学创作已臻成熟的一年,也是梭罗修正《瓦尔登湖》的一年。我们将《梭罗1851年日记》与《瓦尔登湖》作比对阅读,会发现梭罗自然写作中顺应自然的“四季轮回”框架。

作为自然写作日记作家,梭罗不光分日记事,尤其重视四季结构。自1851年开始,他的日记格外留意自然现象出现的时间和顺序<sup>⑤</sup>。日记里写道:2月9日,小河开了冻,又见麝鼠潜水捞蛤;2月13日,溪边有朵小花;3月27日,瓦尔登湖上的冰已化了2/3;5月10日,晚听到草地上有鹈鸟声;5月12日,听到金色林鸰和长刺歌雀的啼鸣;7月16日,青苹果长得与做菜用的尖头苹果一般大了;8月21日,伏牛花籽儿红了;9月6日,山上空气中飘着熟葡萄的甜香;10月5日,柳仍绿,但枫叶开始泛黄转红;10月30日,野苹果可以吃了,知更鸟成群结伴而飞;11月11日,怀特水塘秋叶落尽,准备过冬;12月10日(据12日记载),地上有雪,帮梭罗一起测量的爱尔兰人不肯像他一样席地而坐吃晚饭。1851年康科德的春花夏鸟、秋风冬雪,日记里一一记载无遗。为何要如此细微地关注时序、时频与四季结构?梭罗在1851年6月11日的日记里有自己的解释:“只有狩猎季节的满月和丰收季节的满月引人注目,而我认为每一次满月都值得关注并且具有其明显的个性……据我所知,还没有人观察过季节里的细微差别。两个夜晚也是不尽相同的。一本关于季节的书,每一页的内容都应该在相应的季节,到户外或相应的地区来写。”<sup>⑥</sup>1851年,梭罗延续1845年在瓦尔登湖畔小屋居住时就养成的习惯,每日下午与晚上

①赵白生:《生态理性的范本》,《梭罗日记》,朱子仪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序言第3页。

②Philippe Lejeune, in Popkin, Jeremy D. & Julie Rak, eds., *On Dia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9, p. 2.

③Odell Shepard, *The Heart of Thoreau's Journal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1, p. 2.

④Odell Shepard, *The Heart of Thoreau's Journal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1, p. VII.

⑤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30.

⑥Henry David Thoreau, *A Year in Thoreau's Journal 1851*,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3, p. 67.

在林间草地与溪边湖畔观察探测自然,上午在家潜心创作、书写日记。他的《1851年日记》是“身体与心灵协作”的产品,是一部康科德的四季书。

关于四季结构书写,梭罗熟悉借鉴的有17世纪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按日历框架记录的园林种植书《霍斯顿日历》和威廉·霍特(William Howitt)1831年出版的《四季之书:或自然的日历》<sup>①</sup>。正如梭罗所言,前人忽视了季节里的“细微差别”。梭罗日记在对自然细节的科学关注和四季生活的个人体悟上下功夫,超越了客观书写自然史的四季模式。他的《1851年日记》及生前所有未发表的日记和博物学笔记,在细节水准上都不输甚至超过了与他同时代的自然作家麦考克丝(F. A. Michaux)和达尔文的作品。在四季生活的观察实验与生态领悟上,他的《瓦尔登湖》开创了美国自然散文写作的巅峰,至今无人能及。

《瓦尔登湖》以春天开始,历经了夏、秋、冬,又以春天结束。四季轮回中,终点又是起点,生命开始复苏,至于永恒。从1845年3月末到瓦尔登湖边修建小木屋,到1845年7月4日入住,再到1847年9月6日离开,梭罗把两年多的日记事件浓缩在一年的林中生活里,让四季轮回的寓言绵亘永久。《瓦尔登湖》计划在1850年出版,最终正式出版于1854年。五年的时间里,梭罗七易其稿。在初稿中,梭罗并没有把季节变换当作全书的一个重要框架。尽管作为一个自然写作作家,他也强调说:“我期待着春天的信息。”<sup>②</sup>如梭罗1851年6月的日记所示,直到那时,他才开始正式考虑写“一本关于季节的书”,用一种“四季书”的框架——把季节轮回作为写作

主题的布局。1854年的发表版里,“种豆”的夏天,“贝克田庄”丰收的秋天,“冬天的禽兽”,“冬天的湖”和“春天”等章次表明,梭罗的物候学兴趣更浓了,他的季节书出版了。用弗莱(Northrop Frye)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来理解的话,以“春天”为末章的叙事模式是一种“春之信仰模式”,它与戏剧的上升运动结盟,趋向主人公的胜利<sup>③</sup>。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四季框架里寄寓了自己遭遇《河上一周》销售不景气的失败<sup>④</sup>后新生和成功的信念。

在日记家梭罗的季节书里,除了四季轮回的自然生态之外,我们还能读出日记家四季寓言中的光阴哲学。从我们讨论的《梭罗1851年日记》与《瓦尔登湖》两部季节书里,我们一次又一次读到了日记家对于自己的时间、生命和使命的思索。先来看《1851年日记》。7月19日,“我都34岁了,但我的生命几乎完全没有伸展开。简直还只是萌芽状态!有许多实例可以说明在我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间隔,我都可以说自己白活了……生命的长度连让人取得一项成功都不够。在下一个34年里,奇迹也不太可能发生”<sup>⑤</sup>。梭罗对自己度过的34个四季评价不高。是什么样的理想让梭罗对自己34岁的生命不满意?当日,梭罗接着写道:“我想,我的四季流转要比自然四季的循环慢得多;我的时间节奏与自然不同……假如生命就是等待,那就等待吧。”<sup>⑥</sup>梭罗在等待着什么?“蓝知更鸟用背驮来了苍穹”,梭罗迷恋“天国那蓝眼睛的穹庐”;地上康科德的人们在沉睡,梭罗预备“要像黎明时站在栖木上的金鸡一样,放声啼叫,即使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唤醒(他)的邻人罢了”<sup>⑦</sup>。工业化进

①亨利·梭罗:《种子的信仰》,何广军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第10—11页。

②J. Lyndon Shanley, *The Making of Walde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p. 202.

③Robert Milder, *Reimagining Thorea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20.

④1849年出版的《河上一周》销售很不景气。1853年10月28日的日记里,梭罗用他一贯幽默的风格写道:“我现在有藏书900册,其中700多册是我自己写的。”因为就在那天,出版社送还了梭罗1849年出版的1000册《河上一周》卖剩的706册。

⑤亨利·梭罗:《梭罗日记》,朱子仪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74页。

⑥Henry David Thoreau, *A Year in Thoreau's Journal 1851*,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3, p. 113.

⑦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程加快的消费社会里,“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sup>①</sup>，“金鸡破晓”是梭罗的理想。他反复修改《瓦尔登湖》，等待着《瓦尔登湖》与《河上一周》不一样的命运。怎样实现自己的抱负？梭罗在1851年9月2日的日记中说：“……除非怀着热忱去写，否则我们写不出优秀和真实的东西……一个作家，也就是写东西的人，他是自然万物的笔录者，他是玉米、青草和挥着笔的大气。”<sup>②</sup>自然写作日记家梭罗提倡写作除了“返回自然”、观察四季，还需“化身大法”，激情变身为大自然的一分子，物我合一，成为“挥着笔的大气”。

梭罗用日记记录着康科德的四季轮回，刻画着生命的瞬息与恒长。他在1851年1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利用每一次机会，就当是你最后的机会，用笔来表达你自己。”<sup>③</sup>为什么要把每一天的日记都谱成“天鹅之歌”？日记家梭罗的动因与哥哥约翰的早逝有关。1842年，仅大梭罗一岁的哥哥约翰曾与梭罗一起泛舟康科德河与梅里麦克河，却因剃须刀片划破手指被感染，突然意外逝世。亲历哥哥的死亡，梭罗身心俱痛。在日记中，他是寒冬里一只因痛苦之沉重而不能酿蜜的蜜蜂。生之意义何在？梭罗在另一篇日记里反思自己“寒酸得很”的社会作为，坚定了“酿造生命之蜜”的使命感。他说：“我在想望着把我的生命的财富献给人们，真正地给他们最珍贵的礼物。我要在贝壳中培养出珍珠来，为他们酿造生命之蜜。”<sup>④</sup>生命短匆，四季如流。写成四季书的《瓦尔登湖》里，梭罗说：“时间只是我垂钓的溪。我喝溪水；喝水的时候我看到它那沙底，它多么

浅啊。它的汨汨的流水逝去了，可是永恒留了下来。”<sup>⑤</sup>已经“灰飞烟灭”的生命，曾经空谷回响的思想，在如流的四季轮回里，在日记家的文字之间，定格成了钓钩上的永恒。

从1881至1892年间，梭罗日记的监管人布莱克曾编辑出版梭罗日记四部，分别命名为《马萨诸塞的早春》(1881)、《夏》(1884)、《秋》(1892)、《冬》(1888)。布莱克是梭罗的知音。

## 二、测量家梭罗：“瓦尔登湖是大地的眼睛”

梭罗说：“瓦尔登湖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天性的深浅。”<sup>⑥</sup>梭罗是测量家。他的测量工具除了罗盘、铰链、铅锤、钓丝和石头，还有一支“春秋之笔”。他傍水而居、临湖而作，做的是测量实验。以四季为单位，梭罗用自然与自我合一之法，测出了望湖人天性的深浅，量出了日记家生命的倏恒。

因为有着测量的天赋与爱好，梭罗成了测量家。爱默生说：“梭罗对于测量有一种天然的技巧。他喜欢测量物体的距离、大小，诸如树长、池深、河宽、山高，还有他钟爱的几个山峰峰顶的间距。他的数学知识很好，加之他对康科德的地形了然于胸，他渐渐地成了个土地测量员。对于他，这工作有一个优点——不断地将他领到新的幽僻的地方，帮助他研究自然界。他在这工作中的技巧与计算的精确，很快赢得了人们的赞许，他从来不愁找不到事做。”<sup>⑦</sup>爱默生终究还是了解梭罗的。《瓦尔登湖》的“经济篇”里，梭罗提供了自己某一阶段的生活方

①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7页。

②Henry David Thoreau, *A Year in Thoreau's Journal 1851*,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3, p. 188.

③Henry David Thoreau, *A Year in Thoreau's Journal 1851*,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3, p. 310.

④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译序第9页。

⑤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⑥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5, p. 186.

⑦Nina Baym & Ronald Gottsman,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vol.1,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89, p.1202.



式：“我当时在村中又测量又做木工和各种别的日工，我会的行业有我手指之数那么多，我一起挣了十三元三角四分。八个月的伙食费。”<sup>①</sup>除了动词“测量”之外，还有“手指之数”“十三元三角四分”“八个月”等数字罗列，梭罗在习惯性的说话中印证了自己的测量头脑。梭罗对于测量的热衷主动，以至于政府派人勘测康科德河时，他早已测绘出了该河的全景图，其中每一处数据都用细小的字体，标示得非常详细与清楚。梭罗对测量工作有一种忘我的痴迷。1851年12月12日的日记有如下记载：“……二三十天以来我一直做着测量工作，过着粗陋的生活，甚至饮食方面都简陋得很（我发现饮食总是随着所作的工作的性质而改变）。今晚，我第一次在房间里生起火。”<sup>②</sup>长时间做大量测量工作使其忘记了基本的生活要求，但梭罗却不忘勤写日记。《瓦尔登湖》与《1851年日记》中，动词“测量”，计量单位“英尺”（1英尺=0.3048米）、“英寸”“码”（1码=0.9144米）、“杆”（1杆=16.5英尺=5.742米）、“蒲式耳”（1蒲式耳=36.3688升）和“吉耳”（1吉耳=1.4207升）等词汇出现的频率极高。梭罗不写作的时候，几乎都在测量；而他写作的时候，也常在记述测量。二者相并坚持，所用工具不类，但同为测量：一是测量自然，一是“测量”人生。1851年12月12日的日记里，梭罗说写日记是做“与内心深处最神圣的天性相适应的事情，像鱗鱼躲在青青河岸下一般潜伏在水晶般的思想里”。在“思想的深河”里，他“希望活下去！想活多久就活多久”<sup>③</sup>。测量与日记之后，隐藏着测量家制作一部描述康科德跨季经年“自然史大全”的宏愿，还有一个用文字立不朽的日记家的梦想。

为了完成一部跨越时空经纬的康科德自然史大全，测量家梭罗每天行走，常年勘察。各种自然景物是他的主要测量对象。《瓦尔登湖》第一章“经济

篇”中，梭罗这样叙述自己的劳动：“很多年来，我委任我自己为暴风雪与暴风雨的督察员，我忠心称职；又兼测量员，虽不测量公路，却测量森林小径和捷径，并保它们畅通，我还测量了一年四季都能通行的岩石桥梁，自有大众的足踵走来，证实它们的便利。”<sup>④</sup>在《1851年日记》中，11月23日的日记记录了康纳屯湿地直径3英寸的各类树种棵树列表。12月30日，梭罗记载道：“……今天下午在费尔黑文山，我听到锯子的声响，随后在山崖地带我看见两个人要锯倒我正下方约200码开外处的一棵高贵的松树……它是这片森林遭到砍伐后幸存的十几棵中的最后一棵，十五年来它显现出遗世独立的尊严，在后栽的萌芽林的上面摇摆着身子。我看到的那两个人（活像一对小侏儒）犹如海狸或虫子在啃着这棵高贵的树的树干，几乎都看不到他们手中的横锯。我后来测量一下发现这棵树高达100英尺。”<sup>⑤</sup>有了“十五年”“最后一棵”“100英尺”这样具体的时间、树数和树高等测量数据，伐木者之“渺小”与大松树之“高贵”形象跃然纸上。当大树就要轰然倒下时，“站在树底下的两个侏儒正逃离犯罪现场。他们扔掉了罪恶的锯子和斧子”。在梭罗笔下，伐木者俨如溃军。“在高不可攀的地方给松树提供一个枝桠做窝”，似大山之船的桅杆一般“仿佛站立了一个世纪”的“马斯基塔奎德上空最有尊严”的大树“倒下时拍打了山腰，躺倒在山谷里面，就好像它从未站立起来过，轻得就像羽毛一样，像一个战士收拢起他绿色的战袍。仿佛它已站得厌倦了，以无声的快乐去拥抱大地，让自己的一切回归尘埃。然而听吧！在此之前你只是看到了，还没有听到任何响声。现在传来了撞击在岩石上的震耳欲聋的巨响，向人宣示即便是一棵树，在死去的时候也会发出呻吟。它急于要拥抱大地，将自己的全部融入尘

①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63页。

②③Henry David Thoreau, *A Year in Thoreau's Journal 1851*,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3, p. 305.

④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⑤亨利·梭罗：《梭罗日记》，朱子仪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9—100页。

埃。现在一切都平静下来了,无论用眼睛看还是用耳朵听,这种平静都永远地持续下去”<sup>①</sup>。这是一棵树锯倒的画面。梭罗的笔像一部现代摄影机,记录下了200码的山间距离造成的独特视觉与声响效果。日记在记录,也在测量。梭罗从空间、时间和身形、声音的维度测量了一棵树的生命:大树从站立到倒下的空间位移;似乎站立了“一个世纪”到将倒下的垂危中坚持“十五分钟”,最后归于“平静永远”的时间对照;身体“缓慢”“庄严”地倒下,声音震耳欲聋似巨人发出一声疼痛的呻吟。《瓦尔登湖》中,梭罗说:“我们可以用一千种简单的方法来测定我们的生命。”<sup>②</sup>他用日记测定一棵树的“高贵”,也是测定我们自己生命或“渺小”或“高贵”的一种方法。

《瓦尔登湖》是梭罗一个经典化的测量实验。梭罗的“实验性自我”在对瓦尔登湖湖底的测量及湖畔生活2年零2个月的体验中成了美国文化的经典形象。梭罗的测量实验分自然测量、经济测算和精神测探三部分。

自然测量需要的工具,从德国生产的极其精密的圆规到常用的寒暑表、水准仪、直尺、软尺、罗盘、铰链、铅锤甚至是钓丝和石头,梭罗一应俱全。自然测量的对象包括湖边树木、道路、湖周、面积、湖岸四方山峰的水面高度、不同季节湖岸的水位涨落、湖底的形态,尤其是湖深。传说中的瓦尔登湖是个无底之湖,作为测量家,梭罗“渴望着把瓦尔登湖相传早已失去的湖底给予恢复”<sup>③</sup>。1846年初,梭罗在融冰之前小心地勘察了它,“以十杆比一英寸的比例画了湖的图样,在一百多处记下了它们的深度”<sup>④</sup>。在一块重一磅半的石头和绑着石头的钓鳕鱼

的钓丝的帮助下,梭罗测得瓦尔登湖的最深处是“一百零二英尺”,湖水上涨时计“一百零七英尺”。测量瓦尔登湖后,梭罗写道:“湖面这样小,而有这样的深度,真是令人惊奇,然而不管你的想象力怎样丰富,你不能再减少它一英寸。如果一切的湖都很浅,那又怎么样呢?难道它不会在人类心灵上反映出来吗?我感激的是这一个湖,深而纯洁,可以作为一个象征。当人们还相信着无限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湖沼被认为是无底的了。”<sup>⑤</sup>有限与无限,是梭罗思考的问题。瓦尔登湖是一个象征,他测量自然,以发现证明自然的深奥无限;他书写有限的生命日记,以实践塑建无限的生命财富。

经济测算体现在《瓦尔登湖》“经济篇”的一份份账单里。从房子到饮食、服饰的各项开支都细列在账单里,梭罗要证明的是:靠双手劳动,我们“每年之内只需工作六个星期,就足够支付一切生活开销了”<sup>⑥</sup>;剩下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干无数有意义的事情。对于今天物化的社会里的人们而言,150多年前梭罗书写在《瓦尔登湖》里的建议犹如惊雷:“简朴,简朴,简朴啊!……简化,简化。”(Simplicity, simplicity, simplicity! ...Simplify, simplify.)<sup>⑦</sup>在实验的隐喻里,人类生活的浪费以账单触目,以规劝告终。梭罗测量家的“匠心”剖露无遗。

通过测量瓦尔登湖的湖深,梭罗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则:“用一根直尺放在最长的距离上画了一道线,又放在最宽阔的地方画了一道线……最深处正巧在两线的交点。”他在白湖等地的测量验证了这一规则的正确性。根据自己对湖和人的观察,梭罗推想:

①亨利·梭罗:《梭罗日记》,朱子仪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00—101页。

②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③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15页。

④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18页。

⑤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16页。

⑥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⑦参见 Henry David Thoreau, *Walde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5, p. 91.

湖的情形如此,在伦理学上何尝不如此。这就是平均律。这样用两条直径来测量的规律,不但指示了我们观察天体中的太阳系,还指示了我们观察人心,而且就一个人的特殊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潮流组成的集合体的长度和阔度,我们也可以画两条这样的线,通到他的凹处和入口,那两条线的交叉点,便是他的性格的最高峰或最深处了。也许我们只要知道这人的河岸的走向和他的四周环境,我们便可以知道他的深度和那隐藏着的底奥。如果他的周围是多山的环境,湖岸险巖,山峰高高耸起,反映在胸际,他一定是一个有着同样的深度的人。可是一个低平的湖岸,就说明这人在另一方面也肤浅。<sup>①</sup>

一个人与一个湖是如此地相像,用长度和阔度两线相交的测湖法同样可以测算出道德人心。从湖到人,一种精神测探法应运而生。瓦尔登湖“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天性的深浅”;瓦尔登湖是“神的一滴”,对它“庄严、纯洁的景色”就算只有一瞥,“已经可以洗净国务街和那引擎上的油腻了”;它是文艺女神居住的帕那萨斯山的神泉,而火车到来,森林砍伐,湖上的冰被当作商品运走,瓦尔登湖的皮肤被生生剥掉,湖光山色的破坏必会让缪斯女神都沉默<sup>②</sup>。精神测探上,梭罗的比喻把一个湖与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关联起来,其深浅、洁污和雅俗互为鉴照。

梭罗死于深爱的测量工作。1860年12月3日,

他在冬天的康科德森林细数树木的年轮时染上了一场致命的风寒,其后未能康复。1862年,梭罗死于风寒引发的肺结核及其并发症,结束了他作为测量家与日记家短暂却丰产的一生。

### 三、结语

梭罗用测量发现自然,用日记记录自然,他是每日行走在自然中的作家。“文人作家应该总是或主要坐在屋子里,等着自然从窗户里溜进来?”对这一设问,梭罗的回答无疑是否定的,因为“户外是吸收来自周围种种影响的地方”<sup>③</sup>。梭罗是提倡走进户外感受自然的作家,像他喜欢的诗人华兹华斯一样,“他的书房在户外”<sup>④</sup>。梭罗尤其推崇“让五官完全放松自在的散步”,“一种真正的目游(a true sauntering of the eye)”,“不是去就物,而是让物来亲近你”<sup>⑤</sup>。这种五官自由自在的目游散步是置身自然,忘却自我,让物的主体性充分影响审美者的参与交融审美法。漫步康科德,梭罗做了职业测量家,他测量瓦尔登湖的深度,测量康科德的一峰一树。“毕生皆用的科学测量法”是梭罗探索自然,“了解大自然之物质形态与精神内涵的方式”<sup>⑥</sup>。在户外,梭罗呼松树为友,称自己是“另一个自然——自然的亲兄弟”<sup>⑦</sup>,康科德的自然与梭罗的自我浑然交融;在室内,梭罗“是自然万物的笔录者,他是玉米、青草和挥着笔的大气”<sup>⑧</sup>。在《梭罗1851年日记》与《瓦尔登湖》中,测量家与日记家梭罗,在四季轮回的自然时空里探测到了瓦尔登湖及所有生命的秘密,在日记书写的不朽中实现了自然与自我完美合一的理想。

①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20—321页。

②亨利·梭罗:《瓦尔登湖》,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208—217页,第324页。

③Henry David Thoreau, *The Writing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Journal II*, vol. 8, Bradford Torrey, eds.,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nd Company, 1906, p.338.

④亨利·梭罗:《山·湖·海》,台湾蓝瓶子文化编译小组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年,第317页。

⑤Odell Shepard, *The Heart of Thoreau's Journals*,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61, p.99.

⑥Daniel B. Botkin, *No Man's Garden: Thoreau and a New Vision for Civilization and Nature*,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2001, p.86.

⑦亨利·梭罗:《梭罗日记》,朱子仪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7页,第9页。

⑧Henry David Thoreau, *A Year in Thoreau's Journal 1851*,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3, p.188.

# 跨学科视野下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思想

——第六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综述

◎梁 坤

以“生态文学与生态思想”为主题的第六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于2016年10月29—30日在北京成功召开。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研究所主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海峡两岸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专家、生态环境保护组织代表、期刊编辑、青年学子等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主题涉及东西方生态思想的比较与对话,原住民的宗教神话传统与生态智慧,地方书写与环境美学,以及生态文学主题、环境正义的跨学科研究、生态文学的跨界书写等多个方面。

两岸学人携手探究、发展生态论述,助力实现共建美好家园的梦想,是历届海峡两岸生态文学研讨会的共同宗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梁坤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首先回顾了自2011年起前五届研讨会的主题:厦门大学的“生态文学与生态文明”、台湾中兴大学的“全球生态论述的地方演绎与实践”、山东大学的“生态文明时代的文学与美学”、台湾中山大学的“环境、主体与科技”、南京大学的“当代生态文学批评新趋势”。本届会议主题则深入到思想层面,希望通过解读中西经典文学中的生态思想,寻找到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梁坤教授还提出,从词源学角度看,生态学(Ecology)从希腊文 οἶκος λόγος 而来,意为“关于家园的学说”,因此生态文学当解为“关于家园的文学”,它处理的是危机

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正是西方文学传统中“寻找家园”母题的延续。

生态批评自发端之始就内在地蕴含着跨学科的要求。如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所言,生态批评不是在以一种主导方法的名义进行的革命,而是可以利用任何一种批评视角,围绕的核心是一种对环境的责任感。与会者就多个主题开展研讨,体现出不同视域的对话与融合。现将研讨会的内容综述如下。

## 一、东西方生态思想的比较与对话

各方学者基于生态危机的严峻现实,试图从意识形态批判以及对东西方生态思想的剖析、比较和对话中进行价值重估,寻求救赎之道。

台湾文学与环境学会荣誉理事长、台湾大学外文系名誉教授林耀福先生从对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批判谈起,认为西方的意识形态/历史终结论总是跟西方文学与思想传统中对乌托邦的追寻互为表里,自由主义资本民主制度因其结构性缺陷,无法达成乌托邦理想社会的建构,因此历史的终结尚未完成。生态批评的兴起,可以说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历史终结论的谬误,推动历史迈向生态意识文明的建构。他将当代环境运动的起源置于“落魄世代”(the beat generation,即“垮掉的一代”)反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认为当代环境运动和生态意识从一开始就肩负起鲜明的政治、道德和乌托邦使命,生态主义的发展将生态的层面引入乌托邦与上

层建筑的建构,终结了意识形态与历史终结论,由意识形态的典范更替展开了历史的新页。他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归去来辞》和《饮酒》等诗歌中见出历史与自然的互动,认为那里呈现一则以道德界定的乌托邦故事,道德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道法自然,没有人为的暖化导致气候变暖,扰乱天纪,也没有背信弃义的钩心斗角。

从生态视角对东西方文学与文学批评进行反思和价值重估,是本次会议的一个集中议题。首都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石海毓副教授指出,美国生态文学以雄厚的生态思想为基础,具备自觉的生态写作立场和现实生态危机的迫切语境,它的出现与生态科学和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等思想理论的建构紧密结合在一起,有着极为丰富而深刻的现实根源和思想理论依据。她从自然主体性的回归,人类伦理与审美文化的反思与重构,唤醒人类的感官体验三个方面探讨了美国生态文学的现实价值。文学并非存在于自身的独特空间里,我们对文学的讨论限定其文学性,无异于断离了它与其他体系的联络。而生态文学在当代文学表达之中方兴未艾,是因为一些作家“懂得自己的书写是在作这样的尝试,即不但要写出美丽而抒情的语言,还要能够达成一种关于人类社会与这个星球的现状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生态文学用生动的语言形象、深刻的生态思想重新唤起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感受到大地的气息和生机,让我们的生命回归大地,听到来自内心的呼唤,与其他生命惺惺相惜。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高旭东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对自然生态的尊崇,应当重视中国文化的生态智慧以及生态批评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带来的价值重估。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人与神、人与自然都是分裂的,与自然相比,人与神更为近似,可以支配并征服自然。基督教这种人与神、人与自然的二分,加上文艺复兴之后与古希腊科学理性的共谋,造就了今天的生态灾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中,道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分别与当代

生态批评中的理想派和现实派相类似;同时,中国文化明显的阴柔特性也与生态女性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此基础上,生态批评所蕴含的价值尺度将会对中西文化传统发生颠覆性的重新估价。

杭州师范大学陈茂林教授解读了在西方思想发展过程中“自然”(Nature)一词含义的演变:由“本性”过渡到对象化的“自然界”,词义重心的转移标志着西方近代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宇宙观的形成。他以《呼啸山庄》为例,认为其中“自然”的含义除了“自然界”之外,还有“天性”“自由”“自然而然”的含义,在自然与文明的关系上,倡导二者的和谐交融,其中体现的东方意蕴使作品焕发出新的光彩,对于生态危机时代修补西方主客二分的自然观具有启发意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杨晓辉教授介绍了日本生态文学研究的国内外状况。她指出,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先后共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时至今日,已经从最初对欧美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及作品的译介,发展到形成了具有日本本土特色的生态文学研究态势的阶段。日本生态文学研究第一人(自然写作第一人)野田研一教授、日本文学·环境学会副会长结城正美教授等学者成为研究阵营中的领军人物。跨学科性和对日本本土公害疾病的关注,是日本生态文学研究较为显著的特点。

## 二、原住民的宗教神话传统与生态智慧

向宗教神话回归,通过对原住民生态理念、生态智慧的考察,寻找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是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

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伽丽娜·柳比莫娃女士从人类学、宗教学与当代生态研究相融合的广阔视域展示了乌托邦建构的实例。她首先介绍了西伯利亚作为全人类精神复兴开始的领土的特定形象(以及整个俄罗斯的形象)理念。在“黄金时代”,正是在俄罗斯

亚洲区域存在着地球的精神地带,现在这一地带集中在西西伯利亚的一个农村。在这个农村里的信徒定期会举行宗教仪式(“吠陀仪式”),这些仪式保护着农村作为“地球能量中心”的神圣地位。西西伯利亚还是一个产生于俄罗斯本土的“原始宗教”的诞生地。在多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她介绍了西伯利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宗教运动和祭仪的特点:“新世纪”宗教尤为关注生态问题,而西伯利亚书写农村题材的作家为新宗教教义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前提。最后之约教会的生态伦理观认为,应该同对待活着的事物一样,同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母亲只乐意为孩子奉献自己的一切。要学会向自然“正确地索取”它的资源,强行向地球索取(包括借助硝酸盐)对人类无益。柳比莫娃阐明了西伯利亚针叶林区景观发展的独特性,揭示了与环境空间神圣化相关的创建生态村落的原则,包括具有当代环境保护理念的可替代能源的使用、垃圾利用以及在公社的生活基础上“发展小型生产、手工业和民间手工艺”。这一社会乌托邦的现代形式,为一系列道德和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适应了当下社会发展的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梁坤教授同样将视角转向了西伯利亚。她结合近两年在蒙古国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多次实地考察的经历,对多神教、萨满教的文化遗存进行了多方面的展示。她认为,神话怀旧病是20世纪俄语生态文学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作家们自觉运用神话思维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试图通过神话来反拨现代文明、理解自然。这是20世纪西方文学向神话复归大潮中独特的一支,是原生的俄罗斯文化传统的自然体现。这一传统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其综合性,即东正教和原始多神教的综合,东斯拉夫和蒙古鞑靼文化成分的综合。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东正教、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如何浸入并成为文化主流,植根于社会底层的斯拉夫多神教和萨满教都拥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存活于人们的礼仪行为、生活方式、原始巫术和自然历法中。神话

就是生活本身,是无形态、无意识的自然力。梁坤教授进而从土地—女性崇拜、祖先—圣地崇拜、自然—神树崇拜、图腾-动物崇拜几个层面解读其与列昂诺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艾特玛托夫等几位作家的现代神话创作的内在关联。

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副秘书长、珍稀动物保护学会名誉会长赵连石先生多年从事第一线生态考察。他指出,生物多样性的背后是文化多样性。他以黄河流域的文明发源为例,提出“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传统智慧启发了合理利用自然的行动,又以当下西部地区过度推崇农耕文化、取消游牧业对游牧民族生存方式的破坏为例,提醒盲目推进工业化发展和城镇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他强调,一个尊崇敬畏自然、适度索取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生存方式的消亡,是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悲哀。每种生态环境都孕育一种文化类型,应当尊重每一种文化的发展方式,这样才能保证生物多样性不受破坏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梁艳讲师着力分析了夏曼·蓝波(Syaman Rapondan)的海洋文学作品,探讨中国台湾地区达悟族的“泛灵信仰”的生态观对现代社会环境危机的启示。达悟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源自“泛灵信仰”,这一信仰与现代性的冲突,是原始生态与现代文明的冲突。现代性驱除巫魅,但生态平等与共存的原则受到摧毁。因此,否定之否定的“复魅”又被人们提出,并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作家作为人类学家在思考关于民族未来的问题,即如何在强大的现代哲学文化包括强大的汉族文化的冲击下保持自己的原始文化和民族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黄增喜从神圣—去圣—神圣的层面解读人与自然关系的心路历程。他认为,宗教史既是人与神圣的交流史,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或人类的自然观念史。当代宗教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对宗教观念与自然观念的互动表现出密切的关注,其宗教史叙述既是对人类宗教

理念之演进的追索,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之变迁的回溯。他指出,前现代人大体生活在充满神圣的宇宙中;犹太—基督教对历史的重视,开启了自然的去圣化进程;现代科技得益于这一进程,并加速了这一进程。现代诸多文化思潮的盛行及“回归自然”口号的提出,无不露出现代人对于神圣的隐秘乡愁,多维度地彰显出人与自然之间难以割舍的统一性。现代人要走出文明的重重危机,就有必要重新唤醒、激活自己感知神圣的能力。伊利亚德的宗教史叙述虽有浓重的想象色彩,但不乏重要的当下价值和持久意义。

### 三、地方书写与环境美学

来自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前沿的最强音,以及学者们对地方性书写的阐发,对经典生态论述中“环境美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生态美学”(Eco-aesthetics)等概念的深度辨析,使本届会议呈现出理论与实践交融的特色。

生态批评缘起于当代环境危机的现实,生态文明建设者和环保实践者分别介绍了各自在生态农业、河流保护、西北沙漠保护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以及他们切身的思考,为相关的理论探讨提供了现实的维度,令与会者了解到当下生态危机的现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绩与方向。

在大地上挥毫作画、谱写山水诗篇的齐齐哈尔市原副市长、拜泉县原县委书记、现市政府生态建设顾问、拜泉县生态文化博物馆馆长王树清先生是地球奖获得者。他介绍了拜泉县40年来实行高效循环生态农业的实践经验,展示了三北防护林体系的建设以及坡、水、田、路、村一体化的生态发展模式,并从生态文学与知性书写,生态意境与生态艺术的天然结合,形象艺术与生态技术的结合,生态伦理与形象艺术的人文教育等方面探讨了生态文学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的多重路径。他寄语与会学者:“生态文学的魅力首先在于他给读者带来的思想力量以及感染力,文化不仅仅是历史文化

知识,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存在;文化是充满活力的生命基因,暗地里决定生命的生长和发展;文化的力量是生命的力量,总有一种光芒如影随形,这就是文化的光芒,它浸润、洗礼着我们的内心,给我们充满浮躁、焦灼和困惑危机的心灵以慰藉和安妥,让我们获得心灵的快乐、自由和充实。”

几十年如一日守护家园的志愿行动,为中国绿家园环保组织创始人汪永晨女士带来了中国环境地球奖、环境使者、环境保护杰出贡献奖等荣誉,前不久她又入选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6年度“全球100位优秀人物”。她用大量实地考察的图片,展示了黄河、长江、澜沧江、渭河、洞庭湖等江河、湖泊水源地区在30年间的水文地貌和人文环境的恶化。江河污染尤其是水源地环境的恶化常被处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中的现代人所忽略,全球变暖导致的气候异常会给江河水源带来负面影响,而滥用地下水、水源地化工厂污染物排放等人为因素更加剧了江河危机。她呼吁生态写作者关注江源地区原住居民群体的生存智慧和生存情状,号召更多研究者以实际行动参与环保实践,推进环保事业的发展。

生态关注首先应当是地方性的,人们总是从对地方的身心经验出发,想象并评估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学者们对泉城济南、伦敦地景和奥德修斯的水球环境的研究,与来自现实的报告相互呼应、相得益彰。

山东大学文学院刘蓓教授从环境史视野出发,探讨在“泉城”的城市形象形成和变化过程中,泉水这一自然景观、文学的传播、不同时期城市建设政策制定者对泉水态度的变化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这一个案启示我们在当代快速城市化的语境中进一步思考生态文学的作用和城市文化的发展方向。

台湾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国际学院助理教授倪志昇以心灵地理学为方法,探讨英国当代作家伊恩·辛克莱(Ian Sinclair)作品中描写的伦敦地景。

他认为,作为空间实践的奉行者,辛克莱以行走伦敦的模式重新书写伦敦,其作品长期聚焦伦敦都市现代化给自然与人文环境所带来的冲击,以及现代都会生活经验中主体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北京农业大学钟燕副教授从《奥德赛》中主人公对故乡伊塔卡岛的土地依附、岛上亲人对家园的持续守护两点入手,讨论故乡环境在想象记忆和生存现实中的意义,并从归返途中“群岛”地理构成的欲诱、博物学知识对成功返乡的帮助两点出发,探析归途环境与人类的关系。她认为,《奥德赛》是以大海为辽阔背景的返乡作品,主人公奥德修斯的返乡体现了水球环境中人类家园情怀的隐喻。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程相占教授和深圳大学文学院王晓华教授分别从理论上对“环境美学”“生态美学”等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程相占教授指出,“环境美学”关注融入环境之中的欣赏者与环境之间所进行的相互游戏,他对环境美学的三位代表性学者赫伯恩(Ronald W. Hepburn)、卡尔森(Allen Carlson)与伯林特(Arnold Berleant)各自的关键词“融入”(involvement)、“浸入”(immersion)与“交融”(engagement)进行了辨析。程相占教授指出,理论思路隐含着“生态”和“身体”两种理论取向,前者使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密切相关,后者则使环境美学与身体美学具有一定的关系,在与相关美学理论形态的对比过程中,环境美学的独特理论价值才进一步凸现出来。

王晓华教授则从“生态学”创始人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一元论思想出发,对“生态美学”这一概念进行了知识考古学式的梳理。他指出,海克尔反对二元论和人类特殊论,提出了一元论艺术概念,其生态美学具有机体美学和环境美学两个维度。但由于海克尔没有明确界定机体美学和环境美学二者的区别和联系,在生态美学发展过程中,机体美学逐渐被遗忘而环境美学日益凸显。在环境论的视野中,世界实际上被划分为人工化的世界和自然,二元论的幽灵又出没于文本之中。王晓华教授认

为,为了避免二元论带来的理论困境,生态美学的当代研究者应该追本溯源,回归一元论世界观,以重构完整的生态美学理论体系。

#### 四、生态文学主题研究

生态批评自肇始之日起,经历了荒野回归叙事研究、城市有毒物质的末世叙事研究、环境正义的物质主义叙事研究等浪潮,后又出现了混杂叙事。拥有持续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经典的美国文学为当代美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对美国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的研究也一直是生态批评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会议对以美国为中心的生态文学创作和批评展开了深入讨论,并延伸到英国经典文学和当下中国的科幻小说,批评视角从“再栖居”的荒野乡村到“人类纪”的城市和科技困局。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方红教授基于对美国生态文学的深入研究,首先梳理了“再栖居”概念的四重内涵:离乡之后的返乡,经历多重生活方式后对先人、前辈适应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的重新认同;修复被破坏的自然环境,重建本地生物区域内生态平衡;多地价值视野下对敬重生命、关爱他者的在地价值与责任意识的重新认识;以“星球意识”平等看待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文化与亚洲传统佛教。在此基础上,她探讨斯奈德、霍根与贝瑞这三位生态作家对这一主题的不同演绎。斯奈德的再栖居主要是荒野再栖居,他提出星球意识下的再栖居,再栖居书写融有跨文化的色彩。霍根则在《靠鲸生活的人》中以人与动物之情的变化,体现返乡栖居是融入多地体验的复合在地,是经历多重价值影响后对在地价值及融入地方生活方式的重新肯定。贝瑞的再栖居书写涵盖荒野在地与农场栖居:《长腿屋》重申了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伦理,体现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层生态主义思想;而《土地家园》提出在农耕生活中培养与增强个体对家庭、社群、土地与自然的责任感,续写了杰斐逊农业民主社会的理想,体现出兼顾人类与其他物种安康的弱势人类中心主义



思想。

北京语言大学世界宗教研究中心张华教授介绍了美国著名生态文学批评家、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开拓者、《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的创刊主编墨菲教授作为诗人的生态情怀。他认为,墨菲教授的诗作体现了其生态批评著作中的生态思想,二者在相同时期相互呼应,思想变化的脉络明晰。

中山大学(珠海)中文系特聘副研究员朱翠凤反思“生态美学之父”约瑟夫·米克对生态危机的起源与悲剧、喜剧关系的探讨。她认为,米克假设悲剧中存在人高于自然、将自然视为对立面的意识,将超自然的力量或一个先验伦理秩序存在的预设视为悲剧的特点:“为了结束人与自然世界之间长期的、灾难性的战争,人们有必要拒绝悲剧的人生观。远离悲剧,是人们避免生态灾难的重要前提。”米克推崇喜剧的解决方式,认为人应该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的改变。在这个观念背后,似乎假设环境本是好的、人为了适应环境而作出的改变也是好的。我们要做的似乎是像工业烟中的蛾子一样,改变自己的“颜色”,而不是想着如何治理这些空气中的污染物。

首都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张紫嫣以《乡村时光》《北方农场》《沙乡年鉴》为研究文本,从“恋地情结”“土地伦理”等角度讨论乡村的美学价值和伦理意义。她认为,与荒野的人迹罕至有异,乡村参与者多了一份日常伦理和悲喜情感;与都市、花园的人造景观不同,乡村与自然的联系中多了一重野性的特性。人置身于乡村的审美感受与情感体验是无可替代的,美国自然文学中乡村书写的意义在于观察人对自然环境的作为,记录人与自然相遇的历史,反思人与自然的变化关系。

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张建国研究员论述了美国古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科学史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科学散文代表作的三个特征:其一,通过阐释和捍卫达尔文进化论,消解人类中心主义,提倡生态整体观;其二,反对滥用科学宣扬男

性中心论、白人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倡导人人平等互爱的生态社会;其三,倡导生态科技观,反对滥用科学。古尔德五部代表性作品讨论的是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共存共容,人类因为贪婪无知而破坏环境才导致生物灭绝。古尔德强调,人类需要为保护自己在内的生活圈负起责任,他强调对自然的关爱之心。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汪海副教授将研究引向“城市有毒物质的末世叙事”。他以狄更斯的小说为例,认为雾霾的出现更被狄更斯看作是一种警示:它彰显了维多利亚时代被排斥、压抑和遗忘的各种不可见物,暴露了潜藏的现代性危机。他认为,狄更斯以哲学现象学式的敏锐与深刻,从空间、意向性关系与时间三个层面揭示了雾霾对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现代生活的深远影响,包括雾霾导致的城市空间的变化,造成的感官体验与心理感受,催生的新的美学经验,以及引发的人与世界存在关系的根本变异。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外文系宋丽丽副教授以刘慈欣的系列长篇科幻小说《三体》为例讨论“人类纪”的混杂叙事,将现实思考、学术视角和科幻文学文本作了一次成功的对接。通过介绍三波不同的叙事研究浪潮,她认为“人类纪”是指人类已经很明显地改变了地球表面海洋和大地,而且重置地球生命的秩序,其暗含话语是对现代文明和现代性以及殖民主义的反思。“人类纪”概念的确立,对人文主义精神的认识与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人类纪”的背景下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叙事混杂性研究具有突出重要的意义。她分析了《三体》的混杂叙事,即地球与三体,末世与轮回,现实与虚幻,荒野与科技困局,人造万物与自然法则等叙事,试图从中理解“人类纪”的混杂迷局与人文主义的可能走向。她认为,“人类纪”背景下的生态批评研究将要超越唤醒大众环境意识的道德理想化层面,而走向环境人文精神的认识与建构层面。

### 五、环境正义的跨学科研究

从万物平等、环境正义的角度探究有机物与无机物之间、人与动植物之间的关系,是很多与会代表一致关注的话题。资深学者借助后现代哲学思想与生态思想解读文学经典,体现出生态文学研究的前沿性;青年学子对中外古代经典的研究则给会议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台湾文学与环境学会理事长、淡江大学英文系蔡振兴教授援引德勒兹的“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和瓜塔里的“生态哲学物件”(ecosophic object)理论,结合施宾拉德(Norman Spinrad)的小说文本《温室夏天》(*Greenhouse Summer*),对气候变化问题和资本主义机器对自然、媒体、科技的控制问题展开讨论。他认为,新物质主义对现有哲学思想有两点启发意义:其一,突破人类中心论和意义建构论,强调物质的能动性,其存在意义可以独立于人的主观感知;其二,超越语言学转向对语言的过度强调,物质可以独立于语言的建构之外存在。“生态哲学物件”以符号的、机器的、虚拟的和存在的为特征。通过“物件”的概念导向“混沌宇宙分析”(chaosmosis),而“混沌”体现对秩序的挑战和补充,这有助于我们突破决定论限制,走向他者所代表的多重可能性。

台湾师范大学英文系梁一萍教授从自然写作、非人本主义生态论述、后殖民生态论述、生态女性主义、跨物质生态论述以及植物哲学等角度,给予经典文本《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新的诠释。迈克·莫德(Michael Marder)认为,“植物—思考”(Plant-thinking)的特点是非感知(non-cognitive)、非理念化(non-ideational)、非形象化(non-imagistic)的,相对于形而上学传统,它强调植物生长的生命力(vegetation),抗拒统一逻辑,排斥工具理性。出身于上流社会的达洛维夫人摆脱不掉中产阶级的繁文缛节,她所买之花和散步经过的伦敦市区公园代表了城市化、商品化与阶级化对自然的控制,买花不是为了亲近自然,而是以人本主义奉献的精

神,服从文明社会的符号。因此,以意识流著称的《达洛维夫人》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批评意识,是值得重读的经典文本。

同样涉及植物思考的还有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谢超。他结合物质生态批评、跨身体理论、法国哲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体—主体”(body-subject)理论和卡特里奥娜·桑迪兰兹(Catriona Sandilands)的“植物生态批评”(vegetal ecocriticism)理论,探讨劳伦斯植物诗歌中植物、动物及人的身体三者间的转换,认为劳伦斯企图通过对植物拟人化和拟动物化的书写,重建人与自然和谐有机的联系。

淡江大学林国浒博士通过对比法国电影《野兽》(*La Bête*, 1975)、阿尔比(Edward Albee)的戏剧《山羊或谁是西尔维亚?》(*The Goat or Who is Sylvia?* 2003)和美国纪录片《动物园》(*Zoo*, 2007)三部与动物恋相关的文学、影视作品,探讨动物恋争议背后的伦理、政治与美学因素,动物伦理与主流话语体系之间抑制与颠覆的关系,以及基于差异、多元与跨界的伦理—美学范式重新定义动物恋的可能性。

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与文化学院的李贵苍教授从东西方神话与文学想象对比的角度,分析奥维德的《变形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生命“变形”的不同特点,指出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生命体之间的变形和转换体现了能量传递、彼此关联、统一整体的生态原则。他认为,《聊斋志异》表现出中国自然观的灵性特点,《变形记》则体现出西方自然观的野性特点。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金美玲分析了托尔斯泰儿童文学作品树和动物的形象以及登场人物认识的变化。她认为,作家所表现的生命思想与爱的观念并不局限于人类,还适用于植物、动物乃至无机物等超越时空的广泛存在。托尔斯泰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表达了人类与自然界作为生命共同体和谐

共存的生物平等主义的生态思想。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研究生魏薇认为,爱本质上是一种能量,《夜莺与玫瑰》讲述的是能量流在生态环境与人之间运作的故事。王童康试图用“儿童般天真”(child-like innocent)的眼睛关照自然的重要性。她从《世说新语》咏雪篇中“撒盐空中差可拟”和“未若柳絮因风起”的“撒盐”和“柳絮”两个比喻出发,指出二者的差异既展现儿童对自然独到的鉴赏力,而前者暗示的“人的在场”与后者中蕴含的“放弃的美学”也可以体现出二者不同的自然审美。

## 六、生态文学的跨界书写

将文字为主的生态文学研究转向图像描绘研究和电影研究,可以认为是生态批评的进一步延展,在各种不同的跨界书写中传达的是同样深切的生态关怀。

台湾文藻外语大学英语系暨研发处罗宜柔副教授选定格林(Candace S. Greene)与松佟(Russell Thornton)的《天星陨落时:拉可达冬日历书》(*The Year the Stars Fell; Lakota Winter Counts at the Smithsonian*)为研究文本。她指出,冬日历书为北美原住可达族(Lacota)民常用之年历,记载着自每年首次大雪至隔年首次大雪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由于初期原住民并无文字传承,因此此类历书多以简易符号或象征绘出,即汇集拉可达约17位历书记载者历时200年(1700—1925)的原住民生活记录。透过原住民图像符号记载,深究并体验北美原住民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及将自然融入生活、师法自然、崇敬自然的环境伦理观,验证原住民“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生态铭刻。原住民人类中心主义无论是强人类中心还是弱人类中心,都是警醒人类对生态的责任。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建华教授论述了苏联电影《德尔苏·乌扎拉》与黑泽明电影的俄国自然形象。他认为,黑泽明的自然观既受到日本文化传统滋养,又受到西方宗教及哲学思想的陶

冶。而苏联电影《德尔苏·乌扎拉》的拍摄正处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严重环境问题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泽明表达了建构于西方文化的“自然人”理想,又将自然现象作为辅助叙事和传达象征意义的手段,让人领略大自然的神奇、神秘,他用长镜头展示乌苏里的严冬和盛夏,色彩斑驳的树林、篝火、风雪,脚印、河流,日月交辉、风雪和冰原奇观。森林是温柔美丽与阴暗野性并存的地方,让人类在其间顿感渺小。通过对原始森林的描述所展现出来的“森林文化”,培育与自然的共存感、对自然的敬畏、万物有灵的虔诚之心,反省砍伐树木、残杀动物的恶行。这种深存于日本文化的土著价值观,在危机时代反而可以具有更大的普遍性。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陈阳副教授回溯中国生态电影制作和生态电影批评的历史,提出在当前中国电影批评的格局中,生态电影批评远未获得充分的揭示和展开,研究者将好莱坞生态灾难大片和生态纪录片视为生态电影的范本,因而忽略了生态电影以及生态电影批评所具有的更加深广的内涵。基于这一问题意识,他对中国生态电影的现实维度展开探讨,将其分为五个方面:以生态自然的思想反对消费主义文化;关注自然本真的纯朴天性及其在人类社会的回响;面对自然的敬畏之情转换为对生命的普遍尊重;向大自然学习无私给予的品格;家园意识和对“诗意栖居”的诉求。在中国当下生产的电影中,许多目光敏锐的影片都不同程度地将生态意识转换到叙事结构之中,并使之成为抵抗消费文化及其所造成的人生困境的文化斗争场域。中国生态电影批评由此也可以找到新的切入点和新的阐释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访问学者连丽丽讲师分析了电影《追凶者也》中由迁坟酿成的悲剧。她指出,在工业文明物质至上的原则下,人类无限制地掠夺和破坏大自然,并导致了新的野蛮,做出物伤其类的非理性行为。对大自然的征服与占有,不仅是自然生态的危机,更是人类精神生态的危机。北京电影

学院硕士研究生王佳奕试图从生态女性主义、生态伦理观和深层生态学的角度重新解读野夫的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她认为,小说选取的生态叙述策略表现在对立、反抗和救赎三个层面,而生态叙述与隐喻的选取,既彰显了野夫作品独有的气质,又突出了该小说的实质所在,即让“生态”成为一种对过去的追忆、对现实的隐喻和对未来不可测的预估,暴露潜藏其中的现代性危机。

### 七、余述

本届研讨会首次设立硕博论坛,来自北京大学、首都经贸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几所高校的六位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学术报告得到资深学者一对一的点评。年轻学子频发新见,被寄予继往开来的厚望;资深学者细心点拨,使得本次会议成为名副其实的学术“训练营”。

主编论坛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编审、《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副主编张冰主持,中国台湾地区《淡江评论》主编蔡振兴、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文艺》主编夏忠宪、《外国文学》副主编姜红、《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主编胡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俄语教学》副主编宁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鄱阳湖学刊》副主编胡颖峰分别介绍了各自刊物的情况、学术前沿问题以及论文写作和发表经常出现的问题,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届研讨会还设书展,展出参会学者的专著、

译著和期刊共计近百余册。其中包括程虹教授著作《宁静无价》《寻归荒野》,译作《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醒来的森林》《遥远的房屋》《低吟的荒野》《心灵的慰藉》),蔡振兴教授等主编的著作 *Key Readings in Ecocriticism*, 王晓华教授的著作《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的黎明》,梁坤教授的著作《布尔加科夫小说的神话诗学研究》,杨慧林教授主编的“人文学科关键词研究”丛书,谢天振、许钧主编的《外国文学译介研究》,等等。另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俄罗斯文艺》《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中美比较文学》《美文·汉风专刊》《鄱阳湖学刊》等刊物。

生态问题本身兼具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特征,本届会议成为跨文化对话、跨领域交流和跨学科研究的复调合唱与思想狂欢,为生态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发出了中国自己的声音。无论是关于东西方生态思想的比较与对话,还是关于原住民的生态论述,关于人与动植物等其他者关系的考量,关于生态文学主题研究以及跨界书写,均多从尊重自然的万物有灵论、万物平等的理念切入,最终归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深刻反思,呼吁人类省察自己对生态危机的责任。由研究者和践行者汇聚而成的生态学术共同体,对进一步繁荣学术,推动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者简介:梁坤,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 ABSTRACTS

###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in China: East–West Dialogue**

Holmes Rolston III

This article offered views on the problems of “art and nature”, “urban, rural, wild”, “residence in place” and “ugly”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This article combined the wester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nd Chinese philosophy such as Confucius and Mencius and offered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Beautiful China by discuss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nd eco-aesthetics,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se will have important effects to East–West Dialogue i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 **Three Perspectives of Rolston’s “The Wild”**

Zhao Hongmei

Based on collecting a large number of data,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specific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s, we’ve found that “the wild” is the key word of Rolston’s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After proposing “the wild”-oriented philosophy, value and aesthetics, Rolston sets the wild again as the core of his environmental thought. This article interprets Rolston’s “the wil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e wild and the nature, the wild and the freedom, the wild and the culture, arguing that the wild is the original state of the nature, the wild expresses the spirit of freedom, and the wild is interwoven and interconnected with the culture.

### **On Rolston’s View of Inner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Virtue**

Gao Shan

The study of Rolston’s eco-ethics has been on the rise in the field of Eastern and West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Most scholars are interested in the concept of inner value of the nature, but rare efforts are taken to deepen th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virtue. Rolston’s theory of inner value seems to challenge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virtue, so most academic explorations dwell on David Thoreau, Aldo Leopold and Rachel Carson.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although Rolston proposed setting up a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with the inner value as the core, it still can be seen that his opinions fall into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natur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explains why Rolston’s environmental ethics is a form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virtue by examining ecological rationality, imagination and emotions.

### **An Interview with Holmes Rolston III**

Zhu Jie

Holmes Rolston II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cholars in the world of ecological ethics. The “natural value theory” of ecological ethics which he proposed is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eories in this area. Rolston mainly introduced his recent work *Responsibility and Nature* and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generalized beauty” in this interview. He embraces nature with beauty, and brings natural beauty into the wider range of time and space. Pointing out that human’s lives should be multi-dimensional, he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three-dimensional man”. As to the nature restoration projects around the world, he believes that they should not only mean the return of plants and animals in environmental space, but also the restoration of systematic bala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while for Chine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theory, he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natural aesthetics and appreciate the original natural beauty.

**The Green Development Approach to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xi Province**

Huan Qingzhi

The green development approach to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n idea and/or strategy of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making use of the relatively rich natural resources economically and ecologically, which differs from the model of eco-modernization emphasizing the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relatively developed industri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such a definition, in a provincial area like Jiangxi which is rich in eco-environmental resources while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t is easier to transform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at originated from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and started a systematic reform in economy, politics, society and culture or an extremely complicated and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hole society and ecology into a green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ecologically and economically utilizing the rich natural resources. In other words, in Jiangxi Province, the process of re-recognizing the values of natural resources protection and re-finding the methods of their rational utilization, is also a process of actively promoting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or implementing green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though it is still too early to claim that there has already been a “Jiangxi Model”.

**Eco-marginal Predominance Effec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Zhong Xiaoqing

Marginal predominance effect, one of the ubiquitous interface effects in ecosystems, is applied in this article to studying the interface effect of Hong Kong's economy and society for the first time. Based on the findings that there are five interfaces of Hong Kong—the social system, east and west cultures, the financial time difference, Taiwan Strait, and the port, we've analyzed the eco-marginal predominance effect of the five interfaces by comparing their actual economic indexes. Moreover, drawing on the Donnan equilibrium theory of colloidal chemistry or physiology (micro-ecology) and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 of economics, we define the equilibrium market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se interfaces as the “osmotic pressure” from the permeation (import and export) between them. It is the exchanging effect of the interface “osmotic pressure” that accelerat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a certain extent. According to our research and analysis, the interface “osmotic pressure”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shows a tendency of gradual decrease with the mainlan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economy of Hong Kong, therefore,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Ecological Effects of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A Study Based on the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Panel Data from 31 Provinces (Including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Xu Zhengsong & Kong Fanbin

The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has different impact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impac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change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referred to as the ecological effec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the ecological effect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evolution, we've determin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coeffici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sectors, taken the 31 provinces (including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d the statistical data from 2000 to 2013 to construct panel data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mpact index for cluster analysi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pressur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creased nationwide from 2000 to 2013, and there were obv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we propose to accelerat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o encourage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to selectively undertake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to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rought b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rough technological advances.

**Energy Analysis of China and Mexic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Warm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Energy Model to the Diversified Energy Model** Juan González Garcí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warming, the surge in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large amount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e use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search methods to the energy field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China and Mexico. On the macro level, we are in contrast to the macro economic background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oil and gas energy. The micro level, we use the method of the type of analysis of the traditional energy structure in Mexico (coal, oil and natural gas) aims to present a kind of bilateral energy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renewable energy analysis of energy as a comparison point. Under the severe pressure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newable energy has become the common choice of China and Mexico. In addition, the renewable energy will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expanded in the future (the traditional energy model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a diversified model). Of course, this needs the positive actions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government formulates and implements the concrete and feasible environmental laws and policies).

**An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Yu Xing'an

The global eco-environment features integrity, circular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 so we need a “centralized” governance pattern to solve the global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However,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law enacted with the aim of protecting national benefits is confronted with the problem of “decentralization”. At the current stage we should properly face the fact of a fragmented international law system, and deal wi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by enforcing the law, establishing the mechanism of supervisio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key are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Dilemma of Avoiding “Control after Pollution”** Ju Changhua

The proposal of avoiding “control after pollution” has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against which is the theoretical support from planned economy, leaping development and Eco-Marxism. However, thes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have their historical limitations as they are not well put into practice and fail to curb practice in the actu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fact, the pollution problem was very serious in our country in the 1970s, while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 pollution has also accompanied our development and we have not yet worked out how to avoid control after pollu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appropriately face the dilemma and try to “control pollution” instead of “control after pollution”.

**On the Drinkable Water Supply and Rubbish Disposal in German Cities of the Middles Ages**

Jiang Shan & Hu Aiguo

As a result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commerce, slaves who had been gradually freed from feudal manor economy flooded into the cities. They beca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urban development along with city-dwellers, promoting the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urban prosperity in the mid-thirteenth century also brought about more and mor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of which drinkable water supply and rubbish disposal had been the most urgent and the most concerned since the Middle Ages and even during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

tiv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this paper focuses on drinkable water supply and rubbish disposal in German cities of the Middle Ages,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ity-dwellers'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 surroundings and tries to give a unique and innovative insight into the studies on German eco-civilization history.

**Animal Capital and Garbage Animal: Documentary Redemption and Hope** Chia-ju Chang

In capitalist system, animals are often taken as value-added capital or valueless detritus. How can films, the most powerful media today, with its political intervention, rescue them from the capitalist loop of "production-consumption-recycling"? With Nicole Shukin's concept of "animal capital", this article explains how animals and capitalism relate to each other, and their further relation with films. Due to the wide use of animals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and its film industry, it is appropriate to use the concept of "redemption"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role of documentaries (especially digital ones) in redeeming the film media (which serves as the accomplice of materialized capitalism as well as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animal bodies). From Shukin's "animal capital" to what I term as "garbage animal", this essay explores actions of the animal protection as well as its filmic rhetoric in documentaries. By tracing the animal capital and animal detritus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aries, it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relatively positive hope discourse and its rhetoric used by the activists of the animal protection.

**Henry David Thoreau as a Diarist and Surveyor** Zhong Yan

In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Henry David Thoreau is well known as a Sage of Walden. This paper, wit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 Year in Thoreau's Journal 1851* and *Walden*, argues that Thoreau holds two primary identities as a diarist and a surveyor. It particularly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cycling seasons and landscape surveying in Thoreau's nature writings to find proof for his eco-and-ego-in-one message to the world.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 Ecological Thought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 Overview of The 6th Cross-strait Ecological Literature Symposium** Liang Kun

The theme of the 6th Cross-strait Ecological Literature Symposium, successfully held in Beijing from October 29 to 30, 2016, is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 ecological thoughts". The symposium was organized by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f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re were more than 50 participants, including senior scholars and young students from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experts from Institute of Archeology and Ethnology in the Siberian Branch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representatives from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and editors from academic journals. The symposium covered multiple aspects, including comparison and conversa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cological thoughts, the religious and mythological traditions and ecological wisdom of aborigines, regional writing and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ecological literatur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cross-border writing of ecological literature and so on. This symposium highlighted a polyphonic chorus and ideological carnival of cross-cultural dialogue, cross-domainal communication an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injecting new vitality to eco-criticism and voicing China's opinions. Based on animism and the idea of "everything is equal", most participants proposed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anthropocentrism and appealed to human beings for pondering over their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ecological crisis.